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桑 兵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桑　兵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 007 号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桑兵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4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0761-4

Ⅰ.清… Ⅱ.桑… Ⅲ.社会团体–活动–研究–中国–近代 Ⅳ.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297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　　数 266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目　　录

自 叙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界定模糊的概念，同时又是很难弃置的概念。严格说来，中国是文化集合体，汉族与中华民族，都是靠独树一帜的文化来凝聚和维系。如果说文化是中国的灵魂，那么知识人便是传导灵魂于肌体的神经。从士子童生到新学师生，知识人扮演的角色都是文化载体，在将文化内化为主体意识的同时，使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中国得以聚合、延续、繁衍。古语云：国不可一日无君。其实中国历史上无君或名存实亡的时候不少，而国魂不灭，国体犹存，原因在于有一个由大大小小的士人组成的群体联结地方与中央，认同乡土与道统，维系传统与未来。就此而论，中国实在是不可一日无知(知识人)。令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大惑不解的问题之一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小传统千姿百态，根深蒂固，国家政权又相对简小，对社会控制也不严密的中国，何以能够经历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而凝聚愈紧，久不衰竭。而世界历史上单靠强权控制社会的大帝国，生命力鲜有持久者。纵览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人对于国家、民族、政府、地域的见解及其合群结社活动，可以悟出几分道理。近代人认为，亡国并不可怕，只要知识者的人心不死，国魂尚存，终有复苏振兴的一日。哀莫大于心死，国殇即是知识人心死的祭日，那时中国文化将变成化石。中国知识

人的使命的确任重道远，特别是在时代纪元新旧交替之际，他们如何在自我脱胎换骨的同时令民族重现生机，其心路历程值得深入探索。

然而，由于界定的含混，泛泛而论，未免失之空洞。中国近代新知识群主要由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以及接受西学的开明士绅三部分人组成，我的上一部习作即以晚清国内学堂学生为对象，这一部则以世纪之交的留日学生与新学之士为主，围绕他们的结社活动来探测其群体意识的形成及其如何活化国魂，维系国体。

对近代新知识群的分类定性，容易受时政与教条的影响而简单化。深入史实，发觉戊戌之际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磨擦冲突，不能完全纳入洋务与维新矛盾的框架，而从维新到革命之间，并非只有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后来也不单演化为共和与立宪的分歧。许多当事人都提到过那时趋新势力包含若干政见利益渊源千差万别的派系，其中多数人既不归附保皇，也未加入革命。夏曾佑称之为革政派。他们大都是受过不同程度西学熏陶的开明士绅，面对甲午战后“大局日非，伏莽将起”的严峻形势，感到“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他们担心国家陷入内乱外祸，一般不肯轻易诉诸极端形式。但如果朝廷官府一意孤行，弃黎民百姓于不顾，那么无论他们的思想学术多么正统，出身仕途多么纯正，都会暗中联合江湖草莽，断然实行暴力变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曲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矣。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汪有龄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 1059 页]总之，只要能救国，不排除任何方

式。在此宗旨和策略原则下，他们与各种反清离异势力广结善缘，尝试使用各种方式，只是在排满一点上，觉得没有必要。套用改良或保皇的政治框架，很难涵盖其灵活多变的策略方针与广泛复杂的社会联系。如果要找一个共同基点，那么必定是由传统士人天下己任的抱负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民主体意识交织而成。这种情况到 1905 年后依然存在，革命与立宪的对立，不能完整地表达新知识群错综复杂的政见分歧与派系关系。深入一层将甲午至乙巳间新知识界的变化发展从人脉上循序厘清，更能具体把握前后的联系与区别。

重现复杂的历史，必须从史料入手。史学本应首先仔细准确地揭示丰富生动的史实，然后加以归纳，而不能从主观演绎，甚至削足适履地牺牲史实以求吻合抽象的原则。本书对于史料史实，穷搜深究，不厌其详，并不以早有定论作为躲懒的借口。我想借以表达的，是自己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理想化观念（以前及现在研究的晚清国内学堂学生和近代传播业，寄托了我的另外两种理想观念），它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有的学者认为，考据和编年是史学的最后堡垒。在当代社会人文科学正日益分解化合史学的功能，因而令一些人彷徨于危机袭来之际，找到史学不能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基因，并大力发挥其潜力，实属必要。因为，与此同时，许多社会学科也正在从史学领域寻找创新的动力。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史学伴随古今中外的各种文明度过漫长岁月而历久不衰，其中必然蕴藏着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价值。认真领悟史学大师陈寅恪关于史料与史学的种种精辟论述，如预流与未入流，真材料与伪材料，多数汇集与少数脱离，真了解之同情与穿凿附会之列等，谁能说作为历史学基础和命脉的史料学只是简单堆砌，史学

没有深邃内涵？这种“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而得的“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具有民族与史学的两重不可替代性。只有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浩瀚史料，而重史信史又导致史实变形的环境里，才能产生史学的独特认识价值。拾遗补阙，辨伪求真，了解移情的过程，也正是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程。从中发现和揭示的，是历史固有的内在联系，而非外部强加的架构，可免“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之弊。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大师无不与史学相关，个中原因，除新学建立的时代潮流使然外，学科本身具有的超越与深邃，也昭示这是一片蕴育大师的沃土和托载哲人的磐石。

其二，史学的这一不可替代性功能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为重要。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明清以前部分，在传统史学度过正名、资治的混沌阶段后，从乾嘉汉学到近代新学，侧重发掘学术的独立价值，经历了数百年许多代人对于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排比考校，进而澄清史实，探求脉络，为分析阐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由此树立了可供后人仿效运用的学术规范。相比之下，近代史的研究起步晚，又与时政、思想缠绕纠葛，而且史料庞杂，未经充分的发掘整理。因此，研究者处理自己的课题更应慎之又慎，尽可能穷尽有关史料，并做足排比考校功夫，对史实的来龙去脉及各方联系了然于胸，再下论断，切不可以论代史，观点先行。否则，轻率结论只会令历史在不断增多的形形色色见解中日益失真。况且，就学术价值而言，论证的过程往往比结论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更能体现学术的规范性，更易于测量学术贡献的程度。任何一种选编过的资料，在推动和方便研究工作的同时，都难免或多或少地产生制约导向作用，甚至被视为取

巧的捷径。而学术批评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更助长了以臆念和二手资料拼装成果的不良学风，史学的严谨功夫和基本规范被忽略，甚至有关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最典型的事例是，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的属性，1962 年，金冲及、胡绳武先生就做过详细考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但直到 80 年代，多数著述仍然重复以往的误说。以两位先生的声望和《光明日报》的显要，这种有违于起码学术规范的疏忽实在令人费解。与对某些所谓热门论争趋之若鹜的情形相比，反差更为明显。

在没有经过认真清理的史料上构筑中国近代史的大厦，好比沙上筑楼，基础很难稳固。常用近代史料中有相当部分为回忆录，受时间、政局、人事等因素的影响，错误、疏漏、甚至有意掩饰夸张扭曲之处在所难免。保皇会的勤王运动，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即是显著事例。而大量原始资料又往往夹杂隐语代号，难以释读，容易引起错解，造成死结。更多的情况则是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一次性去伪不一定能还原史实，正气会即为一例。另外，美国的谢文孙教授曾以长篇专著审查分析史书，认为孙中山在辛亥时期的声望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旧正统史学所重构。这固然澄清了问题的一面。但我们重新查阅当时的各种史料，发觉孙中山的确得到新知识界，特别是激进分子们的普遍拥戴，只是带有几分偶像化色彩，而这种偶像化色彩后来被进一步渲染。由此可见，把领袖捧上神坛，不得不以真实价值为牺牲。而后来者在正本清源之际，应切忌偏执一端。由丰富史料带来的大量细节，对人物事件感同身受，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近代史研究中更为重要。以外在观念解释拼装，势必重蹈清代经学与近代古史研究之弊。如随着研究领域在时间和层面的不断下移，地缘性越来越多地支配了学术眼界。然而，这种受社会

学与人类学影响的观念方法，并非由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成。作为大小传统长期并存互渗的文化集合体，中国的知识人早有天下观念和大文化意识，并以此凝聚维系国运族体。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而为外部人难于理解。将近代知识界社团的地缘性由次要服从地位夸大为支配因素的解释中，不难察觉学者自身的乡土意识（来自学术渊源与社会关系两方面），实际上是套用观察分析上古初民或近代部落社会的方法观念看待中国文化的错位。

有人认为，史学只能重构而非重现历史。按照克罗齐的看法，历史总是人们心中的历史，因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即使不受克罗齐的影响，也早有人批评乾嘉汉学的考据后来失之繁琐。如果将问题的一面引向极致，我们不能不同意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然而，从另一角度探查，见解可能大相径庭。描述一段历史的代表性版本，如果细节上存在过量的错漏、含混、歧异之处，势必引起对整体可信度的怀疑，表明研究尚处于有待于完善深化的成长阶段。随着众多具体问题的填充补白，纠谬匡正，总体格局很可能会相应改观。庚子年那一幕大戏的底本与流行版之间的差异，便是有力例证。诚然，对历史的认识永远不会与历史本身完全重合。这里要强调的是，差距越大，研究的成熟度越低，发展潜力越大。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仅层面亟须扩展，即使就政治史而言，也远未见底。只要做足史学的基本功夫，心中的历史与古人的历史就可以不断接近沟通，而免于清代经学与近代古史研究的流弊。

其三，不论克罗齐如何说，求真始终是史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促使认识与史实的不断接近，而是那样一种追求体现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崇高境界。近代学术大师王国

维将文史哲作为真善美的载体,从中发掘人类价值的极则。无独有偶,西方哲人马斯洛也以真善美为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而华夏先贤则视文史哲为致圣之道。孔子影响后世既深远且广大的《诗经》、《春秋》、《论语》,以现代的分类,即分别代表文史哲。春秋笔法固有其伦理标准,但孔子只是依据当事各方的身分地位,通过表述隐寓褒贬之义。东西贤哲所体现的,是永恒与短暂的抗衡。古往今来,任何需要牺牲史实才能维护的准则,或迟或早总要调整变更。而包括求真在内的对永恒的追求,正是知识分子坚持社会良心的基本规范。悖离于此,便仅具躯壳。本世纪中国人追求过太多的短暂,到头来盛极一时无不化作过眼烟云。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本身必定蕴藏着大量永恒的基因以及表现永恒的形式,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就史学的学术性而言,考据编年不仅有作为规范化史学最后堡垒的消极永恒,更有以求真达到人类终极境界的积极永恒。与其分心于那些轰动一时,快意片刻,而很快便时过境迁,弃如敝履的短期效应,不如反璞归真,从基础功夫中探寻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独步当世的内在价值,以免在亢奋与忏悔的轮回中痛苦一世,或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人生。这并非排斥求新创意。只要我们按照严谨规范老老实实地继承前人(史学常青与永恒的唯一秘诀便是传承),从而理解和运用地道的西学与地道的中学,就能够领悟并且进入学问无所谓中西新旧有用无用的意境。

弃短暂而求永恒,是我对于社会、人生、宇宙的领悟。尽管短暂多于永恒,我却有幸沿着历史与史学的纽带把握住永恒,并由此捕捉到中国知识人的使命与史学功能价值的结合点。

幸而在求真的荆途上并非孤身跋涉。我先后在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受惠于

几位学问风格堪称楷模的导师的教诲，并且承蒙他们赐福，得以和许多师长同仁朝夕相处，请益切磋，又结识了海峡两岸众多的前辈同行，更得到海外学术界师友的关怀帮助。他们的指教、勉励、督促、提携，成为我专心向学的动力、依托和屏障，令我对世人视为畏途的茫茫史海钩沉发生莫名所以的沉迷与执着，从中领略到人生的极大喜悦。我要特别感谢日本亚细亚大学的容应萸博士、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教授、神户学院大学的中村哲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故李宗一副所长、王学庄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陈匡时教授，本书几章中的一些关键资料，是他们慷慨提供或指引迷津，予以方便。否则便难以解开死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那种对于后学的支持和对于学术的热衷，成为我将学问当成目的而非手段来追求的精神支柱。

1992年盛夏于广州康乐园

第 1 章

兴汉会的前因后果

兴汉会是庚子前兴中会与长江流域秘密会社结交的组织形式，又与汉口自立军密切相关。但有关资料多属事后回忆，因而长期语焉不详，且多舛错，很难据以判断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宗旨策略及其与各方的关系。80年代中期，日本的上村希美雄先生根据东京对阳馆所藏与会人员当时的题词，撰写了《从旧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一文[1]，对该会的成立日期、与会人员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我在参与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时，利用上村先生赠给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的对阳馆藏史料照片，参照其研究成果以及其他资料，对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并在《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一文中略加论述。[2]近年来，围绕此事的新史料不断有所发现，在排比考校的基础上，对兴汉会的缘起、组成、演变、归宿及其内外关系进行综合论述，已有可能而且必要。

一 缘起

兴汉会由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此事缘起，据

林圭说:“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3]中峰,即孙中山,安兄,即毕永年,当时其易名为安永松彦。[4]两人是兴汉会成立的关键人物。

戊戌前孙中山主于外,含义有二,其一,孙中山一直主张利用和改造民间会党武装进行反清革命。1896－1897年滞留伦敦时,他“每日入图书馆,考查欧洲会党发达之历史,思为本国人谋其改良进步,知其不可以压制除也,冀有以利导之”。他认为:“我国虽式微,即彼野蛮会党,其初起时曷尝非政治上之目的,抑亦有种族之关念存也。”[5]与之关系密切的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对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形相当熟悉。伦敦蒙难事件后,记者曾向他采访对中国会党的看法,他说:“中国私会在在皆是,推原私会之起,大半因敝政府所致。官长贪暴,故百姓结成私会,为自护计。”“其中最强者为哥老会。此会结成已久,入会之人现在约计一兆名。其结会之意,专与官长相敌。而会势之所以强者,以会首有所晓谕,会中之人莫不唯命是听,而生杀之权,操自会首一人。”[6]孙中山可能与他讨论过哥老会的问题。据南方熊楠称,他最早就是从道格拉斯处得知孙中山其人的。[7]其二,孙力图将兴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扩展到长江流域。兴中会虽以粤籍人士为主,但孙中山决非自囿畛域,其大中华观念使之从一开始就以建立全国性组织为目标,以拯救中国为目的,兴中会章程明确表达了这种意向。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一度想把发难之地向北推移。1897－1898年间,他与宫崎寅藏讨论过四

川、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地利人和，虽然认为广东利于聚人，但也同意海州利于接济和进取。同时他还注意到湖南的社会变化，既觉得湘鄂"多是粗蛮之人，虽富豪子弟亦不读书，多尚拳勇之徒"，又赞叹："湖南一省昔号为最守旧之地，今亦改变如此，真大奇也。"[8]

作为鼓于内的关键人物，毕永年"八岁即随父叔来往军中"[9]，又夙具种族观念，早已暗中与会党有所联系。戊戌之际，康梁等翻然变计，独毕氏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与湖南各地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往来，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政变前夕，康有为以其为会党好手，命他率兵督袁世凯军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毕认为袁不可信，予以拒绝，离京至沪，闻政变"自断其尾，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10]然后迳赴日本，见孙中山，入兴中会。不久，唐才常亦东渡日本，由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结识，商议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计划。是年11月唐才常奉康有为之命归国运动起兵勤王，临行告诉平山周，湖南哥老会有起事之兆。毕永年虽不知湘中实情，也接到湖南"飞电急催"，感到形势"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告诉犬养毅："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回因西后淫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11]，并请求犬养毅鼓动日本政府出面干预。平山周闻讯，以为起事应四方同时并举，独湖南一隅兴师必不利，因而与孙中山等商议。孙乃趁机派毕永年、平山周赴湘鄂考察哥老会实力。出发前，诸同志为其设宴饯别，席间毕永年赋诗叙怀："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族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

地澄清今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瞋看玉帛当重来。"[12]抒发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情绪和坚定的赴义决心。11月15日，宫崎寅藏特赴横滨为平山等人送行。[13]

毕永年、平山周经上海行抵汉口，与林圭相会。平山对林十分器重，赠以宝刀，并偕游长沙、浏阳、衡州等地，访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李堃山、张尧卿等人，向他们讲解兴中会宗旨及孙中山生平。[14]毕永年"因谭（嗣同）死而九世之仇益横亘于胸中，遂削发往来江湖间，欲纠集同志。林尝左右之，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为一大变。"以前"林囿于欧（榘甲）说，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见闻既广，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为井蛙夏虫。由是废弃文学，以实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畅于理想之一途。乃与毕氏谋纵火于长沙，因而袭取之，沿江而下"。[15]一些史料和著述称毕、林偕游及谋攻长沙发生于毕氏东渡前，其实政变后毕即径赴日本，上述事件应在其从日本返国之后。可惜林圭年少，阅历不足，而毕永年理想虽高，却缺乏条理，计划不克成就。行动失利，毕氏到汉口任《汉报》笔政，等待孙中山的指示。毕、林之谋表明，湖南人士曾一度想独力举兵，未达目的，更加重了对孙的寄望。

毕永年活动于湘汉之际，平山周回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哥老会龙头多沉毅可用，毕永年所说属实，而且会党均翘首以待义军。如兴汉会揭竿而起，必定天下响应。孙遂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年夏，毕永年再次赴日，奉孙中山之命二次内渡，偕各龙头赴香港与陈少白协商合作办法。[16]这时粤港兴中会员静极思动，屡请行动，孙中山传令不得轻举。其用意显然是想突破1895年广州起义囿于一隅的局限，掀起全国大风潮。为此他提议先派兴中会员去菲律宾"参与阿氏军队，帮助他迅速成功，然

后将余势转向中国大陆，在中原发动革命军”。[17]这里中原并非泛指，而是对湘鄂有所布置期望。

1899年7月11日，宫崎寅藏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视察地方帮派情况，7月28日抵香港。[18]这时陈少白接到毕永年来信，知其“将率领哥老会的首领数人到香港”，因而让宫崎暂缓进入内地。9月，哥老会首领持毕永年介绍函先到，其中两位骨干主动向陈少白等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我国岂能固步自封？”提议合并三合、兴中、哥老三会以及拥立孙中山为首领，并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所以，对孙先生期待甚切。希望毕先生到后共商此事。”[19]宫崎闻听之下，大喜过望，立即汇款给因阮囊羞涩而滞留上海的毕永年，促其速来。[20] 10月初，毕永年赶到香港。几天后举行了合并会议。与会者共12人，其中哥老会7人，三合会2人，兴中会3人。属哥老会者为李云彪、杨鸿钧、辜人杰、柳秉彝、李堃山、张尧卿、谭祖培，属三合会者为曾捷夫、郑士良，属兴中会者为陈少白、毕永年、王质甫。[21]因事先酝酿成熟，很快便接受毕永年的提议，决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名忠和堂兴汉会，以兴中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为总会政纲，并歃血盟誓，刻制印信奉呈孙中山。[22]

10月11日晚，为庆祝合并成功宫崎寅藏在香港的日本饭馆设宴招待众人，出席者除参加合并会议的12人外，另有4人。席间宫崎按日本武士出征的礼仪，为每人摆上一尾生鲤鱼，并解释道：“现在诸位已将三会合而为一，行将一举推翻满虏，岂不也是要走上新战场吗？”[23]遂与众人大杯豪饮尽欢。宾客纷纷为宫崎题词赋诗作画于短外衣上，王质甫诗曰：“英杰聚同堂，诗酒

记离觞。从今分别去，戎马莫仓皇。”陈少白诗为：“温温其人，形影相倚。昔有书绅，今昧此意。”毕永年诗：“金石之交，生死不渝。至情所钟，题此襟裾 。”柳秉彝诗：“将相之才，英雄之质，至大至刚，惟吾独识。”李权杰诗：“牡丹花伴一枝梅，富贵清闲在一堆。莫羡牡丹真富贵，须知梅占百花魁。”辜人杰诗：“负剑曾来海国游，英豪相聚小勾留。骊歌一曲情何极，如此风光满目愁。”张灿（尧卿）诗：“久聚难茶（?）别，秋风咽大波。柔肠君最热，离绪我偏多。恨积欲填海，心殷呼渡河。为胶交正好，此去意如何。”谭祖培诗 ：“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24]湘鄂会党首领多为粗人，而与会者除杨、李两位山主外，个个能诗，应是经过刻意挑选，以便与知识人居多的兴中会打交道。但这样一来，代表的权威性便要打些折扣。

兴汉会成立后，与会者分三路赴两粤、闽浙和上海，将结果向各地同志汇报。宫崎放弃了进入广东的计划，于 10 月 21 日与陈少白离开香港[25]，返回日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呈献兴汉会会长印信。11 月 9 日，舟抵横滨，两人迳往孙的寓所。[26]善于把握机会的孙中山趁势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广州起义前，兴中会内部两派曾就这一位置发生纠纷，杨衢云虽然当上会长，但在海内外的影响远远不及孙中山，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视孙为首领。伦敦被难事件后，陈少白在日本《神户新闻》撰文《中国的改革》，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 ”。谢缵泰即致函转载该文的《中国邮报》，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 ”，“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27]这种名实不符与内耗的情况不利于兴中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孙中山的

要求与杨衢云的让步，都是顺乎情合乎理之事。

二 维新派介入

兴汉会的缘起，与维新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一批维新人士亡走东瀛。孙中山屡次主动前往拜访，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为拒绝。先此，1898年7、8月间，东亚同文会的井手三郎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中西正树、菊池谦让、神鞭知常等频繁往来，“商议联合各派力量”[28]，试图利用变法维新之机，加紧对华行动。因而孙康合作也一度为日本人关注支持。无奈康有为十分顽固，担心与反清人士交往有损其忠臣形象，危及权力来源。早在政变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荐的毕永年，令毕觉得“殊可笑矣”。[29]到日本后，康有为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且不赞成保皇主张，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双方矛盾日趋尖锐。据说康因毕永年在某报播扬其阴谋，“益深切齿毕，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横滨一带地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30]双方可谓势不两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关系复杂化。唐虽有种族意识，但对康有为十分钦佩。戊戌后，他力主起兵勤王，并希望联合各派势力大举兴师，游说孙中山接受两党联合进行的建议。孙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31]唐才常得到这一允诺，邀梁启超同向康有为进言。尽管后者固执己见，联合努力一再受挫，孙中山却未就此放弃。他一面与唐才常订约合作，一面努

力争取梁启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问题上并不以康有为的顽固立场为然，比较热衷于联合。1898 年 11 月 24 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这显然是指唐才常。同时，"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32]这里则是指草堂系师徒。谢缵泰从 1896 年起就与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有所接触，洽谈过联合与合作。无论从宗旨的分歧程度还是声望的高下着眼，康有为都宁肯接受杨衢云而避开孙中山。在谢缵泰的劝说下，他表示赞同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1899 年 3 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等与兴中会的交往明显增多。尽管在组织合并方面仍存在诸多分歧，但双方关系日见紧密。湖南维新派与兴中会的成功合作，对于梁启超无疑有所触动。而孙、梁关系的发展，又对唐才常、毕永年的交往产生影响。

唐、毕二人的宗旨立场明显有别，因此杨衢云称前者为湖南维新派而后者为湖南革命党。[33]但两人都是谭嗣同的旧交挚友，政变后一勤王一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要为谭烈士复仇还愿，实现其未竟夙志。同时，他们彼此也堪称生死之交。政变前夕，毕永年请康有为急催唐才常入京，与自己同担捕杀西太后的重任。仅此一事，可见两人肝胆相照的互信程度。毕虽与康有为反目成仇，对唐才常却深信不疑。而唐为实现大举计划，既要借重康有为的声望资财，又要依靠毕永年的会党武装，同时还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开明士绅等各种政治派别沟通合作。1898 年 11 月，毕永年与平山周抵达上海后，得知唐才常与康有为保持联系，颇为不满，但并未因此产生戒心。次年 10 月他赴港前羁留上海，当与唐才常接洽，甚至可能就住在唐的寓所。兴汉会成立后，宫崎、陈少白赴日途经

上海，曾登岸拜访唐于其寓所，并将吴坚如托付给他，请其设法引至湖北。所以，毕永年联络湘鄂会党成功的消息，唐早应获悉。

当然，保皇会中对合作一事反应积极的只是梁启超等人，兴中会对于康有为一派染指兴汉会的企图不无警惕。毕永年到港，而合并会未开之际，湖南哥老会首领师襄也从上海赶来香港。师襄字仲吉，尝从谭继洵仕清，以军功保都司，任谭的卫队长。后弃官随谭嗣同四处奔走，戊戌后改投唐才常。他素为会党中人，是哥老会的股肱，但兴中会怀疑他私通康派，欲将其排斥于会议之外，经宫崎劝说才改变态度，好意款待，以促成合作大局。会议前夕，师襄忽然潜往广东，此行极可能是与当地保皇会或澳门总局接洽，归来后即诈称在粤接到急信，"说我党已在长江一带起事。目下众首领皆在此处，而部下竟轻举妄动，若不赶紧前去领导，只怕要惹起不测的祸患"。使得同寓的会党首领人心惶惶。幸而宫崎当即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谣言"，才稳住军心。宫崎察觉到师襄"勾结康派，企图从孙派手里夺取这些帮会的领导"的用心，与陈少白商议，以托其照顾内地同志为名，将他支走。师襄临行表白："心里并没有孙、康之别，只愿能同心合力早日起义。"[34]此去即赴上海，参加唐才常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正是通过上述途径得知兴中会与湘鄂会党结盟的确信后，函邀林圭等人归国筹备起事的。先此，林圭"以急激故，亦为乡里所不容"。[35]1899 年 7 月，应梁启超之招赴日，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因费用仰给于粤商，横遭他人白眼，又受日本报刊辱骂中国人的刺激，加上他以实行为目的，读书非其所好，遂向梁启超请求归国。恰值唐才常函邀，于是顺

势踏上归途。11 月 13 日，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人在东京红叶馆为其饯行。是日上午 7 时，孙中山和陈少白由横滨赶赴东京，与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会晤后，出席红叶馆送别会，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也在座。席间各人举杯预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36]林圭出发前亲诣孙中山请益，孙为之介绍在汉口俄办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员容星桥。[37]这时孙已经接到陈少白、宫崎送来的印信，是以兴汉会总会长的身分与会。而林圭回国的目的正是到湖南联络会党。所以，孙中山允诺提供帮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红叶馆送别会出现于孙、梁合作的高峰期，当时双方正进入洽商联合组党的关键阶段。但唐才常虽与孙中山订约合作起兵，也只限于殊途同归。而孙、梁关系不断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在康有为阻挠、华侨中两派冲突及诸同门掣肘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态度时冷时热，不仅曾明确表示暂时不愿合作，甚至一度“踪迹不得不疏”。[38]况且梁本人也有宗旨利益私见。因而双方联合中竞争时起，共事时磨擦不断。唐才常让林圭回湘，显然是想利用毕永年取得的成果，增强己方实力，与兴中会保持均衡。本来毕永年赴湘联络会党，即与唐才常协商确定，只是他不满于唐与康有为来往，而奉孙中山为领袖。所以唐才常也不便直接找毕，要拉林圭代为出面。但唐并未到湖南从事过组织发动，只能提供一纸计划，而无任何实际准备。孙中山虽然答应与梁、唐合作，可是组织合并尚未实现，他不会轻易将刚刚到手的成果拱手送人。他答应向林圭提供的，只是外部帮助，而不是奉上兴汉会的组织系统。

红叶馆送别会后，林圭当晚乘船前往神户，与田野桔次同赴

上海。和他同时接到唐才常邀请的“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发”。[39]此4人应为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唐才中。宋恕日记载：己亥十月，“晤湖南自东回田、李诸君。”[40]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称：“唐既有志于湘鄂，以林与会党素有关系，乃约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国大举，复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粤人黎科、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林圭等人系高等大同学校同学，行动自如，而傅慈祥等分属成城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和日华学堂，不能无故离校，直到次年暑假才归国参与自立军事。据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自立军之失败》记：林圭“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长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另据黄中黄（章士钊）《沈荩》：“己亥冬，林圭乃返国，偕之者五人，即李炳寰、田邦璇之流也。”[41]而秦力山《说革命》称：他于旧历腊月往天津，次年2月经上海至汉口，[42]似不在同行之列。林圭抵沪后，与唐才常、张通典相会，在唐的寓所住了一星期，然后与沈荩等一起出发赴湘。唐才常于1899年11月21日手书一函，托林圭带到汉口面呈东亚同文会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函谓：“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重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43]此行真实目的，三年后田野桔次在所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予以披露：“湖南以长沙为首府，掘湘江之委流，帆樯殷阗，百货充斥，固支那革命之一大市场也。爰拟于此设哥老会之中央本部，以为革命之运动。惟哥老会名目，不可公然发表，而为满清官吏之所侧目，故使予开学校，并设新闻社，暗中盛为运动。”他们准备途经汉口时，知会张之洞，利用其为保护。不料“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所谓

"三愚物",当指白岩龙平、宫阪九郎和荒井。据前引唐才常致宗方函:"顷悉白岩、荒井、宫阪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由于白岩等人从中播弄,"因不能笼络张之洞,倘往湖南,则余辈之生命,恰如风前之灯,其危险不可言喻"。[44]林圭只好放弃原定计划。直到这时,唐才常与兴汉会的关系仍是相当表浅的外在间接联系。如果认为林圭等人一开始就以汉口为目的地,则不免夸大唐派勤王计划的组织准备程度。实际上,戊戌后唐才常只是短期回乡省亲,因遭顽固党纠集无赖围殴,即匆匆离去,并未与会党建立密切关系。[45]其主要活动舞台是上海。

三 意外之果

田野桔次说:"予于湖南计划之运动既为三愚物所破坏,其反动之势力遂转而成两方面,一曰汉口之旅馆,二曰上海之正气会是也 。"[46]这两方面都导致唐才常、林圭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的加速结合。

"湖南之行既不果,少年林君留汉口,谋为哥老会之所寄宿者。开一旅馆,平时以为生业,而阴以便其党徒,实以为会合商议之聚点。盖哥老会员常集于此,以计东西之连络也"。[47]林圭临时改变计划,原来的中转站成了目的地,一时间财政上"穷无所告 "[48],人事上无从措手,不得不求助于毕永年和容星桥。本来孙中山介绍容星桥给林,不过是便中相助,现在却成为林圭的主要依靠。而容星桥也积极施助。他和毕永年分别捐助林圭三

百金、二百元，以解燃眉之急，使之站稳脚跟。又与林圭次商议，认为“必大合而后能办妥”，在汉口设立公所一处，一则为群兄议会团聚之地，以免人心涣散，二则掩人耳目。开始容星桥欲将公所设在租界，因房价太贵，改在僻静的老官庙择上首小房一所。同时，林圭还与容星桥、张尧卿计划开银矿轮栈，以筹款聚人，并派人到各路探险联络，以“义群公司”名义相号召。本来唐才常邀林圭回湘，既有利用毕永年所招会党势力之意，又想通过师襄等以本派名义重新聚合。至此，则只能依靠兴汉会的现成力量了。好在毕、林原有合谋长沙之议，而兴汉会又因毕永年移居汉口而将活动重心转到湖北。

与毕永年、容星桥的联系使林圭等人得以结识兴汉会的湘鄂哥老会首领。1899 年 12 月下旬，辜人杰、张尧卿及其同志 26 人在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宴请田野桔次，其中半数以上是会党头目。他们刚刚从香港聚会归来，一见田野桔次“即奋呼曰：‘日本豪杰来！’”以玻璃大杯豪饮数十杯。田野以此非中国习俗，不胜奇异，乃叩问张尧卿。张大笑答曰：“此是香港流行之饮酒法也。吾尝在香港与日本豪杰宫崎滔天会饮，即是滔天之传授也。”酒至酣时，哥老会员“裂眦大骂，放歌高谈，颇有无赖汉之状。惟张君震声高吟亡国之诗云：‘神州若大梦，醉眼为谁开？湖海诗千首，英雄酒一杯’。”[49]这一结合对双方均发生重要影响。林圭方面，开始将自己与孙中山、兴汉会相联系，认为所从事的是继续两年以来由孙中山筹划，毕永年、平山周实行的事业，遥奉孙为首领；派张尧卿与容星桥一起专程赴日，向孙中山汇报有关情况，请其务必商定办事的方针规则，以便加速开展活动；人事安排上也十分重视孙的态度意见。孙中山方面，林圭的转向和汉口的进展，促使其相应调整对策，委派容星桥“专办

湘汉之事"。尽管在具体方针上与张尧卿等"所商尚无一定之规"[50],但已不仅是从旁协助。至此,双方都倾向于真正的合作大举,并将长江中游作为重心。

然而,正气会的成立却对汉口方面林圭与兴中会的合作产生牵制作用。湖南计划放弃后,唐才常召沈荩回沪,加紧筹办正气会。先此唐在沪已开始联络各方人士,其寓所中"海内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续而来"。[51]只是因为行动重心定在湖南,暂时未在东南一带筹建组织。湖南计划受阻,唐才常决定汉口、上海并重,发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会党和革新志士,由林圭负责汉口,运动湘、鄂、皖、豫、川各省;他本人则负责上海,主要运动江淮地区。

1899年12月下旬,正气会成立于上海。关于该会成立的时间及成员,历来说法不一。1984年胡珠生发表《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利用《宋恕日记》等资料,力证《正气会序》为丁惠康所撰,强调丁惠康、汪康年在创立正气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2]但他在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人记载之误的同时,忽略了许多当时的文献资料,过分侧重于从宋、丁相交的角度立论,完全否认唐才常的地位作用,不免以偏概全。对此,陶季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正气会的创建者不能排除唐才常。但其考证仍嫌粗疏,特别是未能从时间、组织上划清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界限。[53]此事关系到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倒戈"的时间及程度,有必要详加考论。

据直接介入唐才常等人活动的田野桔次称,正气会是林圭等湖南之行受挫的产物之一。其筹划或早已开始(《正气会序》写于1899年夏),但未付诸行动。湖南之行不果,唐才常加快了组织步伐。"正气会之宗旨,以纠合爱国正气之仁人君子为主,

此虽空空漠漠之立意，然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期合群。于时天下英雄来集者甚众：其由哥老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由革新派来者，即周某、汪某、欧某、丁某、叶某等也；而湖南青年党首领唐才常及沈克諴，实膺此会首领，沈为事务员”。[54]哥老会之人应为张灿、辜人杰等。兴汉会成立后，部分成员奔赴上海，风闻唐才常得到康有为的资助，掌握海外华侨大笔捐款，不免心有所动。而且辜人杰驻防江宁，联系便利。革新派人士应为周善培、汪康年、丁惠康、叶瀚，欧或指欧阳柱（石芝），但宋恕说此人不赞成开正气会。[55]唐才常的首领职位正式名称应为干事长。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致函汪康年，谈到正气会事务时问：“浩务任干事长，绂臣复何如？”[56]则正气会前期干事长为唐才常，后改由叶瀚担纲。

正气会成立的时间，《宋恕日记》有如下记载：“（光绪己亥十一月）是月下旬，汪穰卿送《正气会章程》来，我不敢入会。”“十二月初九（1900年1月9日），候穰卿，劝勿开正气会，以免风波。同日，候石芝，石芝所见与我同。访丁叔雅，次日丁来访，均未晤”。[57]而1899年12月30日宋恕致孙詒书称：“丁中丞之公子叔雅者，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开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弟力谢之，不敢列名。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未知诸君之肯从忠告否也。”[58]一人两说，先劝其“解散”，又阻以“勿开”，令人对该会成立与否大惑不解。

宋恕并未参与正气会，认识丁惠康又在1900年2月，其记载只能证明他本人何时与该会成员发生何种程度的联系，而不能确证正气会成立的具体时间。因此与会诸人的行踪成为判断的重要依据。周善培，字孝怀，思想新颖，议论豪爽，历任数省督抚幕僚。1899年秋，奉川督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务，由梁启超介绍访晤孙中山。[59]同年12月19日，梁离日赴檀香山，周善培也归国抵沪。适逢唐才常等筹组正气会，他虽然预料会务难以扩展，仍欣然加入。而且此后不断与汪康年等通信，关心正气会的活动，对于"正气不张，不幸如仆往日所料"感到"太息"[60]。并设法调解内部纠纷。周于1899年12月26日离沪，次日曾在镇江舟中致函汪康年，告以"相别至耿耿"，请其代收遗落之物汇寄汉口。正气会成立应在此前。唐才常的行踪更为关键。据田野桔次记，正气会成立后，"丘菽园深爱唐才常之人物，赠金三万元，曰：'此金虽微，如可以充天下之用，则请用之。'唐才常即日出发而赴香港，由香港银行受领此金。由是正气会一时繁昌，革命之光鋩愈益闪烁于眉睫间矣。"[61]据查，己亥冬唐才常确曾赴港。唐才质所编《唐才常烈士年谱》记："(己亥)十二月初三日(1900年1月3日)，师中吉自湘来，拟在湘组织机关，与汉口相接应。公以经费无着，乃谋至香港筹款。初五日买船票，狄葆贤拟买二等票，公云：'我辈个人用费，宜省得一文是一文。且我既任此等事，尤宜以吃苦为前提，不可图舒服也。'于是乃购三等票三张。船客多，已无余位，只得在船尾近舵之货舱角落，藉以安身。又值风浪大作，师中吉生平未坐海轮，呕吐不堪。三人皆三日夜未进食也。在港华侨无以为意者，再三设法，仅得二千元。香港用小角，实仅千八百余元也。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炜萲（菽园）始汇二万元来，此时沪款已将罄矣。公乃亲携

此款往汉，后又凑一万元由禹稽梅带往。"[62]此说时间与田野桔次所记吻合，且有周善培致汪康年函为旁证。1900年1月3日，周于九江函询："佛尘行乎？"[63]当指其香港之行。1900年9月3日康有为致康同薇书也提到，唐"去年十二月来盘桓数日，今遂永诀"。[64]至于筹款情形，唐才质似有所渲染。丘菽园赠款给唐才常，沪上人所共知，唐也以此自傲。夏曾佑曾对汪康年说："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耳。"[65]则田野所记较近事实。由此可见，正气会应成立于1899年12月22—25日之间，所以宋恕在12月30日函中才会提及力劝与会诸君从速解散之事。而他在1900年1月9日劝汪康年勿开正气会，意思应是让正气会停止活动。

唐才常匆匆赶建正气会，目的之一是便于赴港之际向华侨及港澳人士募捐，以吸引会党豪强。而他担任正气会首任干事长，除个人影响和实际作用外，强劲的财政后援无疑是重要因素（后来中国教育会也曾因经费问题而改选黄宗仰为会长）。当时汪康年、丁惠康、叶瀚等人经济上均感拮据，维持生计尚可，出钱搞政治活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财政优势不仅扩大了正气会的组织声势，吸引哥老会首领归附，也使林圭等人更加倚赖唐才常。因为财政困难恰好也是兴中会的一大弱点，很难在这方面展开竞争。师襄鼓动唐才常去香港筹款，目的之一，就是在湖南组织机关与汉口接应。他已被排斥于兴汉会之外，只能借助于海外捐款与旧日同党沟通。否认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得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难以解释。至于宋恕的记载，只能说明他本人所知道的事。唐才常为人"深鸷"[66]，"固非轻率举事之人，常取沈重之态度，决不至为众人所煽动也"。[67]正气会务分为内圈外圈，唐才常主要关注内圈的人与事，以举兵勤王为

职志。他虽与宋恕相识，但也知其为人怯懦，缺少胆识，不肯与之深交。两人自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结识，整整4个月后，9月23日宋恕致函梁启超时还说："拂尘信不愧复生之友，但得见尚希，其深未悉。"只能从其所著《内言》中窥见性情见解。唐才常当然不会因这种泛泛之交而出面联络。所以，争取宋的使命由汪康年承当。而汪与唐矛盾甚深，言语间自然多提丁惠康，使宋恕产生错觉。宋恕连正气会是否成立、具体何时成立亦不知其详，所记只可证实丁、汪的作用，而不足以否定唐才常。

"义群公司"和正气会的设立，形成长江流域革新势力联合大举的雏形，也奠定了唐才常等人在趁时而起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中的中枢地位。

四　天平倾斜

证实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作用，可以说找到了正气会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联系的关键。正气会的目标，并非如公开文字所表述的，只讲"爱国忠君"，意在恢复清议。唐才常等人是要借此聚人筹款，密谋起义。领到丘菽园三万金赠款后，唐于1900年1月"蓬蓬然归于上海"，并携归海贼三十二三人，计划一面由田野桔次率海贼入京，"期于正月之祝节杀北都西太后，并逐尽所有奸人"，"打碎北京政府"，一面率辜人杰等会党首领于"来月下旬，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略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图天下"。[68]内圈之事大张旗鼓。唐才常在江淮地区依靠的会党，一是徐宝山、张金山、宋刚涛、黄金满等地方豪强，二是辜人杰、杨金龙等驻防湘军中的将领。而辜正是结盟兴汉会的哥老

会首领之一。

正气会成立时，毕永年亦参与其事，这说明兴汉会成立前逐走师襄主要是反映兴中会的态度。这种差异客观上为哥老会首领与唐才常结缘创造了条件。不过，毕永年对唐才常坚持忠君爱国，反对顽固党而拥戴光绪的宗旨强烈不满，与孙中山一样，他强调排满革命的重要性。而且他与康有为的关系势同水火，坚持要求唐才常改宗旨为排满非君，断绝与康有为的联系。唐坚不肯从，会党首领又转而事人，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早与佛门有缘，起初不过剃发绝清，伪装和尚，后在香港邂逅同乡前辈释紫林，与结弟子之缘。[69]这时更愤而弃事为僧，易名悟玄，贻书平山周志别："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他声称："日内往浙江普陀山，大约翌年华三月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而安，不复再预人间事矣。"[70]打算云游四海，老此一生。

毕永年出家入山，除了与唐才常及会党首领的冲突外，别有隐情。1900 年 1 月 26 日林圭在致容星桥书中谈及此事时说："知者以安兄之急于办事，一有不获，则不免于燥，而出此无益之为，然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热肠，尚欲弃而为僧，其事必有因，则难免因而解体。"[71]个中原因，1903 年秦力山写《庚子汉变始末记》为毕氏作传时，曾有所提及："顾毕尝与兴中会事，其后亦卒不合。"[72]可见他深知其中底蕴。1901 年，秦力山在《国民报》上发表《中国灭亡论》，对保皇、革命两派均予抨击，显然是针对庚子之事而发。他指责"以颠覆政府自命者"为"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大势不能允许改朝换代，另立新皇，"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

便其私图”。其证据是，华盛顿、鸦军阿度等倡革命求自立而不亡他邦匿异国，其人却“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以一人当之”，“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己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73]这番话很可能是代毕永年传言。其后秦对孙中山的认识加深，又读了《三十三年落花梦》，心目中的孙文已由“广州湾之一海贼”变成“异乎寻常之志士”[74]，于是写《庚子汉变始末记》时有意隐去毕氏因误解而生的责难。此说若能成立，则毕永年出家的原因之一，当为其急于办事，而孙中山则“尚无一定之规”，疑心后者不敢举事，故意拖延。

孙中山虽然对兴汉会的成立感到欣慰，委任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又殷切款待远道专程来见的张尧卿，但对于将组织活动重心转向湘鄂，的确没有充分准备。其本意在于扩张势力影响，以广东为立足点，而以长江为响应。加上关于张尧卿有不少流言蜚语，毕永年又弃事为僧，更不敢倾全力投向长江。孙中山与湘鄂的联系主要得力于毕永年，他听说毕“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75]从自立军后来失败的情形看，孙中山的谨慎并非事出无因。但如此一来，开始倾向兴中会一方的林圭，不得不再次调整对策，平衡于唐才常、孙中山之间，以维系共同大举的原案。由于双方实力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平衡政策必然有利于强劲的一方，无形中增强了唐才常的影响，使保皇会的支配力相应增长。加上1900年1月令海内外震动的废立之争骤兴，起到动员整个革新势力的积极作用，使勤王声势暴涨，长江流域的活动更加向着保皇会一方倾斜。

然而，正气会的外圈之事却时生阻隔，会中唐才常和汪康年两派之间一直不和。双方分歧的原因，主要不在宗旨策略，而在

派系人事,特别是与康有为关系的亲疏。唐才常以正气会联络各方,密谋兴师,与汪康年等人并无矛盾。甲午之后中国迭遭重创,戊戌一线曙光又被扼杀。开明士绅受传统民本观念和天下己任抱负的熏染激励,加上近代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对皇权的离异心增强,而民权的代表性扩张。从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可见,当时与之交往的士人官绅普遍怀有怨清反清的意识情绪。夏曾佑称:"观官场之习,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此只可归之为政府之末流。举国之民分数大支,今不过可决政府一支之必死耳,其他之人尚不忍尽弃之也。"[76]身为留学生监督的钱恂,认为中国士气扼于满人压制,1901 年底拒俄运动兴起时仍说:"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77]以彻底变革为图存先机。他还指刚毅等顽固党为"中国之忠臣",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反激出新政议论,甚至说:俄国"近来学生囚三百余人,请看五年之内,俄国必有起色。""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胜"。[78]孙宝瑄也说:"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79]经元善的一番话表述得最为明确,他说:"堂堂中国政府,惑邪启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志,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80]他们纷纷采取行动,以拯救危亡。其不顾朝廷禁令,毅然集会结社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了独立立场和行动方针。在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他们试图结交下层社会势力,以达到政治目的。尽管多数人不赞成排满,主张以革政代革命,却并不否定使用武力,也不排除宪政,甚至可以接受共和及联邦体制。用《正气会序》这类公开文献来否认有关组织或个人反清密谋的可能性,甚至否认中国议会成员的武装勤王宗旨,

都不免忽略了政治文件宗旨与策略的两重性，低估了绅权与皇权在相互依存之外还有彼此制衡的一面，由此产生的忠君观与圣王观也是互为联系约束。正气会之下，不仅唐才常努力联络会党豪强，汪康年、叶瀚、周善培等也积极发动江淮川鄂的民间武装。其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历代士大夫每逢国难当头之际常规表现的重演，只是受西方近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增加了新的取向。他们觉得保皇、革命均有所偏颇，虽然奉光绪为趋新像征，但并无保皇派的固执，既可推之为总统，也准备弃而另选其他有声望之人。[81]康有为的存在，反而成为他们任意发挥的障碍。

正气会内部的派系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组织分化，对该会同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的关系发生很大影响。由于正气会组织发展艰难，唐才常不久即将干事长一职让给叶瀚，自己为避免行动掣肘，避开汪康年等人，全力经营内圈之事。以后又将正气会务一分为二，另立自立会，专门负责联络长江会党，设中国议会联络开明士绅。汪康年等则自行其是，仍在川、鄂、皖、江淮等地与其他会党联络。因此，后来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主要是与唐才常等联系，而与江浙派士绅的关系较少。

一时冲动而弃事的毕永年果然“终无死心”，再度“起而救世”，参与筹划自立会之事。因唐才常仍坚持与康有为保持关系，毕永年又一次愤而离去。据说曾一度参与兴中会的惠州起义密谋，终因不合，跑到广州，卖掉西服，着僧装，寄身某禅林。留书同志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82]“实寓革命于僧界中。”不久以病殁，葬于广东罗浮山。民国成立后，1913年1月，由其后人徙骨殖返湘。途经上海时，同志曾假湖南会馆开会追悼之。[83]

毕永年离去后，孙中山与湘鄂哥老会的联系大为削弱。同时由于康有为的阻挠和康门弟子的傲慢，两派合作组党计划一再受挫，孙中山更集中力量筹备惠州起义。不过，孙看出康与梁启超、唐才常之间有异，将他们区别对待，又希望联合大举成功。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他也需要多一条办事途径以为回旋余地和政治筹码，而不能死守惠州一隅。这是自身力量严重不足的孙中山在风云诡谲各派纷起竞逐的庚子政局中，保持独立地位，并设法追求实现宗旨目标的要诀。而林圭等人的态度及其与容星桥的协调合作，使孙中山感到汉口仍有可图。因此，尽管新加坡宫崎等人被捕事件使孙康两派势如水火，但直到惠州起义前夕，兴中会仍然试图争取澳门保皇会总局的支持。汉口自立军更包含于兴中会的战略计划之中。

五　影响犹存

1900 年 8 月底，孙中山由日本冒险回到上海。此行目的之一，应是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早在 4 月间，梁就致函孙中山，劝其接受“借勤王以兴民政 ”的策略，待其借款成功之后，“握手共入中原 ”，“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84]孙中山因此决定赴新加坡，与宗旨相乖的康有为洽商合作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采用勤王旗号。他在新加坡时表示：“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轻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85]在此孙中山没有坚持要求康有为放弃保皇，皈

依革命,而是在承认双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路线。同时孙中山又并非容纳康的保皇主张,而是接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兴民政。现行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实行宪政,至于具体形式,则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定。而且兴中会本身不使用勤王旗号。惠州起义时,义军借诸报端,宣称:“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86]当联合请求再度遭到康有为拒绝时,孙中山暂时打消了对康本人的寄望,却依然对其他维新志士持有信心,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87]8月中旬,梁启超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途经日本,可能与孙中山会晤过。[88]恰好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89],遂决定暂停广东行动,赶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尽管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90],实际上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孙中山欲亲自参与长江联合大举的意向和行动,表明他对兴中会在汉口的影响力抱有信心。从实际情况看,此举并非病笃乱投医,更不是弃兴中会而转靠他人。要弄清这一点,找出兴汉会的作用当是关键。

有的学者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91]形成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冯自由等人的著述夸大了唐才常与康有为的一致性以及唐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忽视了孙唐之间的政治妥协及其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包括与梁启超),将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自立会,简单地视为倒戈或被保皇派夺走。其实会党首领一般不重视宗旨分歧与政治派属关系,只能依据其活动与各派联系的程度来判断定位。二是对兴汉会的组织有所误

解。与以新兴势力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不同，兴汉会作为兴中会与下层秘密会社的结盟，除了名义上奉孙中山为总会长以及奉行兴中会纲领外，并未组建统一机构，其他未参与结盟会议的首领会众也无须履行入会手续。既然根本没有过组织实体，也就无所谓消亡。而林圭和容星桥的存在，构成这些哥老会首领与兴中会联系的牢固纽带。

如前所述，林圭到汉口后，与容星桥合作创办义群公司，联络会党，其基础就是与盟兴汉会的各位首领，因此林圭奉孙中山为该公司的领袖。可以说义群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兴汉会系统的组织机构，只是增加了林圭等人。1900 年 4 月，为解决经费困难，林圭、李云彪、杨鸿钧到上海与唐才常计议创开富有山树义堂，散布富有票。[92]票据上所写内外号中的绝句，据说是孙中山为兴汉会所拟起义时的联络暗语。[93]这至少表明他们无意割断或摆脱与孙中山、兴中会的联系。结盟兴汉会的成员当中，杨子严(鸿钧)、李金彪(云彪)在富有山堂位居正龙头，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和毕永年列名副龙头[94]，辜仁杰任总堂 。仁杰即人杰，字洪恩，是驻南京湘军总兵杨金龙部副将。或谓人杰与洪恩为二人，实为一人。据《自立会人物考》，有辜万年者，字鸿恩，长沙人。井上雅二明确记道：辜人杰改名万年。[95]另外，列名盟堂的柳启宾、谭翥，当为柳秉彝、谭祖培。柳秉彝为宫崎题诗时自署长沙人氏。据张篁溪辑《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柳启宾，长沙人，年四十余岁，身材中等，与辜人杰即鸿恩一路的。"[96]谭字凤池或凤墀，长沙人。另有名谭树者，乃靖江口人。列名盟证者为张尧卿，即张灿，又名张义年。《自立会人物考》称其"名未详，以字行。"但据李英供称："张尧卿即张义，去年由香港、汉口回长沙。"[97]李权杰似为李堃山，又名李正山，

岳州人，未列山堂名单，张篁溪称其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这批人地位的显要，表明兴汉会的基本格局得到了肯定与维护。

冯自由说，因保皇会没有及时汇款，“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鸿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98]因而有人认为，与盟兴汉会者后来逐渐脱离了自立军。细查史料，事实并非如此。

据井上雅二日记，中国自立会的部署，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均为结盟兴汉会之人。另据唐才中供称：李金彪、杨鸿钧一直在上海办事。1900 年 4 月 20 日梁启超致函唐才常、狄平，仍以杨、李作为与徐怀礼对应的湘鄂义军首领。这两人年长位尊但不通文墨，实际负责的是张灿。张“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99]“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100]林圭称其“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向孙中山力保，请其用而不疑。[101]谭翥亦为“江湖豪杰中甚热心任事者”。[102]辜人杰更是自立会在南京的关键人物，“在武官方面，由辜人杰作中介，联络了杨金龙、赵云龙等使之为自立会的事尽力。”[103]当时会中人戏称之为“五省钦差大人”。[104]他们不但没有脱离自立会，而且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担负重大使命。自立军兵败，谭翥就义于长沙，辜人杰殉难于湖北，李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死于狱中。张尧卿屡遭囚禁，辛亥后出狱，一度鼓吹反袁革命。柳秉彝、李堃山则下落不明。[105]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会党首领在筹备自立军起义的同时，继续为兴中会办事。7、8 月间，张尧卿曾协助文廷式到长沙“办孙革命党的事”。[106]井上雅二日记提到，8 月 21 日，文廷式归自湖

南，“似乎事情没有成功。”文于1900年春到过日本访孙中山，谈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07]可见兴汉会成员参加自立军，并不等于倒向保皇派。在自立军中，林圭与唐才常政见不尽相同。秦力山说：“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其实林无时无刻不欲出唐之范围外，因其组织多近于美国制度，与唐每多冲突。唐终不化，屡掣林肘。唐于会中，几激成内讧，林又起而调和之。”[108]林圭的态度，一是出于宗旨分歧，二是受毕永年、容星桥等人的影响。他的汉口寓所内陈列《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之路》、《社会平权论》等书籍，“有同志来访，则相与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意气甚激昂也。”[109]唐才常长期活动于上海，起义前夕才赶赴汉口，对自立军只能给予有限的经济资助。组织活动方面，林圭主要依靠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这无疑会加强其与兴中会的联系，而削弱唐才常的影响。至于保皇会的间接作用更形微小。保皇派事后的回忆有意无意地夸大对自立军的控制力，而革命党则想回避与维新派合作“上当受骗”之事，更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结果造成错觉假象。平心而论，尽管哥老会员一般“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110]，但由毕永年精心挑选出来参加兴汉会的人表现还是比较好。可惜他们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会众，使林圭难以统辖调度。

从兴中会方面看，虽然毕永年离去，会党首领又缺乏明确的政治宗旨，但容星桥始终支持配合林圭的行动。8月9日，唐才常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同行4人中，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曾与盟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111]他们于8月13

日抵汉，由容星桥出面具保，以150两银子在汉口租界租下一处大屋，60余人合居。[112]事发之际，清军亦包围顺丰茶行，名捕容星桥，容化装逃脱。王质甫则辗转逃回香港，岁暮，曾与秦力山在港晤面。秦赋诗唱和道："头颅大好价三千，生不封侯死不仙。但有文章供笑柄，断无毛雨焕奇妍。我身欲葬曾无地，君算成胸别有天。沦落莫添同病感，众生普渡在来年。""血战成红热大千，又从徐福访神仙(时将重游日本)。八千弟子能无恨，五百童男别有妍。铸铁铸金难铸错，知生知死不知天。嗟君险阻今尝遍，已到文侯十九年"。[113]

史坚如与自立军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兴汉会成立前夕，经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介绍，他认识陈少白，加入兴中会。听说哥老、三合、兴中三会合并成立兴汉会，他感到"非常欣快"，借名与宫崎、陈少白同船北上，到上海后，由唐才常托人携往两湖，观察哥老会实情，"建立亲密的关系，为日后打下基础。"[114]抵汉皋后，游览形势，与湘鄂会党豪杰志士周旋，莫不倾结。[115]随即又与张尧卿、容星桥等赴日，拜晤孙中山，奉孙之命深入长江联络会党，[116]在华中活动数月，然后由上海转赴香港。[117]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曾到在澳门《知新报》任职的东亚同文会会员松冈好一寓所，与之纵谈唐才常之死，慷慨悲切，十天后即谋炸德寿，毅然赴死。[118]

容星桥、王质甫、史坚如以及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的行动表明，兴汉会在汉口自立军中始终发生重要影响。自立军不仅是与保皇会关系密切的自立会的武装，也是与兴中会结盟的哥老会首领的武装，兴汉会的功能作用并没有消失。因此，孙中山准备亲自参加中原大举，决不是个人一时冲动，而是与王质甫等人协调一致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是两年以来联合大举

计划的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孙中山组建兴汉会,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几乎使之发生实际效用,将兴中会的活动与革命风潮推向长江流域。考虑到保皇会坚持以两广为重心,对长江流域并未切实支持,以及各方各派的分歧纠葛,如果起义成功,自立军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兴中会与兴汉会的组织影响至少具有与勤王口号及财政空头支票的蛊惑作用相抗衡的支配力。

注 释

[1] 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5号,1985年10月。

[2] 《孙中山研究论丛》第4集,1986年。

[3]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22页。

[4] 古哀州死者(林绍先)辑:《自立会人物考》。在兴汉会为宫崎寅藏题词时,毕自署安永生。

[5] 秦力山:《说革命》,《秦力山集》,第142—143页。

[6] 《中国私会》,译自1897年11月6日伦敦《东方报》,《时务报》第17册,1898年1月13日。

[7] 《南方熊楠日记》,《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231页。

[8]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0—183页。

[9] 毕永年:《诡谋直纪》,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8页。

[10] 民表:《毕永年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29页。

[11] 《毕永年与犬养毅笔谈》,《乘桴新获》,第402页。

[12] 《留别同志诸君子》,《乘桴新获》,第407页。

[13] 明治31年11月28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

[14]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306页。

[15] 民表:《林锡圭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31页。

[16] 《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第74—75页。陈少白赴港筹款办报,在1899年4、5月间。孙中山指示毕永年率哥老会首领赴港,应在此后。其间毕氏任《汉报》笔政。

[17]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56页。

[18] 近藤秀树:《宫崎滔天年谱稿》,《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

[19] 《三十三年之梦》,第168页。

[20] 一说其时毕永年易名安永松彦,"遍游福建等处,日本领事万岛舍松,合中日旅闽志士大开欢迎会以张之"。见《自立会人物考》。另据林圭致容星桥书,毕永年曾在两粤、闽浙一带进行鼓动。

[21] 参见拙著《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孙中山研究论丛》,第4集。

[22] 《革命逸史》初集,第75页;《三十三年之梦》,第170页。

[23] 《三十三年之梦》,第171页。

[24] 据上村希美雄赠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原件照片。

[25] 上村希美雄:《宫崎兄弟传》,亚洲篇上,第273页。

[26] 明治32年11月21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89号。

[27] 《中国邮报》1896年11月30日。转引自黄宇和《分析孙中山伦敦被难及其影响》,第119—122页。

[28] 《井手三郎日记》,明治31年7月29日,见《乘桴新获》,第382页。

[29] 《诡谋直纪》。

[30] 民表:《毕永年传》。

[31] 《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32]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33]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34] 《三十三年之梦》,第169—170页。

[35] 民表:《林锡圭传》。

[36]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

[37]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65—69页。

[38] 《梁启超与犬养毅笔谈》,《乘桴新获》,第406页。

[39]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

[40] 胡珠生:《宋恕日记摘要笺证》,《中国哲学》,第11辑。

[41] 《辛亥革命》(一),第290页。

[42] 《秦力山集》,第158页。

[43] 《乘桴新获》,第200页。

[44]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45]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第274页。

[46]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47]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48] 民表:《毕永年传》。

[49]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50]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一些论著根据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称容闳为孙中山代表,显系与容開(星桥)相混淆。孙中山以容闳为外交代表,在自立军失败之后。

[51]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52] 《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53] 《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54]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55] 《宋恕日记》1900年1月9日,《中国哲学》,第11辑。

[56]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页。

[57] 《中国哲学》,第11辑。

[58] 《中国哲学》,第11辑。

[59] 《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

[60]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4 页。

[61]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 1 章。

[62] 《唐才常集》,第 274 页。

[63]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0 页。

[64]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83 页。柳亚子《中国灭亡小史》称:"明年,才常至新加坡,得华商资助三万金,运动益活泼。"(《复报》,第 8 期)另据丘菽园致汪康年函:"记曩庚子春间,有沪上人来,携到见惠云章。"(《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 195 页)则唐此行又曾赴南洋。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称:"己亥年冬,乃相见于香港,适余将有加拿大之行,佛尘赠我七绝,为书诸箑,以励吾志。"梁于 1899 年 12 月 19 日离开东京,12 月 31 日抵檀香山,从所写《夏威夷游记》看并未途经香港。此行原是应华侨之邀游历美洲,后在檀为时疫所阻,滞留半年。另据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庚子春,丘在香港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腾风等合摄持刀并立小照。康有为于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赴新加坡,则前此梁启超或曾秘密自檀到港。

[65]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72 页。

[66] 《诡谋直纪》所引梁启超语。

[67]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 1 章。

[68]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 1 章。

[69] 《宫崎滔天全集》,第 2 卷,第 560—561 页。

[70] 《革命逸史》初集,第 76 页。

[71]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

[72] 民表:《毕永年传》。

[73] 《秦力山集》,第 69—70 页。

[74] 《辛亥革命》(一),第 91 页。

[75] 《革命逸史》初集,第 76 页。

[76]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45 页。

[77]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 3013 页。

[78]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015—3016页。

[79]　《忘山庐日记》上,第368页。

[80]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29页。

[81]　见《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1364页。

[82]　民表:《毕永年传》。

[83]　《毕烈士追悼会记》,《民立报》1913年1月7日。

[8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8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页。

[86]　《广东惠州乱事记》,《中国旬报》,第27册,1900年10月27日。

[87]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6页。

[8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22日。

[89]　《三十三年之梦》,第218页。

[90]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199页。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33年8月27日山口县知事古泽兹报秘第10之620号,与孙中山同船赴上海的还有8月7日由上海来日的改革派张浍、高绣延二人。据容应萸博士考证,自立军失败后逃往日本的化名高打、高德的改革派青年,前者肯定是唐才质,后者可能是狄平。(《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狄平遁走日本时确曾改姓高(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版,第421页)。则高绣延或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两人在自立军起义时负责调度后方。由此可见,孙中山赴沪很可能是自立军的邀请。特此补记。

[91]　手代木公助:《从戊戌至庚子年间革命派与变法派的交往》,《近代中国研究》,第7期,1966年。

[92]　《俞廉三奏报唐才中供词二则》,《自立会史料集》,第150页。

[93]　《孙中山集外集》,第600页。

[94]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张之洞进唐才常等组织哥老会名单》,《辛

亥革命》(一),第276—277页。另据《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载《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为密札巴县附抄原粘单》,毕任总堂。

[9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1日。

[96] 《戊戌变法》(四),第287页。

[97] 《俞廉三饬把总崔鹏举密拿各犯札》,《自立会史料集》,第134页。

[98]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

[99] 《自立会人物考》。

[100]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自立会史料集》,第95页。

[101]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

[102]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

[103]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8日。

[104] 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第105页。

[105] 参见《自立会人物考》;《自立会庚子革命记》。

[106] 《唐才中供词》,《自立会史料集》,第149页。

[107]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1册,第509页。

[108] 民表:《林锡圭传》。

[109]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110]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

[111]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9日;《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

[112] 明治33年9月5日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青木外相机密第100号;《容星桥讣告》。

[113] 遯公:《庚子岁暮香港和王质甫》,《开智录》,第5期,1901年3月5日。

[114] 宫崎寅藏:《支那革命军谈》,第52—53页;《三十三年之梦》,第172页。

[115] 《革命逸史》,第5集,第25页。
[116]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4页。
[117] 《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555页。
[118]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

第 2 章

保皇会庚子勤王谋略及其失败

历来论及保皇会的勤王运动，都以唐才常和自立军为主。然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资料动摇了这一看法的基本论据，一些学者对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但由于以函札为主的新资料夹杂大量隐语代号，而且内容杂乱，解读相当困难，迄今未能有效应用。以往围绕这一事件的聚讼纷纭，主要源于对史料史实的误判，一方面不能正确释读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又受事后回忆的误导。从目前情况看，进一步发掘新资料固然重要，对已经公开的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考校参证，更为迫切。因为这不仅可以澄清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重新勾画出保皇会勤王战略及其行动和结果的轮廓，而且有助于防止对新史料的再度错解，以免以讹传讹。

一　重在两广

勤王计划虽动议于唐才常，湘鄂又最具声势，但在保皇会的战略框架内，自立军只是“数路大举”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正军。

戊戌政变后不久，唐才常东渡日本，与康有为洽谈起兵事宜。次年夏冬，又再赴香港、南洋，与康会商。康有为等本不排除武力手段，戊戌政变前夕，曾密谋发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此后又屡次策划行刺清廷要人。其弟子罗润楠（伯雅）素与广西山贼及南海西樵巨盗区新、傅赞开等有交，曾鼓动任教于万木草堂的田野桔次共赴广西，率同党400人，“合湖南之大队以进中原”，“一试其屠龙之技”[2]。勤王计划议定后，保皇派迅速展开行动，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于海外各埠设分会140余处，并以澳门《知新报》馆和横滨《清议报》馆为总会机关。同时，区新等奉命“潜行入京谋刺大臣”不果，“改易洋装回粤”，与李昭、傅赞开等公开树起“新广东志气军”的旗帜，“声势甚大”。惊动了最高统治者，清廷于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专旨拿办。[3]由于清廷不断加紧迫害维新势力，在各地搜捕保皇会成员及其亲属，于1899年12月20日和1900年2月14日两度发布上谕，悬赏银十万两捕杀康梁，又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准备废光绪立新储，保皇会感到危机日迫，时不我待，非速以武力大举，不足以救燃眉之急。1900年1月，康有为移居新加坡，为了便于其遥控指挥内地勤王行动，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便办事”。[4]

按照唐才常的设想，长江、珠江应同时起兵，而后者由保皇、兴中两会共同发动。康有为否决了这一计划，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部署。其基本方针，如所定《勤王行师议》：“除别有所图经营外，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焉。”[5]尤以两广为勤王正军的发难之地。为实现该计划，保皇会全体动员，由康有为坐镇南洋，率梁铁君、汤觉顿组成指挥中枢，背靠侨商丘菽园等；梁启超、梁启田（君力）主持美洲、澳洲华侨捐款事务；罗普（孝高）、黄为之、陈国镛

(侣笙)、麦孟华(孺博)、麦仲华(曼宣)等驻东京,负责购械运货,兼向日本朝野寻求援助;容闳办理外交;徐勤(君勉、雪广)、王觉任(镜如)、叶湘南(觉迈)、陈士廉(介叔)、韩文举(树园)、欧榘甲(云樵)、刘桢麟(孝实)、邝寿民、何树龄(易一)、何廷光(穗田)等驻澳门与港商何东(晓生)合作,协调内外;梁炳光(子刚)、张学璟(智若)经营广东,陈廉君经营梧州;长江流域由唐才常、狄平等在上海主持调度,以为响应,大有一鼓而成之势。

然而,随着情况变化,具体方案不断有所调整,贯彻主要战略意图的决心始终摇摆不定。最初,康有为认为:"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因为广东"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各府县皆有倜傥不羁之土豪,若能收罗而抚之,则此辈俱为我用。"福建虽人才绝少,帑项支绌,但只要能拥立有声望者,亦可号令下属。[6]不过,康有为言及福建,多半是敷衍丘菽园,其心目中理想的发难地还在两广,而具体部署则有东西倚重与两粤并举的权衡选择。

康有为自称:"仆前后俱注意于西(自正月发策),而以江、粤展转相牵,西事未成。"[7]的确,保皇会一开始便注重广西,其"所最足恃者,为南关一路,以为正兵,道桂、湘窥鄂。"[8]所谓南关一路,指广东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9]康有为对其极为器重,委以专办广西军务以及勤王正军主帅的重任,让他率部取道钦廉入桂,与龙州、梧州、思恩等地会党游勇配合,攻占桂林,进袭湘鄂。

对于上述计划,梁启超略有异议。他虽称"此诚第一着",但"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著。"主张"必先取粤"[10],以立根本,壮士气,开新府,示文明,办外交,防止孤军深入,列强干涉,尽早打出新政权的旗帜。考虑到保皇会人力财力有限,而

广东准备不足，梁启超接受几位美国人的意见，提议用百万筹款之半数招募菲律宾散勇，以图广州，收“大壮军容”[11]，节省费用，“东西兼顾”，“不分翼军之力”[12]的奇效，与原定方案相辅相成。为了抓住这“第一绝大机会”[13]，梁启超一面亲自物色人选，一面请容闳出面接洽。此外，他还通过叶湘南、罗普等人向柏原文太郎、犬养毅打听，能否雇佣500名日本将士，携带武器，由港取省。[14]

其实，康有为和澳门总局对广东另有一番部署。康有为后来称：“向者长江之事，付之绂丞；广西之事，付之羽异；广东之事，付之井上。此当时鄙人苦心精择，而后以大事托之，推心信之。”绂丞，为唐才常；羽异，即陈翼亭；井上，应为梁炳光。[15]康先后派梁炳光、张学璟、叶湘南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潮勇、惠州嘉应州勇、客勇、高州钦廉勇、肇庆广州勇”[16]，以及各地的会党绿林，并争取由潮汕赴新加坡考察的丘逢甲“归统”，“与版合成一军”。[17]1900年3月，康有为和来访的容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发出试探：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18]其意并不专指汉口，而是从两广发动的整个勤王起义。当时陈翼亭准备起自南关，而负责广东军务的梁子刚则抵达香港，要求在总局的援助下采取行动。梁启超迭函康有为和澳门总局，请以经营内地为头等大事，尤应注意广东。他认为：“今日事势之迫，已到极地，刚等所谋，岂尚能迟。”“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整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并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与刚、智协办”，“以全权交此四人最善，即不然而会款所得，亦必当接济刚、智”。[19]但澳门总局为“取粤”而“养侠”，“故杂进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20]，造成财政匮乏，“不惟无以应之，而来

函并不将此事原委详陈长者。长者欲为布置，不知澳中存款若干，无从遥断”。[21]后来更具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22]康有为大为震怒，严厉申斥。他本来就认为徐勤“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只因王觉任母病归省，梁启超又极力举荐，不得已让他暂时承乏。徐被逼过甚，要求辞职。到6、7月间，康有为“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23]

这时保皇会自觉实力有限，总体战略虽以直捣京师为目的，但具体行动方略还徘徊于第一阶段的取粤或取桂，作战意图只决定夺取武汉后顺江而下攻金陵，下一步行止则无定议，直捣北京恐兵力不敌荣禄武卫五军，又担心俄、英、法等国趁机插手干涉；“若画江以待力足”[24]，则光绪危在旦夕，难以救急。为摆脱两难境地，梁启超托人与柏原、犬养协商：“我师若得武昌或南京之后，隈、犬之力能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胁和，使还我皇上否？”[25]以勤王军为倚靠，而引外强为奥援，双管齐下。

广东既已失机，广西却获佳音。5月底，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告以“滇、黔、桂皆来归，特来请期”。[26]唐自1897年在康有为的协助下举办团练于桂北[27]，这时已与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设立根据地。[28]康有为认为，广西方面“一有小山坐镇，滇、黔皆来，一有版筑，一有廉之商务，一有思恩之康四，其余尚甚多”。“若能西栈开张，大做鄂湘生意，真天赞也”。[29]恰好在日本购械之事也峰回路转，联系到大批旧枪。于是，6月2日，康有为下令改变战略方向：“拟百事捐弃”，“一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一以全饷购械，成西事。但得五千洋枪队，数万附从人，大事成矣”。[30]其实，前此广

东办"刚事",目的仍在广西,"原以候刚事如何,乃专定西栈。"为避免再度坐失良机,康有为反复强调:"但吾视西事最重,故欲尽所有人才,全付之耳。"[31]

针对"北机极好",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又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的情况,康有为制定出相应的完整方略,由陈翼亭、区新、陈紫瀛、傅赞开、叶湘南、李立亭、陈廉君、康四、林玉等9人率兵改装由粤入桂,[32]以陈翼亭正军加上版筑劲旅为前锋,与梧州陈廉君所部合兵袭取桂林。届时广西各路伏莽"已全归我牵制",驻桂清军唯一可调之兵为戍边的苏元春部,鞭长莫及,由唐景崧驻守桂林,正军"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随即陈、区、傅、李各军分梯队经全州趋袭长沙;另遣陈廉君统领后军收柳州、大黄江,集款购械,接济长江,攻略广东。同时令康四出而骚扰,牵制粤军来援。唐景崧招抚桂北湘南会党万人成立后队,亲率入湘接应,担任统帅,坐镇中军。这时湘鄂两省清军兵力或分散或单薄,在黄忠浩所部防营及新党志士的内应下,破长沙,下武昌,策反长江沿岸湘军。接着,勤王军以二万装备优良之精兵,数十万附从,长驱襄阳,冲入直隶,山东大刀王五、镇江徐怀礼部亦分路北上,趁清军腹背受敌,一鼓攻破京师,完成勤王大业。[33]按照这一详细用兵方略,起于南关,经桂、湘、鄂、豫、直进入京师的陈翼亭正军,乃是勤王主力,而广东、长沙、武昌、江淮、山东等地,则是响应之师。

为实现上述计划,康有为重新调整部署,他力劝丘菽园"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34],将原定用于福建的五万元改办西事,以后又争取丘在捐款十万元之外,再借款十万元捐赠;变散财招伙,聚人为上的办事方针为全款购械,因械得人;指派与黄忠浩、熊铁生等湘籍人士熟识的叶湘南、韩文举随正军兼管粮

台，让欧榘甲任文书；等到因家事暂归的陈翼亭、丘逢甲复出，以及完成购械运货，即于6月底正式发动，“备十八日粮交羽异。凡港中各雄各才愿往者皆宜同行，扫地卷众袭桂，速即举事”。“诸将全行，诸众并上，必取之也。”[35]大有破釜沉舟，灭此朝食之概。

二　东西无常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清廷于6月18日急电李鸿章北上。虽然李借故拖延，保皇会得知的消息却是“北乱李行”。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一直是影响保皇会广东方面行动的要素之一，开始试图以暗杀除去，以后又一度计划“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借以收示人文明，“寒奸党之心”[36]，易办外交，安静地方四利。6月初保皇会全力向西，但仍留连于东，派眼线住关房，“打听实真（二九）情形，若必不能，则专西事”；同时继续要求澳门总局对“刚事必极力招呼”。[37]康有为所发指令表明他依然举棋不定，既要求“先将全款办翼军事，一文不留，一事莫支”，“聚精神，聚全款，聚人才，专应翼军，赶速应之”，又声称：“军事难定，原难遥制，汝等可相机酌之。若廉处一举，当地人心，可四处应，如火燎原，惟今之时为然。如此，又不必泥翼之一军耳。或粤中可取，则先图之。计二九当此必大动心，或可为也。”[38]李鸿章北上的消息传出，保皇会在广东举事的顾忌大为减轻。6月20日，康有为即指示欧榘甲等：“前书条理稍异，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广东方面仍由梁炳光统大局，林玉、版筑、三品等伏兵于广州近郊的狮岭或曹涌，

假清军刘永福旗号，奔袭劫城，并一度有调驻广州湾的陈翼亭部奔袭省城的动议。不惜动用广西一路的勤王正军，反映出康有为有过弃桂图粤的念头。但他又向欧榘甲表示："若仍用前议图湘、桂，则汝偕翼行可也。"[39]其本意"始以力薄，故全力图东栈。然岛力欲羽异西，吾亦以为立不败之地，极佳"。集中一路变成两地并举，相机行事。这时海外华侨捐款既多，历时又久，对保皇会迟迟不举啧有烦言。康有为迫于压力，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令各路人马迅速发动。其"总以速为主，然又不可因我催而乱来也"[40]的两可指令，让各路统领进退两难。

取粤的最终目标是北上勤王，因此康有为认为："岛虑甚周，极欲羽异正军捣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粤响应，又处于不败之地，无论粤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6 月下旬，他函示徐勤等："若布置停妥，即合力先取东省，然后长驱。""若东不能下手，即并力西向，较为长策"。[41]并解释道："吾今注意于东，且虑大敌环来，故欲特留大将才，即练大兵以当之。然得粤究以长趋为要，长趋仍以翼为之。"广东"有刚统大局，有版、品、林诸人，或可以守，则羽异往西亦极稳"。[42]视取粤为巩固后防，袭桂才是勤王进取。7 月 18 日李鸿章北上后，保皇会更加偏重取粤，并进一步制定出具体计划：挑选精勇选锋分队入城埋伏，首先袭夺水师舰船，以舰炮轰击城池；于观音山五层楼及各城门遍插预先制作的清军旗帜灯笼，布为全城兵变疑阵，趁乱夺城；然后"挟德寿出示遍谕勤王"[43]，传檄州县，夺饷械，募款项，练精兵，安商旅，设民政局，照会各国领事。但康有为还在犹豫不决。他指示办事人："此刻专注东省（以李去之故），若得手，则取其军械、财富，天下不足定。倘度不能得手，则切勿发也，必聚全力于西省，直趋湖南。""或全力取东，或全力趋西，此间不能遥断。或两粤并

举”。“务求一发必中，便宜办理，不拘一说，避实击虚”。[44]

与此同时，唐才常电催康有为还港，“预备入江入津，因外国欲救上也”。[45]康遂通电各国，探测它们对营救光绪的态度，以便相机决定“还港调度”还是随英国军舰“赴京救上”。虽然他曾完全指望外强保救光绪，甚至公然号召助洋人攻团匪以救上，但对列强仍然怀有戒意，担心一君一臣孑然在北，即使侥幸南渡，订立和约时，“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在他看来，救上的目的在于变法，而变法“非经雷霆扫荡之威，未易行也。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不然南还，亦必吾南中亲军已立，然后可靠。不然。则李傕、郭汜之流，可夺上而生他变耳”。[46]将保救光绪的重心由倚赖外强转到自己的勤王武装之上。后来英国政府提出，以得到光绪的求救手谕为出面干预的先决条件，北上化为泡影。而还港“明购械治兵”之举，也担心刺激广州清军加强戒备，城“反难取，故不还港”。[47]

正当保皇会在两广左顾右盼之际，汉口自立军已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了。这时保皇会用兵的重心仍在两广，梁启超赶赴自立军起义不及，在上海即表示：“也许将去两广。似乎与两广的唐景崧已经联系好了。”[48]除原定计划外，5月间，保皇会日本总部以“今日办事，不能不借外力”，指示洛杉矶分会以矿物、铁路为报酬相诱，游说“既知兵，而且有此志”的美国人荷马李在保皇会举事时，募集美兵相助，并通知其来游时“顺道往见长者，商办一切”。[49]荷马李赶到澳门，准备召集二万五千苦力组成军队，由美国军官率领，从澳门攻打广州。[50]康有为认为其“来助甚好”，但碍于“饷薄难供养”[51]，“我力未厚，顷难即用之，须少待

耳”。[52]因而澳门总局将此方案暂时搁置。

自立军败使保皇会士气受挫，随之而来的严防搜捕又加大了再举的难度。但保皇会人力物力集于两广，并未伤着元气。康有为虽然痛感“大功未成，元勋先陨，失我良将”，仍坚持发动，甚至为各地会党蜂起勤王的传闻所鼓舞。9月间，他在家书中不断提到：“得上海电来，知长江上游三处起，下游六镇即发，麻城大军入河南迎驾。”[53]“幸麻城一军有十万人北上迎驾，又湖南藩司锡良所带伪勤军为我所袭，力颇厚矣。今变为第二队之勤，若天相助，可望成也”。[54]“长江有人卅万，今下游尚有大力，即决日再起，北上入晋矣。广西亦有布置”。[55]然而，这时李鸿章电告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梦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56]英国政府担心其在长江及广东的利益受到影响，指示殖民部电饬新加坡、香港等地总督查办，使保皇会失去了外部支持的便利条件。9月，梁启超和容闳先后抵香港，分别会见港督，“告以各国人心非上位所能压”，“与港督定约取粤，港不肯，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警告“尔等切勿起事”。[57]康有为深知“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暗中放弃取粤。但又担心“损办事者之气也”，故密而不宣，仅“大力令取西”。澳门总局的徐勤、欧榘甲等对此底蕴“亦未之知”，拒绝了港督卜力的请愿建议，继续“眷恋东省”[58]，造成统帅部与前敌指挥所在调度指挥上的严重抵牾，令保皇会的行动陷入混乱。

后来康有为函告丘菽园道："仆意今专注于西，而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数月相牵，致两无成功，在办事皆东人想东故，以此故处之甚难），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东，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视于东，汉事可鉴。即得之，恐为他人作嫁耳。又攻坚非宜，不若攻虚。累书劝告，而井上未以为然也。以东故费极多矣。今更难继，公谓如何？若以绝东专西为宜，亦望公发一长书劝井上。井上甚称林玉才（林已归井，同办一路）。""井上屡请添械，仆以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不知如何乃为止境。甚恐虽添亦复不足，仍无用。而累月以来，老师糜饷，未得一当。况即得当，尚恐西人不允借为定乱而取之乎？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候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然仆此非数年不可，数年之费饷无数，变又无限，安能久待？故不如先西为之愈也。若西既得，遂而取东，其于订外交易矣（望同苦劝之，以彼日间迫于举也）"。[59]

由于调度乖方，保皇会的东西两军始终筹而不举，莫衷一是。10 月 6 日，兴中会却在惠州树旗起义。清政府因汉事甫平，惠事又起，加上接连收到孙、康两派购械运货的密报，"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60]"粤事大局，翼、刚两大路皆为惠局所累"。叶湘南在东莞所办团练被查出，陈翼亭虽得密报出走，"然梧州以其频上下，缉之极严"，其运械小轮也被迫停开，"部下因此有散者"。这时梁炳光"尚固持欲办"，康有为则"决意令停办东事，专意西机"，以免"饷累无穷，终为所牵"。[61]此后粤中党祸益甚，保皇会一些骨干及其亲属被捕。陈翼亭"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其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康有为再度表示："既决为之弃粤。"[62]到 11 月下旬，"若港澳之间，前已令停，粤局但资通信之人耳"。

而广西发动之机也日见其微。11 月 26 日，康有为函告丘菽园："井统五军，治事甚密，前得一营，既泄，而不能内举，泄后又不能不待军备。仆惟恐其妄动，今仆被执，恐死矣，其一军恐散。若不能西，已令向北，免久糜饷。此皆他人所不知者。若羽异之先，原得三万，起自南关；后泄，则力有未逮，已交四万余，改请七万；今又泄，而前途戒严，又索十数。""今轮被停，而械亦少矣，幸虽泄而其人尚无恙"。[63]虽未明言放弃，已在为勤王运动作收场总结了。丘菽园因此对康失去信任，亲自出马掌管粮台，并截留海外各埠捐款；后又与康决裂，提出再捐款十万，请梁启超回日本主持全局，重整旗鼓。[64]但澳门总局的徐勤等已撤离，仅留王觉任、叶湘南、刘桢麟等办理善后。实际上，澳门总局办事诸人在汉口兵败之初还情绪激昂，日夜密谋纠合长江同志再举。后来见国内外形势恶化，感到轻举难以奏功，便转而采取慎重态度，仅以养成实力为名聚集力量，暗中放弃起义计划。[65]惠州起义的影响，不过是保皇会借以体面收场的借口。停办东事，早在惠事前已经明朗化。而东事一停，办事人也无心恋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废立之争带给勤王运动的声势已经掩饰不住保皇会漏洞百出的组织准备，这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康门师徒大举起义的信心。即使没有惠事的影响，保皇会也难以支撑下去。撤消澳门总局，正是全盘放弃勤王运动的表征。1901 年 5 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走访康派志士，了解保皇会动向，并到庇能拜访康有为，康表示以"蓄力"、"筹饷"[66]为长久之策。他还拒绝了荷马李等人"大集众埠"华侨精英再度起义的建议。[67]虽然 1901—1902 年广西会党起义时，仍有一些保皇会员入桂联络，无奈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了。

三 秀才用兵

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历时两年，波及多省，动员大量人财物力，又趁清廷自顾不暇之机，结果却不战自溃，草草收兵。事后人们纷纷追查败因咎责，保皇会内部也互相猜疑推委，或称告密牵累，或谓饷械失济，或指中饱私囊。然而，检验保皇会的组织指挥系统及其实际运作，可见其中存在严重痼疾，使整个战略准备停留于计划的一纸空文，没有落到实处，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贵在组织严密，指挥果断，办事有效，令行禁止。否则，计划再周详，也是纸上谈兵。但保皇会骨干多为士子书生，情急而言兵，从个人素养到组织功能，都与军事行动的要求严重不符。正所谓秀才造反，夸夸其谈，成事不足。康有为身为统帅，长时间对主攻方向举棋不定。虽然他后来声称"前后俱注意于西"，但未能坚决贯彻实施。在华侨督催，属下意见分歧，以及客观形势千变万化等因素的干扰下，一年之内，几易方略，最终也没有注全力于西，主攻侧应流于相机速发。帅无定见，乃兵家大忌。此外，由于澳门总局办事不力，康有为无法切实掌握各路勤王军情，却坚持"大事仍由南佛主断"[68]，所定用兵方略悖离实际。如黄忠浩5月前已移防湖北，而6月他还郑重其事地将其巡防营作为长沙内应的主力。而且康缺乏军事常识，其决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69]，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

枪"以省费"[70]。他自诩知人善任,却往往用人不当,信任夸夸其谈的富商子弟和心怀叵测的游勇头目,埋下致败祸根。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71]。加上康有为缺乏勇气胆识,远居南洋养尊处优,不敢亲入内地统军,平时还要众多卫士洋兵保驾,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难怪一位久慕其名的加拿大华侨指责其"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只知"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于不顾"。[72]

先生如此,门生更甚。澳门总局担负着聚人联络,收拨款项,购械运货等项重任,相当于前敌指挥部。照梁启超的说法:"现时先生既远在海外,其居港澳总持此事之人,即是当天下最要之冲"[73],"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74]康有为手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也称之"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75]后来因两广行动虎头蛇尾,康有为谎称:"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76]表面贬低总局的地位作用,其实是为弟子们开脱咎责。该局实际主事者为《知新报》同人,如王镜如、陈介叔、刘桢麟等,而由王镜如总办。梁启超屡次用"散漫异常","极其散漫","未有人克称其职"等词句形容总局状况,批评其"不举行总会之实事"。他到檀香山两月余,"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77]梁启超连"港澳近日布置"亦"丝毫不能与闻"[78],根本无法协同动作。为此,他建议加派人手,健全机构,分工负责,但情况不见改善。到4月下旬,他仍然批评"总会之事甚散漫,绝不成中央政府之形"。[79]自己"有事欲与总会相商,不知商于何人乃有力量"。[80]王觉任母病归省后,徐勤接任总办,叶湘南、欧榘甲、罗润楠、张棠荫、王颖

初、韩文举、陈继俨、陈默庵、邝寿民、梁少闲、何树龄等保皇会精英汇集澳门，人才济济。但直到5月下旬，梁启超还在抱怨“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81]

梁启超与《知新报》诸人有些过节，受到怠慢，还算事出有因。然而康有为也同遭冷遇。“刚事”康再三函嘱，总局月余不应，“十七书皆不复，可怪。但言支款及加拿大事，四信皆然，如此哓哓，反置它要事于不理”。徐勤还以写信则不能睡觉为托辞，“但言不暇复信”。甚至如何写信汇报情况，也要康有为反复指教：“不得轻率苟简，令吾无从揣测调度。”[82]而且“自正月以来，所有澳中存款若干，支出若干，并无报销。偶一问及，即以为有人攻击，申辩无穷”。[83]且不发各路军饷。康有为嘱购一幅地图，亦前后“五、六函追不得”。[84]急得他大骂徐勤：“汝既总办，我为总持，喉舌所通，事关至要，岂得以不暇委哉！”“如此做法，非小儿即是心乱，令吾忧极”。[85]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海外各埠及上海电函纷至沓来，唯独澳门音信杳然。丘菽园“日来问消息布置”，康有为无词以对，“消息且绝，况于起乎？”保皇会倾全力注西，而正军主将陈翼亭的行踪，主帅竟毫无所知，令“各人日夜狂思乱想，皆如梦中”。6月27日，正当康有为在新加坡“日夜与铁、觉商，与岛辨，为西事办否，今日尚辨驳无已思辨无穷”之际，忽接徐勤电告，陈翼亭已经出发。后又证实陈并未行动。康有为气急败坏地迭函斥道：“天下岂有办事若此者乎！开小铺尚有所禀承，报信尚当详明”，“开一剃头铺，尚有铺章，安有如许大事，而绝无章法如是乎！”[86]“今吾负天下之责望，当非常之机会，而消息绝塞，号令不行，一辈愚生以其愚忠如骄子之专恣乱舞，吾不知死所矣”。[87]“吾以身陪奉汝，岂能将天下陪奉汝乎？”[88]迫不得已，他只好强命王觉任复出，总管内政，由叶湘南

负责内事筹划、接复函电及综核理财，徐勤专办外交，应接志士，抚绥豪杰。但局面仍无根本改观。

办事不力源于能力不强。保皇会骨干大都长于文笔而拙于任事，梁启超因而慨叹"同门无人才"。[89]徐勤、王觉任等抱病节哀，用功勤苦，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麦孟华、罗普及澳门总局先后主持策划暗杀行刺，费时年余，或一筹莫展，或击而不中。尤其是缺乏统揽全局，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韩文举"谨有余机变不足"；欧榘甲"文字之才也，难于共事"[90]，"于报才为长，而任事则非其长"[91]；何穗田笃信扶乩算卦；王觉任、陈士廉善决断，但或才短或量浅。对于康门弟子言兵的意志能力，革命党早有怀疑。梁启超也承认："吾江岛人物归去者便辄颓唐，更无布置，有数人皆前车矣。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担心"飞天头陀笑我到底也"。[92]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他"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93]，主动请缨，要求前往主持大局。但康有为认为他"颇有轻听人言，因人之短而轻信之弊"[94]，未予批准。而且保皇会正副会长在人事方面意见不一致，康、徐称麦孟华为天下才，梁启超则指其"太密而沉，此可以当一面自成一事之人，而非能统全局之人也"。[95]梁推崇徐勤，康有为又认为"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96]康重用王觉任，可是不仅梁启超颇有微词，各同门也觉得其"为人虽佳，然究短于才"[97]，难以服众。

办事无能，偏又个个自以为是，使保皇会意见歧出，行动起来无所适从。梁启超催促容闳前往美洲协助借款，待其出发后，又函阻"以勿来为宜"。[98]澳门总局对康有为的指令也阳奉阴违。甚至对康有为本人的行动，众门生还纷纷指手划脚，"如径电勿来星坡，卓径电勿上香港"，则康只能"死于海中矣"。对于

这种轻率随意地发号施令，康有为十分恼火，曾向徐勤抱怨道："汝视吾行事，如学台看童生卷，随意批诘驳落。汝等稍自立，数人近皆如此。我一童生，而汝等无数学台吹毛求疵，吾一老童之卷，年老手颤，其必下第固矣。而无如汝数学台或仅阅破承，或但观起笔，不阅全卷，即已抹落。又汝等诸学台本不读书，侥幸放差，阅历极少，乃遂妄行。吾一童既落，而全棚之不卷哗罢试者几希。"康有为屡次告诫弟子："今日办事，非读书时可比"[99]，"办事与论学不同。汝等落吾卷，尚可他年再考，今若落吾卷，无再考之日"。[100]希望弟子们抹掉头巾气，但他自己却难去迂腐习。他指示总局健全文书制度，"各种部籍皆宜备"，理由之一居然是"今日军谋即为它日考据"[101]，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保皇会奉行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封闭式组织方针，以君、亲、师的旧式纽带定亲疏，令人才不足的痼疾更加严重。三年后徐勤所说的一段话，足以为此时的言行作注："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俗谚所云：上阵不离父子兵。今日欲办大事，真非同门不能也。盖草堂师弟之谊，数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转移一国者，全在此一点精神耳。"[102]梁启超对此早有不满，认为："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既然同门之人才不能"扛起天下事"，则"同门不同门之圈限，必当力破"，"兼收并蓄，休休有容乃第一要着"。[103]主张以"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必出尽方法以收罗难驾驭难节制之人"，而批评"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104]尽管"此种言论，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105]，他仍坚持己见，"不敢因噎废食"，并反驳康有为"不同门多误事"的责难："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106]可惜这一批评不为师友接受。他视梁子刚、唐才常为"吾党长城"，屡次函嘱澳门总局"与之和衷，

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今日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但二人均非草堂嫡系，总局并未切实接济。梁启超对刚、智二人“以百口保之”，认为“同门无及之者”。[107]徐勤却不满“子刚为人”[108]，令其担忧“刚与澳人不水乳”。[109]康有为虽关注刚事，对长江流域却未予同等重视。保皇会海外筹款三十万元，长江方面只分到四万，其中三万还是丘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由保皇会分拨的仅一万。[110]自立军失败后，唐才常声名远播，康有为诡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举义而响应”[111]，故意将湘鄂偏师说成主力，以掩人耳目，敷衍塞责。实际上，当时保皇会的决策是：款多“自当全局并举，即不尔而专事故乡。”[112]康梁眼中的徐敬业，至少并非“舍唐莫属”。[113]直到6月，康有为还认为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114]方略中没有湘鄂的显要位置。

保皇会坚持两广发难，明显带有畛域之见。康有为不肯北上，原因之一是南中亲军未立，不能驾驭群雄。其战略主攻方向虽定在广西，所依靠的正军还是广东游勇，领兵将帅也大都为粤人。康有为明确指示总局：“我广勇为最精最勇之军，且言语相通，倚为心腹必广勇。厚集其势力……，合为一大团体，乃可制外省湘、鄂、淮、皖诸军也。”[115]其防止各路诸侯趁乱生变的用意不无积极一面，但以地缘定亲疏，狭隘性明显可见。更有甚者，他自吹“我家将才极多”，推举曾跟随从祖康国器镇压太平军的几位亲戚在袭取广州后出而领兵[116]，并轻信侄子康同富“于办军务及兵法滔滔可听，皆可施行”，立即派归任用，认为他们忠信可靠，“且极可托，必不患其泄”。[117]以血缘关系作为区分忠奸的标准。

然而，旧式纽带并不能保障保皇会的战略行动，其勤王计划迟迟不能付诸实现的原因之一，恰好是“办事皆东人”。保皇会内部也矛盾重重。梁启超与《知新报》因故失和，港澳之间则“气味不甚相投”。[118]王镜如等行为缜密，在澳同门刘桢麟亦不能预闻机要，办起事来互相掣肘。而一旦误事，又彼此猜疑推委。康有为因“刚事”延误责怪徐勤，徐怀疑王镜如、欧榘甲告密状，力辩之外，且加攻诋。罗普也怀疑梁启超海外筹款“有不实不尽之言”。[119]勤王不成，耗资无数，华侨责难日至，为了维系派别私利，康有为不惜嫁祸于人，他声言：“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120]，表面承担用人失察之责，其实是委过于领兵将帅，以解脱草堂弟子的干系。当有人追究海外捐款的用途去向时，康竟栽赃于何穗田。秦力山等专程赶到澳门查阅收支账册，才知何“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121]何氏所扮演角色，本系康有为一手操纵。6月，何无意中得知康因支款事责备徐勤，亦具函申辩。康为此函责徐勤：“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122]排斥于前而嫁祸于后，为自保不惜害人，心术险恶，无过于此。

保皇会倚为心腹的广勇头目，多为骗棍赌徒，受利诱而来。康有为称正军主将陈翼亭之才为“众口交推，非独仆所信保。但太稳求全，非冒险家耳”。[123]对其笼络有加。其父病故，在保皇会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康有为指示总局奉以厚奠。[124]但事到临头，陈却不断抬高要价，“借运动为名骗去六万元”。[125]其他如版筑、三品等，康视为得力干将，为网罗到手，“所费不赀”，后来却“不能得其用，弃之可惜，充之难塞”。[126]梁炳光更指三品为“虎狼”，“今以供应不足，几有胁制反噬之心”。[127]另如梧州二陈，保皇会曾派陈默广、叶湘南专程前往调查，“大称其有人确

凿。其头目数人来港索款数万为军装，不能应之”。事后康有为承认对他们“未能深知”。[128]另外，从清方详细查处的情况看，思恩康四也没有自报的聚众三万的实力。[129]惨痛教训令徐勤三年后仍心有余悸，认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130]梁启超更将“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事父母，狎客奉妓女，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131]

康有为的父子兵同样不可靠。康同富奉命到广州后，与“必败事”的无用之辈交往，且十余日即滥用数月经费，令康有为大失所望，斥责其“糊涂若此，安能任事”。[132]保皇会从檀香山、加拿大、日本等地粤籍华侨中罗致的所谓军事人才，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只不过略具胆识。就连梁启超极力举荐，统兵一路的横滨福和商店少东家梁炳光，也是“好作高论，无所表见”。[133]5月以前广东失机，总局固有援助不力之责，梁本人亦仅谋及“可以聚多人”之法，还是梁启超提醒他：“徒聚之无益，当谋练之。”[134]

保皇会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以及参与变法维新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岑春煊、熊希龄、郑孝胥、黄忠浩、张棠荫等。他们具有反清变政意向，但并无义无反顾之志，与保皇会同道而不完全同心。如黄忠浩虽在反复劝说下同意加盟自立军，担任前军统领，却认为这种行动“目的虽对，方法不行”[135]，态度消极。这些人在顺利时表现活跃，积极参与筹划，掌握地方枢要，唐景崧、俞明震分别担任广西、江宁的联络主持人，丘逢甲亦自愿具名于勤王檄文。[136]一旦形势危迫，则或蛰伏不出，或袖手旁观，或但求自保，有的后来还参与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屠杀昔日的同道。广西的唐景崧、岑春煊等与康有为是旧交，唐还是勤王战略的主要依靠对象，但徐

勤认为岑"不可信"。[137]康有为虽激赏唐景崧为人，当世间风传唐向保皇会索款五万金以谋巡抚之职时，还断然予以否认。[138]可是徐勤忠告道："西省人士好利若渴，近年以为吾党势力已尽，则群相攻击。及见近日商会已开，知有利可图，则又来利用矣。此等人只有置之不理可也，切勿赠以金钱。"[139]

四　聪明反被聪明误

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自高身价，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茂盛招诱群豪。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万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140]梁启超对其"常作大言"，吹嘘"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的作法极为不满，认为"徒使人见轻耳"，劝以"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141]但梁自己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励也"。[142]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谎报。如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应对梁启超关于粤事的询问，而当时徐勤尚未返港，陈士廉则滞留北京，"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实未有人也"。[143]后来徐勤三次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从康有为的两次复函看，广东方面连最起码的购械运货之事"尚全无布

置"[144],的确"去事尚远"。[145]

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也令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江湖豪强的贪欲心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利害与祖国安危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这种"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146]的局面,令保皇会势成骑虎。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147] 5月以前,华侨对勤王运动进展迟缓已有怨言,保皇会解释道:"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148]趁机要求华侨罗致人才,募集巨款。6月以后,中外交战,华侨更加迫不急待,"连日仰光、吉冷、暹罗、澳美信电交至,责望起兵勤王"。新加坡华侨捐款最多,期望最殷,"徐、力、黄、林急如星火,抚髀拍掌催促"。"谓经营两年,縻十余万金,而至今大急之变,不能补救,并不能起。又言:若我今不起,外国代我立主,则与外国为难,更不能起矣。其言甚怒,于办事诸人皆有微辞。"林文庆"至谓用弓矢亦可。"一贯明达的丘菽园也"口口皆叹太失机、太持重也"。甚至怀疑其"多费而无成也",脱口说出"恐再要十万尚未能起"这样"极难闻"的责语,并将已拨出的5万元扣下2万。康有为担心再不举事,华侨"或疑我等浪费乾没","人心渐散,哗谤大起"。但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为了摆脱窘境,他一面谎称广西容县会党暴动是保皇会举事,"但不令打勤旗,今已电令改插勤旗",搪塞一时,哄骗丘菽园汇出余款,一面指示各路人马"总以速为主","不妨冒险"。"故在西起,虽败犹胜,以可得人心,又可筹饷

也”。[149]“若能起，岛更高兴，尚可多出，则外埠踊跃，源源而来”。[150]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勤王大业，开始蜕变为招财进宝的障眼戏法。唐才常“徒以保皇会内外各人迫逼而举事，其时亦极多攻者，若不死亦见疑耳，今死后乃多称之”。[151]事后保皇会承认：“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152]两广更加准备不足，连孤注一掷的本钱也没有，只能徒叹奈何。

保皇会盲目张大声势，坚持数路大举，又不肯与他人合作，且急于发动，只好走捷径图侥幸，实行“散款招伙”之策，“意在收罗豪杰，自不能无所滥竽，拔十得五，千金市骏马之骨，是亦不得已之事”。除心腹死士外，还要“旁收偏裨，以备牵应，或虽未深信，而不得不羁縻用之，免资敌致祸”。[153]结果“杂进群才”[154]，“愈益滥支”。到6月报帐时，“所开各人数，实堪骇异”。[155]实际收到的海外捐款十万元已用去八万。康有为不得不下令“尽购货不招伙”，“不须预招”，使“神不外散”。[156]并改变前此“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157]，补贴办事人小费家用的作法，紧缩开支。7月，各路人马将起，纷纷催请饷械，保皇会支绌异常。康有为以“大事为杂款所累，竟不能举，失时失机。散漫不节甚矣”，进一步明确指示总局将所存九万元以七万购械，二万运动，并且“定束水刮沙之法，汰无要之款，以专济赴机之用，一切截止各事，亦截止各款”，办事人“但支月费”，“专办一事之人支二十金，书札奔走之人支十金”。[158]然而，因摊子铺得过大，虽然“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皆有饷无现款，皆应急而发，备左支右，备右支左，得前失后，后者未足，前者已尽，故空费极多”，根本无力兼顾长江。到11月，“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159]，只得停办“累饷最大”[160]的粤局，以节縻费。

资财耗尽，一事无成，当时事后各方面纷纷猜测指责康门师

徒中饱舞弊。康有为顾及派别私利，不敢直言相告，其自相矛盾的种种辩解推诿，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心，坐实这一桩公案。其实，保皇会或有挪用部分款项于不急之务，如办学校、书局、报刊、公司等，军情紧迫之际，梁启超曾以在港办铁器公司为名，倡议从檀香山、香港、新加坡"集股二十万"，称"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161]对勤王大计如此三心二意，不免自私自利之嫌。但保皇会款绌的主要原因在于虚糜太甚，"空费极多"。该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三十余万。截至6月底，除丘菽园的十二万外[162]，各地捐款汇到香港的仅五万五千。海外募捐，往往认捐快而缴款慢，费用又高。康有为曾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万余，惟皆未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美埠甚多，何所得之区区乎？"[163]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八、九万，到6月中旬，实际收集的不过四万，寄往港澳和日本的只有二万。鉴于"似此尺进寸退，终不能成大事"[164]，梁启超以二万金委托美国人赫钦到纽约办理千万元的巨额借贷，并以此为大举成功的希望。他一再函告康有为、丘菽园、唐才常、梁炳光和澳门总局，建议等到8月借款事成再行发动。然而，款未到手，二万本金也付诸东流。平心而论，康有为的辩解虽暗藏损人利己之心，关于捐款用途的说明则大体属实。

康门师徒是论学才子而非办事能人，他们知道"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165]，也懂得"凡办事与谈道不同，谈道贵阳，而办事贵阴，况兵者诡道乎！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166]但行动起来却力不从心，先定大而无当的计划，继以浮而不实的筹备，以同门人办天下事，结果四处碰壁，焦头烂额。丘菽园断然宣称："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竟与康有为、梁启超绝

交。"[167]相比之下，兴中会人少财乏，而惠州起义从筹划组织到指挥行动，却要严密有效得多。这种由地位、经历、社会交往等因素综合而成的能力差异，对今后各自的走向不无影响。康有为表示：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不仅是害怕流血牺牲，痛恻于"株连死者无算"[168]的惨状，更重要的是绝望于保皇会的军事能力，言兵无异于送死。他们并非根本反对动武，而是担心玩火自焚。倒是徐勤说得坦白："若欲起事，必不能成，故亦无容议及。"[169]从此，保皇会除以金钱收买死士密谋暗杀外，将光绪复辟付诸卦象，以"待时听天"，"坐待复辟"[170]自欺欺人。

不过，海外华侨并不因此而见谅保皇会。庚子后，徐勤每到各埠询问华侨："皇上不复位，则如何？则必应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则如之何，则必应之曰：起兵。""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171]为了稳固财源声势，保皇会开始自觉地以勤王名义为谋财手段。澳门总局停办后，海外保皇会员人心浮动，康有为狡辩道："澳局因各省委员常驻窥探，连捉吾党，屡泄事机，故我阳命暂停，并《知新报》馆亦行停罢，此实不得已苦极之事。自外视停罢之后，乃再行密开。凡此办事进退机宜，皆不能告人，汝密知之以解众疑可也。""故有人凡言澳事者，皆勿信，但言因被委员被泄密掩可也。"康出此谎言，目的在于同丘菽园争夺捐款。他通告各埠："近来各事皆在庇能我亲主持，澳局停与不停无关也。且可告各埠，言内地办事之难，死人之多，失机之甚，令各埠释然。此后汇款通信，可直汇来庇能交我亲收可也。"[172]1901年初，美洲华侨响应荷马李的倡议，企图大集各埠精英归国举义，康有为坚决反对，认为："假若纷召各埠，则所捐得之款，尚不足养各埠议事之人，况实办事乎？"荷马李的建议当然不足取，问题是康有为已经放弃了勤王

计划，不是从军事的成败来考虑，而是以利益的得失为权衡，勤王只是幌子，敛钱才是目的。为此，他提出“开新埠，筹新款”的方针，要求“今日务以开新埠为主，必开新埠乃可有款，若旧埠则虽苏、张之舌无能为也，徒生是非耳”。[173]此举用意，无非是旧埠已生戒心，且力已用尽；新埠则易于行诈，以防泄露天机。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张智若等人前往龙州、南宁与其首领联络。康有为、徐勤既不赞同，也不相信有成功希望，但鉴于“言西事，各埠皆欣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若禁言西事，而日诩复辟，令人冷齿而灰心也”。“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174]因而未加阻拦。梁启超虽认为“苟非有兵力，亦安得行其所志”[175]，继续支持张智若、罗孝通等入桂起事，可是急切间难以再举，也借办学名义遮掩，“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176]勤王军兴之际，已有人怀疑保皇会“依于救支那帝国计其隆盛之名义，以募集数十万圆之寄附金，于支那之政治改革毫无作用，而但为自己等之赘泽，或为旅行费，彼等之所作几于诈伪”。[177]后港沪各报更“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各埠保皇会员“亦日相与窃窃私议”。梁启超因“未能做成一二实事”，不得不“直受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178]康有为则一意孤行。无怪乎与保皇派关系极深的田野桔次慨叹道：“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呜呼！康梁及今不改，到底不能免为东亚之亡国虫！”[179]

注　释

[1]　汤志钧：《孙中山和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自立

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赵令扬:《辛亥革命期间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

[2]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 3 章,第 5,《万木草堂之奇青年》。

[3]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剿办新广东志气军首要区新等情形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 440 页。

[4] 《保皇会草略章程》,《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264—265 页。该会最初名保商会。总局设立期间,与原澳门总会机关合而为一。另外,保皇会分会数,据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到 1900 年初为 40 余处。

[5]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45 页。

[6]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93 页。

[7] 《康有为致丘菽园函》,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

[8] 1900 年 4 月 12 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后简称《长编》),第 216 页。

[9]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 33 年 7 月 30 日。1900 年 4 月 9 日梁启超致梁启田函中提到:"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长编》,第 215 页)按:南关一般指广西镇南关,当时驻镇南关清军多为广勇,保皇会也在龙州一带联络游勇。但井上雅二日记称广东南关。另据 1900 年 6 月 27 日康有为致叶湘南书,陈部驻广湾(《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37 页)。所以康言及陈的正军行动时,屡用"捣西"、"往西"字样。而且陈部运械用轮船,经梧州上下往返。因此,陈虽曾打算在南关树旗发难,但实际并不住在南关。而南关究竟系何地,仍须进一步考察。

[10] 1900 年 4 月 12 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216—221 页。

[11] 1900 年 4 月 12 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220 页。

［12］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20页。

［13］ 1900年3月13日《与叔子书》，《长编》，第202页。

［14］ 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书》，《长编》，第222页；5月25日《致罗孝高老弟书》，《长编》，第231页。

［15］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汤志钧教授认为井上即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实为梁炳光。理由是：1.梁启超称："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长编》，第214页）所发各函又多次提到主持广东军事者为刚、智，则广东领兵之人系梁炳光。2.康有为等人信函中，常将"井上"与"刚"通用混称。如1900年6月20日思庄函责徐勤："令井上枯坐月余而不应之"，"长者特为井上事，怒气如山"。同函又称："此次之事全在不能应刚，至失机月余，故长者盛怒大责。"康有为告诉徐勤："吾累得刚追款之书，而大怪于汝等。"思庄函则称："至若海、雄、颖初诸公欲款不得，皆由井上函来言之。"（《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193页）由此可见，井上与刚为同一人。3.从井上雅二日记看，他对广东情况不知其详，显然未预机要。1901年5月25日，井上雅二赴欧洲途中在庇能拜访康有为，见面时称："别来已两年，世态几度变更。"而康有为则说："自北京初次见面，既已四年。"计算方法虽有虚实之别，但都明言是1898年由平山周引荐相识于北京后的再次会面。从会谈内容看，井上对保皇会勤王运动的内情也不甚了然。（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大阪每日新闻》，明治34年6月27—28日）保皇会通信中的"井上"，当为梁炳光的日文名字或代号。他只是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所以思庄说："以长者令井上办一事，而井上生死任之，至为难得。"

［16］ 《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9页。

［17］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版即版筑，广东会党首领；函中的"仙"，即仙根，丘逢甲字。

［18］ 英国外交部第17种文件1718卷，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士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转引自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

期。

[19] 1900年3月28日《致康南海先生书》，《长编》，第209—210页。

[20] 《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21] 1900年6月20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3页。

[22] 1900年6月27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6页。

[23]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

[24]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21页。

[25] 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长编》第222页。

[26]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函中"西省某老"，即别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

[27]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37页。此事桂人当时即疑心其别有所谋。

[2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7日。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另参见近藤邦康教授整理的日文本，《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1、2号合刊。

[29]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小山，应为唐景崧，其旧部有在滇、黔者。另外唐与岑春煊交善，对西南颇有影响。廉为陈廉君，曾在梧州办盐务。康四为思恩会党首领。

[30]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页。据李鸿章、刘学询及清驻柏林公使查报，当时有大批枪械由香港经澳门运往内地。保皇会还有意从德国购械。（《李鸿章全集》（三），第897—923页）

[31] 《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32] 陈紫瀛列名富有山堂正龙头，李立亭为广西会党首领，林玉为

广东会党首领。

[33] 《致办事人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119页。

[34]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

[35] 《致徐勤等书》(五),《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

[36]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20页。

[37]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二九”,即李鸿章。

[38] 1900年6月20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4页。原函仅署“廿四日”,今据内容确定日期。

[39]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4页。

[40]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6—137页。“岛”即星洲岛主,丘菽园号。

[41] 《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7页。

[42]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

[43] 《致徐勤等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6—107页。编者判定是函写于6月20日前,据内容应在此后。

[44] 《致办事诸子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9—152页。

[45] 1900年7月4日《致妙华夫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4页。

[46] 《致唐才常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2—143页。

[47]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8页。

[4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22日。

[49] 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第80号,1992年1月。

[50]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82页。

[51] 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第80号,1992年1月。

[52] 1900年8月11日《与同薇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7页。

[53] 1900年9月3日《与同薇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3页。

[54] 1900年9月20日《与同薇同璧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4页。

[55] 1900年9月26日《与同薇同璧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5页。

[56]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九日(1900年10月31日)《张之洞奏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张文襄公全集》卷51,奏议51。余育之为香港日新银号及跑马地愉园主人,1895年兴中会起义时曾助款万数千元。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0页。

[57] 《与同薇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2页。是函应写于1900年9月。

[58] 1902年6月3日《致罗璪云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0页。

[59] 转引自《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汤文判定是函写于自立军起义之前,但函中有"汉事可鉴"一句,应指自立军失败事。惠州起义后康于另一致丘菽园函中亦称:"今当绝意于东耳。且东事有外人窥伺,虽得而不易守乎?(汉事可鉴)。"秦西即容闳,其于9月11日由日本航抵香港,随即赴英国办理外交。是函言及此事,则应写于此后。误判的关键,在于将"井上甚称林玉才"认作林圭。据11月26日康有为致丘菽园函:"林玉同办,井甚称之"(《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林玉原为广西统军9将之一,后与版筑、三品等随梁炳光办粤事。井上,仍为梁炳光。据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8月他已有赴欧洲计划,10月24日曾到北京,随即归国。11月14日参加东亚同文会会议,次年4月赴欧,不可能在此期间南下广东,主持数月用兵大事。

[60]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

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是函仅署“廿九日”，据内容定为九月，即公历11月20日。

［61］《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是函提及惠州起义，应写于10月。

［62］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转引自《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

［63］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1页。

［64］1901年6月3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61—263页。1900年梁启超到南洋时，丘、康关系尚融洽。后因财政问题，丘疑心于康，1901年更公开撰文自辩非康党，解脱“叛逆”罪名之外，更指责康结党欺人（《北京群报》，1901年8月13日）。

［65］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明治33年12月。

［66］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大阪每日新闻》，明治34年6月27—28日；《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4年5月5日、22日。

［67］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近代史资料》，总80号。

［68］1900年5月19日《致湘曼孺孝诸兄书》，《长编》，第226页。

［69］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页。

［70］《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2页。

［71］1900年6月23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8页。

［72］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所引英国外交部档案藏原函。

［73］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30页。

［74］1900年3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长编》，第207页。

[75]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259 页。

[76] 1900 年 11 月 26 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 332 页。

[77] 1900 年 3 月 28 日《与〈知新〉同人书》，《长编》，第 207 页。

[78] 1900 年 3 月 13 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199 页。

[79] 1900 年 4 月 29 日《致雪兄书》，《长编》，第 239 页。

[80] 1900 年 4 月 22 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229 页。

[81] 1900 年 5 月 25 日《致罗孝高老弟书》，《长编》，第 231 页。

[82] 1900 年 6 月 27 日《致徐勤等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31 页。

[83] 1900 年 6 月 27 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96 页。

[84] 《致办事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23 页。

[85] 《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04 页。

[86] 《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53 页。

[87] 1900 年 6 月 27 日《致徐勤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34 页。

[88] 1900 年 6 月 27 日《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32 页。

[89] 1900 年 3 月 13 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199 页。

[90] 1900 年 3 月 28 日《致康南海先生书》，《长编》，第 210 页。

[91] 1900 年 11 月 26 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 333 页。

[92] 1900 年 4 月 4 日《与黄为之书》，《长编》，第 212 页。1899 年 7 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润楠、张学璟、梁炳光、陈国镛、麦仲华、谭锡镛、黄为之等 12 人结义于日本江岛金龟楼。

[93] 1900 年 3 月 13 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200 页。

[94] 1900 年 11 月 26 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

331—332 页。

［95］ 1900 年 4 月 29 日《致雪兄书》,《长编》,第 239 页。

［96］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 331—332 页。

［97］ 1903 年 2 月 16 日《高山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216 页。

［98］ 1900 年 4 月 23 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230 页。

［99］ 1900 年 6 月 27 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96 页。

［100］ 《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48 页。

［101］ 《致徐勤等书》(三),《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09 页。

［102］ 1903 年 10 月 26 日《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231 页。

［103］ 1900 年 4 月 23 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230 页。

［104］ 1900 年 3 月 28 日《与〈知新〉同人书》,《长编》,第 207—208 页。

［105］ 《长编》,第 208 页,何擎一夹注。

［106］ 1900 年 4 月 29 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232—233 页。

［107］ 1900 年 3 月 28 日《致康南海先生书》,《长编》,第 210 页。

［108］ 1903 年 10 月 26 日《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231 页。

［109］ 1900 年 4 月 29 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 232—233 页。

［110］ 《致办事诸子书》(三),《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154 页;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 1 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

［111］ 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自立会史料集》,第 221 页。

［112］ 1900 年 3 月 20 日《致康南海先生书》,《长编》,第 204 页。

［11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 1 册。

[114] 《致办事人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8—119页。直到6月下旬,港澳已能购械,康有为才让日本总会将余款拨往上海或代为购械(1900年6月23日《致麦来年等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5页)。

[115] 《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9页。

[116] 《致办事人书》(三),《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0页。

[117] 1900年6月23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8页。

[118]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29页。

[119] 1901年6月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62页。

[120]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

[12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4页。

[122] 《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页。

[123]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2页。

[124]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3页。

[125] 《长编》第215页,原初稿批注。

[126]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2页。

[127]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转引自《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

[128]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

[129] 清驻新加坡领事曾侦知保皇会扬言康四"在思恩府诱众三万,候中堂启节即起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七日《寄广西凭祥苏提督》,《李鸿章全集》(三),第981页)经苏元春详查,"并无逆党诱众思逞之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九日《苏提督南宁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第987—988页)。

[130]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2页。

[131]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32页。

[132] 1900年8月27日《与同富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0页。

[133] 《革命逸史》,第2集,第31页。

[134] 1900年4月4日《与梁子刚书》,《长编》,第212页。

[135]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自立会史料集》,第92页。

[136] 《致徐勤等书》(五),《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页。

[137] 1903年11月29日《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8页。

[138] 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大阪每日新闻》,明治34年6月28日。

[139] 1903年11月8日《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4页。

[140] 1899年10月2日《复李腾芳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0页。

[141] 1900年3月20日《致康南海先生书》,《长编》,第205页。

[142] 1900年4月4日《致康南海先生书》,《长编》,第214页。

[143]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17页。

[144]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长编》,第239页。

[145]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31页。

[146]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近代史资料》,总80期。

[147]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199页。

[148] 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近代史资料》,总80期。

[149]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徐为徐亮铨,黄为黄乃裳,林为林文庆。力,疑为秦力山。是年底秦离开新加坡时,赋诗题为《重留别邱林徐三君子》(《知新报》,第133册),

则前此曾相别离。

[150] 1900年6月24日《致办事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4—115页。

[151]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

[152] 《长编》第332页,原初稿批注。

[153]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2页。

[154] 1900年6月20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4页。

[155] 《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156]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99页。

[157]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2页。

[158] 《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4页。

[159]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1页。

[160]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转引自《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

[161]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29页。

[162] 先捐十万,三万付给唐才常,七万陆续汇往澳门总局。后又捐五万。

[163] 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近代史资料》总80期。

[164] 1900年4月5日《与湘孺两兄书》,《长编》,第215页。

[165] 1900年10月17日《与同薇同璧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7页。

[166]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

[167]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

[168] 《唐烈士才常墓志铭》,《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

[169]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页。

[170]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333页。

[171]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页。

[172]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近代史资料》,总80期。

[173] 同上注。

[174]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202页。

[175]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333页。

[176] 1903年9月1日《与穗田二兄书》,《长编》,第324页。

[177]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赘泽即骄奢之意。

[178]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332页。

[179]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

第 3 章

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

勤王失利，康有为将保皇会无功铩羽归罪于汪康年、孙中山。他对丘菽园说："自汉事一败，百凡坠裂，尚有惠事相牵诬，致败乃公事。呜呼！汪、孙之罪，真中国蟊贼也。"[1]这类别有用心的攻诋牵连出一个聚讼纷纭的重要问题，即勤王运动中趋新各派的关系。受事后回忆的误导，以往过分强调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将兴中会以外各种革新势力的活动都视为保皇会所统辖经营。其实，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仔细分析各派的政略与关系，这种认识便大有改观。

一 联合共识

庚子风云际会，对戊戌后政局早已深怀不满的趋新势力趁机纷纷跃起。经元善的一番话，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堂堂中国政府，惑邪启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志，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2]至此，甲午以来兴起的民间救亡运动将清政府从寄望对象中剔除，

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林圭、汪康年等人为轴心，围绕兴中会、保皇会、正气会、自立会及中国议会，形成宗旨、渊源相互交错的派系，在反清变政共识与政见利益分歧的交相作用下，结成既合作共事又角逐争雄的复杂关系。

正如自立军不是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一样，自立会也不是保皇会的政治附庸。纵观当时中国政局，以唐才常为代表的长江趋新势力处于反清联合阵营的中枢地位。唐不仅首先提出长江、珠江并举计划，主张大合维新各派，而且广泛结纳湘鄂江淮乃至川豫皖赣的维新志士与会党豪强，在革命与保皇两派之外自成一大"革政"势力。保皇会视长江为呼应偏师，唐才常则不自甘偏裨，他在政治上呼吁各派求同存异，组织上坚持联合共举，因而能够独树一帜，赢得普遍支持。正气会、自立会的宗旨与办事方略，既反映出它们外受兴中、保皇两会的牵制影响，内有政见分歧的派别个人，又表达了革新志士的普遍共识。以勤王求自立兴民政，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凝聚革新势力的政纲。唐才常劝说"孙康两派，亟宜牺牲小异，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满名词，皆可摒弃"[3]，的确是时势所趋，不应仅仅从革命与保皇两极对立的是非来评价指摘，而要认真考虑其合理性与现实性，特别是促成联合大举的积极作用。唐才常等以勤王名义号召团聚趋新反抗势力，而以变帝制为民政为政治目标，准备举光绪为总统甚至另选他人，明显具有反清和反对皇权的意向，既不同于康有为的保皇拥帝，也有异于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推翻后党专权，正是其救亡图存，革新变政的首要一步。而欲达此目的，"必大合而后能办妥。"[4]这与当时多数革新志士的想法不谋而合。汪康年一派的夏曾佑认为，只要宪法上规定，"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5]，便可以填平革命、革政两派的政治鸿沟，达到

联合对清的目的。唐才常的大合方略，组织上体现为外联保皇、兴中两会，使之援助长江举义及联袂响应于两广，内聚长江各地的反清革新力量，促使政见策略千差万别的派别个人携手共事。后人看来自相矛盾的宗旨，不仅构成正气、自立会内部各派合作的基础，而且赢得孙中山、梁启超对其中枢地位的承认与支持。

对于联合大举，革保双方的态度并非截然对立。一贯灵活务实的孙中山始终态度积极。他从来主张“联络四方贤才志士”[6]，早在1895年筹划广州起义时，就努力争取维新派的支持，邀请康梁及陈千秋等加入农学会。1897年从欧美返回日本后，又主动函邀梁启超赴日“同商大事”，并设法了解经康有为首肯的“中国群贤之公意”。[7]陈少白、区凤墀等也与康派的何树龄、张玉涛等有交。后者认为：内有康而外有孙，“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8]尽管百日维新之际康有为翻脸无情，但戊戌政变后孙中山仍几次登门拜访。通过毕永年的介绍，首先实现与湖南维新派的合作。[9]在其部署下，毕永年联络湘鄂会党，容星桥专办湘汉事务，史坚如再度深入长江，兴汉会系统对自立军的影响，远比以往的认识要深入持久。基于联合大举共识，他又与梁启超等人频繁交往，几乎达到联合组党的程度，甚至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10]孙中山争取维新派的努力，是其扩展革命活动计划的组织保障。他还以兴汉会总会长的身分出席梁启超为林圭举行的饯别会，以示声援。虽然他谴责梁启超到檀香山后专心组织保皇会是“失信背约”[11]，但又接受了后者“借勤王以兴民政”的建议，同意联合阵营使用这一旗号，即不再以皈依革命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论据之一，尽管他深知康有为态度顽固，彼此宗旨分歧，还是远赴南洋，“希

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12]，劝其勿“以区区小事而分立”，趁此良机，“实行大同团结，共同行动”[13]。这显然与所谓1900年4月孙中山接到梁启超的劝说信后，便从此打消与保皇会合作念头的论点相反。孙以必要的让步妥协促成和维系合作局面。南下香港之际，他还托平山周与港澳保皇会员接洽，声称：如事不成，“由他自行其是，吾行吾人之事可也。”新加坡之行受挫，孙中山基本打消对康有为本人的寄望，却未放弃与维新派合作的想法，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14]

孙中山争取维新派，除支持联合大举外，还想借以取得财政援助，增加政治筹码和选择机会。8月中旬，广东经略受挫，兴中会的财政又再陷困境，孙中山“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15]他与归国参加长江起义的梁启超协调行动，决定暂停广东军事，亲赴上海。临行前他发表谈话说：“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甚至对一度感到绝望的康有为也改变看法，认为：“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虽然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16]但实际上，其不惜犯险归国，最主要目的应是践梁启超前约，与之“握手共入中原”，以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17]与此相应，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于8月上旬与唐才常同船赶赴汉口，而容星桥则全力相助。如果没有统一部署，行动上很难如此配合默契。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立军是兴中会参与发动的反清起义。自立军失败后，兴中会继续寻求保皇会

的合作与支持。惠州起义前，港澳兴中会员还不断前往《知新报》馆，争取保皇会澳门总局的援助。[18]当然，孙中山及兴中会并不隐诲反满立场，惠州起义时，还有意通过传播媒介公布本派宗旨。香港《孖剌西报》刊登一封广东归善县来函，内称："某等并非团党，乃大政治家、大会党耳，即所谓义兴会、天地会、三合会也。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19]但也不应低估孙中山策略的灵活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他甚至不惜与李鸿章虚与委蛇，诈取安抚费，又亲自介入两广独立计划，先举李鸿章为主政，继听刘学询称帝王，除排满外，比梁启超的主张更为后退。如果坚持不肯因时变通，非但不足以显示原则的坚定，反倒有种族狭隘之嫌了。孙中山的恰当选择，不仅推动了联合反清事业，而且使保皇会相形孤立，为庚子后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派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

保皇会中梁启超在联合大举方面与唐才常共鸣最多，他力排众议，不断呼吁门户之见甚深的本派同人切实支持长江行动。他主持的檀香山筹款因清领事的阻挠迟迟未能收集，为此，他一再函告澳门总局："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希望同门能够"不分畛域"[20]。由于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以两广为重心，长江方面财政上很难分得一杯羹。正是考虑到"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21]，他才孤注一掷，托人向美商大笔借贷，并分别致函康有为、唐才常和孙中山，劝各派"不可轻于一掷"[22]，待其借款到手，再同时发动，以求必胜。但又担心"气机已逼，不可能挫其一鼓之勇，贻悔将来"，让唐才常"与诸豪随时行事"。[23]继而鉴于"我辈与贼党今日既已成短兵相接之势，想亦已待无可待"，对唐的"速发之议"亦表"附和"[24]。梁启超的筹款计划和

用兵方略并无过人之处，只是由此表现出来的对长江方面合作大举的真切关怀，在草堂师徒中确属难能可贵。汉口起事前，唐才常向康有为要求："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25]，梁启超闻讯立即启程归国，可惜抵沪次日，汉口败耗已至，只能着手于营救善后之事了。

在合作大举的战略框架内，梁启超对于同革命党联合也显示出浓厚兴趣。由于孙中山的地位影响不断上升，像康有为那样拒孙联杨（衢云），无法达成组织联合。康排孙的理由之一，是指其"轻率鲁莽"，"要毁坏一切"，而他主张"和平革命"[26]；后来则担心与"著名钦犯"交往，有损于忠臣的形象。[27]这些对于梁启超并不构成障碍。梁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时，见"草茅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于是"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以后他虽认光绪是"大有为之君"[28]而弃革拥帝，又借重保皇防止瓜分割据，但变法流血的刺激令其对主张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29]，积极回应孙的联合呼吁，甚至表示联合后让康有为"闭门著书"[30]。欧榘甲、梁子刚、张智若、罗伯雅等也齐声附和。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更加活跃。3月28日，他即复函谢缵泰，对前此进展迟缓的联合与合作事宜表示赞同。[31]在其主导下，保皇派与兴中会的交往日趋频繁，合作之事进展顺利。[32]双方甚至一度进入共同组党阶段。

关于梁启超与孙合作诚意的真伪，颇具争议。我认为，一要考虑梁的一贯宗旨与策略，二要从他与孙中山、康有为、唐才常等人的相互关系中测量定位，三要顾及其言行间距。还在日本时，他就告诉孙中山："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

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33]到檀香山后，又再度声明：“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34]此后其全部言行，证明他的确奉行这一方针。他对康有为、孙中山均有所保留，而全心支持唐才常的长江联合大举。他不满于康有为固执保皇成见，“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35]；所办《清议报》“亦始终不登保皇会文字”[36]；募集的款项迟迟不汇往澳门总局，以至康有为斥责其“骄谬专横已极”[37]，“一切大事之误，皆由之”。[38]并常常以梁为戒，教训弟子，令其在保皇会中处于“先生督责备至，朋友之相责尤甚”[39]的孤立境地。同时，梁启超还接受共和主张，结纳为言革而立的江岛同盟，甚至要康有为息影林泉。对于光绪，则主张“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40]自立军起义前，梁启超归国途经日本，可能与孙中山会晤过，“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起义失败后，他仍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未与孙文派一同进行，但将来有必要联合行动。”[41]

当然，梁启超组织上仍属于保皇会，与兴中会是合作而非皈依，又受师尊同门的牵制，需要顾及本派利益和地位。前此徐勤等因大同学校及《国闻报》所刊《中山樵传》与孙中山、兴中会结仇；横滨华侨为大同学校职员选举及华商会议所之争，分成“孙逸仙”、“梁启超”两派，公开冲突，梁启超一度因此与孙中山“踪迹不得不疏”。[42]联合之事为徐勤、麦孟华飞函告变，梁启超被迫离日，临行虽对孙中山矢言合作到底，但天平不知不觉倒向保皇会一边。此外，梁对孙中山“常作大言”之类的办事风格不以为然，双方平辈相交，既无师生之谊，又渐少钦佩之心，关系不免疏离。杨衢云曾批评保皇派“太傲慢，妒忌我们这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43]孙中山也因而指责梁启超“盈满”、“狭

隘”。[44]到檀香山后，梁利用孙的关系，挖兴中会的墙角，又催促港澳同门加紧筹备，与兴中会争夺广东，以免“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45]并让叶湘南派人暗察孙中山的调度计划，办事用人，也处处顾及是否有利于和兴中会竞争。例如他以檀香山“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发现兴中会“在港颇众”，而保皇会办事无人，“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46]因而坚持不派或少派檀岛会员赴港。

尽管如此，总体上梁启超并非单纯为保皇会争权夺利，而是维系以长江为中心，以革政为目标的联合大举，这从他 1900 年 4 月分别致函康有为、孙中山一事可以证明。他一面不顾康“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直言万一光绪“不能待我之救”即“已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47]，如何讨贼立国，婉转地表达了保皇以外的政治要求，一面又劝孙中山顺应废立之争后保皇声势骤涨的时势，暂弃排满口号，“借勤王以兴民政”，“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48]他对康孙二人犯颜直谏，借以表达的正是与唐才常相通的宗旨立场，力促两会支持长江大举，或保持行动上合拍。孙梁关系恶化，始于 1901 年 4 月至 6 月孙中山再赴檀岛，发觉当地兴中会尽为保皇会夺占之后。但梁启超前此所为并非存心行诈。1902 年，当孙梁交构，“意气尚不能平”之际，章炳麟论及二人反目成仇的因由，有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

“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制东西，惟人所命。公知□□，

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49]

仔细品味，章氏仍然相信梁启超确是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只是侨商不能领悟其中奥妙，从此变异。壬寅癸卯间，梁继续鼓吹“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甚至不顾康有为严责，要与之“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50]，实践其抵檀之初对孙中山的承诺。可惜他终究未能摆脱保皇的框缚，旅美后更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孙中山坐实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51]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

对于联合主张，保皇派宗师康有为态度最为顽固。他以革命党为异己政敌，千方百计地划清界限。早在1895年，他就拒绝孙中山加入农学会之请。戊戌骤得光绪恩宠，更担心与革命党交往于己不利，指示同党与兴中会断绝往来，使两派在横滨、香港等地关系趋于紧张。亡走日本之际，又坚拒几度来访的孙中山于大门之外。甚至与孙中山有关之人亦在排斥之列。1898年9月，毕永年在北京向他引荐平山周、井上雅二等人，“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连毕永年也觉得“殊可笑矣”。[52]到日本后，他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53]对门下弟子亦以此分亲疏。梁启超等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倍受猜忌指责，而罗普“以不与江岛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54]新加坡疑狱给两派活动均造成不利影响，康有为却庆幸因此“益明我与彼之不相合”。[55]唐才常、林圭等不仅与孙中山订殊途同归之约，而且与兴中会员共事，又不满于康党的傲慢偏见，加上正气、自立会宗旨和组织上

的独立姿态，康对此耿耿于怀，不能充分信任支持。参加自立会事的井上雅二感到，康"从来不注意得会众之心"，只是"在两广聚集宗徒，嗾使唐景崧所部及三合会一派党徒进行骚扰"。[56]自立军失败后，澳门总局断然拒绝兴中会的求援，康有为更深怀敌意，将保皇会因胆怯力弱而主动放弃在粤举事说成是"惠事及焚抚署一事所牵致"，诬蔑兴中会故意破坏，"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并要求登报声明："保皇与扑满相反"，将"惊粤"罪责推给革命党。[57]勤王运动偃旗息鼓，康不但诋毁革命党，还指汪康年告密破坏自立军，指长江行动妨碍两广，指梁子刚办粤事牵制取桂，指统兵将帅费饷败事，指华侨捐款少而期望切，指容闳、荷马李等志大才疏。除草堂弟子外，几乎一切同道旧友都在攻诋嫁祸之列。这般政治品行，使其众叛亲离，陷于孤立。

不过，康有为虽将用兵重心放在两广，对长江大举未尽力支持，但也没有用保皇会的宗旨方针强制干预，算是默认变政纲领与联合方略。此外，康孙矛盾也夹杂利害计较及人事纠葛。康不愿以声势影响蒸蒸日上的孙中山作为合作对象，害怕因此丧失权力地位，却一直与谢缵泰保持接触，对其提出的"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的主张"[58]表示赞同，洽谈与杨衢云联合事宜。对于梁启超提出的"万一"忧虑，康有为也并非毫无考虑。他曾亲口告诉加拿大保皇会骨干叶恩："上不能救，则必自立，且言求广东自立。"[59]在其使用的电报密码中，既严格区分"孙党"、"我党"，对兴中会保持戒心，又有"一定于勤宗旨方易办事"，"一定于革宗旨方易集事"[60]的权宜选择，准备适时变换旗号。可惜康有为疑心过重，双方缺乏沟通，加上孙中山介入了刘学询的图康密谋[61]，与李鸿章先后就广东事宜所作种种交涉又以刘为中介，更加深了彼此误解，令康有为杯弓蛇影，两派在日本、香港等

地的冲突不断升级扩大，最终导致公开决裂。

二 内部分歧

外部关系的错综复杂，使得长江联合阵营内部分歧丛生。表现之一，以上海为基地的唐才常和以汉口为基地的林圭，与孙中山、康有为的关系亲疏有别，前者主持的自立会“全由康派与唐才常相往来、相计划而成立”[62]，后者统帅的自立军，则主要因袭兴汉会而来。长江流域计划，原不限于湘鄂，除安庆、芜湖、铜陵外，由于辜人杰移防南京，以及淮阳盐枭徐怀礼来附，唐才常等又将势力扩展到南京、镇江、扬州，甚至一度有借徐怀礼虎威，以虎军为正兵之意。[63]以后才确定由狄平负责下游，唐才常统军汉口。由于徐反复无常，临阵变节，江宁杨金龙等又因刘坤一复出以及清政府改变排外国策而按兵不动，[64]汉口才成为自立会勤王正军。唐才常名义上是自立军统领，但主要活动于上海，从事联络与筹款，除几次短期赴汉外，一般靠函电遥控。直到起义在即，才于8月9日从上海匆匆赶赴汉口。真正执自立军牛耳者为林圭。[65]他自1899年11月赴湘不果，改到汉口寻求发展，在毕永年、容星桥等协助下，创办“义群公司”，通过兴汉会的关系，与湘鄂会党建立联系。秦力山称：“吾谓庚子长江流域革命运动大舞台为林氏一人所筑，而其他各人无非备数者。”[66]就自立会而论，此言不无道理。可是林圭看来，汉口之谋由“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67]，视“本公司”与兴汉会如出一脉，行动方略及人事安排，均向孙中山汇报协商。尽管湘鄂会党首领被离间于前，毕永年出家于后，兴中会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有所削

弱，但兴汉会影响始终保持。而且林圭仍倾向反清革命，每与来访者“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意气甚激昂也”。[68]所以，秦力山后来特意“为林氏呼冤而告我国民曰：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其实林无时无刻不欲出唐之范围外……。唐于会中，几激成内讧，林又起而调和之。”[69]协助林圭的秦力山、戢元丞等据说也与孙中山订有合作之约。他们不满于唐才常过分依赖保皇会，但或有仰仗其财政接济之需，或认为政见分歧无关宏旨，[70]没有公开反对。这些“隐没宗旨以迁就其手段”[71]的勤王军将的存在，也是孙中山将汉口自立军视同己出的重要原因。

分歧的表现之二，是唐才常与汪康年的明争暗斗。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与中国议会的联系与区别，一直语焉不详。早在1901年4月23日，夏曾佑致函汪康年已谈及此事：“今日至难处之事，乃上之人不能分新党之派别，以自立会混之国会，又以爱国会混之自立会，转展相牵，葛藤何已。然亦何怪其然，立会之地同，入会之人亦半同，何怪不并为一谈也。此宜作文一篇，表明新党有若干派，各派之政策若何，则界限明矣。窃意此时是政党萌芽之时，故泾渭未分，将来必各各分别不自讳，如东西各国之政党者也。”[72]而厘清三会关系的关键，正是剖析唐汪矛盾。

正气会成立于1899年12月22－25日间，次年5月唐才常等酝酿改组，并打出自立会旗号办事。7月底中国议会成立后，正式立会。[73]另立自立会，主要目的是“联络长江一带兵官及哥老会等而利用之”。[74]8月井上雅二到江宁活动时，即以中国议

会名义联络官绅，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清军将领和会党头目。[75]同时也是为了避开派系纠纷。在正气会和中国议会中，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派起着重要作用，而自立会则完全排开汪派。因为“汪与唐心中互不合拍。唐认为汪不可信赖，而汪认为唐有野心”。[76]双方存在严重隔阂。

正气会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等，一是革新派人士周善培(孝怀)、汪康年、丁惠康、叶瀚(浩吾)等。虽然干事长、事务员分别由湘籍的唐才常和沈荩担任，但最具实力的还是汪康年等江浙人士。他们在上海活动既久，交游又广，彼此间有着同乡、同僚、同窗、亲友、故旧等多重社会纽带，结成连环相扣的大网，不仅影响左右沪上士林，而且广泛结交往来于此的各省新党。戊戌前与之交往的湘粤人士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相比之下，唐才常、沈荩等人的资历根柢要浅得多。到了中国议会时期，江浙派势力进一步增强。该会除容闳、严复、郑观应等名高望重者外，骨干成员是唐才常、狄平等康梁派和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人士。尽管会长容闳偏袒干事兼会计唐才常，但主要权力控制于人多势众的江浙派之手。7 月 26 日首次集会时，叶瀚任主席。7 月 30 日第二次集会选举干部，叶瀚任书记，汪康年任干事，两人既是同乡，又曾同僚。[77]其余两位书记汪有龄(子健)、邱震(公恪)，一是汪的亲戚，一是叶的知己。[78]另外 8 位干事中，汪立元(剑斋)是汪康年的亲戚，沈士孙(小沂)、赵仲宣据说“与汪观点一致”。[79]孙宝瑄(仲愚)则与汪同乡，又曾是《时务报》的重要撰稿人，且地域意识明显。他后来曾说：“盖我国开化之志士，广东、湖南而外，惟吾浙最盛。”[80]戊戌前，他和另一位干事胡惟志(仲翼)与汪康年、宋恕、梁启超、谭嗣同、吴嘉瑞等自比竹林七友。[81]其余 3 位干事，郑观应缺乏实

力，丁惠康、吴保初与汪康年、叶瀚、孙宝瑄的关系比唐才常要深得多。而唐派的重要骨干张通典、狄平，则未能进入中国议会领导层。

唐才常组建正气会，是为了联络维新志士，聚合江湖豪强，显示组织实力，争取海外财源。但正气会成立后，因名义公开，不便于运动会党，又与汪康年等貌合神离，时生龃龉，于是双方分别筹划自立门户。唐才常与梁启超协商，筹组自立会，“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其气脉，有容闳等替其运动，有唐才常等为其主力”，“汪康年深以为非，实有分道扬镳之势”。[82]而汪康年在正气会成立后，也感到受唐才常排挤，颇为失意，[83]企图纠合同志，另立一会。1900年3月12日，夏曾佑函询汪康年：“正气全[会]无恙否？更别立会否？公有他图否？”[84]5月，又问以“别会成否？”[85]后来由于唐才常另设自立会，由叶瀚接任正气会干事长，汪康年才试图请东西外人相助，改造扩张正气会。[86]远在四川的周善培对于内部冲突导致“正气不张”，大为“太息”，甚至说：“然见君辈之龃龉，则孤立者又仆之幸也。”[87]

汪康年等见斥于自立会，并非如有人所论，武装起义为中国议会的士绅名流所难梦见。分析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宗旨策略，眼光不能仅仅盯在几份公布的宣言文告上，而忽视政治活动中公开表态与实际方略往往大异旨趣的常规通则。诚然，中国议会成员确有政见分歧，据章炳麟说，行动方略“所执不同”，分为迎跸、排满两派，迎跸派内部，又有文廷式藉力东西，唐才常翁、陈坐镇，狄平密召昆仑，汪康年借资鄂帅等意见，“志士既少，离心复甚”。[88]汪康年还分别游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率兵北上勤王，诛杀“不顾国家，不明大局之贼臣”，以“为议和

之根本”。[89]后又力辩自己与革命党及江湖中人无关，所请“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90]，并指有关蜚语为保皇会诬陷。但是，一开始就愤而脱会的章炳麟对各派政见方略的概括并不全面。汪康年不仅事后分辩多有隐情，前此上书也是别有深意。当时维新志士包括章炳麟在内，视义和团为顽固党操纵的排外复旧工具，纷纷请求南方各督抚发兵平定，以打击后党，恢复新政，进而变政革新。而且汪的行动为团体公托，对此唐才常亦表赞同。

实际上，汪康年等人早怀反清变政意向。1897年德占胶州湾后，维新人士萌发倚靠民间势力解救危亡之念。黄中慧建议汪康年“纠合山东豪杰倡举义党，以与德抗”。[91]戊戌后，这种愿望日趋强烈，矛头所向，也由外强转向顽固政府。汪康年对章炳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92]的见解及其称赞孙中山“不瓜分不足以恢复”之说“可谓卓识”[93]的评语颇有同感，嘱咐黄忠浩“专以练兵为务”。[94]又不顾清廷三令五申的党禁，积极串联组织，结党救国。他称正气会旨为“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95]，表明正气、自立两会精神相通。由他亲自参与制定，一般会员亦不知情的中国议会绝密宗旨，不但准备暗中动武，而且力图变政自立，“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具体方式有二：“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实行方法则为：“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96]这一联合民间私党武力变政的宗旨，与唐才常、梁启超的主张是一致的。

汪康年等还努力将此宗旨付诸行动。早在正气会成立之初，唐才常计划请田野桔次率数十海贼突袭北京，杀西太后，“逐尽所有奸人”，并发动会党起义于长江，“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

略武昌，遂可号令于天下”。[97]与此相呼应，在汪康年主持下，派人驻镇江、武汉以通扬沪消息；编排隐语暗码，秘密筹款；在扬州、四川、宜昌、祁门等地以办学堂、开公司名义，招纳豪强。汪本人则在沪广交异人，以为“将来九合诸侯之地”[98]，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到夏季，四川方面未能打开局面，周善培“极意招徕，渠辈又谓是老酸者，不足与谈生意”。[99]“日日求通”而“力不能通之”。[100]湖北方面，则宜昌有黄小琴者，“情形最熟，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101]扬州等地进展最为顺利，特使不仅与徐怀礼接洽，还广开门路，用金钱“办理下交”，并建议出具定凭，实行利诱，“以鼓动众心，使为我用”。据称他已联系到可靠之人，“大约凭此君之能事，可撰出佳文二千言，字字皆能得力”。[102]汪派的活动得到唐才常的协助，后者听说周善培在四川运动会党，“用四、五月之力，了无成效”，拟派“湖南伙计来川”，共事联络。[103]因此，当汪派觉得“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104]而加以抱怨时，周善培劝解道：“浏阳之有可疑，仆意此浏阳之隐苦。盖其所谋内圈之事，不如正气之可一一告人。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其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特于足下可一直言之而不言，则可惜者。总之，吾党既欲有所营于天下，则凡小疑小嫌，肠胃之间，皆当设一消化之力以待之，乃能相合于永远。”[105]唐、汪两派也深知其优势建立在联合基础上，要想保持对内对外的影响号召力，便不能公开分裂。因此，在自立门户的同时，又共组中国议会。当然，这方面的努力同样受到派系纠纷的干扰，从1900年6月提出组建中国议会，因“互有阻隔，且于经费甚支绌，竟因是迟迟迁延时日”[106]，到7月26日才告成立。

三 犬牙交错

周善培函中所谓“某君”，即康有为，唐、汪的门户之见，与保皇会关系匪浅。

戊戌前，康、梁与汪康年原属志同道合，他们共同经营的《时务报》，堪称开风气之先。后因汪秉承张之洞旨意压抑梁启超言论，并对康有为有所不恭，双方失和。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107]。草堂系飞扬跋扈，不仅与日本、港澳的革命党关系趋于紧张，也得罪了湖南、京沪等地的非草堂系维新人士，不少人鼓动汪康年出面与康有为抗衡。[108]后来担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议会书记的江浙派另一首脑叶瀚，还准备倡兴浙学，以抵制“声气可席卷天下”的“南海伪学”[109]。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激怒汪与之公开论争，“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110]当时日本人这样评论：“日清交战后接踵而起者，在民间有广东的康长素派和上海的《时务报》馆派等。这两派表面相结托，其实完全不同，如广东人与江苏一带的中国人的差别。特别是康派稍带宗教味，外面观之，有东林党之嫌。”[111]政变后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芥蒂甚深，积怨难消。在正气会和中国议会中，汪康年虽与唐才常合作，却不满唐与康联系过密，担心“若其人真归，则费事之极耳”。[112]双方因与康有为关系的亲疏而俨分两派，互不协调。为避免办事掣肘，唐才常只得另起炉灶。

然而，汪、唐两派不仅宗旨方略根本一致，对待康有为的态度也是异曲同工。唐才常服从康有为，敬服之外，的确别有隐

情。据了解内幕的井上雅二称：按照自立会的布置，因大多数人不赞同康有为的言行，“只是要利用他的筹饷”[113]，所以不准备让他出头任事。这不但与梁启超前此的主张相符，而且与汪康年等以“安插对山”为“极难对付事”[114]的看法不谋而合。事实上，戊戌政变后，中国只有少数人真心拥护光绪继续改革。[115]尽管废立之争后，保皇勤王的旗帜下从者如云，但多属趁时而动。而且群雄并起，各自逞强，康有为反倒成了多余人物。如果不是在海外筹款方面影响犹存，唐才常的政治天平如何摆动，还是一个未知数。

值得注意的是，汪、康交恶与孙中山有一定瓜葛。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愤于清廷“弭患无术，善后无方”[116]，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东，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民间力量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还专程陪同汪、曾二人到大阪，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会见过《大阪每日新闻》记者。[117]一些日本人遂将汪康年与孙中山相并提。[118]在此之前，两人已间接有所认识。1895年3月，梁启超函告汪康年：“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119]孙中山伦敦被难，《时务报》连续译载海外报刊的消息评论，最早向国内介绍这位革命先行者的异域历险。[120]东渡前夕，汪曾向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121]与孙中山接触，是否在原议程中，不得而知。归国后，汪认为：“行者之无能为”，且将此意“遍喻于人”。[122]康有为害怕汪、孙交往之事张扬开来，牵累于己，竟密谋举发。徐勤函告韩文举：汪氏“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馆声名。欲公度、卓如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即汪康年)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又指汪“荒谬”，目为“小人”[123]。邹

代均担心康门师徒施展"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124]的惯用手段,借机构陷,飞函告急。此事进一步加深了汪康裂痕。此外,汪间接介入了刘学询的图康密谋,无疑也会加重康的恶感。

东游归来,汪康年仍与兴中会有所联系。1898 年 6、7 月间,他会见了平山周等人。[125]正气会期间,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又不能与唐才常通力合作,汪康年等还探讨过联合革命党的可能性。周善培建议:"中山许公宜常与之通消息,缓急亦有用者也。"[126]夏曾佑反对向督抚进言求助,也不赞成与"翘然为首"、"帝制自为"者共事,认为:"自成一队,力既不能,时又不及。与中山合,此较妥。然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待人(中山处大约人材较众,皆教中人,非士大夫,故我辈不知)。唆使武负,此策无从行。"[127]为保证"文必己出",以免"自主无权","求为彼隶卒且不录"[128],他建议:"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129]惠州起义时,周善培仍表示:"中山既有所举,吾党不可不赞之,不可复有嫌疑。""中山倘西顾,必使人来而为恃","果有徒,仍宜赞中山"。[130]此后汪康年还向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打听:"二雄合一,是否? 二雄能再雄鸣否?"[131]与江浙派的关系,应是 8 月间孙中山敢于赴沪的动因之一。

汉口兵败之际,汪康年、叶瀚有心"收拢唐等的败兵","以利他日之用"[132]。无奈前此两派"固属莫不相关","终难收效"。[133]为保存实力,汪康年等欲将所招人马拉进宜昌、恩施一带"未开辟而无主名"[134]的深山,生聚教训,潜伏待机。可惜缓不济急,一时难有作为。康有为仅凭道听途说就断言自立军失

败"全由汪康年之泄","汪尾唐后而入鄂,一搜而得据,故尽败"[135],结果再度激化矛盾,"两派之间遂截然分途,不能化合","议会亦由是散耳"。"自余各派,亦互相排击。此不特新党志士之忧,而于全国前途之影响,有大不利焉。"[136]趋新势力从此卷入党争漩涡,遗患无穷。

当然,各派之间在革新变政救亡宗旨的大同之下,也存在诸多分歧。康有为以保皇为目的,而其他人看来,勤王只是手段。孙中山的排满与民权,得到梁启超、林圭、章炳麟等人不同程度的共鸣,江浙士绅中有人却不以为然。三年以后,夏曾佑批评当时激进青年鼓吹逐满、民权、流血之说,认为逐满非持平之道,民权有待民智已开之后,流血乃必不得已之法。[137]孙宝瑄对革新势力的基本分析是:"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138]不过,这些政策分歧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些派别会因此而绝对排斥以暴力方式实现革新变政,或根本拒绝民主政治。孙宝瑄的态度在江浙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1901年新政复行之始,他认为:"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并复函章炳麟:"法果变,公再谈逐满,当以乱民相待。"上海新党闻知此事,"皆哗然",谓其"改节,贡媚朝廷"。但他又向来函声明继续坚持排满立场的章炳麟表示:"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139]尽管他们当中

许多人与官场特别是地方督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再未滋生反清意向,但庚子国变的万古未有之变局,迫使各派亮出政治底牌,因而宗旨方略趋于一致,言行迅速接近起来,能够以组织联合形式协调行动。

中国议会议长容闳是牵涉各派关系的另一重要人物。一些论著据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称之为孙中山代表,显然是与容開(星桥)相混淆。由此论证孙中山与唐才常以及二容间的联系,则往往颠倒时序,误因为果。容闳对康有为十分钦佩,积极为保皇会和自立会办理外交,在中国议会中,则偏袒唐才常,引起汪康年的不满。但他一直努力促进各派联合,早在1900年3、4月间,就与谢缵泰、杨衢云等在香港多次商谈合作计划。谢还建议推容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40]4月4日容闳由港经日本赴美见梁启超,谢函劝孙中山与之会晤。梁启超很可能是与容闳等通气后,才分别致函孙中山、康有为,正式提出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方略,力劝各派合作。4月26日,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协商合作事宜,内容之一,当是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的建议。杨、谢拥容,既针对保皇会阻挠合作,也不乏抵消孙中山声势,以报复兴中会领导权之争失势的用意。[141]而孙中山既然接受梁启超因时变通的意见,也要考虑联合阵营领袖的适当人选。他去南洋与康有为洽谈,推举容闳为共同领袖应在议程之内。8月孙中山赴沪前发表谈话,不仅对各派联合前景充满信心,而且特别对新当选为中国议会议长的容闳表示支持,称之为"众望所归的领袖"。[142]

然而,容闳的会长头衔多属名誉性质。他"与汪不合拍",认为"汪有私心"。[143]汪派则觉得其"进化太高"[144],"不能任国会之事"。[145]康有为也批评其"纯乎西风"。[146]尽管他袒护康派,表

面看来似乎了解自立会内情，实际上“并不知道唐等的事情。完全是康有为等人一手操纵的”。所以自立军失败，“他无法来挽回和收拾”，其“组织团练”，“民间用兵”[147]之策无从实现。对自立军，由于容星桥的存在，容闳可能了解一些内情。但孙中山与容闳的关系，则是在 1900 年 9 月二人同船东渡，由容星桥居间引荐，在船上和到长崎后几度晤谈，容闳改变了孙“过于轻率”[148]的印象，才密切起来。容闳表示：“欲帮助孙遂其宿志。”[149]不久，容闳接到上海密电，于 9 月 7 日由长崎启程赴香港。与孙中山一同前往东京活动的容星桥闻讯，也于 9 月 14 日由横滨赴港。[150]联想到梁启超在上海所说要与孙派在两广合作的话，这似非偶然巧合。此后，容闳一面继续为保皇会办外交，“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151]，一面被孙中山举为代理使职于外国之人，[152]才分别成为革命、保皇两派的外交代表。由于保皇会勤王虎头蛇尾，兴中会举义虽败犹荣，他逐渐疏远前者。

兴中会以外各派的秘密宗旨与活动表明，一旦当权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严重危及国家社稷的安危，开明士绅的民重君轻观念与天下己任抱负便会与民主爱国的崭新意识交相作用。汪有龄这样表达其主张：“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曲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矣。”[153]他们秉承士林异端结交江湖以抗朝廷的传统，与各种反清势力联合，以武力扫除变政障碍。其因时因地而异的言行，固不免夹杂拚死一战的冲动，但也有策略的灵活变通。各派宗旨利益不一，手段却惊人地相似。而且就革新变政的根本而论，宗旨亦无二致，只是程序步骤缓急有别。当各派矛盾尚未扩大公开，而形势又逼使其立即行动时，凭着以民间势力速起救国的

基本共识，不仅产生了相互联合的愿望，而且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正如田野桔次所说："然时势之所变，几咸驱在野之志士而成合一团体。""而一时感动奋发之气象，理想知识之发达，实足令人敬仰。且彼等之心，皆出自一片爱国之热忱，非所顾于成败利钝也。故万一事成，不特称霸于中国，雄飞于亚东，固将摧狮威，折鹫翼，握全球之霸权，执万国之牛耳，而为世界之主人翁也"。[154]当时列强兴兵，北方糜烂，南方督抚以下大小官吏各怀贰心，纷求应变自保之方。如果各派通力合作，未必没有乱中取胜机会。可惜康有为气狭量窄，各派又不能齐心协力，使中国再度痛失变革良机。在清廷各个击破和内部各派冲突的夹击下，趋新势力元气大伤。

武力反清中各派显示出来的能力高下，成为庚子后海内外一片言革之声的重要契机，使革命党抢占上风。徐勤叹道："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155]先前曲高和寡的排满革命成为人心所向。不过，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还处于分化改组的大变动之中，勤王未必尽属保皇会，反清并非同归革命党。用革命与改良（维新）两极相对的简单框架来解释甲午以后中国各种趋新势力的形成起落，分化演变，及分歧联系，总有几分不合体。细读史料，突出勤王阵营中保皇与革命的冲突对立，很大程度上受到庚子后政局变化，特别是 1903 年革保初步论战的影响，而章士钊所著《沈荩》，秦力山所著《庚子汉变始末记》尤为关键。从清末政治大格局中考察民间势力与政府的关系，趋新各派政治行为的驱动因素不仅来自西方近代意识，也受制于传统社会绅权与皇权关系的观念及行为规范。

注 释

[1]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见汤志钧《自立军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29页。

[3]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自立会史料集》，第67页。

[4] 1900年1月26日《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22—323页。

[5]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1364页。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7]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9—180页。

[8]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114页。

[9]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10] 《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11] 《革命逸史》，初集，第16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页。

[13] 明治33年7月21日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青木外相，高秘第770号。

[1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1、196页。

[15] 《三十三年之梦》，第218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199页。

[17] 1900年4月28日《致孙逸仙书》，《梁启超年谱长编》(后简称《长编》)，第258页。

[18]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明治33年12月。

[19] 《广东惠州乱事记》，《中国旬报》，第27册，1900年10月27日。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文字稍异。《清议报》第62册从香港西字

日报转译此函，则作“本会首并副会首等誓灭满洲，重立新君，以兴中国”。

[20] 1900年4月13日《致总局诸兄书》，《长编》，第224页。

[21] 1900年4月29日《致星州先生书》，《长编》，第240页。

[22] 1900年4月4日《与忠雅两兄书》，《长编》，第213页。

[23] 1900年4月12日《致忠雅两兄书》，《长编》，第222页。

[24] 1900年4月20日《致忠雅两兄书》，《长编》，第224页。

[25] 《长编》，第245页，梁仲策注。

[26]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27] 1904年12月3日《大陆》杂志第2年第9号所刊《钦差大臣》记：康到日本后，“孙三次造访，康皆拒不见。后孙之友某日人与康笔谈，偶及拒孙之故，康曰：‘我是钦差大臣，他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

[28] 《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

[29] 《革命逸史》，第2集，第28页。

[30]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59页。

[31]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32] 据现有资料可证，梁启超于1899年5月1日在东京与孙中山约晤(明治32年5月2日东京警视总监报乙秘第629号)；6月初在横滨文经商店与杨衢云会晤(《中华民国革命秘史》)；7月8日在横滨和章炳麟等与孙中山会晤(参见拙著：《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孙中山研究论丛》，1986年第4集)；7月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与孙中山洽谈行动方略，并到孙的寓所叙谈(《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44—46页)；8月11日与孙共同出席犬养毅在横滨住吉町六丁目千岁楼为华商会议所争执事举行的调解会(明治32年8月12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秘甲第380号)；是年秋，两度函约孙中山，为之介绍周善培，并商一切事务(《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另据梁令娴回忆，当时梁启超多次与来访的孙中山高声辩论革命之道，各叙所见，状至融洽(见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一)，第492页)。

[33]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44—45页。

[34] 《革命逸史》,第6集,第14页。

[35]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2—133页。

[36] 1900年4月27日《致雪兄书》,《长编》,第238页。

[37]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等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2页。

[38]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页。

[39] 1900年4月27日《致雪兄书》,《梁谱》,第238页。

[40] 《革命逸史》,第2集,第29页。

[41]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22日。承亚细亚大学容应萸博士指出中译本的错误。

[42] 《梁启超与犬养毅笔谈》,《乘桴新获》,第406页。

[43]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44]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44—45页。

[45]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梁谱》,第201页。

[46]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谱》,第233页。

[47]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21页。

[48] 1900年4月28日《致孙逸仙书》,《长编》,第258页。

[49]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2—163页。

[50] 1902年5月《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86—287页。

[51]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页。

[52] 毕永年:《诡谋直纪》,《乘桴新获》,第26页。

[53] 民表:《毕永年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29页。

[54] 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长编》,第317页。

[55] 1900年8月12日《与同薇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9页。

[56]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

报告》，明治33年10月。田野桔次据此写成《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第5节，内容有所增删。

[57]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见《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

[58]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59]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2页。

[60]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48—553页。

[61] 1899年7月至9月，刘学询借考察商务之名赴日，与日本政府密商交康之事，其间曾与孙中山接触。11月，李鸿章、刘学询有过利用孙中山诱捕康有为的计划。至于孙如何回应，不得而知（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孙中山研究论丛》，1987年，第5集）。

[62]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

[63] 1900年梁启超致函唐才常、狄葆贤，谓："若用虎威，两公入虎穴与否，是一大问题。""杨（鸿钧）、李（云彪）与虎相合否？能团成一军否？兄意如欲以某军为正兵，则宜入某军"（《梁谱》，第224页）。

[64] 7月22日，清廷发布上谕，令刘坤一、张之洞等保护外国在华商民教士，以谋和解，得到地方官吏的支持，长江沿岸湘军将领纷纷改变初衷，重新效忠朝廷（《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日）。

[65]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

[66] 民表：《林锡圭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32—233页。

[67]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21—322页。

[68]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

[69] 民表：《林锡圭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32页。

[70] 如沈荩对"文字小道，尤不屑厝意，无论若何方面，吾惟以可达吾目的者是用"（黄中黄：《沈荩》，《辛亥革命》（一），第289页）。

[71] 黄中黄：《沈荩》，《辛亥革命》（一），第295页。

[72]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8页。

[73] 关于正气会的成立时间及主要成员,胡珠生据宋恕日记提出新论,惜误解颇多,详见拙文《兴汉会的前因后果》,《孙中山研究论丛》,第9集。关于自立会的成立,1900年6月6日梁启超致狄葆贤函谓:"来函所论甚当,吾辈宗旨既专在救国,会名既已定,改为自立甚好。"(《梁谱》,第245页)另据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30、31日记:"唐还打算设立中国自立会。""唐才常一派的计划,建立中国自立会"。

[74]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

[7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8日。

[76]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31日、8月1日。

[77] 参见叶瀚:《块余生自记》,《中国文化》,第5辑,第480页。

[78] 汪有龄为汪康年族叔。1902年邱震病故,叶瀚挽联云:"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饮冰室诗话》,第18页)。

[79]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30日。

[80] 《忘山庐日记》,辛丑二月二十三日。

[81] 《忘山庐日记》,丁酉三月二十八日。

[82]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83] 1900年2月11日邹代钧致函汪康年予以慰问道:"公在沪既无意趣,虽不因人言而离沪,又何不自为而离沪?"(《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792页)。

[84]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3页。

[85]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8页。

[86]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函询:"正气会西人肯助,其旨若何?扩充又如何?"(《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页)汪康年还致函近卫笃麿、大隈重信和犬养毅等日本关注中国问题的政界要人,并寄呈正气会章程,请求援助(汪贻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年谱一)。

[87] 1900年5月16日《周善培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4页。

[88] 《再致夏曾佑》,《章太炎选集》,第 115 页。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 137 页。

[89] 井上雅二:《上海维新党重要人士上李鸿章意见书》,《东亚同文会第十回报告》,明治 33 年 9 月。

[90]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汪穰卿遗著》,第 4 册。

[91] 1897 年 12 月 24 日《黄中慧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 2267 页。

[92]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951 页。

[93] 1899 年 7 月 7 日《章炳麟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956 页。

[94]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 2294 页。

[95]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年谱一。

[96]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 33 年 7 月 31 日、8 月 4 日。

[97]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 1 章。

[98] 1900 年 7 月 3 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65 页。

[99] 1900 年 6 月 18 日《周善培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6 页。

[100] 1900 年 5 月 16 日《周善培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4 页。

[101] 1900 年 8 月 7 日《□存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 3685 页。

[102] 1900 年 8 月 9 日、19 日《□存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 3686—3687 页。佳文二千言,即精锐二千人。

[103] 1900 年 6 月 18 日《周善培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6—1197 页。

[104]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72 页。

[105] 1900 年 5 月 16 日《周善培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4页。

[106]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107] 1898年9月13日《邹代钧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763页。

[108] 1898年8月3日《陈汉第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2045页。

[109] 1898年7月29日《叶瀚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600页。

[110] 1929年4月《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戊戌变法》(二),第573页。

[111] 草胜:《上海近信》,《大阪朝日新闻》1898年6月10日。转引自藤谷浩悦:《戊戌变法与东亚会》,《史峰》2号,1989年3月31日。

[112]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1页。

[113] 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

[114]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页。

[115] 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论中国革命与先烈》,第24—28页。

[116] 《时务报》第52册,1898年2月21日。

[117] 《清国新闻记者》,《大阪每日新闻》1898年1月17日。见藤谷浩悦:《戊戌变法与东亚会》。曾广铨为曾纪泽之子,原任清驻日公使馆三等秘书。1897年跟踪孙中山由英国到日本(明治30年8月18日神奈川县知事中野继明致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秘甲第403号)。后参与创办《时务报》。1900年任李鸿章幕僚时,介入抚孙计划。6月17日,乘安澜轮赴港接孙中山,并担任刘学询与宫崎、内田、清藤会谈的翻译(《三十三年之梦》,第182-183页;《革命逸史》,第4集,第93页)。孙实甫,名淦,后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并任职于日本邮船会社。

[118] 1899年2月16日《章炳麟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951 页。

[119] 1895 年 3 月 14 日《梁启超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31 页。

[120] 《时务报》第 14、15、17、19、21、28 册分别转载《伦敦东方报》、日本《国家学会志》、《温故报》的有关报导评论,如《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中国私会》、《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论中国内腐之弊病》等。

[121] 1898 年 1 月 1 日《梁启超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52 页。函谓:“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惟前往之人,必须极老诚、慎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

[122] 1898 年 6 月 2 日《汪大燮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82 页。据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此前他曾致函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赴日,了解情况,同商大事。

[123]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 2756 页。

[124] 1898 年 7 月 18 日《邹代钧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757 页。

[125] 1898 年 6 月 25 日《汪康年致宗方小太郎函》,《乘桴新获》,第203 页。

[126] 1900 年 6 月 18 日《周善培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1197 页。

[127] 1900 年 6 月 22 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1364 页。

[128] 1900 年 8 月 19 日《□存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7 页。

[129] 1900 年 6 月 22 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1364 页。

[130] 1900 年 12 月 12 日《周善培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201—1202 页。

[131] 钱恂答称:"门下士极力图合,然孙昏而康诞,均非豪杰。"(《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009页。此函应写于1900年)。

[132]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日、8月26日。

[133]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134] 1900年8月28日、9月8日《□存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8—3689页。

[135]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

[136]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137]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90—1391页。

[138] 《忘山庐日记》,辛丑十月四日。

[139] 《忘山庐日记》,辛丑六月五日、九月十四日、十七日。

[140]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141] 自杨衢云于1895年广州起义前夕要挟孙中山让出会长职位后,两派一直为此明争暗斗。1896年11月,陈少白与谢缵泰就孙杨地位问题打了一场笔墨官司。陈先在日本的英文报刊《神户新闻》上撰文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11月26日,香港《中国邮报》予以转载。两天后,谢缵泰致函《中国邮报》编辑,通知其"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重要组织者之一"(黄宇和:《分析孙中山伦敦被难及其影响》,第119—122页)。

[142]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

[143]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日。

[144] 1900年8月21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86页。

[145] 1900年9月4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1页。

[146]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近代史资料》,总80

期,1992年1月。

[147]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26日。

[148]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据《容氏谱谍》卷15《兆六房善公支世传》,容星桥与容闳的高祖父为亲兄弟。

[149] 明治33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9月2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971号。

[150] 明治33年9月7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36号,9月18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61号,9月14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385号。许多著作引述明治33年9月10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外相青木周藏的甲秘第111号报告,称容闳于9月7日与孙中山一起赴东京,系与容開混淆。

[151]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转引自《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

[152]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2页。是函写于1900年10月中上旬。

[153]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59页。

[154]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此节文字田野翻译时有所增添。

[155]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页。

第 4 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

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早已为史学界反复论道，而保皇会的同样行为却鲜有提及。尽管有关史料历历在目，但先入为主的观念令人难以把暴力手段纳入改良范畴。在视保皇派为革命劲敌、清廷帮凶的同时，忽略了康梁还是当朝执政通缉的首犯，把他们政治行为中一个别具色彩的侧面排斥于可能性之外。加上保皇会当时的函电文书有意隐去当事者的姓名行踪，事后对此又避而不谈，甚至故弄玄虚，致使各种史实模糊不清。80年代中期，汤志钧、杨天石分别依据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撰《诡谋直纪》，确证了戊戌政变前夕康梁等密谋发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公案，揭示出维新派政治行为阴的一面。以爬梳考校史料为基础，描述分析戊戌、辛亥间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政治势力的品格与性质。

一 复仇复辟

戊戌政变后，保皇救上、恢复新政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当务之急。为达此目的，他们设想的主要途径有三：1. 援引列

强;2.兴师勤王;3.暗杀行刺。

作为积极参与政治角逐的入世者,康梁不同于一般坐而论道的学者文人,道行清高不得不服从于权力斗争的胜负法则。竞争者虽有革新与守旧的背景差异,但权谋手段如出一辙。只是处于在野地位的康梁缺少合法性依据,行动更为隐蔽,以后又秘而不宣,借以保持忠正形象,编织道义战胜权奸的神话而已。亡走东瀛之初,梁启超在与日本外相大限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中说:"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兴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然义师之起,其险著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名而起,蹂躏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此险著而谋之于下,不如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希望由日本出面,联合英美进行干预,促使光绪重掌大权。他还函邀容闳前往东京,与康有为同航英美,就此事接洽磋商。[1]不过,康梁虽然害怕草莽豪强拥兵自重,也同样担心东西列强仗势欺人,趁火打劫,自己背上卖国的千古罪名。要避免起于下、迫于外的割据瓜分风险,最佳良策莫如以暗杀除去西太后和少数顽固重臣,迫退守旧党,拥戴光绪复位,重行新政。

康有为避匿香港之际,宫崎寅藏曾坦然指陈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想以一纸上谕来完成这样的大事",没有以武力作后盾的准备,鼓动其"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试图促成维新、革命两党结合,联络哥老、三合会党,掀起一番风云。但康有为将政变归罪于西太后,"说她是东亚的祸根,认为当前的急务在于除掉这个西太后"。[2]并提出借助日本壮士达到这一目的的想法。宫崎虽然不反对暗杀,但批评其求助于日本人是怯懦的表现,以激将法逼康从弟子门生中寻找赴义侠士。其实,康有为等人并不排除以暴力相加为应急手段。百日维新

之前，梁启超见“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自己“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3]他入湘任教于时务学堂时，主张实行“急进法”，“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康有为“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4]随之同往的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等一律本此宗旨，持论急进。湘中士子本有结交江湖的传统，时务学堂学生感受民权思想鼓荡，情绪顿趋激烈。据说康有为本人在万木草堂中也“大倡自由共和的理论”。[5]他派梁启超入湘的原因之一，是“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立”。[6]其弟子罗润楠曾潜于广西山中与山贼结交，这时准备赴桂率同党 400 人合湖南大队挺进中原，“一试其屠龙之技”。[7]

康梁一派趋于激进，是因“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8]。一旦沐浴光绪知遇之恩，便视“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于是“幡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甚至政变后仍指革命“乃谋国之下策”，只能万不得已而用之。面对强邻环伺，豪强蛰伏，瓜分割据的潜在威胁不断加剧的形势，革命“尤为不可行”。[9]然而，光绪失势不仅令维新派权力地位一落千丈，更严重影响其信念与希望。因而当危机迫近之际，他们曾试图诉诸武力，以扭转乾坤。政变前夕，康有为等风闻西太后密谋于旧历九月天津大阅时诛杀光绪，感到形势严峻，召毕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他们奏准光绪时，只称废西太后，暗中则使毕“执而杀之”[10]。在宫崎的激励劝说下，康门弟子陈士廉、梁元理决心北上刺秦。临行之际，两人分别到宫崎在香港的寓所洒泪告别，表示：“此行已不期再归，也不能再见。如果北方风云有变，即为我死之日。”[11]并嘱托宫崎援

助保护康有为，以挽救中国前途。宫崎则劝以切勿轻易赴死，成功后设法全身而退。当晚，陈、梁二人即登轮北上。

保皇派暗杀的重点对象，是发动政变，残害六君子的罪魁祸首西太后和荣禄。特别是荣禄，不仅历来反对革新变政，而且鼓动西太后复出，密谋围杀光绪，又掌握重兵，把持朝政，迫害新党，保皇派视为万恶之源，对其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此番北行，梁元理到天津即折返。陈士廉只身入京，亦因禁卫森严，难以下手，无功而回。不过，保皇派并未就此放弃暗杀计划。此后两年间，在陈士廉、麦孟华、[12]刘桢麟、罗润楠等人的主持下，保皇派一面从海外各埠招募侠士，一面联络两粤的会党豪强，多次组织行动。如广东南海县西樵乡巨盗区新，曾于1899年受保皇派驱遣，“潜行入京谋刺大臣”。[13]加拿大、檀香山等地保皇会也派归数人任侠。维多利亚华侨关炳响应倡议，回港与刘桢麟等共谋大事，由刘主议，关回乡“招集四方豪杰，千金不惜，即欲刺荣禄，以报六君之仇。不料四方寻觅，竟然有三十四人允诺”。其中为首的十余人，“胆实，有弹必中”。无奈澳门总局调度乖方，关炳几度致函而不一覆，亲往询问，则《知新报》馆已停，总局已撤。“回家对义士说知，则众君大哄，谓愚失信于天下”。关炳只得变卖祖业，自行支敷，因而破家。[14]康门弟子或有谋无勇，或缺乏真才实干，组织不力，加上京师禁卫森严，大内尤甚，几经努力，无一成功。

二　勤王辅助

康梁等人亡走海外，声称奉诏，鼓动保救光绪，创发报刊，抨

击当朝执政，成为西太后及其党羽的心腹之患。从其出亡之日起，清政府就设法予以铲除。开始试图缉拿正法。政变不久，清廷即派荣禄的心腹李盛铎任驻日公使，取代黄遵宪，准备重施驻英公使馆绑架孙中山的故伎。1899 年 7 月又派刘学询、庆宽等以考察商务名义赴日，以"交康"为与日本政府订约结盟的条件，相机除之。[15]此举不成，遂改用通缉与暗杀并举之法。1899 年 11 月，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并奉密旨除康，即任用刘学询，企图利用孙中山诱捕康有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16]孙中山对此未予回应。鉴于秘密行动屡试不果，同年 12 月 20 日，清廷发布上谕，令沿海各地督抚"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即使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17]公然鼓动滥杀。同时派遣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以办理除康事务，破坏保皇会在广东及海外的势力与活动。1900 年 1 月 24 日，清廷再度颁布上谕，确定赏银数额为十万两，无论生死，一体给赏。而且将银两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交犯，一面即验明交银。如不愿领赏，则破格授予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18]除康之意十分迫切。

清廷步步进逼使之与保皇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康梁等人不仅无法踏足祖国，海外活动也因此横生枝节。梁启超欲往旧金山，清驻外使节串通当地守旧侨领，以"官吏悬赏购刺，无赖小民，及贪利洋人，既已预备药弹匕首以待"[19]为由，加以恫吓阻拦。这就迫使保皇派以牙还牙。北方行动不易措手，奉命到粤查办保皇会的李鸿章便成了众矢之的。李鸿章赴任后，为敷衍交差，捕拿了几位保皇会员的亲属，在海外华侨中激起轩然大波，一些人畏惧惊恐，更多的则是义愤填膺。前此，康有为接纳唐才常的建议，决心起兵勤王，他督率弟子党人一面加紧宣传募

捐，一面在澳门设立总局，联络两广会党首领和地方实力派，制定出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勤王战略。特别是1900年5月以前，一度以广东为发难之地。而两广总督李鸿章，成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重大障碍，令保皇会心存顾忌，千方百计要将其铲除，以利于军事行动。此外，保皇派的老对头刘学询又被李鸿章罗致门下，益发激起康梁等人的忌恨。康、刘之间，早在1896年就因康代王鹏运草拟弹章牵及刘而结仇，[20]后又因刘东渡密谋交康及在沪策划绑架之事风声走露而积恨，双方已成你死我活之势。刘学询掌握闱姓巨款，又控制着李鸿章所购六千军械，[21]李、刘勾结，狼狈为奸，成为保皇派的首要之敌。当时保皇会在港澳等地购械运货，准备起义，刘学询奉李鸿章之命四处查堵，给起义的筹备工作造成一定困难。于是，保皇会将暗杀的重心暂时南移到广东。

对于刺杀刘、李之事，梁启超态度最为积极。他在军事上力主大举必先图粤，而以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为此谋略成功与否的要素，因此不断函嘱负责两广军事行动的澳门总局："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此二人在他日阻力未有已也"。[22]在复函赞同沈荩北上行刺计划时，还要提及一句："肥贼、刘豚为我辈无限阻力，能并图之最善也。即失之于北，亦当取之于南。"[23]希望其一身二任，南北兼顾。特别是对刘学询，他甚至说："卯金富而多谋，今以全力图我，阻力之大过于荣（以其近也），不可不先图之。"[24]认为刘比荣禄为害更烈，力主将其列为首杀对象。"卯金事，我必不两立，一切未办，亦当先图之"。[25]"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26]他指责陈士廉、麦孟华等人经营此事，"数月不就手"，怀疑他们手下"未有用命

之人”，并对总会“现时款项虽非大充，然亦未至尽绌，何以数月以来，无一毫动静”[27]的状况表示不满。身处海外侨界，他深感刘、李在广东株连本党亲属所造成的影响危害，认为：“鼠辈猖狂如此，非磔数四，不足以挫其锋。”[28]在檀香山保皇会员“无日不以此相劝相责”之下，为了打击清廷凶焰，重振华侨对保皇会和勤王运动的信念，他提出：“此事既为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重赏之下未必无勇夫，不宜惜此区区也。悬赏之法，与其人同往银行订存若干，事成而谢之。”并且声称：“此事若就，檀可增金万数千也。”[29]与清政府的举措针锋相对。

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澳门总局经多次尝试，终于设法执行了行刺刘学询的计划。1900 年 4 月 24 日，刘从澳门回省，“甫登岸，即被凶徒以手枪对面打中胸旁，赖里衣搪护，仅入皮肉三分，血流不止”。经洋医诊治，尚未致命。“盖此等事为新党仇恨，下此毒手”。[30]行动虽然失利，但保皇会总算有了搪塞华侨的借口。1900 年 5 月 19 日陈国镛函告保皇会洛杉矶分会负责人谭良：“至募死士刺杀贼党一层，为极难事。自去年至今，已日日注意于此，已费许多金钱招致此等侠士，惟总未见一施诸实事者。前月在省城枪伤刘学询，谅亦有所闻。此正我保皇发韧之先声，亦不得谓无敢死之士。虽未能致之死地，庶足以寒奸贼之胆，壮我民之气也。近闻其弹子尚未取出，又有其已死者，真否尚未可知，容俟续报。”[31]此后梁启超仍不甘心。本来为配合取粤为先的谋略，他一度提议：“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32]，以后保皇会集中兵力向广西，康有为对李仍有分化利用之心，梁启超则认为已无价值。在 6 月接到李鸿章托人转达求免之意的信函后，他仍然坚持：“此贼若在，阻力不小”，希望澳门总局设法将其先行除去。[33]

保皇会在谋取刘、李项上人头之时，并未忘怀于北方大敌。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中提到："伯忠来书，有'介现入都'之语，然则介所办仍是在密一边，非在明一边也。"介，即介叔，陈士廉字。所谓明，即兴师起兵，所谓密，则是暗杀行刺。当时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34]应对梁启超关于广东军事部署的询问，而梁知悉陈士廉仍在京师从事暗杀活动，故有此一驳。除保皇会直接指挥的行动外，罗普(孝高)还提出以金钱"使东人为荆、聂之说"，企图利用日本人实现其夙志。梁启超认为："似此胜于用吾党人"，"此事大佳，望助成之"。[35]敦请康有为拨款援助。[36]

为了对抗清政府日益加紧的迫害行动，旧金山保皇会提出保护家属之法三条，其中第一、二条规定："一我帝党中人无拘在何处被人戕害，或波及亲属，一经查出，确是因保皇起□，即访主谋者何人，立速函报各属，务要罪人斯得。更即函商总会，将其主谋家属一并翦除，庶可以弭奸人之伺。一同志中有敢任报仇者，查确果得真凶，本会即奖赏中国银五百元；倘非真凶，不能领赏。能得仇人家属翦除者，亦以中国银五百元为酬。所有赏费，均由会项支销，决无失信。"[37]决心以暴制暴，大规模实施报复行动。新加坡侨商也表示愿出十余万"以捕诸大贼"。[38]

保皇会的暗杀重点随军事行动南移，与之关系密切的唐才常等人，则以长江流域为主要用兵之地，关注重心仍在北方清廷。正气会成立后，长江革新志士与哥老会群集麾下，唐才常赴港领取新加坡侨商丘菽园所赠三万元资金，准备大举起义，率会党徒众发难于江淮，"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略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号令天下。为配合这一行动，请日本人田野桔次率海贼三十余人，"期于正月之祝节杀北都西太后，并逐尽所有奸人"。出

发前田野忽患重病，不能成行，改由正气会干事员沈荩代理。沈素持破坏主义，不屑于文字小道，在正气会中，主持一切交通事务。1899年11月下旬，他与林圭、田野等人由沪赴湘，准备以办学堂开报馆之名运动会党。后因白岩龙平、宫阪九郎、荒井等人反对，滞留汉口。[39]正气会成立前，沈荩“以事返上海，又蹈隙往北京，有所谋”。[40]所谋之事，应为主持行刺。梁启超接到沈荩、唐才常、狄平等人来信通告此事后，表示：“读诚〔諴〕兄书为起舞。吾固知行菩萨行之人，决不住声闻触觉地位矣。能流血之人，此间同胞非无之，但涉数万里而归，所费未免太大，而情形又不甚熟，故未遣之耳。风萧萧兮易水寒，弟甚愿东向遥浮一大白，祝君之成也。”[41]然而，沈荩此行亦未奏功，及至汉口事机急迫，应唐才常之命返鄂。自立军兵败，沈荩侥幸得免，遂再入京师，结交宫禁权要，密谋入宫行刺西太后和光绪，不幸事泄身殉。[42]

三　再向京师

汉口自立军未起先败，保皇会的两广谋略草草收场，勤王运动雷声大雨点小。经此一役，康有为以党人“株连死者无算”，“自后不敢言兵”。[43]面对草堂弟子和海外保皇会员的一片言革之声，他顽固坚持保皇路线，至于如何保救光绪，则除了“待时听天”[44]的托词外，唯一的实际行动就是暗杀。他告诫弟子：“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各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屠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今四境无事，勤王亦不能起。若圣主犹

存，天命尚在，岂可言革。但一荣禄在，除之即可复辟。与荣一人战，抑与全国战，孰为难易乎？不待言矣”。[45]锋芒所向，仍在荣禄。康有为家仇国恨集于一身，声称：“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刜刃之。如有言不杀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46]保皇会为此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梁启超自1901年5月回到日本，到1903年初，年余时间，用去万七千余金。其中自用不及三千，其余均用于派人北行、援助张智若等赴广西运动会党等事。[47]庚子后，丘菽园与康有为绝交，保皇会失去重要财源，加上康坚持不肯言革，谨守保皇二字，在“无一人不言革命”[48]的海外各埠难以开展活动；华侨又风传康门师徒侵吞挪用捐款，使保皇会的募捐活动陷于停顿，财政十分拮据。梁启超倚靠《新民丛报》进款，维持横滨保皇会事务，弥补旧金山《文兴报》和檀香山《新中国报》亏损，供应康有为日用，“以一人之力而供一党之用”，“为作文字，辄数夜不寝，太过劳苦”，依然入不敷出。其余党人如张智若等，也因此而“家已破尽”。[49]

壬寅癸卯间，梁启超受时局感召以及保皇会内外种种非议的刺激，自愧向华侨筹集巨款而未能做成一二实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因而革命言论“时时出没于胸中”[50]。他直言以对康有为：“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表示要与恩师“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康有为严词斥责下，仍然坚持道：“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继续在《新民丛报》上宣传反清，并以党人公论抵制康有为

的一己私见。[51]1902年11月，经康有为长函痛骂，并称因其“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梁启超才勉强复电，佯称悔改，“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公开场合虽不明言革命，私下交谈仍持此义，“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52]“中国实舍革命之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53]因此，他一反前此热烈鼓动暗杀的态度，对康有为等人的密谋一再提出异议。他借狄平之口表示怀疑是否有必要倾全力对付一个老朽荣禄。[54]康有为以荣禄的生死去留为光绪复位、新政再举的关键，梁启超则认为：“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55]绝望于清政府，使之决心推翻满清，除旧布新。只能决定几个老臣生死的暗杀，当然不能满足这种彻底变革的愿望，甚至对光绪能否复辟，也已失去兴趣。

1903年，保皇会刀光剑影所向的头号大敌荣禄病死，康门师徒凭借天意而感到“诚足使吾党一吐气”，暗杀锋芒转向镇压汉口自立军的祸首张之洞。澳门和日本保皇会机关开始进行筹划准备。当时尚在游历新大陆的梁启超闻知此事，认为：“及今谋去皮逆，自是正办。”但他不赞成澳门方面用金钱买死士的作法，主张“由其人之热心肯自奋身前往”，对日本同志中有谋此事者颇为关注，打算东归后参与筹划。[56]美洲归来，梁启超宣称放弃破坏主义及革命排满宗旨，同时也对康有为“舍钱买侠士”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他将保皇会“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之事父母”，“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日日下气柔声，……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他揭露康有为当时所招“林侠”者，“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

生苦于供养"，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同时声明："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57]隐约批评了康有为的行为，并反对将教育捐款挪作秘密活动经费。徐勤也表示："今日中国欲行荆、聂之事（本是第一要事），苦无其人"，提醒康有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58]

两位副会长异口同声的反对，迫使康有为不得不调整部署，放弃招诱死士之法，启用党人担任暗杀之责。1904 年秋冬，他请老友梁铁君出面主持，挑选本党精营执行暗杀行动。梁名尔煦，南海佛山人，身材长大，好读书击剑，有古侠士之风，康有为对其十分推崇，曾咏物"惜其才侠不见用也"。[59]他长期跟随康有为左右，负责护卫。由他亲自出马，可见保皇会决心之大。陈默庵、梁子刚等亦随同前往北京，兵分两路，由梁铁君亲率一枝，梁子刚等为一枝，合力办事。按照拟定的计划，以西太后为目标，到次年 5 月下手行动。此举在康有为是尽力一搏，梁启超则有到此为止之意。他说："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60]然而，保皇会虽有赴死之心，却无致胜之道，梁铁君等人在京活动颇为困难，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拖到 1906 年夏秋之交，由于店伴告发，梁铁君被捕入狱，9 月 1 日暴死于狱中。

梁铁君等开始筹备之时，保皇会财政仍十分拮据，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彼此掣肘，不能同心协力予以援助。原计划以半年为期，最省之费约需 1 万元。梁启超罄《新民丛报》所有，为其充作旅行费，并许诺一月后陆续接济，其实已经"一文无存"，只是顾

及“苟不许之，则令办事人寒心也”。他致电香港王镜如、邝寿民等告借5千元，却被拒绝，只得将广智书局所有地皮部分出售，以救燃眉之急，并托康有为向加拿大侨商叶恩求助。但叶恩不满于康固守保皇，倾向于革命自立，双方因嫌生隙。梁启超对“今日骑虎难下之势”大为焦虑，既“并一掷之力而无之”，“彷徨而不知所出”，又担心“九仞之功，亏于一篑，前此费去尔许巨款，同归乌有，更何以对天下乎?”[61]此后梁铁君一再延期，前后耗资数万元，更令保皇会捉襟见肘。行动失败后，康梁虽对“铁老竟为我而死”感到“痛断欲绝”[62]，但庆幸“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63]反倒像卸下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大包袱。天缘巧合，梁铁君暴毙之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令保皇会的流血牺牲有了象征性成果。从此，保皇派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宪政，又与一些当朝权贵暗中交结，企图利用清政府的内部矛盾改善境遇，连袁世凯也在拉拢之列。加上保皇会表面奉行和平手段，海外宣传及募捐均以商务、教育为名，不能大笔挪作秘密活动之用。为避免空耗人力财力，影响全局，此后保皇会不再组织对清朝权要的暗杀。

四　渐入下流

保皇派暗杀活动的目的，先是促成光绪复辟，继而作为勤王辅助，其中不免夹杂个人复仇情绪和冒险取胜的侥幸心理。后来康有为企图建立和保持正人君子的形象，强调以德服人的精神感召力，千方百计地隐晦当年的种种密谋。例如保皇会庚子勤王运动的重心在两广，汉口自立军不过是偏师，康有为却故意

抬高汉口为正军，掩饰其在两广结纳江湖豪强，“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64]的事实，以推卸办事无能的责任，维系“决不惊动故乡”[65]的谎言，将“惊粤”罪责推给兴中会。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暗杀活动更加讳莫如深。在1924年初所撰《唐烈士才常墓志铭》中，他特意写了如下一段文字：“先是，林圭网罗侠客，有四人已登督署屋瓦。吾电止之，谓吾党欲效日本义士之胁萨摩、长门侯，藉其力勤王，宜大义于天下，非欲除之，严戒勿行。”[66]林圭是否有此布署行动，不见于其他有关资料。而避居新加坡的康有为，由于澳门总局沟通不畅，连两广情况也往往无从揣测，更难顾及汉口。况且远在千里之外，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不能阻止已登屋瓦的刺客下手。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非旦不反对暗杀，还以此为重要手段。在保皇会为勤王运动所制《办事军情暗码补》中，赫然写有“着△△人行刺△△人”[67]一条。24年后康有为欲盖弥彰的障眼法，恰好表明他有意掩盖历史真相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有为有谋无勇，缺乏胆识，很不适应相互仇杀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亡走香港，去向未定之际，一听说李盛铎取代黄遵宪任驻日公使，立即敏感到“这是事先估计我将去日本而采取的行动，他们的本意实际上是要杀害我”。因而不敢前往日本。担任救援的宫崎寅藏斥责“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这儿，终生无所作为”。[68]指学生而骂先生，才使康有为下定决心。勤王运动中，素来敬仰康为人的加拿大华侨函责其“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69]丘菽园更以“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70]而断然与之绝交。保皇会的暗杀行动成效甚微，没有对清政府产生多大震慑力，而双方剑拔弩张反倒令康有为本人杯弓蛇影。

为了防范清廷加害于己，除梁铁君外，他又从华侨派归的精壮中挑选卫士，并对弟子们将卫士名额定为一人大为不满。[71]在新加坡等地，还要求殖民当局派兵保护。有时竟疑及同道。1900年6、7月间，他听信传言，将奉孙中山之命前来接洽合作事宜的宫崎寅藏等人指为清廷刺客，耸动殖民当局将其逮捕下狱，导致孙康最终决裂。1906年梁铁君北京密谋失手，康有为也怀疑是孙中山一派的构陷。[72]政坛角逐诚非坐而论道可比，但品格也有高下之分。相比之下，康有为往往以小人之心度人，种种文过饰非，嫁祸栽赃的言行，足以显示当他卷入政治斗争漩涡中心时，恰恰缺乏光明正大的"圣人"品格。

庚子以后，康有为逆流而动，坚决反对革命，倒是真的成为热血青年的行刺对象。1903年6月1日，《苏报》在由爱国学社青年接办后改良出刊的第1号上，便刊登论说《康有为》，公开透露这一信息："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趟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康有为必欲为革命之反动力，则当今蚩蚩之辈何所增减于一有为，特恐天下之激徒，将援先生所说春秋责备贤者之法，欲得剚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方今暗杀之风正在萌芽，乃一试其锋者，不在反对婪毒之政府疆吏，而在为德不卒、认贼作子、维新首功之康有为，此亦无可奈何之事。"

保皇会暗杀活动的历史，还为后来的一桩悬案提供了一点旁证。1909年5月，由广西地方官绅与保皇派合力举办的振华实业公司负责人刘士骥在广州遇刺身亡。是年旧历七月，该公司的另一负责人刘义任又被毒杀于广州。有关此事的主谋真凶，聚讼纷纭，迄无定论，而以康、梁、徐勤等人的嫌疑最大。[73]当时他们力辩与己无关，将罪责推给欧榘甲、叶恩等反叛派。进而又将杀刘与徐锡麟刺恩铭案相比照，罗织欧、叶等合谋造反的

证据，指暗杀为革党手段。不仅嫁祸于人，而且牵及无辜。尽管现有史料不足以定案，但暗杀确系保皇派的惯技，康有为也不乏栽赃陷害的前科。早在庚子前，康有为就因毕永年于报章上播扬其阴谋而衔恨至深，"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港澳一带地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74]企图以暗杀加诸昔日同道。自立军失败后，风传由汪康年、龙泽厚泄密，徐勤也试图毒杀之。[75]如果刘士骥案确系徐勤等人所为，那么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就随着它在政治上的倒退，而入于下流了。

揭示保皇会的暗杀活动所得到的启示是，以激进青年为主体的革命党固然崇尚暴力流血，开明士绅受民重君轻观念的薰陶和天下己任抱负的激励，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采取起义暗杀等暴力手段，来谋求实现救亡振兴大业。在这方面，近代西方革命史实与下层社会暴动虽不无影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绅权既有接续官权传导皇权的功能，又有代表民意制约皇权的责任。一旦朝廷官府置国家社稷的兴亡安危于不顾，士绅便会起而代行社会主导职能。如果面对高压，他们更不惜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自己与秘密会社的联系(其首领往往是下层士人)，从草泽以抗朝廷。斗争形式与手段，不足以作为政治派属的分界标准。诚然，历史上士绅的此类越轨行为仍属例外，但这种例外现象每当内忧外患之际又总是循例发生，形成常规通则。清末只是增加了废皇权兴民权的选择。此外，先秦以来的游侠风尚，早已化为士林性格的有机成分，荆轲、聂政更是无数少年风靡崇拜的偶像。1905 年梁启超编撰《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起曹沫，讫李广，并准备续编至张汶祥，传列历代名将侠客。其用意不仅"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76]，更隐含为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寻找合理依据之意，以证明它与正统士风的契合。当然，圣王之道毕竟两

歧，保皇派只好在致圣的幌子下，大行争霸之道。只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功力，没有值得炫耀的业绩，不得不避讳遮丑罢了。

注　释

［1］《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

［2］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第133—137页。

［3］《与志贺重昂笔谈》，《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

［4］狄葆贤：《任公先生事略》，《梁启超年谱长编》（后简称《长编》），第88页。

［5］《三十三年之梦》，第117页。

［6］《康有为致赵曰生书》，《长编》，第94页。

［7］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3章第5节。

［8］《康有为致赵曰生书》，《长编》，第94页。

［9］《与志贺重昂笔谈》。

［10］毕永年：《诡谋直纪》，《乘桴新获》，第26—28页。

［11］《三十三年之梦》，第137—138页。按该书将两人姓名隐去。据《康南海自编年谱》，1898年10月15日，陈士廉与梁元理“曾冒险难走京师”，欲偷运康广仁遗体南归。此事日本政府曾通报其驻华外交机构（《与志贺重昂笔谈》）。据查，宫崎于1898年9月29日在香港与康有为取得联系，10月19日陪康赴日。北上行刺二门生出发于康离港前数日。另据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知新》同人书：“去年以来，介之经营此事数数矣，未能一得手。”（《长编》，第225页）陈字介叔。则北上二人应为陈士廉、梁元理，主要目的是暗杀行刺。

［12］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徐勤书称：“麦事弟向不与知，故亦不敢妄议。但去年数次经营北事，不就手犹可言也；至于今年经营豚事，数月不就手，不可言也。”（《长编》，第238页）

［13］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剿办新广

东志气军首要区新等情形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40页。

[14] 1909年11月26日《关炳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62页。

[15] 1899年7月3日《汪大燮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08页。

[16] 《李鸿章全集》,第3卷,第870—871页。

[17]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454页。

[18]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470—4471页。

[19]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66—67页。

[20] 孔祥吉:《孙中山康有为早期关系探微》,《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第1894—1896页。

[21]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7日。

[22] 1900年3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长编》,第206页。

[23] 1900年3月28日《复诚忠雅三君书》,《长编》,第209页。

[24] 1900年4月13日《致总局诸兄书》,《长编》,第222页。

[25] 1900年4月20日《致〈知新〉同人书》,《长编》,第226页。

[26]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长编》,第238—239页。

[27]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长编》,第238—239页。

[28] 1900年4月20日《致〈知新〉同人书》,《长编》,第225页。

[29]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长编》,第238—239页。

[30] 1900年4月25日《致北京盛京堂》,《李鸿章全集》(三),第910页。

[31] 《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1900年第1期。

[32]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20—222页。

[33] 1900年6月17日《与港澳同人书》,《长编》,第197页。

[34] 《长编》,第217页。

[35]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20—222页。

[36]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31页。

[37] 1900年4月13日《致总局诸兄书》,《长编》,第223页。

[38] 1900年5月19日《与同薇同璧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9页。

[39]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

[40] 黄中黄:《沈荩》,《辛亥革命》(一),第290页。

[41] 1900年3月28日《复诚忠雅三君书》,《长编》,第209页。据《自立会史料集》,"诚"应为"諴",沈荩字克諴。

[42] 赵必振:《沈荩略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59页。

[43] 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

[44]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0页。1900年8月11日和1901年1月7日,康有为两度致函女儿同薇同璧,告以"顷穗寄来一(得晋)占卦,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可谓奇极,此实为上复辟地也。两年仅望得此"."穗田占一卦言:上明年必复位,那拉必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7、190页)。穗即保皇会澳门分会会长何廷光,其字穗田,好占卦问卜。

[45] 1902年6月3日《致罗璪云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8—159页。

[46] 1903年1月11日《康南海与任弟书》,《长编》,第300页。

[47] 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长编》,第318页。

[48]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1页。

[49]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7页。

[50]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332页。

[51] 《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86—287页。

[52] 1900年4月15日《与勉兄书》,《长编》,第320页。

[53]　1900年4月1日《与勉兄书》,《长编》,第318页。

[54]　1903年1月11日《康南海与任弟书》,《长编》,第299—300页。

[55]　《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286页。

[56]　1903年9月1日《与穗田二兄书》,《长编》,第324页。

[57]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332页。

[58]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232页。

[59]　《咏柚赠铁君》,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第114页。

[60]　1903年11月11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344页。

[61]　1903年11月11日《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344页。

[62]　1906年9月29日《康南海致麦曼宣书》,《长编》,第366页。

[63]　《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367页。

[64]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

[65]　《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6]　《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

[67]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49页。

[68]　《三十三年之梦》,第138—139页。

[69]　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与孙中山》,《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70]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

[71]　1900年7月《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8页。

[72]　《与夫子大人书》,《长编》,第367页。

[73]　贺耀夫:《康有为与振华实业公司》,《岭南文史》,1989年第1期。

[74]　民表:《毕永年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29—230页。

[75] 1900 年 11 月 26 日康有为致函丘菽园言及此事:"此事全由汪康年之泄,或以为出邱震来,硬坐东文译社,考察踪迹,故致泄露。""唐、狄皆未告龙,今亦何由知? 亦不过与邱揣摩耳"。"大通之举,固有以召汪疑,今或人以疑龙耳。仆向来闻一事及他人所言,必暂存案,待行查而后定之。但未得确,亦不与办。顷得信,乃知勉欲毒之,真谬甚谬极! 如勉一闻人言,而怒甚欲杀人,真卤莽也"(《自立会史料集》,第 330 页)。

[76] 梁启超:《〈中国武士道〉自叙》,《饮冰室文集》乙巳本,谈丛类,第 114 页。

第 5 章

早期留日学生社团与活动

关于早期留日学生的社团与活动，长期以来，主要依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等回忆资料，未能与其他文献映证考校，甚至回忆录中的自相抵牾之处也未加辨正，以讹传讹之事不少。受此制约，有关的分析评价难以做到信而有征。这种史实与结论的误差，从以下数则考订可见一斑。

一　发端新探

1896年6月15日，清政府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出现了13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2]

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贴，

并非没有疑义。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到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扶桑。其二，它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正式发端，在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三，它显示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认识到向战胜国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其四，它是近代中国向外国学习进程中的一个界标。派遣留日学生及其队伍的膨胀，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而且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表现出开眼看世界视野的拓展。在确定留日学生运动发端时，应当从以上几方面通盘考察。实藤先生正是想指出这些意义，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述了日本舆论界的有关评论。可惜所引《太阳》杂志的两篇文章，都是 1899 年后的作品，不能说明 1896 年这 13 位中国青年出现于日本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这一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这 13 位青年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闿模、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清政府何以要派遣这些学生东渡？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国向日本派驻公使之始。

1877 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驻日公使，在东京设立公使馆。起初以为“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3]，结果洋相出尽。一年后，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抱怨：“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和舛，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不得不“暂觅通事二名”，并要求驻横滨、神户、长崎等地领事“就地觅一通事，以供传宣奔走之用”。[4]这显然有损

于堂堂大清国钦差的体面,不利于沟通内外之情。所以继任公使黎庶昌就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奏请招致学生设馆肄业,以三年为期"[5],在使署西侧设立一所东文学堂,"专为学习翻译",于1882年11月正式开馆。以后即沿为定制,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才一度中断。十余年来,成效甚微。后来的驻日公使裕庚评价道:"既专为学习翻译而设,不过学至翻译而止,入手之初,未尝计及深造。学堂既设在使署,去高等师范甚远,无所折衷,一教众咻,事事皆从简略。名师既不相就,学生则饱食而嬉,以致成材甚少。使臣虽日加督责,而众人视为具文。又所定章程奏明拔充学习翻译后照章保奖,并可分派各口充当翻译,于是学生甫满三年,知此捷径,群思弃而之他。既到各口后,又复荒其本业,不加温习,一经传语,动辄贻笑,翻译东文,错谬多端。"[6]总之是一塌糊涂。尽管裕庚的话不乏官场中司空见惯的贬低前任恶习,以及在变法浪潮之下的自我吹嘘,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实情。

甲午战后,裕庚接任驻日公使,于1895年9月抵达东京,不久即着手恢复东文学堂。他与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多次商议,认为在使馆内设立学堂不如将学生送到日本学校附读,较为切实。遂将此意报告总理衙门。次年4月,总署奏请批准了这一要求。裕庚遂派已预定为横滨领事的湖北补用知县吕贤笙前往上海、苏州一带招收学生,往返两月余。1896年6月15日,吕率领选定的13位青年抵达东京。他们在使署寄居半月后,于6月30日入校学习。按照中日双方达成的协定,这批学生的教育委托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由其和裕庚共同在高等师范附近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由本田增次郎任东文监督,町田弥平为东文教师,两人的束修以及学校

的全部费用由清驻日公使负担。开始这些学生连假名也不认识，以后课程逐渐增加，共分为两类，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和晚上由教师教授或自习外交史、日本文法、日本尺牍、汉文、日文书写以及阅报等，下午则到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地理、初级高等物理、高等初级数学、历史、兵式体操。[7]

由上可知，这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还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负责部分教务；所学课程则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也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附近的一座校舍。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首先，培养学生的目的没有变，仍是训练为使馆服务的翻译人才，因而官方继续称之为“东文学生”。直到1898年，清政府没有再派学生留日，裕庚也未提出这种要求。因为10名翻译已足以应付使馆业务需求，而清政府并没有将他们别作他用的意向。学习基础课程，最初不过与京师同文馆一样，仍是为了翻译上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变法运动的兴起，才逐步扩大用途。其次，学堂及学生的隶属关系没有变，学生并不是直接进入日本学校，而是单独设立了一个附读班，这样既便利了学生学习，又保证了使馆的权限。不仅全部的学生学费、教师薪水和学堂费用由使馆承担[8]，而且每隔一星期要将学生接回使署面加考验，“教师教导不力者，告知学校长更换；学生怠惰荒嬉者，由学校长转告使署撤回”。其中3人不久即因“纨绔性成，紊乱规则”，受到“登时撤令内渡”的处分。[9]甚至学生患病也由使馆接回调理，并负担一应车、饭费用。

东文学堂的复办及其变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对日观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甲午一战，清政府水陆

两军在历来不为中国士大夫所正视的“倭寇”手下惨遭败绩。但是,统治集团的君臣们,包括以“求新”自我标榜的洋务派,都没有向自古就从中国引进文明的战争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胆识。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早已使清政府感到震动。特别是历届驻日公使,耳闻目睹那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意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一大威胁。首任公使何如璋即实际上承认明治维新是“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10],继任黎庶昌也感到日本“近年事事讲求,海陆两军,扩张整饬,工商技艺,日异月新,物产又极富饶”,“其力量几与西洋次等之国相敌”。[11]然而,要放下大清皇朝钦差的架子向“倭夷”屈尊,实在是他们不敢也不愿想的事。

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曾导致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倾向于联合日本。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主张与英日结盟反对沙俄,形成一个松散的联日派。但他们更要维持居高临下的门面,自欺欺人地说日本是易于笼络的小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很难提出学习日本的政策。尽管他们出于洋务的需求,可以向日本派遣少数留学生。

敢于学习日本,是维新派的功绩。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在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进行比较时,明确指出二者的优劣是非。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公开把日本由变法而强盛的事实作为范例,而且在制定变法方略时,不同程度地参照借鉴了明治维新的模式与经验。不过,甲午战争前,就是在这批人的心目中,也还或隐或现地含着对“区区三岛”的轻蔑之意,因而在承认明治维新成就的同时,多少保留了几分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

甲午战败的惨痛事实,打破了洋务运动30年,国防“深固不摇”的神话,人们不得不对东洋人刮目相看。但战败屈辱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悲愤情绪和同仇敌忾心理,使人们一时还不能冷静

下来思考问题。而三国干涉还辽成功所引起的远东局势新变化，又给沙皇的狰狞面目蒙上一层柔光。在统治集团中占上风的亲俄派固然奉沙皇为救星，就连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来了个180度急转弯。刘坤一上书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正式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误。他说："或谓俄与中国接址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以臣愚见，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因而建议：今后"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12]在朝野上下一片联俄拒倭的喧嚷声中，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学习日本的口号。1895年张之洞奏议战后补救之策，建议派遣留学生，也仅以欧美为念，没有提到日本。裕庚后来自称到东之始，即以为"翻译不过学业之一途"，俨然已有"振兴人材为本原计"[13]的设想，未必属实。他讲这番话时正值变法运动高潮，意在邀功，并非真有维新宿志。裕庚任期两年内东文学生人数只减不增，就是对他本人最有力的驳斥。

由此可见，1896年戢元丞等人东渡，既不是甲午战争刺激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认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因而鼓动留学日本的产物。甲午战争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的确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忱和变革决心。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如果把战后的一切变化都与此直接联系起来，看不到在警醒与学习敌手之间还有一个转变过程，而且其难度不亚于鸦片战后士大夫经历的磨练，则不免失之简单笼统。

那么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发端定于何时为宜呢？

从中国方面看，产生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比较晚，而日本方面则早就有此打算，特别是日本军政界中一批对华野心不断膨

胀的人，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就积极策划利用互派留学生来培植亲己势力。"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根据奉使北京的实际经验，深感对华问题不能付之等闲。迨西南战役以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趁中国首任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等抵达东京的时机，为两国间彼此交换留学生及善邻亲睦起见，特纠集少数有志之士，创设振亚社，不时集会"。[14]1880年3月，这批人组成了兴亚会，特邀何如璋到会祝辞，并开办中国语学校，教授日本青年。1898年，该会将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徐勤以及自费前往日本留学的维新派骨干罗普吸收入会。[15]以后兴亚会并入东亚同文会，后者成为日本最积极干预中国留学生事务的组织，先后在东京和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地开设同文书院。1902年又利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企图取得保送自费生进入日本军校的垄断权。不过，兴亚会提出的互派留学生的计划，由于中国方面持有戒心，长期未能付诸实现。

关于留日学生的概念，并无严格界定，其中不仅有从中国本土去的青年，也包括旅日华侨商民的子弟。有些专为后一类人开设的学校，如神户的同文、横滨的大同学校，后来也吸收国内来的学生。而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横滨中华学堂，早在1885年即已创立。[16]不过，按照惯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将这些学校的学生算作留学生，一是就读于此的华侨子弟进入日本学校，一是国内前来求学的青年。[17]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使馆东文学生，如唐宝锷、胡宗瀛在留学生题名录上签署的留东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进入早稻田大学和青山农学校，[18]而不是1896年6月进入附读班，可见他们本人也没有把1896年东渡视为自己留学生涯的正式开端。

我国最早名符其实前往日本留学的是广东顺德人罗普。罗

字孝高，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嫡传弟子。1897 年，他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次年初“由日本当道举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法科，“讲习万国律例之学”。[19]据与他同屋居住的日本友人田野桔次说：“当时东京留学生亦未有一人也。”[20]冯自由《革命逸史》称罗是中国学生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的“第一人”[21]，其实他也是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人，起码是首批留日学生的代表者。与之同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前往日本求学。如 1898 年 1 月汪康年到日本考察报务之际，就在大阪见到正在山本宪的家塾中学习日语的汪有龄、嵇侃两位留学生。[22]当然，他们的行动仍属个别现象，但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意向，预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新趋势，表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罗普赴日是否得到康有为的赞助支持，不得而知。不过，维新派的《知新报》将此事列入“创新要事”，予以综合报导，称赞其“慨然有志”[23]，表明了这一派人的态度。甲午战后，维新人士以战争胜负的鲜明对比为据，大声疾呼变法图强，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24]日军所以屡胜，是因为“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25]梁启超还上书张之洞，认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中国对西学则“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6]，建议效法日本，改革体制课程。一面鼓吹留学的必要与重要，一面比较中日的优劣，自然有助于造成学习日本的舆论氛围。

中国有可能派遣留日学生，也由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有所松驰。1897 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趁火打劫，紧跟着占领了旅大。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给那些曾对沙俄抱有幻想的人当头一棒，朝野上下齐声痛斥沙俄背信弃义，亲俄空气

一扫而光。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旧调重弹，提出“以兼联英日为要策”。[27]维新派对此积极呼应。胶州湾事件后，日本参谋本部派人来华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康有为走告翁同龢：“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又为御史杨深秀、陈其璋等草疏请联英日，并作联英日策，遍告朝士。经此事后，“朝士渐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测，自此群议咸知联英日矣”。[28]康有为趁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直接了当地建议光绪奉日本为楷模，变法图强。汪康年等人也前往日本，试图联合中日民间势力以救危亡。这一努力得到以江浙为中心的开明士绅的广泛支持。这样，中国派遣留日学生的主客观条件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借机施展外交和文化手段。1897 年底，日本参谋本部军官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先后来华，在武昌与张之洞、江汉关道以及洋务委员等晤谈，转达参谋部川上操六大将之意，诡称：“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强，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请中国派人到日本“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清廷担心引起其他列强的进一步要求，谕令张之洞“断勿轻许”[29]。但张之洞不肯作罢，一面再次奏陈：“惟彼言深悔前年不应与中国战争，今愿遣我人赴东入各种学堂云云，洞甚嘉许之”[30]，一面决定让郑孝胥等 3 人于次年春选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31]1898 年，维新运动声浪日高，日方活动也更加积极。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 5 月间函告总理衙门：日本政府“拟向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接着又亲赴总署面陈：“中国如派肄业

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32]矢野的态度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当他将情况报告外务省请求指令时，外务大臣西德二郎"颇感意外"，认为费用太巨。"然既已表示，已难取消，兹后若清政府对于右记所作表示决定派遣留学生，宜限定最少人数，以观对方回答。希勿由我先为挑动，任其自然可也"。[33]不过，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和矢野文雄先后向清政府作出同一姿态，决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他们的言行显然反映了日本一些政治势力的意愿，而且很可能受到高层的指使，所以敢于如此独断专行。宇都宫太郎等在与张之洞密谈时即声称："实系奉内旨而来。"[34]矢野在复西德二郎的信中，毫不掩饰其野心，他说："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5]矢野与西德二郎的分歧，并非政策基点的对立，而是步骤方式的区别。所以西德二郎认为矢野的意见"甚善"，只是对巨额经费、来学人选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有所顾虑。

然而，中国方面，朝野上下都把日本的别有用心当成与人为善。1898 年 6 月 1 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既然日方愿意予以优待，"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选派"贡生监之聪敏有材、年未

三十已通中学者"[36]赴日留学。总理衙门议后奏称:"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送总理衙门,陆续派往。"[37]只是对任人报名之法有所保留。光绪当即批道:"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勿延缓。"[38]以后日本政府又"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清廷遂正式下旨:"著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39]并向日本政府递交国书,表示谢意。至此,派遣留日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正式国策。

一些实权在握的地方督抚的反应比诸多掣肘的光绪更为敏捷。1898 年 3 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费正式留日学生。同时到东的还有富士英(浙江)、卢藉东(广东)等人。5、6 月间,浙江官费生钱承志等 4 人以及湖北官费生萧星生等到达日本。这一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陆续派出官费生 64 人[40],另外还有毕永年、冯斯栾、范源廉等 13 名自费生。[41]这时,那批东文附读生已学满两年,裕庚奏请将其中可堪造就者拔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东文学堂无形解散。以后,继任公使李盛铎又重新恢复使馆东文学堂,"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42],以应付政变后尽废新法的局面。有的地方督抚计划大举派遣留日学生,如张之洞拟"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人,湖南五十人,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43],湖南甚至

已出示招考，后因变法不幸夭折而搁浅。不过，由于洋务派督抚对慈禧“尽废新法”的旨意有选择地进行了抵制，加上许多维新志士亡命日本，此后几年间，留日学生队伍仍在逐步扩大。辛丑和约后，清政府重行新政，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趋新力量。

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如甘肃晚到1905年后才开始派遣，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

留日学生运动一旦发端，就不断冲击着旧的统治秩序，成为整个近代留学生运动的重要分水岭。1904年底，《外交报》一篇题为《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的论说，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分析：“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论者犹以为与前之派西洋留学生等耳，而岂知其后之效，乃与昔大异。昔之留学生，绝无所表现于社会，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44]这种界标的意义，显然不能从1896年的东文附读生或更早的洋务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只有

在维新运动激励下东渡求学的青年，才会迅速与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参加救国和革命运动。而原来附读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后，才积极投身于斗争洪流。因此，适当调整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更有助于研究其地位作用，进而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二 社团滥觞

在军国民教育会出现之前，留日学界的社团多为小型化，只有留学生会馆和同乡会等联谊机构例外。这些小型社团，如励志会、国民会、广东独立协会、开智会、青年会等，资料很少，语焉不详，问题较多。仅举数例证之。

（一）励志会。1900 年成立于东京的励志会，是留日学生最早组建的社团，"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45]但是关于该会的起止时间及其宗旨性质，各种记述互相矛盾。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几次提到："庚子七月汉口一役殉义之黎科、傅慈祥、蔡丞煜、郑葆晟及脱险之戢元丞、秦力山、吴禄贞诸人，皆此会会员也。"[46]"云翔尝偕戢翼翚、金邦平、章宗祥、吴振麟、黎科、傅慈祥等发起励志会"。[47]指该会成立于自立军起义前。后唐才质所撰《自立会庚子革命记》亦同此说，而加入"其时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励志会会员中主张扫荡清室，树立新政者，如戢翼翚、沈翔云等，最为积极"[48]的字句。傅光培等所撰《傅慈祥事略》则称："尔父恐晋末五胡之祸，复睹于神州，乃与吴绶卿、蔡松坡、刘伯刚、吴念慈诸人，组织励志学会，讨论革命进行，至深且

密。”[49]张玉法教授《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在该会会员名单中列有黎科、蔡丞煜等人，等于承认为自立军起义前成立。但秦力山曾明确指出：“而次年正月(即辛丑)，巩黄复至日本时，则在留诸公之所成就者，励志会之成立也(为死事诸君在时所发议而未成立者……)。”[50]则汉口事变前只是开始筹划，并未正式成立。到自立军失败后，部分幸免于难的创议人回到东京，才重续前议，组成团体。

秦力山虽然1900年初即赴天津，但他与死事诸君稔熟，又亲历其事，所记应较近事实。而且此说有重要旁证。1900年7月24日，沈翔云、傅慈祥等人在东京召开第二次“中国学生会”，贺光绪卅一圣诞，悼“圣躬被废之第二十三月”，沈翔云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论述开会演说的必要，其中几段值得注意：“向者吾邦之士，留学是邦，散处各校之中，会面甚少，即偶相见，亦不过寻常应酬数语寒酸而已。同国之人，互相隔膜，无亲爱联结之气，为各国所见笑者也。”“欲救中国，固非一长一艺所能为力，故聚众人之长，庶足为救中国之用。又思吾中国人民四万万，此四万万人皆有救中国之责，独吾等百数十人游学外洋，得习文明之学问。则吾等百数十人，乃四万万人之代表者，必求学成之后，足以归见四万万之同胞，方为尽责，是则不可不开会演说之故也。我等当充此以为国家思想政治思想者也。”鉴于“伪政府之政策”禁开会演说，同学有所戒惧，沈翔云力辩此举乃天下公理，并主动承担首倡之责：“请为诸公表白于天下曰：中国学生相会，乃众人之意见相同，立会必欲演说，种种自由独立之议论，沈翔云一人之意见。政府官吏欲禁止拿问，请治沈翔云一人。”同时他又声明：“然此究不过一人之意，不足取公众之从。有不欲者亦请演说其不可之理，则会中之人，皆惟公理是从，断不以一人

之议，一先生之说，株守而不通也。"[51]由此看来，沈翔云、傅慈祥等人创议之会，应为中国学生会，到1900年7月，至少已开过两次筹备大会。但因为留学生心存顾忌，意见不一，直到沈翔云等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时，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正式形成团体。

不过，秦力山称励志会"会章五条，为纯粹之革命主义"[52]，与自立会有关各人的回忆也力证励志会是革命组织，冯自由却说这五条会章"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其宗旨仅在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二事"。"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53]两说相较，冯记较近事实。

励志会最初的五条会章文献失载，不知其详。据壬寅十二月改正的会章，共两章六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纲领。

第一条，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

第二条，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

第三条，重视责任以为辨办之基础。

第二章，事业。

第四条，调查国势，凡关乎国家之大问题，本会均当实际调查(分为名法、理 财、内务、外交、教育、实业、军政各部)。……

第六条，巡回讲演，凡对乎会外之各团体，本会均当随时出张讲演。

附则：

1.内地各处，本会当随时派员开演说会或讲习会以开风气。

2.无论内地外洋，凡同志组织之会，本会当联络一气，以期

推广。"[54]

由于没有前期章程比照，无法辨认其间的差别。仅就改正章程看，励志会决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倒是更多地倾向于立宪。励志会员分为激烈、稳健二派，后期改正章程修订于激进派另组青年会之际，宗旨或有所倒退。但从该会的功能与人员结构看，前期也不会是革命团体。

励志会创议之初，中国留日学生总共不过百余人，而且分为四部分，"一为南洋官费，约三十人左右，共赁一屋居之，榜其庐曰日华学堂，至读书则各习专门，朝去暮归，学校不一；一为两湖陆军学生三十余人，居成城学校（此校为陆军预备科）；一为湘、粤之自费生约十余人，居大同高等学校；一为公使官费生，居同文书院"。[55]各部学生彼此缺乏联系。沈翔云等人立会之意，显然是想改变留日学界的散漫状态，以统一的组织形式推进革新变政的宗旨宣传，因而力求使团体为全体或多数同学所能接受，形成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联谊组织，将几部分学生中对群体事务感兴趣者结为一体。这表明留日学界随着人数的增长群体意识开始形成。对于政治派属的分界，他们还不大在意。其创议各人宗旨上大体属于当时所谓"革政派"，而不是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最鲜明的政治特征在于坚持排满共和，反对满清的专制皇权统治。对此不仅孙中山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其他革新势力也都以此为分界标准。并对孙中山坚持排满立场感到困惑。而"中国学生会"集会庆祝光绪圣诞，沈翔云发表"恭祝皇上万寿演说"，称"皇上为古今未有之圣主"，"皇上之志，在救中国之民，中国存一日，则皇上之寿增一日。我等能行皇上所欲行之事一日，则皇上之寿增一日。我等若立志尽行皇上所欲行者，则皇上之寿绵百祀历千秋而永长矣"。还列举光绪

之德政，将一切罪责归于西太后和荣禄，表示："伪政府以下之人，凡皇上仇雠，皆吾人所不共戴天者也。""我等为皇上之民，所以报皇上者，惟有忘死生入水火，求为救民之举，以达皇上欲行之目的而已"。傅慈祥也历述"皇上圣德"。[56]傅虽然曾经表示："吾辈不能创造共和政体，即以南方作一大墓可也。"[57]决心倡兴民权，但其共和观念不一定与排满相联，甚至不一定否定君权，而是君民共主上下共和之意。沈、傅二人在公开场合如此表态，显然与革命党有一定距离。此外，黎科与保皇会关系密切，组织行动上加入其行列。1900 年 4 月 4 日梁启超函告黄为之："张、黎两君既如此之热心，宜以全力与之相结，决不可失之。"[58]1900 年 5 月 19 日又函告叶湘南等人："黎、张两君热力，已足与我一气，大可喜慰，乞为我常常致意。忠、雅等若有事于江左，弟意欲两君中以一人往助之，预备有交涉之事也。"[59]

但是，也不能因此将沈翔云等人与保皇派等同视之。康有为对光绪的君臣之义，与沈翔云等主张的国民之义毕竟不同。前者保皇带有知恩图报的不贰忠心，后者则只是因为皇帝志在救民。所以，沈翔云等极力鼓吹中国民众必须养成国家政治思想和独立之心，以"维持此会之大旨"为"达皇上目的之第一著"，呼吁不要官吏保举"臭之不香，掷之即碎之头衔"，而要"自己保举自己为第一等英雄，第一等豪杰，以救民之重且大也"。重民权者为兴民权而拥皇权，亦可因此而弃皇权，他们比保皇派跨越君臣之义的心理障碍要来得容易。沈翔云一再声明自己信服公理，"康梁何足为我等信服"。[60]以后又抨击张之洞将自由、平等、民权诸说"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唾余，毋亦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61]说明这些留学生与革保两派都有

一定的政治间距。

励志会正式成立后，会员从一开始就分成两派，激烈派以沈翔云、戢元成、程家柽、杨荫杭、雷奋为代表，稳健派以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王璟芳为代表。立会之初，活动频繁，"初则数日一会，近则或每日一会，每会必有演说，议论悖谬，大约皆欲效唐才常所为，实堪骇异"。[62]这引起张之洞的注意。他函嘱驻日公使李盛铎出面干预。1901年元旦，励志会开新年庆祝会于上野精养轩，30余名会员和犬养毅、菲律宾代表彭西、兴中会会员尤列、翟美徒等到会，这是励志会的鼎盛时期。由于自立军败后清廷视留日学生为乱源，双方对抗情绪日益加剧，所以会员"志趣虽歧，尚能谨守小节，绝无辱及国体者"。[63]以沈翔云名义发表的《复张之洞书》，参加撰述者数十人，章宗祥亦为其中一分子。[64]然而好景不长，1901年1月，清廷发布变法上谕。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以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三折为蓝本，推行新政。9月17日，谕令奖励游学，学成归国后，经考试合格，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正式纳入仕进之途。[65]这一连串的求新姿态和实利诱惑，使"留学生之热中利禄者多认为仕途捷径，励志会会员乃亦渐次解体"。1902年初，留日学生筹建留学生会馆，因经费支绌，请清驻日公使蔡钧资助，并推蔡为会长。担任会馆干事的稳健派会员章宗祥、曹汝霖等，"凡遇政府派员到日考察，章等辄为之翻译引导，因是渐与官场接近"。"激烈派渐鄙其行，诋为官场走狗，两派积不相能，遂成水火"。[66]两广总督陶模等为举办新政，招诱留学生归国任职，"尤为进步一阻"。[67]不仅稳健派倒向官场，寻求进身捷径，激进派也为之动摇。沈翔云南下求款于丘菽园不果，便通过同学陶葆廉与其父陶模搭上关系，成为广东地方新政兴革事业的顾问。[68]尽管激进派会员

发起创办《国民报》、《译书汇编》等刊物，并试图组建国民会，积极响应亡国纪念会，都不能挽回励志会的颓势。况且激进派并不等于革命派，其中如雷奋、杨荫杭等，后来便倾向于立宪。据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统计，励志会员共42人，除汉口自立军死难4人不应计入外，其余38人中，确有革命倾向者11人，即程家柽、戢元丞、董鸿祎、叶澜、唐才质、秦力山、秦毓鎏、张继、王宠惠、沈翔云、汪荣宝，政府派14人，即良弼、王璟芳、章宗祥、曹汝霖、金邦平、张锳绪、富士英、吴振麟、沈琨、王宰善、高淑琦、张奎、钱承志、陆世芬，立宪派4人，即雷奋、杨廷栋、杨荫杭、吴禄祯，其余态度不详。1904年9月，由袁世凯保举"钦赐进士出身，准其破格录用"[69]的金邦平、富士英、高淑琦、张奎、张锳绪、沈琨、王宰善等7人，全是励志会员。1905年7月特别科廷试一等的14人中，张锳绪、曹汝霖、陆世芬、金邦平、王宰善、钱承志、高淑琦、沈琨、戢元丞等8人为励志会员。[70]

1902年冬，励志会中的激进派另组青年会，高揭民族主义破坏主义旗帜，曹汝霖等人则因将全付精力投入留学生会馆事务而脱会。但励志会并非如一般所说就此解体。剩下的会员于1903年初修订了章程，试图进一步发展扩大。由于革命与官场两派纷纷离去，会员的政治倾向反倒趋于一致。1903年3月17日，康有为之女康同璧赴美洲考察政治，途经东京，应励志会之邀在富士见轩演说，到会者百余人，"演说大旨谓：论我国大势，恐革命之事适足以亡国，故劝诸留学生宜倡保皇，当以革命为戒。"接着留日学生陈懋勰、蒯寿枢、章宗祥、金邦平等相继演说，内容依次为"勉学生各宜自爱"，"谓各人皆有改良社会之责，以为他日蓄办事之人才"，"康女史研究政治，实开我国女界之先，又论男女平权即是男女分治，并驳女子脑筋不如男子之非"。金

邦平一度加入青年会，在章宗祥挑动下宣布脱离，重返励志会。他对前此康同璧在日本青年会演说时要求日本人助中国改造政府的意见表示异议，认为："自国之政治，万不可恃外人代理，且不可将权力让之他人。康女史在青年会演说之语，可与日人言之，而我辈不可存此心也。"[71]此后，留日学界各种因地缘、功能、政见而起的团体纷纷成立，像励志会这样介乎政派与联谊之间的组织失去吸引力，其活动不再见诸记载。1904 年 3 月 9 日《警钟日报》刊出论说《论立会之理由》，附列各团体情况表，励志会一条标明"未久"，可见已经不复存在。

（二）国民会。国民会由创办《国民报》的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等人发起。他们大多是汉口自立军的生还者，将失败的悲愤情绪化为公开树旗排满的行动，经历了一个过程，秦力山即为其中典型。

庚子大通兵败，秦力山亡走上海。8 月 22 日，与从檀香山赶来准备参与自立军中原大举的梁启超会合。接到汉口出事的消息，他奉梁启超之命，前往汉口探听实情，以定行止。[72]秦力山此行获悉败因之一是饷械失济，回到上海时形势已经恶化，不由慨叹："嘘天一何补，鬼友尽称雄，懒说恩仇事，骊歌满亚东（故交死者既数十百人，其存者则无论新相知、旧相知，三月以来悉风流云散矣）。"[73]决定南下新加坡，访康有为、丘菽园，以谋再举。两相对证，才知道丘菽园曾捐赠巨款给保皇会。本来康有为是将这些钱用于两广兴师，但因用人不当，形同虚掷，又不敢对长江方面明言。秦力山不知就里，指保皇会挪用侵吞。丘菽园亦迁怒于康。康有为被逼无奈，竟嫁祸于保皇会澳门分会会长兼总会财政部长何穗田。秦力山等"至澳门查阅收支账册，结果乃知穗田仅为一挂名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

不能过问，特康梁之一种工具而已”。[74]康有为栽赃原为藏拙，不料反而坐实了丘、秦等人的怀疑。丘菽园亲自出马担任粮台，夺回财权，截留各地华侨捐款，并和秦力山宣布与康有为断交。

秦力山本来就有反清意识，在自立军失败的刺激下情绪更加激烈。他在上海送唐才常东渡时，便发出呼唤：“愿君归来日，不为亡国民，收拾旧山河，汉族庆再生。”[75]向沪上同志辞行时又表示：“洪涛臣起如山立，洗净蛮邦一抹青。”[76]到南洋后，反清情绪益发不可遏制：“可怪胡儿多误我，神州此后更沧桑。”[77]“他年应再动春雷”，“直抵黄龙饮一回。”[78]庚子岁暮，又在香港与曾赴汉口参加自立军的兴中会广东负责人王质甫往还唱和。不过，他虽与康有为断交，但对梁启超还寄予希望，与丘菽园商议，准备请梁启超回日本主持全局，由丘菽园出资10万，以谋再举。回日本后，又一度担任《清议报》编辑。后因“亡命贫困，求假贷不与”，又以自立军“用勤王号，名义不顺，欲力振刷之，遂与启超绝”。[79]他与沈翔云、戢元丞、王宠惠、雷奋、杨荫杭等于1901年5月创办《国民报》，高唱民族主义，排满革命。但其中一些人对孙中山也颇有微词。

励志会渐趋腐败，《国民报》诸人，“因励志社及留学界中优秀分子渐醉心利禄，时为清吏所收买，遂拟发起一国民会以救其腐败，其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二大主义，拟运动海外各埠华侨与内地志士联合一体，共图进行。即以《国民报》为主动机关”。[80]至于具体倡办人，秦力山《说革命》隐去其名，当为沈翔云或戢元丞。问题是，该会是否正式成立。

冯自由《革命逸史》只是谈到《国民报》诸人拟发起国民会，并未确认其成立。由于该报资金困难，出版4期后即于1901年8月被迫关闭。“及报既停刊，会亦因之搁浅”。[81]拒俄运动兴起

时，上海成立四民总会，随即改称中国国民总会。1903年5月31日，《苏报》刊出一份国民公会章程，宣布宗旨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该会还准备“搜辑东西各国政党之章程，以为取法之地”，“与各国政党时通声气，以为将来办理外交之地”，并与“海内外所有中国各会”联络，“以期共济”。几天后，《苏报》记者专门发表《敬告国民公会发起诸君》一文，指出：“盖此章程者，非今日上海国民公会诸热心家所拟，乃前年东京国民会诸热心家所拟也。先是，东京留学生某君组织《国民报》，另发起一国民会。此国民会者，以革命为宗旨，拟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而即以《国民报》为其机关报也。报既停，会亦解散。”并且声明：“记者何以知其详也，乃发起国民会返国之某君来本馆切责记者。”[82]似乎此会已经成立。一般著述都肯定国民会为留日学界最早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冯自由的搁浅说不能轻易否定。据亲历其事的秦力山称：“□□□遂开一国民会以救其腐败，卒至不能成立而罢。”[83]1904年3月29日《警钟日报》所刊《论立会之理由》一文所列各团体中，有励志会、青年会，而无国民会，也是一个旁证。1901年6月10日《国民报》第2期曾用英文刊出一则“关于国民会的告白”，称：“本报乃中国国民会的喉舌，该会章程已用小册子形式出版，在居住本地及其他各地的中国人中广为散发，已有相当多的有影响的中国人列名该会为成员。该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会议地址尚待择定。”透过虚张声势的措辞，已可察觉其中艰难。如果国民会真的得到广泛响应，《国民报》就不会因经费困难而于两个月后停刊。而且，这次成立大会在此后的《国民报》以及其他各报上，均未见报导。由此可见，该会虽

已动议发起，并拟定章程，但未获得足够的响应，作为中坚的《国民报》又不能持久，实际上没有正式立会。

国民会不易成立，除了留学生对于排满仍有畏惧外，与秦力山等人的政治态度不无关系。秦力山之父理刑名，他“少小随侍往来宦场中，继又访吾国之逋臣于东南群岛，复求草泽无名之英雄于南部各省”，“阅人多矣”[84]。这一特殊经历加上勤王失利的刺激，使之产生一种偏激情绪，怀疑与抨击一切。他一面指责康有为“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迨至一经挫折，遂至举平日所视为身心性命者，一扔而不复顾，曰君恩，曰友仇。”“天姬侍宴，众仙同日咏霓裳；稚子侯门，同作天涯沦落客”，一面又批评孙中山老于世故，“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85]戢元丞也与之同调，“其志在革命，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86]过于偏激的政治态度令他们很难广泛争取同盟者。直到 1902 年冬，才有叶澜等人的青年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87]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会成立前，郑贯一、冯自由、郑斯栾等人于 1900 年底在横滨创立过开智会，有名的《开智录》，便是该会的机关报，又叫《开智会录》。据蔡锷受郑贯一之托所撰《开智会序》，他们在“吾国民一受列强之压制，一受满人之钳禁，则为两层奴隶之势成矣”之际，不“图国民之自立”，而“犹以开智为议，创区区小举”，是因为“争权之道，必在充足吾国民智力也。智力既充，则虽一时瓜分，不能绝吾国民之华盛顿也。片时受两层奴隶之辱，不能使吾民之自由钟息声也。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亡，非随今日政府之亡，乃国民之智未拓，则一亡之后，无建新

政府之日耳"。[88]该会成立后,得到横滨侨商的广泛支持,但"事务日繁,主持人少"[89],主要会务为办报印书,"争自由发言之权,及输进新思想以鼓盈国民独立之精神为第一主义"[90],组织功能反倒不显突出。

(三)亡国纪念会。1902 年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被视为原自立军部分骨干以及留日学生的革命化踏上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但是,关于这一活动的一些重要问题,目前所据冯自由的各种记述与事实有所出入。

1.开会日期。据冯自由记,会期订于旧历三月十九日(4 月 25 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虽然清公使蔡钧要求日方干预,但仍有小型仪式。而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卷 3 所存当时刊发的《集会通启》,拟定举行纪念式的时间为 4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冯自由所据只有宣言书而无通启,不一定可靠。

2.发起人即签署宣言书者。冯自由称:"宣言书既成,留学界初署名发起者十数人。有署名后中悔者数人,故仅得十人,即章炳麟、秦鼎彝(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和(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群(彬四)、王思诚等是也。"[91]与《集会通启》所载有所不同。两相比较,吻合者为章炳麟、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冯自由、李群、朱菱溪等 7 人。《通启》所记王雄、或为王家驹、王思诚二者之一。另有唐蟒、冯斯栾,冯书失载,而陈犹龙为《通启》所无。唐蟒字桂梁,湖南长沙人,唐才常之子,为自费预备入校生,时年仅 15 岁。[92]他的加入,象征意义重大。

3.据冯自由所记,该会仅为临时纪念活动,并非固定组织。而据《通启》所载会约三条,一、无论官商士庶,凡属汉种皆可入

会;和人有赞成者,待以来宾之礼。二、本会不取捐资,乐捐者听。三、本会每岁开设二次,会期临时择定,以阳历4月9日为限。则该会有常规化意向,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4.对留日学生的影响。冯自由称:宣言书发出后,“留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届时“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然是早上野精养轩门前及不忍池附近已有无数警吏监视,声言禁止中国人开会,学生到轩门者均被日警劝告而散”。[93]因而一般认为在留学生中反响很大。

然而,综合当时各方反应,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军部福岛安正少将电告清政府:“顷有贵国不良之徒在东设会,将出亡国纪念会之名,诱惑留学生,即由当局者已行严办矣。成城学校学生内有一名稍可疑者,现已饬令退学。其余学生则知事类儿戏,几无预闻者。”[94]正在日本考察学务的吴汝伦向管学大臣报告:“前主支那亡国纪念会及传单等皆犯罪逋亡之张秉林所为,学生无一人在其中。”[95]另据留日学生监督梁焕奎、京师译学馆提调张缉光等人称:“顷闻有逋人流寓东瀛者,倡为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刊有一启,为各留学生大不谓然。”[96]“日来有友自东洋归,查悉亡国纪念会惟章、秦二人主之,各留学生多斥其谬”。[97]

吴汝伦等均系新派人物,此事发生后,清廷“衮衮者之心,莫不目日本留学生为叛党”。他们担心“内地讹传,以为康焰复炽,必至为留学诸生之累”,“则一切东洋译本书皆将为厉禁,而宪法之说更无由明,更难望有收用留学生之一日”。京师大学堂派往日本的学生,便因此由40人减至10人,又由10人减至2人。为此,他们竭力向朝野各方解释,力图缓和紧张空气,甚至要求“著论报端,声明此旨,以保全吾国一线之生机”。[98]言词间不免

有所遮掩。日本方面也唯恐此事影响其吸收中国留学生的通盘计划，低调处理。而且，由于警署干预开会不成，与无人响应毕竟大不相同。

如果说日方和官绅记载只能反映亡国纪念会的实际结局，那么几位当事人所记则显然包含留学生的主观态度。章炳麟《秦力山传》称："余与力山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和者虽不广，亦不怪也。"[99]秦力山《说革命》记道："章君枚叔等十人，开亡国二百五十二年纪念会于东京，内地及香港等处志士遥应之，震起国人种族观念。然而此时学生全体之腐败，几乎一落千丈也。"[100]后来他告诉章士钊："时当庚子之第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中国革命党人，包括彼与太炎及冯自由辈，无过十余人，自哀无国，聚而横议。上野公园内，有西式菜馆曰精养轩，顾名思义，以美馔驰名一时，若辈辄蜂拥而往，开会其名，轰饮其实，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席间人人手持太炎预草叙文一通，以志焚巢余痛，而力山复作宝塔歌一首，其结尾十字句曰：'甚么亡国会，精养轩一顿'。"[101]从留日学界的情形看，从1901年励志会分化到1902年6月成城学校入学事件，恰好处于政治低潮时期。其间部分人虽怀革命情绪，但普遍倾向则是与清政府调整关系，缓和庚子以来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公然鼓吹排满的亡国纪念会当然不会积极响应。况且，当时留日学生总共不过400人，其中辛丑十二月以前到东的共272人，[102]从辛丑十二月至壬寅三月间新到者134人。后一部分以官费陆军生居多，政治倾向保守，[103]数百人赴会的可能性很小。直到是年底青年会成立时，因公开打出排满旗号，发展还是至为不易。留日学界革命倾向的普遍公开化，到1903年才比较明显。

三　壬寅东渡

胡汉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先后于1902、1905年两次东渡扶桑。又两遇退学风潮。其中第一次东渡时间虽短，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并对考察当时留日学界的普遍倾向具有典型意义。其自述及海内外的有关著述，对此事的描述颇多可斟酌之处，有必要加以考订。

1.官派还是自费。据胡汉民自称，当时"已绝意于满洲之禄位。欲为人捉刀，得其报酬，为游学费"，因此跑去考了个举人，又于1901年秋(其自传记为1902年)为某氏昆仲捉刀，使之双双中举，结果得六千余金，"而数年谋留学之志愿以遂"。[104]看来似为自费。但参诸别种资料，则未必然。胡汉民是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生的名义去日本的。该科的设置，由弘文学院校长嘉钠治五郎在1901年冬游历中国后创议，于1902年春开办，设有六月、八月、九月、一年、一年半等名目。"其各学科之所由名……，盖以吾政府派遣学生之文件上所以名吾学生者名之"。纯属因人设事。该校中国留学生批评日方这样做的目的，是"欲援所谓服从主义，夺吾邦之教育界，创设弘文学院，立速成师范以为之招"。[105]速成师范科开始主要以清朝中央及各省官派学生为招收对象。1902年4月，湖南率先派胡元倓等12人东渡进入该科，期限6个月，"每人发给游学费四百元。又发给银五十两，作为赡养家室之费"。[106]随后，湖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陆续派遣，皆为官费。虽然后来"自费生亦往往厕列其间"[107]，但一般不是成批入学。而胡汉民等一行共二十余人，系由两广

总督陶模“派赴”日本，期限统一为6个月。临行时，陶模还特派洋务委员沈喜男护送各生至香港乘船。[108]除提前退学者外，这批学生均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卒业。回到广州后，还要“诣督院禀到”。[109]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属于官派。另据与胡汉民“联袂东渡”的仰公记：“同行二十七人，多其(指胡汉民)所举。”[110]自费生既不必被举荐，更不会举荐他人。再者，东渡时二十余人统一乘坐二等舱，当时从香港到横滨的船票，一等90元，二等48元，三等21元，[111]自费生应视各人家境分乘不同舱位，不会毫无例外地选择二等舱。而官费生一应旅费、学费、生活费均由政府负担，不必自谋资斧。况且区区6个月时间，也无须六千金巨款。清末留学日本费用较廉，担任过出洋游学生招待会留东总理的吴稚晖曾有具体说明：“弘文每年日币三百，同文二百四十，清华则一百八十元可矣。所举之数皆约连零用一切在内。”[112]比在国内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还便宜。湖南学生所发款额，已有优待之意了。即使胡汉民打算以后转为自费继续学习，以3年为期，连同路费不过一千元足矣。他参加科考及为人捉刀，或别有所图，或仅仅是时尚所趋罢了。

2.此行是否与吴稚晖同路。冯自由说得比较肯定：“壬寅(1902年)陶模督粤，派吴敬恒带领学生数十人赴日本学习速成法政，以一年为期。汉民与詹宪慈、冯鸿若、周起凤等预焉。”[113]而吴稚晖只是说：“我在广东看见了官场内容，觉得格格不相近，故明年壬寅招考完毕，便带了留学的亲友，共二十六个少年，一同再上日本。”[114]台湾蒋永敬教授所编《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虽然认为：“展堂先生这次赴日游学，是否和吴同行？以及和哪些人同行？尚无详确的记载”，仍引述了冯自由的说法，将吴、胡二人东渡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件没有直接关联的事。

1901年冬，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筹办广东大学堂，因吴稚晖曾"肄业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夙究教育理法"，特电邀来粤，商办一切。"筹商两月，始将章程议定"。[115]次年5、6月之交，吴离粤返沪，然后赴日。关于此事详情，1902年7月5日《选报》第21期报导如下："吴稚晖孝廉订定广东大学堂章程后，于四月下旬由粤抵沪，即回无锡偕其夫人并女学生数人复至上海，已于昨日登轮迳赴日本。"同行的8名女学生为：上海曹丽云、元和陈彦安、无锡华桂芳、胡彬华、周佩珍、俞文婉、冯元赛、阳湖吴芙，均为吴本人及戚友的儿孙妹媳。"前四位拟寄宿舍东洋女士下田歌子家，入华族女学校，后四位拟分入中小学校"。由此可知，第一，吴稚晖并非直接由广东乘船赴日，而是先回无锡，再由上海东渡。第二，时间约在1902年7月初。第三，同行者仅其妻女及由江苏带出的女学生，没有广东官费男生，且无26人之众。罗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引述吴稚晖的回忆说：他"率学生沈刚、沈觐恒(后单名沈恒)、沈觐鼎及李准之弟，同至上海，又增添无锡学生吴震修等共二十六人，同赴日本。"[116]但其中沈姓数人为福建侯官人，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题名录，签到日期为光绪廿八年四月。而随吴稚晖赴东的8名女生，签到日期则为光绪廿八年五月。根据前引《选报》报导，吴稚晖不可能于廿八年四月抵达日本。他的回忆大概是将此事与后来成城入学事件相混淆。在那次事件中，随他入使馆请愿者恰好也是26人，而且沈刚等人均在内。[117]

至于胡汉民东渡的情形，因事属创新，乘船又颇费周折，故《世说编》有详细报导，兹照录于下：

> 粤东派赴日本速成师范生共二十七人，督宪转派洋务委员沈喜男大令于上月十一日护送各生至港。沈大令先至

日本领事官野间政一君并美国公司马沙打君处关照一切，知“广岛丸”早已开行，乃拟改坐“日本丸”。惟该船新例，凡由港登船搭客，每人均须薰浴。各生初出国门，闻之颇有难色。沈大令唔商管理薰浴洋医生，告同行者皆上等学生，并无疾病，恳请特免薰浴。医生许之，但须俟上船时再行察看。而杨君玉衔、彭君金铭、周君祥鸾三人仍以为患，谓搭“备后丸”可免。大令再三慰语，谓：“诸君初经沧海，难免眩晕，“备后丸”船小，直抵神户、横滨，天气炎热，尤为辛苦。“日本丸”系上等邮船，颇极宏敞，每至上海、长崎、马关、神户、横滨，沿途口岸，均当寄锚，尽可登岸游览，不至十分困郁。昨与医生说情，必能以异数相待也。”杨君玉衔、彭君金铭、周君祥鸾疑虑如故，遂率朱君念慈、陈君廷泰、谢君祖诒、范君公党、陈君懋功、蒋君禹廷九人分乘“备后丸”，胡君衍鸿等十六人随沈大令至美国红十字会薰浴船。大令以前情相告，医生颔之，检行箧一件，所装皆洁净衣服及书籍图画等。正医生谓副医生曰：“果然洁净，甚为难得。”大令曰：“各箱皆如是，我不敢诳君也。”两医生欣然遂止，请诸君径上“日本丸”。未几，再来审察面色，以沈君藻清稍有倦容，持寒暑管令口含之，云热度过高，疑其有病，着令下礼拜再行附轮，尚可赶及。周君起凤先在横滨等候。计此次坐“日本丸”者十六人，坐“备后丸”者九人，十三日下午一点钟同时开行，皆乘二等舱。“备后丸”约十九可抵横滨。“日本丸”因各口岸有停轮，后一日到云。[118]

此则报导，可以澄清如下问题：第一，胡汉民东渡的具体日期是 1902 年 6 月 18 日，如果不出意外，应于 6 月 25 日抵达日本。这与《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题名录的签到时间相吻

合。[119]第二，登船地点为香港。第三，这批速成师范生共27人，其中1人已在横滨，1人因病缓行，同行者实为25人。除报导中提及姓名的12人外，还有詹菊隐、刘伯中、庄丙汉，区彬如、陶效勉、易廷元、李文榘、沈诵清、关赓麟、冯梁、冯恃、李滨枢、张淦光，另有二人佚其名。[120]胡汉民本人乘坐“日本丸”。因此，他显然不是和吴稚晖同船东渡。尽管他们在广东时过从甚密，胡赴日留学还得到吴稚晖的赞同支持，东渡时间也相近，具体行动却是各不相干。

3.退学归国时间。1902年7月28日，胡汉民到日本甫一月，留日学界就爆发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吴稚晖、孙揆均二人为敦促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保送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带领同学到使馆静坐请愿，被蔡钧勾结日本警方逮捕。8月6日，东京警署将吴、孙二人押解出境。吴稚晖决心“以尸为谏”，投水自沉，遗书中痛陈：“民权自由，建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欲以一死唤醒群梦，起国民权利思想”。[121]虽获救不死，却使留学生大受刺激。“自吴、孙两君之见放，国耻观念益涌起于学生人人之胸中。吴君出行之日，侵晨六点钟，学生群集新桥驿（东京之火车站）相送者数百人”。“吴、孙二君去后，神田铃木町之留学生会馆日日集议”，“以日本人循一俗吏所请，蔑视我国民全体，毫无可指名之罪而放逐我同学，吾侪腆颜留此，实无面目，誓相率归国，宁失学问，勿失名誉。万喙一声，汹汹不可压抑”。最后议决：“拟暂停课，以待此事之着落。若无着落，退学未晚。”[122]但已有不少人自动弃学归国。胡汉民所在的弘文学院，退学呼声更加高亢。当时的报导说：“东京弘文书院有中国留学生一百数十名，偕同他校学生二百名左右，彼此会议，均有去日之意，有欲回中国，有欲赴英国留学者。”[123]胡汉民本人就是积

极鼓动者之一,“愤于公义,谋所以归国之道”。然而,留学生思想参差不齐,不少人怕事畏祸,全体退学之举终付流水。同批赴日的广东速成师范生,对胡汉民“平日崇拜尊奉,至是而和者甚寡,且生反对之潮”。[124]胡汉民后来回忆道:“余遂率同学反对清公使,反对日政府,提出条件于日本教育当局,以退学为要求。日本稍缓和其事,而教育当局更诱胁诸言罢学者。余本为广东同学之领袖,退学之议,又经开会而决定,顾同学多畏祸,则中变而私为悔觉书上于学校。余益愤,遂单独提出退学书,径归国,从之者数人而已。”[125]一起退学的几位同学是詹菊隐、刘伯中、庄丙汉、区彬如。不过,退学后胡汉民并未立即归国,而是一度客居日本人三矢氏家,主人对他“相待至厚”。迁延一个月,到这一年的中秋前夕(9 月中旬)才登轮启程,返回故国。中秋之夜,胡汉民伫立船头,夜色沉沉,沧海茫茫,掐指算来,“东去西还止十旬”,为时百日,几经挫折,不由感慨万千。

4.胡汉民此时的思想倾向。他后来自称:东渡前“已持排满革命宗旨”,“苦求不得革命之方略,则以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126]而吴稚晖却说:“我在广东同胡展堂至少相聚过三十二十回,虽曾讲着史坚如被杀,十分愤惋,他尚未会过总理,说不到革命”,只是“其时革命的名词,好像已经不甚刺耳”。[127]从日本归国后,胡汉民一度主讲于梧州中学堂和师范学堂,据他后来说:“以其间为学生讲民族革命之要”,招致梧州绅士的连衔攻讦,指其“随时演说,无非革命之莠言,以圣经贤传为陈言,以平等自由为时务”。且自诩“素薄”康有为之“为人与其学说”[128]。冯自由回忆他 1902 年 6 月去横滨码头接胡汉民时,胡虽对梁启超颇有好感,却是因为“任公宗旨仍在民族主义,与其师康有为根本不同”。[129]可是根据当时《岭东日报》

的报导，梧州绅士许庆慈等人“赴梧州府联控中学堂教习举人胡衍鸿诋斥孔孟，祖述康梁”[130]，其罪名与革命无关，倒是与康梁有些瓜葛。由于这些记载相互抵牾，难以引为确证。

胡汉民的扶桑3月游，适逢留日学界政治上由消沉走向活跃的转折时期，而其到东之初，更处于这个低潮的谷底，因而虽然得偿夙愿，却感到茫然若失，“郁郁无所得”。[131]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心境时说：“以校中所授课，殊不足副所期望。间与日本所谓在野民党领袖数人谈，亦无所得。由粤偕行之同学，思想平庸，更无可与言者。”“留学生全体多不满于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来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无统系，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亦参杂于其间。吴稚晖于留学生总会欢迎会演说，亦仅能为痛诋西太后之言论而已。留学生会馆则悬有湖北留学士官之谋武汉革命为张之洞所杀者四人相片，然未有敢公然评论其事实之经过者。余时意志郁郁”。[132]抱着取经救国热望东渡求学的胡汉民，对留日学界这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大失所望，这大概是促使其毅然退学归国的原因之一。

然而，留学界的消沉毕竟是高压下的表象，孕育蓄积的地火终于在成城入学事件上找到突破口，猛烈喷发出来。全体罢学不果，胡汉民深受刺激，在回国前夕和归途中，他与友人赋诗唱和，一吐胸中块垒。这几首诗在海内外编辑出版的胡汉民各种诗文集中均未收入，有关的传记、年谱及其它著述亦未引用。考虑到它们对测定胡汉民此时的思想倾向有重要价值，不妨连同友人的诗一并抄录于下：

壬寅之夏，粤督陶模派遣游学，余与展子联袂东渡。既至，郁郁无所得。适吴、孙两君以保送留学生与蔡冲突见逐，展子愤于公义，谋所以归国之道。同行二十七人，多其

所举，平日崇拜尊奉，至是而和者甚寡，且生反对之潮。余既悯若辈之无志，且为展堂抱知人之憾，辙成二律以自解，即以送展子之行也。

仰公

漫说今吾胜故吾，我名一任马牛呼。
沿门乞食言词拙，陌路论交气类孤。
棋不争先输到底，玉还未琢掩其瑜。
神山约略千重远，樵斧丁丁不识途。

* * *

立锥何必苦思家，歧路茫茫日正斜。
无木能炊名士饼，有缘来食女儿茶。
误骑虎背诠难解，学画蛾眉谱已差。
芳草迷离寻不见，年来一例混蓬麻。

即韵答仰公 展子

民权公理惯支吾，未受人间党派呼。
铸铁无心当致错，残棋有子敢言孤。
聪明不敢藏圭角，暇垢何曾累瑾瑜。
我志从今方自励，懒从阮籍感穷途。

* * *

穷愁无日不思家，望断南天雁字斜。
避地又逢东道主（退学客三矢氏，相待至厚，凉秋初试故乡茶。
忧天才调虽无益，蹈海心期总未差。
莫道薰莸多异味，从来菅蒯附丝麻。

既和仰公复得四律　　展子

艰难回首问吾徒，落落风尘志岂孤。
出塞不逢苏武节，辞秦羞上李斯书。
催眠有术谁先觉，唾面能干我不如。
纵使蓬莱风景好，故乡吾亦爱吾庐。

*　*　*

要从十万试横磨，一著儒冠恨便多。
未信他乡难作客，常闻同室善操戈。
新交慷慨皆奇士，浊酒登临付醉歌。
遗恨吞吴真失策，受人穿鼻国如何。

*　*　*

虎斗龙争未有涯，同洲同种漫相依。
强权可握秦先帝，贵族无才宋自卑。
一局残棋嗟此日，环球公理语何时。
燕巢危幕原难久，风雨秋来知不知。

*　*　*

纷纷才士志朱颜，国事而今见一斑。
漫说闻鸡能起舞，翻疑倦鸟自飞还。
百年哀乐消排易，廿纪风潮抵御难。
自是金瓯同巩固，何人破碎此河山。

中秋夜舟中作　　展子

东去西还止十旬，莫将鸿雪话缘因。
茫茫沧海横流日，耿耿星河独夜辰。
学界渐除奴性尽，脑中赢得主权新。

恍然疑听钧天奏，夷乐侏离不可闻。

*　　*　　*

大屈龙蛇转一伸，自由从此见精神。
长途行箧三山草，故国秋风八月莼。
并世祖刘争此著，同舟李郭更何人。
拂衣夜啸江湖黑，回首沧瀛莫问津。[133]

诗言志。这些诗清楚地再现了胡汉民当时的内心世界。他充满对祖国破碎山河的热爱和悲怆之情，痛感亡国危机的紧迫，廿纪风潮的催逼，不甘受人穿鼻，做人奴隶；对于同室操戈，兄弟阋于墙的行径尤为痛心疾首，憎恨清廷君臣祸国殃民；并深刻认识到，在龙争虎斗，强权即公理的世界中，根本不能相信所谓同洲同种的骗人鬼话！ 西方近代民主意识在其脑海中业已留下深刻印记，“学界渐除奴性尽，脑中赢得主权新”，是他的理想和希望，并因此而恃才傲物，坚持人格独立，不屑与取媚官场之辈为伍。他已不再单纯是顶着举人功名的儒生士子，而是欧风美雨激荡胸中，以爱国救亡为己任，追求自由的民主斗士。为此，他立蹈海之志，以挫折为动力，激流勇进，“大屈云龙转一伸，自由从此见精神”，“我志从今方自励，懒从阮籍感穷途”，表现了激进新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然而，还不能简单地将他划入已开始形成尖锐对立的革命或保皇派阵营中去。“民权公理惯支吾，未受人间党派呼”，这种观念在当时中国新知识界十分流行。陈由己（独秀）说得更加清楚：“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134]集中体现专制统治秩序的清王朝本是他们共同的大敌，彼此有着以民权民主反对皇权专制的共同意愿，没有必要再分楚河汉界。至于革命或保皇的政见分歧，则是进一步追究的问题。因此不少反清志士走上革命道路时，主要是从梁启

超那里获得精神动力，而不是受革命党的鼓动影响。他们不仅视梁启超为同党，甚至奉为旗帜。统治者的决策使这种倾向得到加强。清政府并未将保皇、革命两派区别对待，双方的领袖均被指为叛贼逋犯。1903 年，清廷拟大赦天下，惟康梁与孙中山例外，就是明证。尽管两派分歧磨擦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公开对抗，并产生广泛影响，则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胡汉民在另一首据说同样写于 1902 年的《为平田氏题蠖屈图》诗中，也明确表达过反满情绪，[135]但还不能说已具备孙中山式的革命观念。胡汉民等人退学归国后，曾于 9 月 27 日应邀到广东时敏学堂向学生演说，胡首先登台，“言日本招待中国学生，实阴行其外交政策，故一以笼络中国政府为事，因以诱夺其利权，此我国民所宜知也”。[136]其他 3 人的演说内容亦仅涉及游学、教育和爱国，而没有革命色彩。坚持爱国救亡，反对君主专制，追求民主自由，是新知识界在从浑沌到有序的过渡期的主导倾向，胡汉民东渡其人其事的典型意义正在于此。

四　排满演说

1903 年旧历元旦的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排满演说，是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事件，曾在留日学界和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预示着革命热潮即将来临。但目前史学界关于此事引以为据的两条主要资料，即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和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的有关记载，却有不少失实之处。两人所记如下：

“壬寅、癸卯间，东京学生杂志风起，高谈民族主义，倡言革命，而讳言排满。先生（即孙中山）忧之，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匪剑帏灯之宣传无益也。'召成禺及马君武赴横滨曰:'吾朋侪中有勇气毅力,莫如两子,余非依违两可,即临阵脱逃者。民族革命,要在排满,舍排满而言民族,其能唤起国内人民之清醒乎?今有一机会,元旦留学生团拜,欢迎振贝子,公使蔡钧、监督汪大燮皆在,开演说会。禺生与君武,能提出排满二字,以救中国,大放其辞,自能震动清廷,风靡全国。禺生楚人,君武原籍湖北蒲圻,彼亦楚人也。身家性命功名富贵之徒,不足与言亡秦之事矣。'元旦日,莅留学生会馆,首由马君武登台演说排满,声泪俱下,予继之。当日全国通电,皆言刘成禺,而不言马君武,故予一人获罪。"[137]

"癸卯元旦,各省学生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正团拜礼,到者千余人。清公使蔡钧亦到。时有广西人马君武、湖北人刘成禺先后演说满洲吞灭中国之历史,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慷慨激昂,满座鼓掌。满宗室长福起而驳之,为众呵斥而止。事后刘成禺因此被开去成城学校学籍,不许入士官学校。长福由蔡均力保,得充横滨领事。"[138]

这两条记载,乍一看言之凿凿,仔细推敲,参诸其他史料,则难以奉为信史。

1.演说时间及与会人数。冯、刘二人称演说发生于癸卯元旦,即1903年1月29日。近年出版的有关著作均沿用此说。但当时出版的《选报》第51期所发详细报导《满洲留学生风潮》记载:"新正初二日,东京留学生会馆大集同学,兼请国人到馆演说。"据此,则演说的具体日期是1903年1月30日。《选报》的主持者与留日学界关系密切,并在东京设有访事人,而且该文系辑录《苏报》等各日报的报导而成,内容多为来自东京的现场消息,并非捕风捉影的传闻,因此可靠性较高。当时有些报导标以

"元旦会馆演说",应系泛指。

至于与会人数,冯自由说有一千余人,而《选报》记为五、六百人。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中的题名录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为642人,[139]除去未到会者,估计有600人与会,《选报》的报导是准确的。

2.演说者。据冯、刘二人回忆,当日演说排满者为刘成禺、马君武两人。然而根据当时的报导,发表排满演说者只有马君武一人。《选报》所载《满洲留学生风潮》一文,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大会的过程:"时有广西马某在座,众首推之。马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如何看待。座中除三十余名满人外,约有五六百人皆鼓掌。逾刻满人互相语曰:'宁送朋友,不与家奴,诚吾人待汉奴不易之策也。'马退而湘人樊锥继之,言:'中国患在外而不在内,满虽外族,仍为黄种,不宜同种相仇,与人以鹬蚌之利。'满堂寂然无和之者。最后则汪大燮续演,略谓:'诸君皆在学年,正宜肆力于学界。语曰:思不出其位。吾敢以为诸君劝云。'"据此,这次大会共有3人演说,即马君武、樊锥、汪大燮。后两人的演说,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反对马君武的观点。此外,《黄帝魂》一书中的《满学生与汉学生》也说:"元旦学生会馆演说,有某生者,主张排满";陈天华的《狮子吼》描写道:"留学生在日本,有一个会馆,每年开大会两次。有一回当开大会之时,一人在演台上,公然演说排满的话,此时恃着人众,鼓掌快意。"[140]可见当天演说排满的只有马君武一人。马虽与梁启超及《新民丛报》关系十分密切,却怀抱革命宗旨。他利用时机鼓吹排满,是十分自然的事。其演说的具体内容为:"一若满之为满,为今天下所当共排。其意盖谓满人之饮食宫室何所取资,曰惟汉人是赖。满人之衣服男女何所

取资，亦曰惟汉人是赖。汉人日竭其出作入息、胼手胝足之勤劳，以供给此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之辈，于心已不能平，况又削汉膏腴以保彼晏游之地，割汉行省以赎彼根本之区，今又以三十九年之摊还四百余兆之赔款，斫骨削肉，饮血啜脂，福则惟满独优，祸则惟汉独受，天下事之至不平者无过于此，盖欲不排乌得而不排！ 间尝反复其旨，大抵亦本自由平权等说而来。"[141]

至于刘成禺，则没有在会场上演说排满，而是乘势响应，"在《湖北学生界》畅说人种，与元旦议论颇多疑似，故亦为满学生所忌"。[142]刘成禺的文章题为《历史广义·内篇》，连载于《湖北学生界》第1、3期上，其中第1章即为《人种》。该文称："秦汉以后之历史，真可谓世界上空前绝后一部大奴隶史也"，"南北朝辽金元诸史，所述某帝天性仁厚重儒术，某帝英武过人，勘定大敌，宣扬赞叹，几有认外种人为吾之祖若宗者。无怪乎奴隶根性养之数千年，而流毒孔长也"。文章表面虽然主要针对列强，但隐含排满倾向，甚至对保皇派的拥帝也隐加批评，认为："无论他种人有华盛顿之君，有极自由之政，终不让彼窃我公产，侵我民权，污秽我人种的历史上之人物也。"[143]由于马、刘两人同时在不同场合发表过排满言论或文章，又出现于同一报导之中，容易令人混淆。1903年《汇报》的一篇论说已将演说者误记为刘成禺，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也只提及刘成禺的名字。后来刘自觉不妥，撰文为马君武表功，然而有意无意间又把自己加了进去，结果刘、马之误部分得到纠正，演说者却由一人增为两人，真是越理越乱了。另据1903年7月6日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邹容"元旦演说，已大倡排满主义。"[144]但当时章并不在日本，事后传闻，不足为据。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对马君武、刘成禺两人的处理。刘成禺

自称："练兵处奏清廷，廷寄不准学陆军入士官学校，抄籍武昌家产，逐出东京。后由汪大燮赔款六千元赴美，与学生会馆干事订立条约，刘成禺一人不入士官，易自费生二十人学陆军，方声涛等皆条约所交换。办理此案，则蔡锷、蒋百里、胡文澜诸人也。"[145]参照其他资料，亦属夸张之词。首先，刘成禺并未立即离开日本，拒俄运动兴起时，他参加了5月成立的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后又往来于上海、东京间，直到1904年5月以后，才应聘前往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其次，清政府并无以刘成禺交换20名自费生学陆军之举。据报载："东京成城学校卒业生湖北刘君成禺为满洲同学所持，不许入联队进士官学校"，"日人以信用支那政府为外交主义，亦允其请，故刘君竟无可设法"。[146]部分满族学生还策动当局，不准保送汉族学生学习陆军，"今汉学生不能入陆军学校，方信此事非讹传。湖南提督之子亦不得入陆军学校。今应有二十余人由成城学校卒业升入联队者，学生中纷纷传说，谓监督得有政府电谕，不许保送汉学生入陆军学校"。[147]在控制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问题上，清政府已多次与留学生发生冲突，这次同样激化矛盾。汉族学生闻讯，"全体哗然，各开同乡会以谋救济"[148]，"东京满汉冲突甚为剧烈"。[149]在留学生的坚决斗争下，清政府不得不遵守1902年7月成城学校入学冲突后达成的协议，继续保送汉族学生。再次，清政府处理的重点是马君武，对刘成禺则只是不准其升入联队。当时马君武有意转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某某两生并胁学生监督汪大燮，使不许送主张排满之某生入成城学校"。[150]元旦演说事令汪大燮十分恼怒，指马君武"昌言无忌，性气尤劣，正思有以治之而无其术"，暗中指使汪康年"设法令其母一控，由江南咨潋处押遣回国"。但又担心马君武与日本华族女学校校长下田歌

子有交,"设办不得手,反致生事",嘱咐汪康年"需告知日本领事转达日外部,至以为要"。并再三叮嘱:"如办马事,能觅一湘人与午帅(即魏光焘)处通气,方能顺手。第一不可泄漏,第二要使日本人不生阻力,第三要办得神速。"[151]不过,此事办起来颇多窒碍,不易措手,汪大燮又转而试图化解矛盾。不久,他函告汪康年:"马君武其人通英法文,笔下亦颇好,故前劝其赴欧美学,居然劝动。现已于前月下浣动身,大约日内可到上海矣。既离日本,前说即可不必,恐上海一有风声,反迫其东来,转多事也。此间事亦非用威所能行,寄居人国,凡一切押解驱逐之说,皆不能行,所谓无恩可怀,无危可畏,是以无法无天如此。细察情形,即国家能用一二人,亦尚无益。缘其滋闹之人,必不可用,亦自知必不见用,其喜事仍如故也。深思之真无善法耳。"[152]作为留日学生的主管,汪大燮煞费苦心地对付一介书生,不仅表明清政府对留日学界日益增长的潜在威胁感到忧心忡忡,而且显示其何等重视马君武演说其人其事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刘两人在此事件中角色地位的差异。刘成禺书多有不实之词,此亦一例。

3.演说的策动者。刘成禺称这次演说的策动者是孙中山,并详细引述了孙中山向他和马君武面授机宜的谈话内容。可是,唯其情节愈详则漏洞愈多。孙中山是1902年12月初离开日本经香港转赴河内的[153],此时距癸卯元旦尚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孙中山布置得如此周详,本身已属可疑。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元旦团拜演说已成通例,可以预先计及,清贝子载振去日本一事,却无论如何是孙中山当时不可能得知的。1902至1903年间,载振曾两度去日本,第一次是1902年9月,为处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调解留学生与公使蔡钧的冲突。他于9月5日在骏

河台留学生会馆召集成城、弘文、同文、清华、高等商业等校和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400余人，鼓吹了一番所谓"爱国"观。9月24日回国。第二次去日本，是在1903年4月底至5月底。此番东渡，是为了参加日本在大阪举行的劝业博览会，并未与东京留学生会面。孙中山既不可能在1902年12月上旬就得知载振的行止，而载振也不可能出席1903年1月30日的东京留学生新春团拜。此外，东京留学生杂志风起的情况，出现于1903年初，孙中山不会在1902年就对其中弱点进行针砭。可见这次演说虽然很可能受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但直接策动者却不是孙本人。

4.演说的反对者。冯自由《革命逸史》及其他一些记载称，当马君武演说之际，满族学生长福从座位上跳出来大肆反对，并因此得到清政府的青睐，事后由蔡钧保荐，当了横滨领事。《苏报》报导却说："今年元旦留学生会馆演说时，有满人长福闻而鼓掌。某满人怒之以目，迨回寓时将责福曰：'彼毁我满人，汝何鼓掌耶？'某曰：'吾未闻其有毁我满人之语也。其所言善，吾安得不鼓掌？'"[154]据此，长福非旦没有跳出来反对排满演说，而且是满族学生中唯一与汉族学生一齐鼓掌表示赞同的人。两种记载，截然相反，一个是面目可憎的跳梁小丑，另一个却是凛凛正气的进步学生，究竟哪一个是历史上真实的长福？

从各方面材料看，冯自由笔下的长福是被扭曲了的形象或张冠李戴。长福，字寿卿，清朝宗室，正红旗人。从1893年起以工部员外郎任记名外务部章京。1901年11月1日，他与25名满族学生东渡日本，进入弘文学院警务科，并担任学长。[155]留学前长福的思想状况，据他本人说，为官数年，昏昏扰扰，"甲午之役，渐知自愧，戊戌之变，寻知自强，至庚子之变，发奋投袂，游学

东瀛。"[156]留学期间，他广泛阅读各种日译泰西新书，潜心研究日本近代政治制度，对日本官制及一切法度，知之甚详。[157]1902至1903年间，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发表劝同乡父老送子弟游学书，长福也慨然挥毫，撰写发表了长篇《劝游学书》，呼吁八旗青年子弟东渡扶桑，为国求学。文章劈头一句："呜呼！我中国今日几不国矣！"接着历述鸦片战争以来种种列强野蛮侵略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惨痛事实，指出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使中国"门户尽失，无险可据，而列国惟以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公例，日寻竞争。我不筹防止之术，则举凡利权胥归乌有。"对于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骇人暴行，长福尤感痛心疾首，同时清醒地指出：列强所以没有瓜分中国，"非我有所恃，亦非彼有所不能也。盖以列强势均力敌，莫敢先发我"。提出中国必须矫正墨守陈规、无爱国心及缺乏公德等三大弊端。他指责"吾国守数千年之旧学，于人群之关系无所发明"，主张讲求合群之义务，生团结之力，起进取之念，"推一己之利益而利益吾群"。作为一名北方士人，他对开埠通商后沿江沿海读西书，讲西学，以俾实用的情形表示赞赏，而批评直隶"读书之士则鲜知时务"，府县地方更"狃于守旧迂习"，只知排外仇教，"而不知别求自强之道，以立于列强竞争之世"。认为庚子拳变"有仇教之心，无克敌之术，其志固可嘉，而其愚则可悯已"。主张"经此大创，受此大辱，当如何卧薪尝胆以图报复，当如何呼号奋发以图自强"。

长福不仅具有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与救国切望，作为一名满族学生，他还对十八省同胞怀有深切的内疚与自责。他痛斥当此亡国惨祸临头之际，满人依然歌舞升平，昏庸误国，"愧我直奉八旗之人，犹复醉饱酣歌，安于扑塞固陋，而不知可危孰甚，可鄙孰甚哉！"辛丑和局虽成，"重以赔款四百余兆，负

债五十年。虽各省为我分负之，而我直奉八旗之人，问心能不耻乎？”为此，他呼吁八旗子弟源源赴东，“考求各种专门学术，迨至卒业回华，各就所长，施诸行事”，使“民德日进，民智日开，民力日厚”，这样才不致“无以对各省之为我同负巨款”，而“我直奉庶不为十八省同胞所见弃也！”[158]这封呼吁书洋洋数千言，饱含痛楚、悔恨与愤懑，爱国救亡激情，跳跃于字里行间，比之于其他各省留学生所著劝游学书，独具特色。无怪乎《汇报》发表专文对此评论道：“宗室长福劝八旗子弟游学一书，觉其脑筋为独灵，其目的为最准，其思潮与心血尤为极膨胀而极热诚。然后叹八旗中莫谓无人，固自有识时务之俊杰在也。”[159]后来他还与一批开明旗人在京师创设北京进化阅报处，助人看报，并设讲报机构。

长福的政治倾向还不止于此，出于爱国救亡的动机，他甚至对排满革命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与支持。长福回国后，1903年6月3日，曾与外务部同僚孙宝瑄等人置酒纵谈。席间他说：“今日之游学日本者，多主张革命排满，或立会或演说。吾虽满人，决不斥以为非，引以为忧。”这与他在元旦大会上的表现正相吻合。所以孙宝瑄闻听之下，不禁赞叹长福“人极开敏，其脑中已灌注无限新理想”。[160]孙曾任中国议会干事，是官场士林中的新派人物，如果长福顽固守旧，不会得到他如此赞赏推许。

长福的激进倾向在行动上也有一定的表现。1903年5月，他和另外3位满族学生一起，毅然参加了革命色彩较强的爱国团体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该组织的13名干部中有8名是革命团体青年会的成员，而且刘成禺也是会员。如果长福在3个月前刚刚扮演了一个反对革命，人人唾弃的丑角，恐怕就未必会加入，也未必会被允许加入这个组织。

冯自由说长福因反对排满演说有功，由蔡钧力保，当上了清

政府驻横滨的领事,则更是无稽之谈。长福的确在日本任过领事,但既非蔡钧保举,也不是在横滨,更不是由于反对排满演说而换取的赏赐。事实是,1903 年 5 月中下旬,长福由日本启程归国,[161]在外务部任候补主事。1904 年 8 月 26 日,横滨正领事请假销差,驻日公使杨枢以"横滨一埠,最称繁杂,侨寓该埠之华商多系广东人,商情颇难接洽。现值考察商务,呈报商部之际,该埠领事更须慎加遴选,以期得力"为由,举荐原神户正领事吴仲懿(广东人)调补横滨正领事,而让长福接任较次要的神户正领事一职。[162]蔡钧早已于 1903 年 10 月 15 日离任,此事与他毫无关系。[163]至于杨枢保举长福,不过说他"年富力强,趋公勤慎"[164],根本未提及反对排满演说的"功绩";而且以横滨正领事的空缺让神户领事接充,只让长福任地位较低的神户领事,可见对他并无特殊优待。此次调任不知何故而未实授,到 1907 年 9 月 3 日,总理大臣奕劻又再度提出让当时仍以外务部候补主事名义在神户领事馆办事的长福当神户领事。[165]到次年 5 月 17 日,长福便离任,职位由长崎领事张鸿调补。可见他在仕途上颇为失意,丝毫没有血染顶子,官运亨通的迹象。任职神户领事期间,长福与梁启超等往还至密。1910 年夏秋之际,长福还在北京寓碑塔胡同自己的寓所接待康有为弟子潘之博,积极协助梁启超等人运动开放党禁。[166]

不过,面对公开的排满演说,以宗室亲贵为主的满族留学生的确普遍反映强烈,他们"两日不食,作书三百余通,飞告各省满洲大员之自爱其种"。[167]其中以良弼为首的一些人"尤为鸷悍,素持制汉之旨,今闻聚议,立有三策,一请诸政府多杀汉人,杀一人好一个,此为激烈办法。二杀一二人以警其余,此为和平办法。三速请多派满人学习陆军警察,汉人则以后不许习陆军警

察诸学，此为常治久安之办法”。[168]在其鼓动下，“东京满洲留学生倡立一会，其宗旨有三，第一，禀求政府禁汉人学兵。第二，削夺汉官之权。第三，杀灭汉族。会中人若得势之日，不杀汉人，群斥为猪狗，决不认为满人”。[169]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梁启超闻知此事，大骂“满洲鬼良弼干涉监督”，主张“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170]，与之对抗。显然，满族学生中死硬派的首领不是长福，而是后来因反对革命而被暗杀的良弼，反对的形式也不是当场跳出来激犯众怒，而是事后倚仗权势，挑动朝廷官府进行干预镇压。

长福其人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他的思想和行动说明，甲午战争后，在亡国危机的刺激和欧风美雨的鼓荡下，不仅汉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知识分子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变化。他们中间既产生出像良弼那样利用所学新知来死心踏地维护清朝统治的顽固分子，也出现了一些倾向开明，赞同改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他们本来可以而且应当为中国的革新事业贡献力量的，可惜新势力的政治领袖们提不出一个能够动员包括统治民族中的进步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进行革命的纲领口号，排满声浪掩盖了长福这一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民主精神的光芒，使其湮没无闻，难以有所作为。长福的出现只能成为辛亥革命来临和清政府垮台必然性的一个小小例证。这一形象在民族偏见的长期浸渍中变得面目全非，应当根据信而有征的史实，还其本来面目。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大将军邹容虽与排满演说无缘，但作为这次事件余波再兴的姚文甫剪辫事，倒确是他的亲手杰作。

姚文甫，名昱，字文敷、文夫，浙江人氏。本为留学生，因时

常出入于留日学生总监督汪大燮处，谋得南洋学生监督的职位。[171]其所犯奸私事，据留日女生胡彬记，详情如下："阳历二月二日，校课毕，返舍未几，闻同学钱(钱念劬之妇)、陈二君如怒如骂，议论纷纭。余就听之，钱君谓余曰：'昨午舅姑设盛馔于家，我等正在醉饱喜乐之际，忽闻舅妾媚皋，乘醉请于舅前，欲嫁姚文敷。舅恐伤文敷名，故诺之。彼即于是晚如何如何。'余异而默言曰：'唉，文敷先生，先生身为监督，而若是乎。……君识高智大，焉有不知任事尽责之理。媚皋身出鄙贱，固无足怪，而君则博古通今，名倾中外，何竟如斯之谬耶？"“斯事既有伤吾国体，又有伤我女学生之名，……外作恶样，内丧天良，天下之无耻人，殆无过于汝者矣。"[172]钱、陈二君，为留日女生钱丰保、陈懋謥。钱念劬，时任留日学生监督，其父钱振常为翁同龢之婿。

此事张扬开来，留学生“大动公愤”。就表面观之，这不过是一桩风化案，充其量是个人品行不端而影响国体尊严。从另一角度看，似还有点儿积极意义。然而，由此闹成一大冲突，则别有隐情，且与排满演说关系匪浅。

1902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增多，对政治活动的兴趣不断提高，与清政府的矛盾则逐渐激化。以前留学生事务由驻日公使兼管，1902年初，蔡钧上书外务部，指留学生受康梁影响，“熟闻邪说，沾染恶习，遂入歧邪，竟有流荡忘返之势”。“学业未成而根本已失，宗旨一变，则心术全乖”，加上日方“暗中引诱学生以作乱之谋，以便从而取利”，“将来学生等卒业回华，散布各省，倚为心腹，假以事权”，则“曩岁湖北之变，难免不复见于南北各省”，因此建议各省自设学堂，少派留学。[173]留学生得知此事，“皆相率致书回籍，详论密函中所言之虚妄无稽，并极言日本之政教实有可钦。"他们抓住蔡钧品行不端之事，借题发挥。据日

本《读卖新闻》称:“蔡和甫星使初至东京,与各学生甚为接洽。嗣因星使常赴赤坂东京艺妓聚居之所游宴,某学生作函规劝,遂成水火云。”[174]以后双方矛盾日趋激烈,终于导致成城学校入学大冲突事件。为了缓和矛盾,应蔡钧和留日学生会馆的请求,清政府增派总监督一名,统一管理留学生事务。这样一来,矛盾冲突的焦点便由公使转向总监督。

总监督不是直接管理留学生,而是通过各省各部门所派分管本籍本部留学生的监督进行间接控制。其中一些担任监督者思想开通,品行端正,与留学生关系融洽,如钱恂、夏偕复等。而另一些人则媚上欺下,为虎作伥,姚文甫便是其中典型。元旦排满演说后,留学生与官方矛盾急剧尖锐,身为汪大燮心腹的姚文甫从中挑拨离间,火上浇油。“有人云唐、经、马诸人之不送成城,刘豫生之不送联队,姚实献策为谋主。人言藉藉,咸有集矢于姚之心。又送成城时有某生数人因不合格斥退,亦多归怨于姚。又南洋学生之在成城者,以事故八人共殴一人,致一人重伤”,姚欲斥革负伤者,“同乡大哗,群抱不平”。在“众怒所归”之下,姚之“私德不饬,尤为众所齿冷”。学生风闻姚文甫奸私事,“一时致书于会馆参议部者列数十起。又致书于浙江同乡之干事,拟于大会时提出付议,且欲浙江先开一同乡会,办理此事。其中有数人者,欲勸姚回国,于开大会之先启行,如此则此事可以略消。言之于姚,姚不料猝有此事之发难,惊骇无措。然舍此别无解法,允于二日内之船期即行,作为自欲回国者”。[175]然而,激进学生不甘其轻易脱身,邹容邀集张继、翁巩、张轶殴、陈由己、王孝缜等人乘夜入室,[176]执而剪辫。其经过《新世界学报》有如下详细而生动的记述:

“阳历三月三十一夜半,适当中国三月三之上巳佳节,姚某

将就寝，忽有六七人从容扣关入，列坐通姓名，道寒暄毕，即有一人发言曰：'吾等此来别无他意，足下素称能事，何不载彼美而逃，居将何待？'因历数其罪状。姚某猝为所中，自知无可置辞，因唯唯伏罪，言语支吾。旁有一人止之曰：'汝言我固闻之，然今日我辈之来，他亦无所要求，但愿假君一物，务乞勿吝。'姚某曰：'但有所求，无不如命。身非木石，敢不知恩。'其人探怀出剃刀一柄，笑曰：'请得君之辫而甘心焉。'姚某仓皇失措，哀告曰：'诸君刀下留人。春季大会在即，诸君临会唾骂，万不敢辞，今日哀求宽假。'其人谦谢而起曰：'今日即是大会，此处即是会场。吾人例不空回，君固无烦逊谢。'语讫，乃真扭其发。姚某疑将刃其喉，因以两手抱头缩项龟息。而持剃刀者因徐徐为之理发，讫齐根割之，笑曰：'已讫事，去休去休。'姚某又哀请曰：'割下之辫，可以还我。'诸人笑曰：'此奇货也，岂可再入汝手。'因致声孟浪，拂衣迳出。""次日，悬其辫于清国留学生会馆之事务室，而为之大书曰：姚文甫之辫"。"姚某俟诸人既出，乃亟呼警察，露顶示之，而告以为学生攘去。警察抚磨熟视，操日语谓之曰：'大变便利デス。'意谓非常便利也。"[177]

事后，姚文甫被撤差，狼狈遁归，邹容、张继、陈由已等人也被迫离日归国。此举打击了官府帮凶的气焰，对留学生与政府的冲突做了道义评判，促使留日学界的反清情绪进一步高涨。

剪辫之事后来还有一阵涸澜，继姚文甫之后任南洋留学生监督的沈兆宜，1904 年又因事与学生冲突，"学生纠剪辫党至其寓，从容执沈辫剪之。沈告公使，无如之何"。[178]剪辫不仅成为留学生与官方斗争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他们自己脱离清廷羁绊的象征。1903 年，清廷专门下旨不准留学生剪发易服，"无如各生已成习惯，均不肯从，惟有二三满人尚肯听命"。[179]排满开

始从口头演说物化为实际行动。

注 释

[1] 这批学生到日本的时间，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为旧历三月底，而清驻日公使裕庚在向总理衙门呈报的《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中，则指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1896年6月15日）为"到东之日"。旧历三月间总理衙门仅根据裕庚来函，奏准招收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尚未实际选送。

[2] 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石锦：《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组织》，《思与言》，第6卷，第1期。近年来大陆有关著述基本沿用此说。

[3] 《东文学堂》，《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 《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设驻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理事即领事。

[5]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在日所招东文学生毕业后应如何待遇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

[6] 《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7] 《东文学生逐日现习功课清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8] 1897年1月27日总理衙门在奏报此项经费时称："查东文翻译一项，向在使署立学，按年列于出使经费内作正开销。""此次学校经始动用经费数目核与向章作正开销之处，系属相符，应如所报准销".《出使日本大臣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

[9] 《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等人归国的原因，一是不能忍受日本小孩频呼豚尾的戏

弄，二是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这只是依据相关资料推论，似不确。

[10] 何如璋：《使东述略》，第11页。

[11] 《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二。

[12] 《刘坤一遗集》第二册，奏疏卷二十四。关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态度的变化，参见 Don. C. Price: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96—1911.

[13] 《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14]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465—466页。

[15] 《旅日本中华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1898年5月1日。

[16] 1885年，横滨董事（此为清政府领事选派有力绅商担任，分管当地华侨事务）陈瑞璋等集资"创设中华公学，规模宏整，商民子弟，皆得入塾读书"。（《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奏保日本通商口岸董事片》，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

[17] 参见《游学汇志》，《选报》，第42期，癸卯二月。

[18]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

[19] 《旅日本中华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

[20]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6页。

[21] 《革命逸史》，第2集，第29—32页。参见《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附录《广东留学生题名录》。

[22] 《清国新闻记者》，《大阪每日新闻》明治31年1月17日。山本宪（梅崖）后为1898年成立的大阪日清协合会会员。据蒋絅裳编《浙江高等学堂年谱》，汪有龄原为蚕学馆所派，后回国要求改习法政，1898年随浙江首批官费留日学生再次东渡。汪后来担任过中国议会书记。

[23] 《旅日华侨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

[24] 《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34页。

[25] 《文廷式请开学校讲习武事片》,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七。

[26] 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34—936页。

[27] 《鄂督张之洞致总署联英俄仍须联日以戢德焰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28]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38—139页。

[29] 《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0]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一。

[31] 《鄂督张之洞致总署日人劝郑孝胥赴日学习与联英事无涉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2] 《总理衙门议复游学日本折片》,《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33] 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の矢野龙溪氏》,《成城文艺》第46期,第68—69页。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17—18页。

[34] 《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5] 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の矢野龙溪氏》。

[36]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0—251页。

[37] 《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奉之谕旨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38]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二。

[39] 《军机处电寄各省督抚谕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40] 其中南北洋及湖北各20名,浙江4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折》,光绪二十五年七月,舒新城编:《中国近

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74页。

[41] 据《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第二、四、五次》;《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浙江潮》，第3期;《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第10册。

[42] 六月《官书局报》译自《太阳报》,《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3] 《鄂督张招考出洋学生示》,《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4] 《外交报》，第99期，1904年12月21日。

[45] 《革命逸史》，初集，第98页。

[46] 《革命逸史》，初集，第99、102页。

[47] 《革命逸史》，初集，第81页。

[48] 《自立会史料集》，第71页。

[49] 《自立会史料集》，第270页。

[50] 《说革命》,《秦力山集》，第158—159页。

[51] 沈翔云:《恭祝皇上万寿演说》,《清议报》，第53、54册，1900年8月5日、15日。

[52] 《秦力山集》，第159页。

[53] 《革命逸史》，初集，第98—99页。

[54] 《译书汇编》，第2年第10期，1903年3月13日。

[55] 《秦力山集》，第158页。

[56] 沈翔云:《恭祝皇上万寿演说》。

[57] 独立代表人:《偶成》,《开智录》，改良第2期，1901年1月5日。

[5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2页。

[5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

[60] 沈翔云:《恭祝皇上万寿演说》。

[61] 沈翔云:《复张之洞书》,《中国旬报》，第35期，1901年1月15

日。

[62] 《张之洞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戊戌变法》(二),第626页。

[63] 《秦力山集》,第159页。

[64] 据留日学生监督钱恂致汪康年函,该意见书以"沈翔云为首,章仲和、戢元丞辈助之,中有名言,岂一人之力哉"。(《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009页。此条原附于钱恂来函第二十六,为"庚五月十七到"。但其中提及1901年杨衢云在香港被刺一事,显然应写于此后。)

[65]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720页。

[66] 《革命逸史》,初集,第99、102页。

[67] 《秦力山集》,第159页。

[68] 《革命逸史》,初集,第82页。

[69] 《破格用才》,《汇报》,1904年10月1日、5日。

[70] 《汇报》,第8年第44号,1905年7月12日。

[71] 《志康女士演说》,《苏报》,1903年4月9日。

[72]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22日。

[73] 《法成去后之第三夜隐几若有所思》,《清议报》,第92册,1901年9月23日。

[74] 《革命逸史》,第4集,第74页。

[75] 《法成去后之第三夜隐几若有所思》,《清议报》,第92册。

[76] 《南行留别沪上诸君子》,《知新报》,第131册,1900年12月22日。

[77] 《道出星洲赠星洲寓公》,《知新报》,第133册,1901年1月20日。

[78] 《重留别邱林徐三公子》,《知新报》,第133册。

[79] 章炳麟:《秦力山传》,《太炎文录续编》卷四。

[80] 《革命逸史》,初集,第97—98页。

[81] 《革命逸史》,第98页。

[82] 《苏报》,1903年6月4日。

[83] 《秦力山集》,第159页。

[84] 秦力山:《〈孙逸仙〉序》。

[85] 《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3期,1901年7月10日。

[86]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3页。

[87] 《革命逸史》,初集,第102页。

[88] 《开智录》,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

[89] 《本会核数告白》,《开智录》,改良第2期,1901年1月5日。

[90] 《开智会录缘起》,《开智录》,改良第1期。

[91] 《革命逸史》,初集,第59页。

[92]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

[93] 《革命逸史》,初集,第59—60页。

[94]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六。

[95] 《吴挚甫京卿致管学大臣书》,《选报》,第25期。

[96]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79页。

[97]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790页。

[98]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79、1790页。

[99] 《太炎文录》卷四。

[100] 《秦力山集》,第159页。

[101]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21页。

[102] 《日本留学生调查录》,《选报》,第10期,1902年3月20日。

[103]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

[104]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05] 《弘文学院学生退校善后始末记》,《江苏》,第1期。

[106]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第176—177页。

[107] 《浙江潮》,第7期,通信,1903年9月21日。

[108]　《游学详纪》,《汇报》,第392号,1902年7月9日。

[109]　《游学汇志》,《选报》,第42期,癸卯二月。

[110]　《大陆》,第4号,1903年3月8日。

[111]　《东游统计表》,《岭东日报》,1903年12月7日。

[112]　《志士吴稚晖说留学东洋之便利》,《选报》,第32期,1902年10月22日。

[113]　《革命逸史》,初集,第186页。

[114]　《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

[115]　《前粤督陶粤抚德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选报》,第30期,1902年10月2日。

[116]　《国父年谱》,上册,第147页。

[117]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4日。吴稚晖欲保送入校的9名自费生亦非由他带到日本,他们省籍各异,签到日期或四月或五月,显然不是同批到达。

[118]　转录自《汇报》第392号。

[119]　题名录上签到时间写为廿四年五月,应为廿八年之误。胡汉民因提前归国,故表上无名。

[120]　参见《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演说略述》,《汇报》,第421号。

[121]　《附记一则》,《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4日。

[122]　《尺素六千纸》,《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18日。

[123]　《蔡吴阅案》,《文言报》,第7号。

[124]　《大陆》,第4号,1903年3月8日。

[125]　《胡汉民自传》。

[126]　《胡汉民自传》。

[127]　《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

[128]　《胡汉民自传》。

[129]　《革命逸史》,初集,第186页。

［130］《梧州学堂之批语》，《岭东日报》，1903 年 12 月 8 日。

［131］《大陆》，第 4 号，文苑。

［132］《胡汉民自传》。

［133］《大陆》，第 4 号，文苑。

［134］由己：《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国民日日报》，1903 年 8 月 17 日。

［135］《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 3 册，第 1743 页。

［136］《演说述略》，《汇报》，第 421 号。

［137］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第 46 页。

［13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 48—49 页。

［139］该报告统计到 1903 年 3 月止，共 668 人，其中有 26 人是旧历元旦后才到日本。

［140］《陈天华集》，第 172—173 页。

［141］《论宗室长福劝八旗子弟游学》，《汇报》，第 534 号，1903 年 12 月 2 日。此文称"前年刘成禺于元旦倡排满之说"，应为当年马君武之误。据《教育界之风潮》，1902 年旧历新正团拜大会时，有人称会场为美国独立厅。《革命逸史》第 4 集《记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称，此事发生于 1901 年秋冬，为中国留学生会馆成立时，吴禄贞致开会辞所说。据《新民丛报》第 5 号《中国留学生新年会记事》，1902 年旧历元旦正值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由蔡钧宴请全体留学生于九段坂偕行社，并无排满演说之事。

［142］《记满汉留学生之冲突》，《苏报》，1903 年 3 月 9 日。

［143］《湖北学生界》，第 1 期，1903 年 1 月 29 日。

［144］《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233 页。

［145］《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146］《记满汉留学生之冲突》，《苏报》，1903 年 3 月 9 日。

［147］《满洲留学生风潮》，《选报》，第 51 期，1903 年 5 月 10 日。

［148］《满学生与汉学生》，《黄帝魂》，第 112—113 页。

［149］《记满汉留学生之冲突》，《苏报》，1903 年 3 月 9 日。

[150]　《满学生与汉学生》,《黄帝魂》,第112—113页。

[151]　1903年2月24日《汪大燮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24页。

[152]　《汪大燮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25页。

[153]　孙中山抵达香港的时间是1902年12月13日,当时香港至横滨有英、法、日等国轮船通航,途中正常航行时间为6—7天。参见《东游统计表》,《岭东日报》,1903年12月7日;《游学详记》,《汇报》,第392号,1902年7月9日。

[154]　《由日本回国者之谈话》,《苏报》,1903年4月24日。

[155]　《满洲警察学生之历史》,《苏报》,1903年6月12日。长福等系北京官费生,由驻日公使那桐建议派遣。1901年11月1日,在警务衙门监督川岛浪速、优藤内藤及小平等3人的率领下,从大沽乘"相模号"赴日本。(《开办警察汇志》,《选报》,第2期,1901年11月21日)曾一度传闻川岛与担任学长的长福勾结侵吞清政府所发补助款和安家置装费。事发后,满族学生罢学欲驱逐川岛、长福。但未能查实,最后不了了之。其中或别有隐情。

[156]　长福::《劝游学书》,《湖南官报》,第291号,癸卯正月。

[15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903年6月9日。

[158]　长福:《劝游学书》,《湖南官报》,第291—294号。

[159]　《论宗室长福劝八旗子弟游学》,《汇报》,第534号。

[160]　《忘山庐日记》,1903年6月3日。

[161]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于5月11日,而6月3日长福已在北京,计及旅途时间,估计其于5月中下旬归国。

[162]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调人员派充领事官折》,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八。

[163]　《驻日本大臣蔡钧至外务部电》,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七。杨枢于1903年6月15日即被任命为驻日公使,10月15日正式到任。

[164]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调人员派充领事官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八。

[165] 《外务部奏拣员派充驻日本使署参赞领事各缺折》,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一。

[166]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5页。

[167] 《纪满洲留学生》,《苏报》,1903年2月28日。

[168] 《记满汉留学生之冲突》,《苏报》,1903年3月9日。

[169] 《满洲留学生风潮》,《选报》,第51期。另据1903年4月12日《游学译编》第6册《劝同乡父老子弟航洋游学书》:"某见夫在日本诸人,有血者寥寥,凡所谓流血排满者固无有也。岁首元旦大会演说,有语侵满洲者,满洲之警察学生归商之,良弼曰:'无妨也,以一顶子且每日五十两银子给伊等者,彼又将为我之奴隶。'夫其言诚虐矣。然计我在日本之留学生,无非求作官者,则其所见透者也。"

[170] 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8页。

[171] 冯自由《革命逸史》和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称姚为陆军学生监督,章士钊《疏〈黄帝魂〉》称其充湖北留学生监督,均误。当时各报所载,均指姚为南洋留学生监督。参见《日本留学陈君去病致友人书》,《苏报》,1903年4月30日;《姚文甫》,《选报》,第51期。

[172] 《录留学日本胡女士彬记南洋学生监督之劣迹》,《童子世界》,第11号,1903年4月16日。

[173] 《蔡星使致外务部书》,《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8日。

[174] 《公使荒谬》,《选报》,第13期,1902年4月18日。

[175] 《姚文甫》,《选报》,第51期。

[176] 参见沈延国:《记章太炎先生》;《革命逸史》,第2集,第47页。

[177] 巨君:《论南洋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失辫事》,《新世界学报》,第12期,1903年3月13日。

[178] 《日本留学界之片影》,《大陆》,第2年第5号,1904年7月3日。

[179] 《日使照会》,《汇报》,第471号,1903年4月25日。

第 6 章

中国教育会

1902 年春成立于上海的中国教育会，一般仅被视为进步人士所办的教育机构，而教育救国没有超出改良的范围。认真翻阅一下有关资料，发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几乎所有辛亥风云人物都或多或少与该会有过关系；作为一个有着秘密革命核心的组织，它比华兴会、光复会成立得早，并直接对这两个革命团体产生了影响，与兴中会也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其活动对于扭转戊戌以来的时论风尚，掀起内地革命风潮起了重要作用；而该会内部的矛盾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多次分裂，又尖锐地表现出近代新兴知识分子固有的弱点，以及他们在社团组织与活动方面的种种痼疾。此外，还可以从中探查江浙开明士绅在社团组织中的人脉关系。

一 双重属性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 1902 年春。先是，蔡元培与叶瀚、蒋智由、王季同、汪德渊、黄宗仰、王慕陶等人于 4 月 15 日商议筹组中国教育会。4 月 27 日，由在沪同人选举蔡元培担

任事务长(即总理),王慕陶、蒋智由、戢元丞、蒯寿枢等任干事,陈仲骞为会计。随即函邀江浙各地同志赴沪,于5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1]入会者“或为学校师,或为编译员,或为新闻记者,或为学生”[2],“都是上海及内地顶有名望的人,总共也聚了一百多人。”[3]新型知识分子构成该会的主体。中国教育会的出现,表明在上海这个中西交汇的新兴大都市中,新知识群体已经聚合发展,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具有相对固定的角色地位,并要求通过自己的社团组织与活动,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

关于中国教育会的缘起与性质,冯自由说是因为当时“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从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因联络海上有志之士,发起中国教育会为策动机关。倡议诸子,均属热心民族主义之名宿,故此会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4]教育会的重要骨干蒋维乔则极力肯定该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5]而吴稚晖又对蒋说表示否定。[6]因而仍是一桩悬案。

事实上,中国教育会的确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秘密革命核心,他们立会的意图,是想凭借当时最为风行的兴办教育的名义,以学校为培养革命力量的基地,展开宣传组织活动,并不拘泥于发展教育。1904年4月3日,蒋维乔曾在一封致教育会诸君书中明确指出:“原设会之本意,诸君子固别有宗旨,不过借教育为表面。”“窥诸君子之用意,盖以中国垂危,教育之效终嫌缓不济急,故恒持虚无共产主义为救急第一良策。”不知底细者“固抱一教育普及之念而来,一入其中,微闻其内容则骇而走耳。此所以入会者前后有百余人,至今十不存一也。”有鉴于此,他提议:“诸君子欲达目的,则宜秘密者应另组织一秘密之部,而教育

会自以普及教育为宗旨"，使"名实相符，可期发达，不致蹈前此之弊，与诱人入会无异。"[7]值得注意的是，当该会机关报《警钟日报》将这封信刊出时，却把其中涉及秘密宗旨的内容全部删除。[8]可见是有意加以隐蔽，以防意外。从会员的思想倾向看，的确有一批核心人物已经脱离维新的旧轨，走上或是趋向革命的新路。他们不仅自己从事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而且力主将其政治主张定为组织的秘密宗旨，并反映到教育会的公开章程与行动方针中去。该会章程总则规定："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9]后来修订章程时，又将"教育中国男女青年"扩大为"教育中国国民"。关于"恢复国权"，激进会员有进一步的解释："我等所以设立此会者，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决非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否则亦当如腐败之报馆，日日望朝廷变法而已，又何劳我辈穷措大担任此国民之事乎？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10]1903年初，教育会在致海外同胞书中追述了立会的动机："专制之毒，痡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况丰祸之交乘而迭至者乎？同胞同胞，吾侪不自振拔，偷懦惮事，失今不图，必无幸免之希望矣。"[11]矛头指向专制教育和列强的文化侵略。

中国教育会名义上是为了发展民办教育，即使这方面的活动，也带有反清意向。会员们说："各处奉谕建设大中小蒙各学堂，其实行奴隶教育绰有余裕，何劳我辈穷措大担任此教育之事乎？"[12]所以如此，其目的就在于培养革新改造的新国民。爱国

学社开学之日，中国教育会代表人蔡元培发表祝辞道："吾中国教育会建立之始，即议先举实事，以为本会发达之基本。经营半年，始有此爱国学社，是为本会实现理想之第一步，故学社之前途于本会前途实有重大之关系。""近今吾国学校日月增设，其所授科学诚非可一笔抹杀者，然其精神上之腐败之卑猥决不能为之讳。此如人之有官体而无神经，则土偶傀儡之类耳。吾辈今既以制造神经为主义，则有三希望焉：一曰纯粹其质点，则沈浸学理以成国民之资格是也。二曰完全其构造，则实践自治以练督制社会之手段是也。三曰发达其能力，则吾学社不惟以为雏形，而以为萌芽，以一夫不获之责，尽万物皆备之量，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呜呼！吾学社果能达此希望乎？则微特学社之光荣，微特吾教育会之关系，吾中国之前途，实大被其影响焉。"[13]这段话的含义，又可以从蔡元培在处理浔溪公学第二次退学风潮时所讲的一番话中找到注解。他认为学生中有一派人"自以已负国民之义务"，"又日染于译书之理论，日激于新闻之记载，则愤叱狂呓，血涌技痒，不知其所由。"他们是可以用作清除挡路巨岩的"爆烈之材料"，"其性质喜理论恶实验，喜涉猎恶记诵，喜顿悟恶驯致，喜自检束，不喜受人检束，喜自鞭辟，不喜受人鞭辟。此其人宜自集其同志为一学社，延其所心服若吉田松荫、西乡南洲之流而师之，不拘拘于学科之常例，而要以淬厉其志气，增长其见识为主义，则他日必当为我国革新之先导者。"1902 年 7 月留日学界发生成城学校入学冲突事件时，"中国教育会拟函劝留学者回国，而于上海设一学校以待之"[14]，未能实现。但在南洋公学退学后便趁机开办了爱国学社。这种培养"爆裂之材料"、"革新之先导"的计划，从一开始就确定为教育会的办事方针，而爱国学社学生在教育会

的帮助引导下，果然成为革命骨干。当时的进步舆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欢呼中国教育会的诞生。有人满怀希望地说：中国“犹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则有志之士接踵而起，以教育自任，以开化为职，播革命之种子，涌独立之风潮，大声而疾呼之，冀什一于千百，此诚吾国前途之大幸欤！”他进一步分析道：“今日言革命决不能出二范围，曰和平，曰激烈。今日而望和平革命欤？政府昏沉……，和平革命不可得，必出于激烈。”而激烈革命非“翩翩文士之所能为”，“则必望于下流社会以为之。然下流社会杂然无规则，缤然无条理，又决不能奏功。”既不能骤兴革命，又不可坐以待毙，所以，“察今日之时，度今日之势，救中国之亡，拯吾民之危，必以教育为第一义。”于是高声赞道：“善哉！今日沪上诸志士之设中国教育会也，可谓洞知病源而施苓术者矣！吾中国之复兴将于斯焉赖矣。”[15]

当然，中国教育会又不同于兴中会或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它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并且认识到只能通过“激烈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它并不是秘密反清团体，其“激烈革命”主要体现为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和暗中培养革命力量。立会初期，组织的革命色彩并不明显。随着形势的发展，激进会员不仅强化了宣传上的激烈程度，而且越来越认识到武力反清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虚无共产思想的影响，以极大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从事暗杀活动的训练和准备，而没有筹划过武装起义。

与其他革命小团体相比，中国教育会还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即在其内部存在着激烈、温和两派，“激烈派主张以学校为革命秘密机关，蔡孑民主之；温和派则以名实应求相副，不如纯粹办教育，培养国民，叶浩吾等主之。”[16]所以该会又类似政治联盟，

两派各自奉行一套公开或秘密宗旨。由于这种分歧，双方往往各行其是，温和派不参加激烈派的反清密谋，激烈派也有意避开温和派。因此在进行革命活动时，一般不是以组织的名义出现，而是由会中的秘密核心来实施。部分核心会员所持秘密革命宗旨与整个组织的公开宗旨并行共存。围绕宗旨及组织上公开与秘密的两重性，两派展开既合作依存又磨擦冲突的复杂关系。激烈派须借助公开宗旨来保障团体的合法生存，以便于活动，贯彻秘密宗旨，温和派则须借重激烈派的力量。在会务迭遭挫折的情况下，温和派对于激烈派"诸君子身在教育会中，而尽力于教育者甚少"的现状极为不满，屡次企图取消秘密宗旨，主张"本会非他会可比，可以直接或间接尽力于教育者为界，非如秘密党可以杂然并蓄也"。进而提出："我会之根本宜确定者"，就是改宗旨为单纯普及教育。[17]要求将中国教育会由一个以激进的全面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政治团体变为纯粹的教育机构。

中国教育会内部以宗旨为焦点的分歧争论，其内涵却不是两派政治立场上的根本对立，而是行动方针与策略的见解有异。教育会中虽有个别保皇派分子，如龙泽厚以及后来转向保皇派的蒋智由，但内部两派纷争并非革命与保皇派冲突的延续。蒋维乔是温和派的重要成员，也是提出改变宗旨意见书的动议人，他在戊戌以前便开始接受新思想，先后阅读了多种新书新报，并翻译了《佛国革命战史》五卷。其"生平极厌科举，凡考试均以游戏视之，"怀抱追求科举功名以外的"鸿鹄之志"。对专制统治者"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的贪婪横暴深恶痛绝，十分向往西方民主制度。1902 年他进入南菁学堂，"与诸教习及同学志士相处，乃大悟新学界之别开生面"，思想学问与日俱进。"又多识沪上志士，而恨南菁学堂之腐败"，退学到常州开办

修学社，组织团体，“以邑民同盟为国民同盟之基础”。至此，他才感到“学识始有所归宿，而抱定变革宗旨矣”。其内心世界渐与反清革命发生共鸣。一次，他与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小谷长尾晤谈，后者作诗讥讽京师大学堂新定章程，轻蔑之意，流于言表。他当即指出：“中国政府实属可笑，而不能将中国之人一概抹杀也。”并奋笔和诗曰：“会看汉族风云变，大泽龙蛇淮泗村。”[18]期望反清义军揭竿而起，排满革命情绪跃然纸上。1903年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蒋维乔撰文评论，开篇大呼：“奴隶之劣根性种于二千年，童而习之，长而遂安之，生而循之，死而莫知之，可哀哉，我黄帝文明之子孙也！”视学潮为“独立之萌芽”，“专制之力益甚，则学界之团结亦益固”，赞扬学生“其功比于大禹之治水，周公之驱猛兽，有过之无不及也。”并希望造成“以长江为中枢，北而黄河，南而西江，风潮遍及，由水而陆，则可普及全国”的大好局面，“而海上设总部，握其机关，隐然而成立国会，独夫民贼不足平也。”为此，他“惟日夜祷祝压力之日益甚，使抵力日益强，夫而后度尽全国奴隶根性，而我黄帝文明之子孙可自立于二十世纪之天地也！”[19]显然，反对清政府及整个君主专制制度已成为其思想主导，排满革命口号呼之欲出。

温和派领袖叶瀚的经历则反映出这一类人政治态度的变化发展。叶字浩吾，上海格致书院肄业生。早年入鄂省张之洞幕府。戊戌期间，与汪康年等筹办浙学会，下设格致、时务、农学、蒙学四会，一面“为将来团练张本”，一面抵拒康有为的“南海伪学”“侵入浙界”[20]，俨然为浙学领袖。正气会成立时，他以革新派身份加入。[21]后来唐才常另筹自立会，由他继任正气会干事长。[22]1900年7月26日，在中国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担任主席，7月29日第二次大会时，当选为书记。1901年，应庞青城之聘，

出任浔溪公学校长。[23]上述经历表明，他不仅是一位在清末江浙知识界，尤其是开明士绅中颇具影响的人物，而且总能与时俱进，始终置身于政治的前沿核心。作为中国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不仅积极兴办教育，对激进派的活动也予以配合支持，义务承担了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的教职。《苏报》案发生之际，他冒险前往爱国学社劝章炳麟等“留此身以有待”[24]，后来又与身陷囹圄的章炳麟等时通消息，并亲自迎接章氏出狱，陪同其前往中国公学。[25]他们与激烈派的分歧，主要在于行动步骤与策略。正如蒋维乔在更改宗旨意见书中所说：“陈义至高，实行至难之事，惟有躬先蹈之，以倡天下。断无自己不为，而以空言号召即能成事者。诸君子手无缚鸡之力，而日以暗杀望人，身为穷措大而日以共产望人，何其颠倒谬误，一致此欤？”诚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他们与梁启超等人还有相通相似之处，如所谓人民程度问题，蒋维乔说：“况中国人程度之浅，不可以道里计。诸君子未尝一一研究，而欲骤语以至高之主义，譬诸执负贩细人而语以哲理，其谁听之？且诸君子亦尝以至高之义施诸年少学生矣，血气未定，文字未通，而导以革命事业。彼青年者，喜其言之便于肆意妄行，而实行家庭革命者甚多，而满洲政府则依然也。”因此他断言：“教育未普及，民智民德未进步，而语以至高之义，则有百弊而无一利。”[26]姑且不论这种认识的是非正误，即就论点本身而言，也不能与保皇派的政治主张相提并论。他们把改革当成革命的前奏序曲，通过改革为革命创造条件，造成最终推翻专制统治的力量与形势，而不像保皇—立宪派那样，多少有以改革抵制革命的意向。正因为两派基本立场相吻合，才会一致同意将人所共知作为国内革命舆论中心的《苏报》和《警钟日报》收为该会的正式机关报，同时温和派也才会在了解激烈派秘密

宗旨的情况下，维持组织的统一。

教育会中温和派的思想与政治动向，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该会成员主要是戊戌以后一直活跃于江南政坛的开明士绅，他们大都从事文教新闻活动，与从官场到民间秘密会社的各种政治势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变法失败和庚子国耻的刺激下，其反清情绪日益激化，革命锋芒逐渐锐利。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就是他们革命化趋势增强的具体表现和直接产物。在留日学界和国内学界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反映出当时中国新兴知识阶层基本或主导的动向。一个具有秘密革命宗旨和组织核心的中国教育会，适应政治风尚的变化，因而迅速崛起，对1903—1905年间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发生重要影响。当然，这种转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开始他们的言行不可避免地带有过渡性特征，反映到组织上，便形成中国教育会所独具的二重结构。然而，辛亥时期，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前，无论是保皇—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在新兴势力中都只占少数，而包括教育会温和派在内的趋新力量，则具有数量的绝对优势，成为双方依赖和争取的社会基础。他们的追求与政治动向，是制约时代潮流主导方向并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人对于反清革新具有广泛共识，而并不重视政治派属在宗旨策略上的分歧。他们对各派的政治主张与行为有所权衡取舍，但不一定加入其阵营。仅仅以革命与保皇—立宪的划分，尤其是以一两位领袖人物的言行为尺度，不仅不能完整概括这一时期中国新知识阶层多元化的复杂政治分野，而且很容易简单地从两极对立的角度妄加评判，忽视甚至抹杀大多数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毋庸讳言，中国教育会一度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特别是1903年以前，教育会员对梁启超相当崇敬。曾任会长的黄宗仰

作诗赞道:"洗刷乾坤字字新,携来霹雳剖微尘。九幽故国生魂死,一放光明赖有人。""笔退须弥一家攒,海波为墨血磨干。欧风墨雨随君手,洗尽文明众脑肝。"[27]章太炎、马君武等人也对梁启超期望殷而推重甚。筹建爱国学社时,该会还得到梁启超的捐款赞助。[28]但这主要是因为1899—1903年间梁启超表现出了空前的激进倾向,他既不排除使用起义、暗杀等暴力手段,又在一定程度上附和了排满革命,或多或少离开了保皇的旧轨,而与教育会的立场接近起来。至于蒋智由后来的倒戈,则属于个别人的立场转移。当然,温和派与保皇—立宪派认识上有相通之处,行动上有时也会同后者搅到一起去。1905年后国内立宪派活动渐趋活跃,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立宪派更是积极。是年10月8日,百余人在上海愚园开会,成立江苏学会。当天张謇并未到会,由教育会员屠敬山代为主席,出席大会的蒋维乔等一批会员推举张謇为会长,恽莘耘为副会长,李平书等4人为会董。该会成立后,东京的革命派报刊予以激烈批评,指责其"依附官场,崇拜资格,几为藏垢纳污之地"。[29]其基层组织选举议事时,"多循旧社会资格,故所得者,多庸庸不足道,而少年奇特之士,辄不为其社会所容,横被排挤。"[30]但是,学会毕竟也有"以讲学合群之意,立地方自治之基"[31]的打算,一度遭到地方官府的封禁。而且有的同盟会员也参加了江苏学会,不能因为教育会员侧身其间,就视为与立宪派同流合污。对国内合法斗争采取排斥态度,削弱了对民众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动员能力,正是同盟会方针策略的重大失误之一。在国内,政治阵营的对立没有海外那么壁垒分明,相互混杂的状况反而有利于从内部推动影响立宪派的行为。

二 规模与联系

研究清末政治小团体的学者往往注意到这些组织的地域色彩，并归咎于其成员的主观意识。然而，中国教育会从一开始就没有用狭隘的地域观念把自己局限起来，而是力争建设成为全国性组织，这从它标明为“中国教育会”即已昭然。该会章程规定：“本会置本部于上海，设支部于各区要之地。”[32]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为：“本会设中央事务所于上海，其会员在各地至十人以上则设一地方事务所。”[33]蔡元培对于教育会沟通内外的功能作用有很好的说明：“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以媒介之，尤不可。”[34]从整个活动看，该会积极贯彻了这一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现。

中国教育会几经起伏，人员流动很大，多则百余，少则十数[35]，会员籍贯分布于苏、浙、闽、皖、直、鄂、湘、粤、桂、甘等省，其中以江浙人士居多，但其他省籍会员如湖北的王慕陶、戢元丞、广西的马君武、安徽的汪德渊、蒯寿枢、湖南的章士钊、陈范、福建的林森、林獬、直隶的张继、广东的徐敬吾、甘肃的陈竞全等亦起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还担任过职员。这种情况反映出上海移民社会的背景。清末这里成为各地新知识群中精英分子的汇萃之所，他们时而聚会上海，时而分散各地，使得上海与各地知识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教育会的直辖分支主要分布于江浙一带，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与许多重要省份新知识界中的革命分子建立了密切联系。

1903年春成立于上海的福建学生会，会长林森及骨干林獬都是教育会员，其活动往往借用教育会所或爱国学社校舍。王慕陶、耿元丞等与湖北进步知识界联为一体，他们创立的国民丛书社，"同乡公举以为上海机关，于吾湖北关系甚大。"[36]由湖北革命小团体花园山机关派赴上海设立联络处昌明公司的万声扬，就与国民丛书社保持直接联系。继起的科学补习所也与教育会互通声气，其章程即刊登于中国教育会的机关刊物《警钟日报》上。湖南方面，陈天华、黄兴、杨毓麟等人均与教育会员过从甚密。陈天华多次在教育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政见。黄兴于1903年作为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归国时，曾与教育会接洽，以后又赴沪与蔡元培等人密谋，计划以上海为国内各地及东京同志的集合点，华兴会起义时大举响应于东南。杨毓麟在京津一带的暗杀活动，及其为配合华兴会起义在上海设立的策应机关爱国协会，以及起义失败后与逃亡到沪的黄兴等人重建的组织，都有不少教育会员参加，所以连宋教仁都知道"《警钟日报》社原属同宗旨"[37]。没有教育会的协助，华兴会很难在上海立足活动。此外，华兴会中的张继、秦毓鎏、翁浩、叶澜、章士钊等人均曾加入教育会或参与过该会的活动。安徽的陈由己也与教育会关系密切，1903年他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印刷即由教育会属下的东大陆图书局承担。后来他发起组建了岳王会。光复会的情况更不待言，会员中一部分来自留日学生的暗杀团，一部分则来自教育会，如蔡元培、章炳麟、蒋智由、刘师培、蒯寿枢、林獬、柳亚庐等。相比之下，后者的地位更显重要。教育会中激烈派早有暗杀密谋，因与温和派意见相左，办事诸多掣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产生另组机构专门从事秘密活动的意念。

从教育会的角度来看光复会，还可以为光复会研究中的某

些疑点提供新的论据。如教育会员认为能够实行革命的,“大半都是因那强盗进村,失了财产,穷苦无赖,志图报仇。其余那些有钱有势的财主,还在那里打算盘,三七二十一,顾着眼前安乐。”[38]因此比较注重下层社会,主张虚无共产。他们组织光复会,就是为了动员下层,从事暴力斗争,所以适应民众心理,鼓吹“振汉、思明、覆清”;一些人更进而针砭资本主义的弊病,不切实际地希望超越。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全部或最终的社会政治理想。如果不顾其他事实,仅仅将这两方面直接联系起来,视为因果,就容易得出光复会只主张反满复汉,还没有跨出历史上驱蛮攘夷、改朝换代窠臼的结论。其实,他们在光复会中的言行,只是反映了思想的若干侧面,综览其全貌,则清楚地显示出近代激进民主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色彩与特质。反满与批判西方近代社会的某些弊端,正是其激进民主立场的表现。另外,关于光复会的定名,有一事值得注意。1903 年底,教育会员林獬以“白话道人”为笔名,在该会的《中国白话报》上发表连载小说《玫瑰花》,描写癸卯四月间,占据玫瑰村的强盗打算割一半田产给外人,村里志士钟国洪邀集朋友方振汉、葛思明、蒯覆清等密谋“暗地设一个光复会,会中立个章程,劝人入会”,准备发动起义。“约计到会者共有一百三十七名,内中除本书上常见的各位有名会员之外,其余商家里面占了三十二人,农家里面占了四十五人,工艺里面占了二十人,其余四十人,全是读书社会里头。”[39]这里至少包含了作者本人对革命团体的某些设想。《玫瑰花》在江浙一带流传甚广,颇有影响,特别受下层社会欢迎。光复会的定名,与此当不无关系。

中国教育会与留日学生的关系十分引人注目。会员中不少人曾留学日本,并经常来往于东京国内间,如戢元丞、马君武、吴

稚晖、张继、林獬、蒯寿枢等，有的则因故旅居日本，如章炳麟、黄宗仰、陈范、蒋智由等。该会在东京设有通讯员，吴稚晖还担任过上海出洋游学生招待会的留东经理。[40]他们的言行，对留日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有些人本身就成为留学界的革命骨干。由于这种历史渊源，在茫茫东海上架起一座无形的桥梁，沟通了国内外两个革命基地的联系，使革命风潮汇成一体。留日学生归国，多以中国教育会为落脚点、中转站或联络处。1902 年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后，教育会发起"协助东亚游学会"，"拟专派会员亲赴东京，商定将来中国人愿入成城学校者，可以径由会中保送。"[41]拒俄运动中，教育会与留日学界关系更形密切，甚至建立了统一组织军国民教育会。

中国教育会与孙中山、兴中会的关系特别值得重视。在华兴会和光复会成立之前，中国教育会是除兴中会以外国内仅有的带革命性的组织，双方的联系，既验证了教育会的性质与动向，又反映出孙中山对国内进步知识界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会员章炳麟早在 1899 年就与孙中山结识。1900 年 8 月，他断发出国会后，致书《中国日报》，推崇孙中山为"天人"，认为"廓清华夏，非斯莫属。"[42]其他如张继、黄宗仰、马君武、戢元丞、王慕陶等人，均与孙中山有亲身交往或通信联系。1903—1904 年间，孙中山与教育会员通信频繁。为了支持孙中山扫荡保皇派的斗争，黄宗仰汇寄《革命军》一千册到南洋，大受华侨欢迎。孙中山复函表示："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43]孙中山还把自己拟定的新誓词和宣誓方法详告上海方面，说："公等既为同志，自可不拘形式。但其余有志者，愿协力相助，即请以此形式收为吾党。"[44]1903 年秋，

中国教育会内部发生冲突，兴中会骨干陈少白闻讯后，“以同党内哄，有碍大局，特亲至上海设法和解，并设宴邀集沪上诸同志联络感情。”[45]这种“同志”或“同党”的关系，显然已经不是组织外的一般联系了。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员并未全部入盟，而其中原属教育会者却大都加入。

1903年以前，孙中山还不大为国内人士所了解，后来这种情形有了重大改变，其间中国教育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之梦》最早的两个中译本《孙逸仙》和《三十三年落花梦》，先后由会员章士钊、金天翮翻译，并由教育会附属的国学社等机构出版发行。其次，1902—1904年间，教育会员在各种刊物和宣传品上纷纷表态，交口赞誉孙中山，推崇备至，尊为“革命北辰初祖”，“东大陆之华盛顿、拿破仑”，“支那革命大豪杰”[46]。这些言论出自当时在国内极具影响的中国教育会会员之口，对新知识界的震动可想而知。再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最早是通过中国教育会的机关报或附属刊物传达给国内知识界的。重要的几篇文章是：《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复某友人函》，12月8日—10日的《论中国民族主义》，12月20日的《孙逸仙书后》，以及12月24日的《论共和政体》。此外，章炳麟《訄书》修订本中的《定版籍》和与教育会关系密切的秦力山发表于《国民日日报》的《与孙逸仙讨论公地笔记》内容简介，以及戢元丞主编的《大陆》杂志第2年第9号《孙文之言》，分别介绍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革命程序论思想，《警钟日报》和《大陆》杂志还刊登了美洲各埠致公堂所发欢迎孙中山反对保皇党的传单公启。这些言行看似偶然现象，却反映了国内新知识界对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推崇与期待，以及教育会与孙中山思想行动的合拍。

中国教育会的公开名义是发展教育，培养革新改造的新国民，在这方面，它也隐然成为全国的中心。在其影响下，浙江、江苏、江西、四川、湖南、广东、山东、福建等省纷纷成立教育会或教育研究会。这些组织大都以"普及国民教育，振起自立精神"[47]、"养成国家思想，振起尚武精神"[48]为宗旨，会员一般有百余人，有的多达400。[49]除总会外，还在府县设立支部。如江西教育会"计十三府一州，惟饶郡无人"，其余地方"均有代表之资格"[50]。江苏教育会最初由留日学生发起于东京，后会员十余人归国，在无锡、娄县、宝山、江阴、常熟等地设立支部，会员增加到一百多人。[51]各地人士鉴于拒俄运动时"上海教育会慕义响应，都之得八九百人"的事实，大声疾呼："我同胞而不忧家国则已，忧家国则必立民团；我同胞而不立民团则已，欲立民团，则请从教育会始。""由一方隅而推之全省，万室之都，三里之邑，莫不有教育会之组织焉，则全省之团体必固。由全省而推之全国，形胜之地，繁盛之区，莫不有教育会之组织焉，则全国之团体必强。""聚我全国数万万人为一大团体，则全国必有左右全球之能力。"[52]他们认为："中国教育会者，中国教育会之总部也，有总部必须急设支部"[53]，承认中国教育会的中枢地位，并以行动响应之。因此，有的省份教育会在章程中规定："本会与外省教育会、并中国教育总会，有互相协助联络之义务"[54]；有的省成立教育会时，"特派会员至上海中国教育会事务所商订联络章程"[55]，甚至计划与之"连合南北，以兴教育事业。"[56]一时间"各处教育会及各学堂皆步尘而兴，咸奉海上诸志士为全部之中心。"[57]从而不仅推动了民办教育的发展，而且促使新知识群加快了动员组织的步伐。

中国教育会从一开始就力图建成全国性组织的事实表明，

新知识阶层的政治团体并不曾以狭隘的畛域之见作茧自缚。这不仅是沐浴欧风美雨的结果，也由于传统天下观的熏陶和严酷社会现实的逼迫，使他们打破地域界限，因为他们共同面对的强大敌人，是统治整个中国的专制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使得普天下的叛逆们认识到共同的地位与命运。靠文化凝聚的民族，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人始终是国体命脉所系，这时更将士人的天下己任抱负转化为国民意识，结成统一整体。诚然，乡土社会的影响在一些人身上留痕，中国教育会内部也曾因地域之别发生矛盾冲突。但是，他们还不至于把决定国家民族及群体命运的革新大业也装进地域之见的囚笼。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地域色彩，主要也不是来自其成员主观认识的局限。而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囊括天下英豪的愿望无从实现。新型知识分子很早就呼吁建立全国性团体，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区域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奋进，直到同盟会的成立。而中国教育会正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三、发展与影响

中国教育会从建立到涣散，历时6年，几经起伏，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1902年4月—11月为开创期。依据章程，教育会总事务所设于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西福源里21号，[58]设正副总理各一人，干事6人，会计2人，书记2人，评议员9人，纠仪2人。[59]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其中教育部又分男女二部，以后改为学校教育部与社会教育部。[60]但开始“会员人数稀少，经济尤为竭蹶，发展殊难”。[61]其间比较重要的事件是6月组织上

海女学会和8月13日在张园集会欢迎因成城入学事件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的吴稚晖。张园集会参加者达百余人，会长蔡元培亲赴日本将吴接回。会上"吴君登台演说，备述颠末，激昂慷慨，淋漓尽致。述及中央政府腐败，国权丧失与学生反对之故，则令人怒发冲冠，有为之泪下者。述及公使语之荒谬，又令人转怒为笑。演毕下台，众人鼓掌，掌声如雷震耳。"后又在张园安恺第开协助亚东游学会，戢元丞提议派人赴日协商，将保送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权力由公使转归教育会，叶澜则主张自办学堂以教子弟。会后各人分头办理，均未实现。"教育会因学生未有要领，暂缓秋间大会。"[62]苦心经营，"至其秋冬之际而组织乃粗备。"[63]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力争站稳脚跟，再谋打开局面，但也不放过表明政见的机会。6月间上海进步人士集会悼念原中国议会书记邱震、吴孟班夫妇，蔡元培、章太炎、王慕陶、叶瀚、汪德渊、蒋智由、蒯寿枢、王季同等敬献挽联，向这对"戊戌党锢以后大呼政治革命，支那奴隶之国创闻男女平权"[64]的革新伉俪表示怀念。

1902年11月—1903年7月为全盛期。上海南洋公学风潮骤起，教育会应退学生公请，于张园召开特别会，专议协助退学生建立共和学校之方法，由各会员认助开办费若干及月费6成，并义务担任教员，组成爱国学社。"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65]从此教育会的活动影响一日千里，蒸蒸日上，改组《苏报》为机关刊物，热情鼓动学潮；发起拒法抗俄运动，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吸收全体爱国学社学生入会，力量陡增；创办印刷社，编译出版各种东西方社会自然科学著作以及反清革命书籍；连续在张园等处大开演说会，鼓吹革命。一时间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热点。4月26日春季大会盛

况空前，到会者有会员60余人，旁听者百余人及爱国、务本、自立三女校学生，爱国学社学生则“戎服劲装，列队齐行”。为便于筹款，以应付日益增多的各项事业开销，改选黄宗仰为会长，[66]蔡元培、吴稚晖、王小徐、贝季美、穆抒斋、蒋维乔、陈范、吴仲旗、吴丹初、汪穗澜、蒋智由、裘剑岑、敖梦姜、虞和钦、余桐伯等11人任评议员，吴稚晖、蒋维乔、王小徐、敖梦姜等4人兼任监察员。记者不禁赞道：“夫中国自戊戌而后，所立之会，指不胜屈，倏起倏灭，忽合忽离，从未有秩然不紊，历时长久者。惟教育会之寿命独长，所办诸事尤有条理。而自此次大会后，阅历有得益加善完，可无待言。吾为教育会前途贺，吾尤为中国前途贺也。”[67]然而，兴旺中潜伏着危机。一方面，清政府对教育会的活动感到严重不安，阴谋压制破坏；另一方面，意气之争导致教育会内部矛盾激化，乌云笼罩，接踵而来的爱国学社独立和《苏报》案风潮，使教育会蒙受巨大损失，声势顿落。

1903年7月—1904年4月为恢复期。《苏报》案后，“爱国学生星散，教育会几于消灭”，爱国女校成为硕果仅存的事业。苦苦支撑，“教育会之命脉不绝如线”[68]。几次开会，到者不过10人。在恶劣的环境下，残存的会员凭着坚毅精神与勇气，设法逐渐恢复并加强了革命活动，使“教育会虽不能如上半年之公开鼓吹革命，然内地之运动革命者，皆以教育会及爱国女学校为秘密接洽之机关。”[69]张继等人又与从教育会分离出去的章士钊、何梅士等发刊《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动反清革命，时称“《苏报》第二”。年底，蔡元培等发起拒俄同志会，创刊《俄事警闻》，“当时签名与会者虽及二百人，其发原力则仍然本会一部会员也。甲辰正月，复经同志会会员之决议，改《警闻》为《警钟》；又以时局日非，对俄二字不足为吾人唯一之责任，特于正月二十七

日开会提议，又经同志会会员之赞成，改名争存会。”[70]同时积极筹备暗杀活动。蒋维乔站在温和派立场上，称这一阶段为中衰期，未免有些片面。教育会的公开活动虽然缺少生气，但革命活动却不断发展，并推动整个教育会事业逐步走向中兴。

1904年5月—1906年秋为中兴期。1904年5月1日，教育会召开春季大会，重举蔡元培为会长。刘光汉、蒋维乔等人分别提出动议，因争存会与教育会宗旨相近，其“要素会员，亦以教育会会员占其多数”，“何必为此名异实同之事业，使本会又因力分而见弱，从其以脞本部之事务哉?”要求将争存会归并于教育会，“凡签名争存会而未签名教育会者，皆得为教育会会员”，不愿者自请出会，“扩张教育会之范围，即以实达争存之目的”。或者“解散争存会，速从事本会事业”。[71]议案虽未通过，但新入会者十余人，并先期在4月28日的评议会上将仪器馆、镜今书局、《中国白话报》等正式收归实业部，认《警钟日报》为机关报。5月2日，再开评议会，“议定委任书记、会计及各地分会联络事。”蒋维乔见会务重现生机，不禁欣然道：“可为教育会之中兴，较之去年大不同。”[72]由于温和派正式要求取消秘密宗旨，激烈派另谋组织团体，进行秘密活动。6月9日，何海樵由东京抵沪，联络蔡元培、钟宪鬯等人参加暗杀团，以爱国女校为掩护，进行训练筹备。钟宪鬯精于化学，利用科学仪器馆名义购买器械药品。[73]后来激进会员又组织光复会，并陆续加入同盟会。教育会还公开为邹容殓葬，开会追悼，立碑纪念，迎送章太炎出狱赴日，表示对殖民当局和清政府的抗议，伸张了正义。可惜教育会的各项事业又相继遭到破坏。1905年3月，《警钟日报》因抨击德国密谋经营山东，被官厅封禁；万福华事件使暗杀活动受阻，爱国女校则因内讧陷于停顿。中兴气氛里已渐呈衰败之象。

1906年秋至1908年冬为结束期。1906年秋，蔡元培离沪北上，爱国女校"渐渐脱离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终因经济亏欠，为新沙逊洋行查封抵卖。[74]这时会中激烈派已将重心移到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上，有的深入下层，有的避地东京，"教育会已无形解散，在沪会员不过数人，不复能开会。"[75]随着同盟会事业的渐次展开，中国教育会完成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使命。而会中的温和派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继续坚持以合法活动为唯一形式，在这方面的影响又被立宪派的声势所压倒，这样，教育会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中国教育会虽历时仅6年，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辛亥时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如拒俄运动、学界风潮、军国民教育会、《苏报》案、与保皇派论战、华兴会起义、万福华事件、光复会、吴樾刺杀五大臣等等，几乎都与教育会员有直接关系。正因为这样，尽管它以合法名义存身租界，仍一再遭到清政府和殖民当局的压制破坏。

中国教育会的革命宣传，打破了梁启超垄断趋新舆论和国内新知识界精神世界的局面，青年学子不必再从梁启超那里曲折地汲取革命动力，而是直接在民主共和、排满革命言论的鼓动下踏上反清道路，从而把政潮主流引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1902年以前，兴中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团体，虽然它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报》（包括日报和旬报），但在国内的发行范围与数量有限。直到1904年，《中国日报》的国内发行点除广东外，仅在厦门、福州、上海、南昌、天津、北京、胶州、汉口等地设立少数代销处。[76]据杭州、南京、武昌、镇江、扬州、常熟、泰州、衢州、海盐、埭溪等城镇的不完全统计，所订报刊近60种，万余份，却没

有一份《中国报》。[77]而中国教育会所属各报刊的代派点少则30余处，多达80余处，不仅遍布南北各大都市，而且深入中小城镇。

在舆论宣传方面，尽管《中国报》不时也有精彩言论，兴中会的确显得人才不足，尤其是缺乏学贯中西的理论头脑和动人心魄的生花妙笔。相比之下，梁启超的影响就大占上风。他不仅曾以办《时务报》、《湘报》给知识界留下震聋发聩的快言利论，而且以《清议报》酣畅淋漓的抨击和《新民丛报》精辟独到的政论时评激起新知识群、特别是国内热血青年的风靡崇拜。他们身处逆境，又正当发蒙，无缘也无力与大千世界交流沟通，只得开怀畅饮由梁启超加工的西方近代思想的清泉，以满足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而不能像游历士绅或留日学生那样，亲历其境，接触原本，从而察觉梁启超的肤浅驳杂。诚然，这些从睡梦中被梁启超一掌拍醒的青年往往一跃登上革命战车，但这种曲折转换毕竟带有副作用，朦胧中吞下的保皇杂质和种种错解误释，或迟或早会恶性发作。当时处在困境中的兴中会既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与必要。而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则有助于加速实现这一转折。由教育会员编辑的《选报》，从1902年起，不仅在国内发表独家革命言论，而且连续转载《中国报》的社论时评。先后由教育会员主办或参与编辑的《童子世界》、《少年中国报》、《大陆》、《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二十世纪大舞台》、《女子世界》等刊物，特别是一脉相承的《苏报》、《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旗帜鲜明地进行反清革命宣传，言词激烈，见解深邃，分析精辟，俨然成为国内革命舆论的中心，不仅取得与《新民丛报》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往往占有优势。许多有志之士在"党派纷纭不强同，或谭暴烈或从

容"的风云变幻中,"洗耳偏来听《警钟》"[78]。附属于教育会的几个印书社、图书局,咸为国内出版发行革命书刊的重要基地。如镜今书局的"胆子比别个书局大些,那般做邪说的新党,往往做了邪说,没处寄卖,都想在镜今书局寄售。"[79]会员们还在上海等地举行演说会,鼓吹爱国革命。特别是1903年2月至4月在张园安垲第的几次演说会,影响尤为广泛。如3月15日第二次演说会,因天雨途淖,"到会初不过三百多人,后竟不下七百余人。"吴稚晖首先登台,表明:"此演说会正为四万万之同胞大呼救命,四万万同胞其各救其命,亦互救其命可乎?""教育会会员不过作一发起人而已,中国人多有一分,人人可听,人人可演。"接着蒋维乔、穆湘瑶、徐宝姒、蒋增炜、敖梦姜、马叙伦、沈步洲、林森、金松岑、徐镜湘、董竹香、华铭初、马君武、王蕴章、祝尔康、周开基、朱文驷、秦景阳、许原尹、蔡元培、陈春生、何海樵等相继演说,鼓吹军国民主义和国民自立,指陈欧洲革命三大原因:"一争多数人之幸福,二纳税如保险费,三民族主义。"当有来宾表示:"于激烈改革尤具其难其慎之意"时,吴稚晖起身反驳,"激昂奋迅,四座感动。"[80]演讲到"中国历来受外族淫杀之惨祸",以及"地球上将来必无一弱劣之种可厕足其间,诸君其谓中国人为佳种乎? 为劣种乎?"听众"心不知其何痛,鼻不知其何酸,眼不知其何热,而此两行亡国之泪,竟欲不滴其不能。斜睨旁座,亦复如是,遍视全堂,均表同情。"人们听罢演说,"心乱如麻,内热如沸,恐惧忧喜,百念交集。"[81]有人评论道:"吴稚晖的演说,是有名的,连泥水小工都听得来。""今年三四月间,吴稚晖在张园开许多的会,我也听过几次,才晓得革命就是这么一件事体。"[82]

除正面宣传外,教育会员还率先公开批判保皇派,开辟了革

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国内战线。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擂战鼓,邹容的《革命军》又吹号角,会员们纷纷披挂上阵,呐喊助威。"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狼欲遮道为虏伥,麟起阙之暴其肠。"[83]"教忠我被尼山误,保教人随南海狂。几见房州衣带诏,暗中传付骆宾王。""娶妻当取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84]"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保皇正龙头,顿使吃一惊,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85]"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脑拜卢骚。"[86]一篇篇诗章,就是刺向保皇派的一柄柄利刃。中国教育会的革命宣传,由新知识界中心带的成名人物执笔政,凭借上海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思潮向以孙中山为旗帜的革命思潮过渡转换起了致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在香港与保皇派的《商报》进行激战的《中国日报》,曾多次转载教育会报刊的政论,以加强攻击火力。没有中国教育会的努力,舆论界的力量对比很难在短短几年间发生捩转,形成共和革命高歌猛进的大好局面。

中国教育会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广泛传播自由民主平权意识和科学新知,为思想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根本推翻皇权专制制度,因而不仅需要以舆论准备呼唤狂飙,更需要清扫与旧制度相适应的观念意识。维新派在戊戌前后进行的民权宣传,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但存在着窄和浅的局限。而且他们的尊皇保皇主张实际上将专制权威置于不可动摇的地位,从而最终否定了民权。真龙天子不倒,百姓就不能从礼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由臣民蜕变为国民,思想启蒙就难以真正奏效。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以确定革命的方式、道路和目的为

重点，集中于政治革命方面，是舆论准备的核心。而正面宣传民权民主思想与各种近代观念意识，批判专制蒙昧主义，则是更具重要性的基础建设，更能体现社会革命的内涵。不首先解脱专制枷锁的禁锢，就谈不上将共和观念引入人心。中国教育会奉行广义教育，正如蔡元培所说："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87]为此，该会专设社会教育部，"主提倡政论，改良风俗，凡书报演说等事隶之。"[88]通过兴学办报，出书演说，广泛传播近代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批判专制皇权和鬼神迷信。会员们注意到，"报章能激发识字之人，演说则能激发不识字之人"，为扩大影响，"拟推广演说。"[89]其演说内容包括评说时政大事，鼓吹自立自强，推动发展商务，革除陋习劣俗，改良家族宗教等。在科学宣传方面。该会附设科学仪器馆，举办《科学世界》杂志，以"开通风气，使吾国民皆有科学之智识"[90]为宗旨。发刊之日，教育会员钟宪鬯、虞含章、林森等纷纷发表祝辞，指明科学与发展实业、救亡振兴的内在联系，批评新学之士"闻卢骚、达尔文之学而遗其自然科学，是失实也。"放言空论非旦不能图种姓之进步，反而会滋生流弊。世界竞争，形式"要莫不待助于理科。是故理科者，实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炸弹也。"[91]期待有朝一日"伟大国民产出于我理科之窟宅"。[92]教育会的政治宣传把舆论准备推进到以民主共和为核心的新高度，开创了继维新派民权宣传后中国民主思想传播的新阶段。此外，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社会主义、军国民主义的思潮，大都可以从教育会找到源头脉络。要认识和评价这些思潮的内容作用，不能不对教育会的历史、会员的思想及其宣传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教育会积极参加国内的合法斗争，有力地冲击和暴露

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激起普遍的反清情绪。这突出表现在鼓动支持学界风潮以及发动领导拒俄运动上。南洋公学风潮发生后，教育会立即致函祝贺，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的行动，抨击专制政府对学生施以酷虐，诱以利禄，“自杀其群”，“究其所极，不导吾四万万人相率入于黑暗地狱不止也。”并指出学生“原为成就其学术以达其志愿，为异日救国之材，非甘学为奴隶之学，为异日干禄之用也明矣，故以一人受辱，而全班告退，此即诸君牺牲个人之私利而为爱群之公德也。”肯定学生反抗的正义性，称赞他们“今一人受奴辱，诸君为学生辄能抵抗腐败之总办；国民受奴辱，诸君为国民必能抵抗顽固之政府；举国受奴辱，诸君办外交必能抵抗彼强大之列国。”建议退学生“亟图所以自主自强之道，乐群奋兴，通力合作，速创学堂，苦身焦思，励志力学，以底于成。”[93]在张园特别会上，教育会员又再次充分肯定学生的举动，“为不肯受龌龊教习、糊涂总办之压制，抛弃其安居修业之利益而漂流奔走，不少悔折，是真有独立自尊之风。推其原因，为一二人受压制而全学争之，牺牲个人之利益于同学，是真舍己为群之风，所以诸君真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与本会会员理想相合无间。”[94]这些言论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对退学风潮率先定下肯定的基调，使褒贬不一的舆论逐渐变向，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们的斗志。在教育会大力协助下建立起来的爱国学社，成为世人敬重的“国民表率”[95]，吸引了各地许多退学生。所以南洋公学退学生称“中国教育会为我国学界之中心点。”[96]

1903 年 2 月，《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报导各地学界斗争，抨击学堂的专制腐败，鼓动学生退学罢课，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他们视之为自己的舆论阵地，纷纷投函揭露所在学堂的黑暗内幕，以求伸张正义。在其影响下，一时间学潮风起

云涌。顽固势力对此又惊又恨，咒骂该专栏“莠言乱政，在可杀之例！”[97]《苏报》案后，虽然舆论界对学界风潮的鼓动渐趋消沉，但《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仍辟有专栏，大量刊发有关学潮的报导、通信和评论，继续支持声援学生的斗争。拒俄运动中，中国教育会自始至终起着积极引导作用。早在 1901 年运动开始时，后来成为教育会骨干的进步人士就是热情的鼓动者和参加者。1903 年斗争高潮来临之际，教育会员斗志更盛，多次集会演说，发动学生、绅商和各界民众，组织国民公会和军国民教育会。蔡元培等人亦去掉发辫，“与学生早晚同习兵操。”[98]章太炎甚至主张：“全学社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99]他们与留学界相呼应，把运动急剧推向高潮。以后，蔡元培等发刊《俄事警闻》，创办对俄同志会，继续引导运动走向深入。1904 年 1 月，蔡元培、蒯寿枢、蒋维乔等人还散布传单，策动上海钱业抵制俄资道胜银票。这些斗争破坏了专制统治秩序，推动革命风潮广泛兴起，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派的反清活动。

教育会员对于当时流行于国内的地方自治、军国民教育以及科学、实业救国等思潮与活动，不是简单否定或随意附和，而是在积极支持、热情赞助的同时，加以革命性解释和引导，使社会改造与反清革命相辅相成。会员们认为，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而广义教育之中，有军国民之教育，有实业之教育，有普通国民之教育。”[100]1903 年 3 月，蔡元培、吴稚晖、陈范、蒋维乔等组成四合会，专办体育部，并与何海樵等开办体育会。[101]是年 3 月 15 日第二次张园演说会的主题就是“设体育部以练国民躯干”，“以体育为演说之主义。”会后正式成立体育部，签名者达百余人。[102]由何海樵任会长，日集同志数十人练习体操，准备逐渐推广，以造就军国民。后来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也在同一操场

训练。1904年6月中国教育会第三次修订章程时，又增设军事教育部，“凡体育、武备学校等隶之。”教育会同里支部则组织军事讲习会。[103]该会还设立实业部，准备在“中国区要之地，量地方之情状，以兴起财源，开设工厂公司，出版印刷所之类。”[104]因资金所限，未能如愿，后改称实业教育部。教育会在上述活动中并没有模糊自己的政治观念。拒俄运动中，会员们不仅与上海的保皇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还抵制了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上层路线，对留日学界派遣运动员归国运动清政府提出严厉批评。众所周知，拒俄运动加速了中国知识界的革命化进程，但仅仅看到清政府压制的反激力显然是不全面的。拒俄运动所以能将一批激进青年推上革命道路，除了这些青年本身已具备一些革命因素外，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具有革命倾向的团体与个人从内部施加影响和引导。他们挫败了保皇派分子阻止运动进一步深入的企图，促使运动冲破“合法”的樊篱。而中国教育会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们的成功经验，革命党本应善加总结汲取。遗憾的是，由于政见偏激，决策失误，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后来国内合法斗争的领导权为立宪派所独占，革命派只能施加客观影响。尽管随着形势的发展，内在激进力量仍推动合法斗争朝着革命的方向行进，最终汇入反清大潮，但与革命派的关系毕竟疏远了一层。结果，起义爆发，反而把立宪派抬上浪峰，令许多革命志士抱恨终天。

中国教育会促进了新知识群的组织发展。在迭经风潮之后，“中国教育会的会员愈加老练，把大团体散了，化成无数小团体，各人分头办事”。[105]在江浙一带的常熟、常州、绍兴、吴江、海盐、武阳、无锡等地，先后建立了教育会、演说会、学生会、体育会、音乐会等地方分支机构，并由会员分头组建了一批外围团

体,如东亚谈话会、争存会等,总计有几十个之多。它们一面借组织联系之便,从上海总会获得各种新知信息,一面向封闭的基层社会传输推进新事业,特别是将基层社会散布各处的开明人士聚合组织起来,形成一股趋新势力,教育和影响后生学子及一般民众,成为都市变化传导于乡村的社会载体,促成城乡社会变迁的呼应共震。这对国内知识界影响极大。进步人士纷纷冲破党禁,建立组织,一时间各地团体蜂起。从前乡村社会的童生士子"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及今日而敦群讲学,其庶几廓清学究之余毒,以为二十世纪之新人物"。[106]地方新旧势力的冲突因此而日趋频繁激烈,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从都市蔓延到中小城镇及乡村。由个人独行到组织活动,大大增强了趋新势力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能量,使数量少的先天不足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有助于提高求新行为的持续力,扩大社会影响。

中国教育会培养和聚集了一批革命骨干,直接为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输送了力量。一部分会员暗中进行的暗杀和起义准备,不仅对后来革命派的暗杀活动影响极大,也为东南一带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1904 年底,东京的暗杀团、两湖华兴会的后援爱国协会、上海的争存会和吴春阳所办青年学社,都把机构设在教育会本部所在地新闸余庆里,而且几方面活动都有教育会员参加,无形中成为革命党人密谋大举起义的联络协调机关。这就促使长江中下游成为武装革命活动的新中心区,为把革命推向全国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教育会在开创与推动近代女权运动方面占据显著地位。该会成立之初,就把男女平权作为重要目标,其章程特意标明:"教育中国男女青年"。会员们的有关宣传,不仅鼓动女权勃兴,而且构成其中激进的一翼。陈范之女陈撷芬倡办《女学报》,

“欲一药数千载之痼疾，振廿世纪之文明”[107]，“畅滥海外，洵属培女德以强种族之盛事也。”有人赋诗赞道：“此是天孙锦，机丝织报章。国闻传万里，民史具三长。闺阁同声集，文明竞胜场。支那奇女子，灵气萃潇湘。”[108]金松岑还撰写了《女界钟》一书，鼓吹女权。最为激进的是由会员丁芝孙、丁初我、金松岑等人主办的《女子世界》杂志，倡兴“女界革命军”，大声疾呼：“革命！革命！家庭先革命！”[109]鼓动妇女“脱男子的羁绊，复女界的权利。”[110]他们公开宣称：“欲再造吾中国，必自改造新世界始，改造新世界，必自改造女子新世界始。”[111]并进而把女权与政治革命相联系，指出：“政治之革命由君主法律直接之压制而起，女子家庭之革命由君主法律间接之压制而起，其原因同。”[112]这就触动了宗法思想与专制制度的根本，揭示了女权衰微的本质，将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引向反对君主专制。

与宣传上的主角地位相适应，教育会还以行动切实推进女权运动。1902 年 6 月，该会热情支持会员亲属黄世振、林宗素、陈撷芬、吴亚男等发起成立上海女学会。该学会 1901 年曾由吴孟班创议，“草议章程，应者盖寡，久而未遂。”[113]首批会员共 20 人，为沈和卿、章浣香、蒋畹芳、王慕青、丁明玉、薛锦琴、经玉娟、金兰贞、盛晴英、钟佩萸、林有蓁、赵愿孙、顾素芬、吴亚男、吴弱男、陈君素、林宗素、陈撷芬、陈小庄、黄世振。开会之日，蔡元培、林獬、蒋智由、陈范、吴保初等人到会演讲，称：“古时中国以女子专属之于家，而以为于国无与也者，此误解也。”“欲造此完全之中国，非独当责之凡为男子之人，尤当责之女子。”“有女学而后有完全之人，而后有完全之家，而后有完全之国。故救起中国，其权之握于女子者大也。”他们指出：“中国扶阳抑阴锢习，积非成是，深入脑筋，无异美人受英辖时羁轭牢不可破，一旦欲恢

复三代坤教规模，建树男女平等特帜，非巾帼中人有华盛顿之壮志不可肇端伊始。"[114]将女学会成立比作华盛顿之于美国独立战争。此外，林獬在福建创建了闽中女学会，教育会同里支部也兴办了女子俱乐部。教育会组建爱国女校，实际上还早于爱国学社，1902 年 9 月 2 日《选报》第 27 期已经刊出《爱国女学校开办简章》，确定"本校以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旨"。教习皆义务任课。普通科"专教汉文通顺女子，授以历史、地理、数学、体操、伦理、卫生、化学、意文、英文、日文诸科目"。星期六开设特别科，教授高等学科，如国家学、人物传记、哲理、高等历史及地理、时事评论等。每月开演说会一次，"请名誉赞成员及中外硕学家到校演说。"会长蔡元培亲自兼任校长，并以此为秘密活动基地。当时人称赞女校道："果能渐推渐广，革除旧习，努力维新，纳此二万万女子于文明之中，而使能操其平等自由之权利，各竭才智以济国家之用，则同心御侮而列强无敢欺凌，激励全国之精神，庶一雪四万万同胞之耻辱，而挽此千钧一发之危局矣。"[115]1903 年底，蔡元培等人还协助上海宗孟女学堂的郑素伊等组织对俄同志女会。不久，该会改名慈航社，订立活动办法 9 条，"其中第二条为访求侠客，实行暗杀。并声明曰：'如有应募一试者，不论成败，素伊愿倾家百万以酬之。'"[116]次年 4 月，慈航社发布《拟刊〈成仁录〉征文启》，欲将"二百六十年来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者"，"集具事迹，编辑一书，名之曰《成仁录》，以表彰潜德，以阐发幽光，以默慰毅魄贞魂于天上。"所列名单内有唐才常、黎科、林圭、郑保丞、傅慈祥、史坚如、贺金声、沈荩等数十人。并且发布广告："凡志士遭卖国误国诸贼陷害有性命出入者，可速向本社述明，本社必为之设法保护，或送往外洋，或寄匿密友处，务使其脱离苦海，竟登彼岸而后

已。”[117]这显然与教育会激烈派的宗旨一脉相承。

四 内部矛盾

中国教育会是凭借上海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生存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中外交汇的中心点，又是国内新知识群的汇萃之所，外部信息灵，内向辐射广。但也由此带来成员背景各异，思想驳杂，性情相悖等不利因素。在租界特异环境和清末专制统治秩序调整松动的情况下，个人活力得以发挥，相互磨擦也因而加剧。教育会几起几伏，迭遭顿挫，清廷与殖民当局的镇压破坏固为主因，而教育会本身的弊病，则是从内部滋生的瓦解因素。

教育会最大的隐患之一，就是内部两派分歧始终未得到合理调整与解决，激烈派希望借此开展革命活动，温和派则企图变为纯粹的教育机构。双方没有妥筹良策，协调步骤，而是回避矛盾，各行其是。结果，合法与秘密两方面事业不能始终并行不悖，两派不断地试图使各自的主张成为唯一宗旨，否则就从事组织外的小团体活动，或是同时加入其他团体。这样虽然避免了正面冲突，但人力物力资源难以公平分配，组织建设起伏动荡，组织功能无法发挥，内部矛盾冲突不断爆发。为此，教育会很难提出一套政纲策略，广泛吸引民众，从而突破教育的外壳，真正成为政治核心与旗帜。所以，尽管它力图发展为众望所归的政治团体，最终也只能把革命分子迫切要求组建革命大团体的潮流引导到同盟会的旗帜之下，而自身则在共和革命的凯歌进行中悄然消逝。

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严重，成为教育会的一大弊端。近代

中国的民主宣传重自由而轻权限，已经流弊匪浅。教育会激烈派中的一些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为害更重。他们鼓吹：“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为之事，吾皆得而为之，而人断不能禁止吾压制吾也。”[118]从反对专制的角度看，这在当时确有积极意义。但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这股思潮泛滥的恶果之一，就是1903年6月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分裂。爱国学社成立后，学生大都加入教育会，双方在组织和财政上名义有别，实际上难分彼此。大家通力合作，使会社事业日新月异，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暂时的成功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部分学生开始向教育会闹独立。他们借口财务原因，“揭示戒诸生勿往来中国教育会治事室”[119]，并拒绝出席教育会例会。在5月24日教育会月会上，有人偶尔提到“教育会立爱国学社”，“学社即教育会之一部分”[120]，学生趁机发难，揭出《爱国学社之主人翁》一文，以“爱国学社与教育会者，平等之二团体”为名，挑起会社主体之争，还刊登广告，严分会社关系。会长黄宗仰从中多方调解，但章太炎与吴稚晖却因素有积怨而各执一端，吴表同情于社员，章则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并指责“学生踞学社，不务储能为国用，日夕相与论议结党援以与本会抗，学社之不复为本会有明甚。”提议：“以书警之，能幡然悟则善矣，不然并削诸学生籍。”[121]黄宗仰、蔡元培等调解无效，6月13日，教育会为此特别召开评议会。蔡元培鉴于戊戌梁启超与汪康年争夺《时务报》两败俱伤，徒授反对党以口实，主张听学社独立。黄宗仰表示赞同。6月16日，蔡元培辞职北上青岛。三天后，爱国学社发表《敬谢教育会》一文，宣告独立。接着，黄宗仰公开致函《贺爱国学社之独立》，承认既成事实，咽下涩果。这股革命激流中泛起的浊浪，引起舆论界诸多非议，不少人对学生任意妄

为的"独立自由"精神表示怀疑和不满。当时清政府正与租界当局相勾结，密锣紧鼓地策划对上海革命势力进行镇压，分裂使得爱国学社和教育会两败俱伤，失去应变能力，结果让统治者阴谋得逞，学社瓦解，教育会风雨飘摇，教训极为惨痛。

中国是乡土气息十分浓重的社会，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中，移民的血缘关系已在脱离故土时破碎，也仍然由地缘关系所取代，全体市民分为大大小小21个商帮，由不同的会馆公所组织控制。[122]生长于其中的新知识人士也难免受此影响，教育会员的宗派行为有时就由地缘形成。1903年10月，王慕陶、刘成禺等人因《繁华报》所登国民丛书社联语有伤书社名誉，与《国民日日报》主笔连孟青发生冲突，牵连章陶严。[123]经章士钊调解无效，双方遂在报刊上大启战端，互相攻讦。林獬兄妹亦卷入战团，火上浇油，使冲突不断升级。戢元丞等联合湖北在沪同人公告为王、刘二人辩诬，冲突进一步扩大，教育会不得不开会干预。会上林獬、张继"跋扈专横，以意气相凌压"，王慕陶一气之下，愤然脱会。他是教育会的创始人之一，"曾尽国民事业，两岁在狱"[124]，在与爱国学社分裂后的最困难时期，和同志"收合余烬"，以图"重行组织"。出会之后，他余怒未消，痛责会中一些人"鬼气恹恹，月复一月，不思振作。"这次冲突给教育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不少会员对此类无谓之争极为反感，所以"当召集时，多半未到。"[125]更为严重的是，上海当时已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点，革命阵营一再发生内讧，大大损害了其声誉形象。

在内部冲突中，会员之间还屡次发生大打出手的野蛮举动，如徐敬吾与何海樵、徐敬吾与蒋维乔、章陶严与章太炎、吴稚晖与章太炎等。这种行为加剧和扩大了会员的矛盾裂痕，并留下

很深的积怨。如蒋维乔被殴后于日记中写道："此仇不可忘，余此生不能报，余子余孙不可忘之！"[126]甚至因此心灰意懒，不愿接办爱国女校。直到后来他撰写《中国教育会之回忆》时，仍不忘旧恶，对徐敬吾极力贬抑。教育会的内弊，不仅直接危害自身的事业和组织，也给以后的革命团体造成隐患。一些人加入同盟会后，继续搞独立闹分裂，成为导致同盟会涣散的重要原因。

从联系的环节考察，是认识事物的重要途径。教育会以公开和秘密两面出现，刚好适应了处于过渡状态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需求。它在组织上推动新式社团由区域扩展到全国性，思想上促使维新春雨化作革命惊雷，行动上带动长江中下游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在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形成新的革命基地，并将反清浪潮引向内地，这三方面的作用，都明显表现出过渡特征。随着形势的发展，教育会越来越不能容纳青年志士的革命激情，而 1906 年学部颁布《教育会章程》，对原有教育会组织在合法化的同时，"整齐而划一之"，禁止从事教育以外的事业，使其公开活动也大受限制。中国教育会在两方面的中心地位分别为同盟会和立宪派士绅的社团所取代，政治舞台上的作用逐渐淡出。这样，中国教育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就成为衡量近代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及其政治倾向变化发展的重要尺度，反映出中国社会在清末短短几年间所经历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变动。

注 释

[1] 蔡元培：《杂记》；蒋维乔《鹪居日记》壬寅三月三十日记："廿六日，偕钟宪鬯先生、丁君益孙、黄君子彦同舟渡江至沪，赴中国教育会。舟小风大，至中流浪高丈余，振动殊甚。四人促膝长谈，言笑自若，志殊壮甚。既渡江而无轮舟，已不及与会，遂反。"

[2] 《告中国教育会》,《俄事警闻》,1903 年 12 月 22 日。

[3] 《文明介绍》,《中国白话报》,第 7 期,1904 年 3 月 17 日。

[4] 《革命逸史》,初集,第 115—116 页。

[5]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 84 页。

[6] 《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东方杂志》,第 33 卷,第 1 期。

[7] 《鷁居日记》,甲辰二月十八日。

[8] 《争存会变更议案》,《警钟日报》,1904 年 4 月 7 日。

[9] 《中国教育会章程》,《选报》,第 21 期,1902 年 7 月 5 日。

[10]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 35 期,1902 年 11 月 20 日。

[11] 《教育会之公函》,《新民丛报》,第 27 号,1903 年 3 月 12 日。

[12]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 35 期,1902 年 11 月 20 日。

[13] 蔡元培:《爱国学社开校祝辞》,《选报》,第 35 期。

[14]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选报》,第 35 期。以上两文为各种文集、年谱、传记失载。

[15] 仁和马世杰轶群:《与陈君逸庵论杭州宜兴教育会书》,《新世界学报》,第 12 期,1903 年 3 月 13 日。

[16]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 98 页。

[17] 《鷁居日记》,甲辰二月十八日。

[18] 《鷁居日记》,壬寅四月廿三日、正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日,癸卯十二月十四日。

[19] 《论南京陆师学堂退学事》,《苏报》,1903 年 4 月 13 日。

[20] 1898 年 8 月 1 日《叶瀚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 2600 页。

[21]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 1 章。

[22] 1900 年 6 月 18 日《周善培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6 页。

[23] 天仇:《庞青城事略》,《民权报》,1912 年 5 月 8 日。

[24] 吴稚晖:《上海〈苏报〉案纪事》,《辛亥革命》(一),第 405 页。

[25]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96—97页。

[26]　《鷗居日记》,甲辰二月十八日。

[27]　乌目山僧:《赠任公》,《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9月16日。

[28]　梁启超:《忠告香港〈中国日报〉及其日本访事员》,《新民丛报》,第53号,1904年9月24日。

[29]　《封禁学会之风潮》,《复报》,第2期。

[30]　《太镇学会之现状》,《复报》,第3期。

[31]　《封禁学会之风潮》,《复报》,第2期。

[32]　《中国教育会章程》,《选报》,第21期,1902年7月5日。

[33]　《中国教育会第三次改订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6月11日。

[34]　《蔡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苏报》,1903年3月12日。

[35]　《论立会之理由》,《警钟日报》,1904年3月29日;《文明介绍》,《中国白话报》,第7期。

[36]　《湖北在沪学生代王刘二君公告》,《大陆》,第12号,1903年10月28日。

[37]　《宋教仁日记》,第13页。

[38]　《玫瑰花》,《中国白话报》,第2期,1903年12月14日。

[39]　《中国白话报》,第2期,第10期。

[40]　《上海出洋游学生招待会简明章程》,《选报》,第19期,1902年6月16日。

[41]　《纪协助东亚游学会》,《选报》,第27期,1902年9月2日。

[42]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43]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0页。

[4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45]　《革命逸史》,初集,第136页。

[46]　章士钊:《孙逸仙》,《辛亥革命》(一),第100页;中国少年之少

年:《中国灭亡小史》,《复报》,第8期;《〈三十三年落花梦〉告白》,《江苏》第7期,1903年10月20日。

[47] 《江苏教育会试办总章》,《警钟日报》,1904年8月5日。

[48] 《江西教育会起点之远因及现状》,《国民日日报汇编》。

[49] 《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

[50] 《江西之进步》,《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3日。

[51] 《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8月6日。

[52] 书瘘:《教育会为民团之基础》,《萃新报》,第1期,1904年6月27日。

[53] 《与陈君逸庵论杭州宜兴教育会书》,《新世界学报》,第12期。

[54] 《浙江教育会简章》,《新世界学报》,第15期,1903年4月27日。

[55] 《教育研究公所》,《警钟日报》,1904年5月16日。

[56] 《中国教育会纪事》,《警钟日报》,1904年6月24日。

[57] 《上海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之冲突》,《浙江潮》,第6期,1903年8月12日。

[58] 后迁至虹口。见《中国教育会第三次大会》,《警钟日报》,1904年5月2日。

[59] 后改为会长1人,评议员11人,检查2人,监察2人,会计2人,书记2人,内外庶务各1人,另由评议员公推副会长1人。1904年又设干事长之职。《中国教育会第三次大会》,《警钟日报》,1904年5月2日。

[60] 《中国教育会章程》,《选报》,第21期;《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订章程草稿》,《苏报》,1903年5月15日。

[61]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84页。

[62] 《鷗居日记》,壬寅七月初十日,九月十二日。

[63] 《教育会之公函》,《新民丛报》,第27号,1903年3月12日。

[64] 《大公报》,1902年7月4日。邱震,字公恪,又字宗华,江苏元

和人(《日本留学生调查录》,《选报》第10期,1902年3月20日)。1900年中国议会成立时任书记。“平日愤中国之不振,病在无学,发奋研究东西学术。”1901年冬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讲求兵法。不久,因病退学,归养沪上,梁启超亲送登轮,未及一月而卒,年仅24岁。梁启超称其“固夙以为国流血自祝,吾亦冀其为铁血派中一伟人也”。(《饮冰室诗话》,第17—18页)其妻吴孟班,“女中杰也,有大志,娴文学,通西语。”肄业于上海中西女塾。曾倡设女学会,“慨然以提倡女子教育为己任。”(《追悼志士》,《大公报》,1902年7月2日)辛丑腊月,染时疫而卒,年仅18岁。报载:“闻孟班尝有身,自坠之。公恪大骇。孟班曰:‘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皆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道听途说》,《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10日)

[65]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

[66] 因黄宗仰与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交善,后者笃信佛教,曾为教育会筹措开办费。《革命逸史》,第3集,第167页。

[67] 《记中国教育会徐园大会事》,《苏报》,1903年4月28日。

[68] 《鷗居日记》,癸卯六月十八日,甲辰二月十八日。

[69]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95页。

[70] 《争存会变更议案》,《警钟日报》,1904年4月7日。

[71] 《争存会变更议案》,《警钟日报》,1904年4月7日。

[72] 《鷗居日记》,甲辰三月十六日、十七日。

[73] 《蔡孑民先生传略》,《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第8页。

[74]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98页。爱国女校被抵卖后,仍继续开办。

[75]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98页。

[76] 《中国日报》,1904年3月5日。

[77] 参见《扬州报界之调查》,《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3日;《常熟报纸销数》,《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21日;《杭城报纸销数之调

查》,《东浙杂志》,第 4 期;其余见 1904 年 10 月至 1905 年 1 月《警钟日报》。

[78] 天梅:《访警钟社》,《警钟日报》,1904 年 7 月 7 日。

[79] 《文明介绍》,《中国白话报》,第 6 期,1904 年 3 月 1 日。

[80] 《记中国教育会第二次演说会》,《苏报》,1903 年 3 月 16 日。

[81] 敖梦姜:《演说会不可当一大酒肆》,《苏报》,1903 年 3 月 19 日。

[82] 倬人:《敬贺癸卯科乡试诸君》,《国民日日报》,1903 年 10 月 11 日。吴稚晖自称其加入教育会时还不是革命党,"直到彼时明年正月起在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东方杂志》,第 33 卷,第 1 期)

[83] 中央:《〈驳康书〉书后》,《江苏》,第 5 期,1903 年 8 月 23 日。

[84] 松岑:《陈君去病归自日本同人欢迎于任氏退思园醉归不寝感事因作》,《江苏》,第 5 期。

[85] 剑公:《章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警钟日报》,1904 年 8 月 10 日。

[86] 亚庐:《岁暮述怀》,《江苏》,第 8 期,1903 年 11 月 19 日。

[87] 《蔡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苏报》,1903 年 3 月 12 日。

[88] 《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订章程草稿》,《苏报》,1903 年 5 月 15 日。

[89] 《鷗居日记》,壬寅八月初九日。

[90] 《科学世界》,第 1 编,第 1 号,1903 年 3 月 29 日。

[91] 王本祥:《论理科与群治之关系》,《科学世界》,第 1 编,第 7 号,1903 年 9 月 21 日。

[92] 钟观光:《祝词》;林森:《发刊词》,均见《科学世界》,第 1 编,第 1 号。

[93] 教育会会员某:《致南洋公学退学诸生书》,《文言报》,第 15 号,1902 年 12 月 14 日。

[94]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

[95] 《渡美纪行诗》,《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96]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

[97] 《记浙江大学堂戴氏情形》,《苏报》,1903年4月21日。

[98] 《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8日。

[99] 《与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25页。

[100] 《争存会变更议案》,《警钟日报》,1904年4月7日。

[101] 《鹪居日记》,癸卯二月廿九日,四月三十日。

[102] 《记中国教育会第二次演说会》,《苏报》,1903年3月16日。

[103] 《警钟日报》,1904年6月11日。

[104] 《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订章程草稿》,《苏报》,1903年5月15日。

[105] 《文明介绍》,《中国白话报》,第7期。

[106] 《吴江县同里镇教育研究支部附设之青年会叙》,《苏报》,1903年3月21日。

[107] 《上海女学会演说》,《选报》第20期,1902年6月25日。

[108] 《女中豪杰》,《湖南演说通俗报》,第2期,癸卯四月。

[109] 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5月15日。

[110] 天醉生:《敬告一般女子》,《女子世界》,第1期,1903年12月30日。

[111] 初我:《〈女子世界〉颂词》,《女子世界》,第1期。

[112] 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

[113] 《上海女学会演说》,《选报》第20期。

[114] 《上海女学会演说》,《选报》第20期。

[115] 《湘乡张淑芬女士自金陵致其妹书》,《游学译编》,第2册,1902年12月14日。

[116] 《女界义侠》,《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5月15日。

［117］《警钟日报》，1904年4月18日、23日。

［118］钱瑞香：《论自由》，《童子世界》，第10号。

［119］金天翮：《蔡治民传》，《天放楼文言遗集》卷三。

［120］《纪事》，《童子世界》，第32号，1903年6月6日；俞子夷：《回忆蔡元培先生和草创时的光复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

［121］金天翮：《蔡治民传》，《天放楼文言遗集》卷三。

［122］杨荫杭：《上海商帮之大势》，《商务官报》，第12期。

［123］此事详情为：王慕陶延纳同乡张香全入国民丛书社居住，张带下女同居，为同人所责。连梦青闻知其事，偶与《世界繁华报》记者谈及。该记者揭诸报端，并误将张一人之事记为该社诸君所为。国民丛书社以此事有伤全社名誉，向《繁华报》提出质问。该报馆主李伯元表示愿来社服礼。逾时李未到，刘成禺和丛书社英文教习卢和生（英籍粤人）再往报馆询问，在报馆门口遇见卢友美人某（一说为法人），同入馆内。馆主称消息由连梦青提供，连适在座，推为章陶年嘱登。刘、卢等遂告退。后《国民日日报》载文指刘、卢率洋人假冒巡捕，借异族威吓同种。卢路遇连，以洋伞击其背。章士钊以事关《国民日日报》，且与王交善，出面调停。交涉间程泳生来晤王慕陶，以章偏袒，忿而斥之，章弗衣去。《国民日日报》社指卢殴连为王、刘所指使。林獬与王有隙，开会时据一面之词责王，激化矛盾（《上海国民之风潮》，《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17日）。

［124］《湖北在沪学生代王刘二君公告》，《大陆》，第12号。王慕陶曾参加自立会。

［125］《王侃叔致教育会书》，《大陆》，第12号。

［126］《鹪居日记》，癸卯五月二十二日。

第 7 章

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是清末新知识界中出现较早、规模影响较大的政治团体。它对此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革命团体的组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革命党人曾予以高度评价，说："此实学界民族革命团体之嚆矢。"[1]"湖南之华兴会、安徽之武毅会(按应为岳王会)、浙江之光复会，皆由是而出。"[2]"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3]的确，该会的组织、性质与活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留日学界的思维行为趋向。但由于资料的限制，如何理解上述评价，及其与史实原本间的关系，存在不少问题。1962年，金冲及、胡绳武先生曾撰文对有关史实进行考辩。70年代末，杨天石、王学庄先生又编辑了《拒俄运动》资料集，并发表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为全面、深入地研究该组织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此之前，台湾的张玉法教授和日本神户学院大学的中村哲夫教授在有关研究中也分别做过数量统计或挖掘出关键性的档案资料。这些都使最终定论成为可能。

一　产生与结局

军国民教育会组织上是由拒俄义勇队、学生军演变扩大而来，精神上则是甲午战后中外矛盾不断激化，新知识群救亡振兴热情不断高涨的产物。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传统士绅发生重大变动，从中分离出一个新的群体，它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受西学东渐影响较深的开明士绅，一是国内外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面对日益严重的亡国危机和变法自救的失败教训，目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救亡振兴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从明治维新思想家那里改头换面搬来的"军国民主义"。

"军国民主义"的概念，由日本倒幕思想家的军国观与梁启超倡导的国民观相融和演化而来。[4]1901年11月，林獬、林长民等杭州日文学堂学生主办的《译林》杂志，从第9期起连载长篇译文《军国论》，文章以欧洲近代战争为例，分析指出，战争胜负决定于综合国力，近代国家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全民皆兵。次年2月，蔡锷（署名奋翮生）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开始发表长篇连载《军国民篇》，详尽论述了在中国提出军国民主义的原因和意义。他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逾年

有长江一带之骚动，此奋发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文字之力，不亦大且速哉！昔中国罹麻木不仁之病，群医投以剧药，朽骨枯肉，乃获再苏，四肢五内之知觉力，逐日增加。然元气凋零，体血焦涸，力不支躯。""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所谓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其渊源是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全权公民军事制度和近代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它要求社会和国民生活军事化，以对内镇压被统治者，对外争夺区域霸权。所以中国的倡导者说："帝国主义实由军国民主义胎化而出者也。"[5]"故军国民者，实民族帝国主义之根萌也。"[6]这本是应予否定的东西。但是，正如《天演论》一样，在西方已趋反动的社会理论，一经搬到中国，就有了崭新的意义，成为激励人们昂然奋进的强心剂。军国民主义的具体要求为：第一，社会成员按军事编制进行组织，"盖国家之兴废盛衰，直接于个人之安危休戚，兹理之触接于脑也，惟军人为尤易而显。然则社会而以军人之精神组织之乎，奚患其不爱国也，奚患其无公德也。"[7]第二，对全体国民实施军事教育和训练，以期"基础既坚，体质既固，虽使千锋万刃，何间而可得而闯入乎？"[8]也就是说，对于国家要以军事组织统一国民意志与行动，消除一盘散沙的状况；对于每个国民则要强健体魄，学习掌握军事知识与技能，洗刷东亚病夫的形象，从而使国强民健，挽救民族危机，进而崛起于东方，争得民族平等地位。由此可见，军国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对列强霸道强权的爱国

思想，而不是一个革命口号。

然而，作为新知识分子提出的救亡振兴主张，军国民主义除了反抗外强的内涵，还要求变革专制制度，使民众由中世纪的臣民进化为近代国民，并相应实行民主政治。其倡导者反对专制奴化教育，认为"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词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对欧美近代国民教育则无限憧憬，他们比较道："欧美诸邦之教育，在陶铸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中国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以腐坏不堪之奴隶，战彼勇悍不羁之国民，乌见其不败耶？"[9]有人进而指出：中国国民腐败，"一原因于政体"，"一原因于外侮"。"中国数千年之政体，专制政体也。历代英君雄主，恐民之起而抗己也，乃为种种防民之术，于是挟弩有禁，佩剑有禁，饰其词曰偃武修文，美其名曰重文轻武，务使人尽病夫，国无壮士，而心始甘焉。""民受其毒，以致国亡种灭。"[10]

作为20世纪初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与戊戌时期维新派的主张也有很大不同。其重心不在于凭借皇权龙威发动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依靠国民大众，视国民强弱为国运兴衰的命脉。"夫主人翁之资格者，即军国民之资格也。"[11]这种军国民式的主人翁，首先要求改变百姓孱弱屈从，统治者蛮横霸道的状况，以尚武加民主，使民众同时完成由臣民到国民、由羔羊到斗士的转变，打破官府列强赖以逞凶的武力垄断。"军国民主义者，至光耀之名词，至高尚之品格也。有尚武精神而国家思想薄弱者，可谓之军人而不得谓之军国民；有爱国热心而不能堪军旅之艰辛者，可谓之国民而亦不得谓之军国民。故军国民者，以国民而兼为军人，有尚武之精神而有国家之思想者也。盖惟富于

国家思想者知国与身之关系，而后能牺牲个人之利益以求多数之幸福，掷头颅，流鲜血，以扬祖国之光焉；亦惟有奋不顾身之气概，而后爱国之热力始能实践。故二者如辅车相依，如表里相附，不少偏废者，始能享此荣名。"[12]只有人人都具备军国民资格，从奴隶变成主人，才能外抗强权，内拒专制，使国家臻于强盛。如西方各国，"国内之兵力盛者，所伸之权限斯大。而伸此权限往往不尽关政府之意见，而由于人民膨胀之威力。壮哉彼国民也！"[13]军国民主义正是贯彻主权在民理念的可靠保障。这种兴民权以强国强种的主张表明，庚子以后，清王朝在进步人士的心目中已经丧失了国家民族代表的资格。因此，提倡军国民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具有抗击侵略，奋发图强的激励作用，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权威，则是一种对抗和瓦解的因素。由于这一概念容易赋予革命的解释，有的激进分子就把它与反清革命直接联系起来，指出：中国"一奴于同种之汉族，再奴于满洲民族，三奴于欧西民族"，重重压迫，积弱不振。而当今天下，"强则无往而不利，弱则无往而不败，而能操纵此强权者，宁非军国民耶?""他日军国民之资格既已完备，大之可以御外，小之可以革命，驯使脱离专制，自由钟声震长衢"，大声疾呼："以军国民铸自由钟！"[14]

近代知识分子提倡军国民主义，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他们认识到军国民主义向外扩张，即转变为帝国主义，却未予以批判。有人甚至提出："扩张国势，膨胀民族，宣传我国民特质于二十世纪之历史中，势力圈分划乎欧美，殖民策播布乎非澳，以壮我国民特色，展我国民威力，施设我国民进取手段。"[15]由抵制侵略而争霸世界。尽管其用意在于激励国民，但也说明军国民主义只是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用于反抗外强和专制统治时才具

有进步意义，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势必走向反面。

不过，由于军国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中国社会的时弊，进步知识分子竞相宣传鼓吹，一时间举国风行。受此影响，1903年拒俄运动中，全国各地不少青年学生和开明士绅组织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把军国民主义贯彻于行动，就是实施军国民教育。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因沙俄拒不撤兵，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而迅猛高涨。留日学生聚居的东京和中国近代经济文化最为发展的上海，形成两个斗争中心。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即出现于上述两地。

这时的留日学界，不仅人数增至900，政治热情也持续高涨。新年甫始，斗争浪潮就前推后涌，滚滚而来。旧历新正初二大会上，马君武畅言革命排满，全堂五六百名留学生一齐鼓掌。随后接连发生了大阪博览会台湾馆事件，反对弘文学院新定规则的退学事件和成城学校运动会补悬中国国旗事件，参加者动逾数百。学生们集会演说，慷慨陈词，大大激发了爱国热情。4月下旬，留日学界又召开拒法大会。同时，宣传组织活动也十分活跃，各省同乡会、恳亲会纷纷成立，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还成立了一些编译团体，翻译出版各种西文日文的社会人文科学著作。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拒俄运动洪峰推动而形成。

1903年4月29日，留日学生惊闻沙俄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的警报，先后召开留学生会馆干事、评议员会议和全体大会于锦辉馆，决定组织义勇队，分军队和本部办事两部，签名者达180余人。5月2日，全体学生再度集会，改名为学生军，编成3个区队，公推兰天蔚为队长，龚光明、吴祐贞、敖正邦为区队长。

5天后，因风闻日本外务省欲干预学生军活动，留学生集议改名为军事讲习会，并推举叶澜为起草员，钮永建、王璟芳为参议。后神田警署果然下令解散学生军。经留学生反复讨论，并征求了上海中国教育会代表汪德渊的意见后，遂于5月11日改学生军为军国民教育会。至此，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正式宣告成立。

消息传开，上海新知识界闻风响应。自1902年春中国教育会成立后，上海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增长很快。是年11月，南洋公学爆发退学风潮，退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组建爱国学社。受此影响，东南一带退学风潮此伏彼起，一批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青年冲破重重阻力，汇聚于爱国学社。通过全力支持学潮，中国教育会的声望大振，与许多省份的民办教育会以及进步知识界建立了联系。4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千余人率先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并组织了四民公会。4月30日，上海进步人士再度集会，群情激昂之际，接到留日学生成立义勇队的通电，立即决定编队响应，“临时签名者甚众。”[16]但因缺少教练，没有具体组织和活动。不久，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30余人到沪加入爱国学社，解决了教练问题。东京方面改换名称后，上海义勇队支部也于5月中旬改称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并没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仅仅存在了两个月，就在清政府的镇压和内部矛盾冲突下瓦解了。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主要由爱国学社师生组成，其活动与该社的存亡息息相关。清政府对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早就视若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拒俄高潮刚起，清政府就以上海“爱国会社诸生，借俄事为名，在张园演说，议论狂悖”为名，密电江宁查禁拿办。湖广总督端方与江苏巡抚恩寿认为爱国学社“党羽众多，阴有巨魁主持”，主张“责成沪道知会领事及工部

局密行设法诱拿数人，余自解散。”[17]6 月中旬，蔡元培等人因此被迫离沪。是月底，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事发后，爱国学社学生不畏强暴，继续坚持斗争。7 月 7 日，端方为此电告张之洞：“报馆虽允封闭，然尚出报。逆党聚议，仍在爱国社。近日学生恣肆，《苏报》凶横，皆爱国社会所为。《苏报》馆既封，爱国社更应严禁。”要求清廷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妥速办理”[18]。但清政府处理《苏报》案颇为棘手，在租界不能任意施暴，加上该案风声远播，各地学生人人自危，络绎东渡，国际舆论哗然，清政府唯恐激成更大的风潮，所以始终没有正式查封爱国学社。

《苏报》案前，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因故发生冲突，并于 6 月 15 日宣告独立。这样，由双方联合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实际上已经分裂。《苏报》案发之际，爱国学社一部分学生因暑假返归故里，一部分则亡走日本，此后再未恢复，无形中解散了。从时间上推断，爱国学社的解体当在 7 月中旬。与此相应，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也告结束。[19]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解体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部政治倾向不同，在革命与否的抉择关头发生了大分裂。先是，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20]为宗旨，并派出特派员归国运动官府朝廷，结果不但毫无收效，反而遭到清政府的疑忌压制。痛定思痛，7 月 5 日，在军国民教育会欢迎特派员东归的全体会员大会上，秦毓鎏等 15 人提出改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21]，要求公开打出革命旗号。担任该会经理的留日鄂生王璟芳当场表示反对，声称：“大清不可背负，政府不应乱诋。”[22]革命与否的问题尖锐地摆到每一个会员的面前，迫使他们明确表态。面对政府高压，作为各种爱国力量联合阵营形

式的军国民教育会已不能继续维持，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唯有再进一步，踏上革命轨道。然而，值此关键时刻，该会却不幸发生分裂，未能实现组织上从爱国到革命的转变。关于此事，有如下记载：1.《浙江潮》第6期《特派员之还东》："有某某会员提出改革意见，宣告大众，会员赞成者过半。惟某某等以意见微有不同，并或因病，或因才不足，当场脱会者十余人。"2.端方在致张之洞和清政府电报中，分别称当日"相率出会者百余人"[23]；"相率出会者二百余人，后出会愈多，仅剩数十人，党羽星散，遂不能成军。"[24] 3.1903年8月21日《岭东日报》报导："当堂请除名者七十余人，及散会后递言除名者又数十人，现在所余者仅三十余人，而其中代表人亦极力主张解散。"4.陈天华《狮子吼》记："当时留学生的程度，十分参差，经满洲政府几番严拿重办以后，和平的怕祸要退出会去，激烈的索性把'拒俄'二字，改称'革命'。两相冲突，那会便解散了。"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共有会员208人，而且这时已有不少人归国运动，所谓"相率出会者二百余人"，显系夸大之词。但《岭东日报》倾向革命，陈天华则亲历其事，《狮子吼》的写作年代距事件又近，所记当近事实。1904年3月29日《警钟日报》载文《论立会之理由》，分别以"久"、"暂"、"未久"、"近立"标明励志会以后各进步团体的状况，其中军国民教育会一条下标以"暂"，即当时这个组织已不复存在。《国民日日报》所载《呜呼国民之前途》一文亦称：军国民教育会"固一世之雄也，而乃如电光，如石火，不匝月而化为乌有。"[25]至于《浙江潮》的报导，应是善意的隐晦。从1903年5月到1904年初，军国民教育会中的主要革命分子约40人相率归国，他们在7月以后都没有以军国民教育会的名义进行活动，而东京也不可能存在一个革命的军国民教育会本部。有些记载说直

到同盟会成立，军国民教育会仍然保持组织活动，是缺乏根据的。

二 组织与活动

由于军国民教育会存在时间很短，关于它的组织与活动，多语焉不详，因而有必要考察详实。

首先，会员人数与籍贯。东京学生军成立时，全队121人，加上本部办事员31人及女队员12人，有名可考者共164人。[26]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时，因日本福岛安正少将的干涉，学生军队长蓝天蔚及3个区队长龚光明、敖正邦、吴祐贞均未加入，队员吴寿康、杨士照、施尔常和本部办事员林志均、程树德等也因故退出。尽管如此，会员总数还是增加到208人。籍贯可考者如下：

江苏56人：*钮永建、*费善机、*廖世勷、*黄铎、*朱祖愉、*蔡文森、* 陈福颐、*张肇桐、*秦毓鎏、*贝均、*华鸿、*陈去病、*徐家瑞、*沈成钧、*吴雄、*张修爵、*濮祁、*朱孔文、*倪永龄、*彭树滋、*夏斌、*陆规亮、*陆龙翔、*杨汝梅、*张兆熊、*张景光、*诸翔、*杨言倡、*秦文铎、*胡克猷、*王季绪、*顾树屏、黄以仁、顾次英、*吴钦廉、叶基勤、*刘钟和、*许嘉树、叶基桢、经家龄、贝镛礼、*吴治恭、*夏清馥、辛汉、朱廷禄、吴传祓、张懋德、*邓官霖、陈定保、*何世准、*曹汝锦、*陈懋勰、*华桂、*胡彬、*吴芙、*周佩珍。

福建28人：*林长民、*方声洞、*高种、*林先民、*蔡世俊、陈与年、萨端、*王学文、*王永炘、*郑宪成、*施传盛、*

林獬、* 李宣威、林楷青、* 翁浩、* 沈刚、* 方声涛、* 林肇民、王学来、* 王兆楠、* 江尔鹗、林蔚章、萨君陆、* 王孝缜、王孝细、方声煊、* 林宗素、* 方君笄。

广东 23 人：* 张崧云、* 黄润贵、* 陈茹昌、* 朱少穆、* 李天锡、* 唐寿祺、* 胡镇超、* 卢藉刚、* 刘志芳、* 冯启庄、* 伍嘉杰、* 陈芙昌、* 黄实存、* 韦仲良、* 欧阳干、* 甘启元、* 鲍应镟、* 苏子谷、* 黎勇锡、李锡青、区金钧、桂少伟、卢牟泰。

湖北 22 人：* 余德元、* 王璟芳、* 欧阳启勋、* 黄立猷、* 刘成禺、* 周兆熊、* 陈云五、* 李隽、* 王镇南、* 张魁光、* 尹援一、* 王明芳、胡铮、陈荣镜、* 李书城、屈德泽、* 卢启泰、周维桢、洪范、* 杨霆垣、黄瑞兰、* 王莲、

浙江 17 人：* 汤槱、* 丁嘉墀、* 俞大纯、* 叶澜、* 王嘉榘、* 董鸿祎、* 王隽基、* 龚国元、* 韩永康、* 许寿裳、* 李炳章、* 胡俊济、* 潘国寿、* 石铎、濮元龙、钟杰、* 钱丰保。

直隶 12 人：* 张浡、杨毓苹、* 严智崇、张书诏、* 张殿玺、* 刘景沂、* 冯廷美、* 陈之骥、邢之襄、李士熙、王鸣皋、* 尚毅。

湖南 10 人：* 黄轸、* 陈天华、* 杨毓麟、* 周宏业、* 陈介、* 袁华植、* 杨明翼、* 高兆奎、* 罗元熙、许翔。

四川 8 人：* 刘蕃、涂永、王章祐、曾天宇、张小冲、胡景伊、周道刚、徐孝刚。

江西 7 人：* 谢晓石、* 徐秀钧、* 李盛衔、赵世瑄、* 刘景熊、* 刘景烈、* 陈秉忠。

安徽 5 人：* 程家柽、* 蒯寿枢、* 戴麒、* 戴赞、* 龚圆常。

贵州 1 人：* 蹇念益。

山西 1 人：* 何厚僩。

奉天 1 人：* 张毓灵。

山东 1 人：* 张允斌。

旗籍 4 人：* 宜桂、钟音、长福、额勒精阿。

不详 12 人：* 董猛、* 任责、刘文福、* 周庆冕、* 方舜阶、* 平士衡、李寿康、* 刘希明、乔示臣、梁孟刚、廖蕃、* 钮勤华。[27]

上列表明，江苏、广东、四川、江西直隶等省入会人数与留学生总数比例相当，均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入会；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省则低于这一比例；而总人数不多的福建学生却有 28 人参加，居第二位。这时整个留日学界的爱国热情都在迅猛高涨，许多人虽未正式入会，但以捐款等方式表示支持。所捐多则 30 元，少则 5 角钱。当时留学生的生活并不宽裕，"官费者仅能自给，自费者大半称贷，曲质而徒，经费困难，常有朝不保暮之象。及聆开会时一番痛哭流涕之演说，靡不恻然心动，愿割己之肉以为人食。故东京留学生之捐款，虽一元半元之微，而其中有斑斑点点之血泪在。"[28]如果加上捐款人，则支持拥护军国民教育会者达 500 人，超过了留日学生的半数。[29]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爱国运动不仅吸引了广大汉族学生，满族学生也参加到斗争行列中来，军国民教育会就有 4 名旗生。

军国民教育会存在仅两月余，又没有在东京扩大发展组织，所以，凡未列名此表者，则不是会员。有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如周树人、廖仲恺、何香凝、仇式匡、吴永珊、潘赞化等，当时虽在东京，却没有加入军国民教育会。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主要由中国教育会体育部和爱国学社学生组成，其人数据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自蔡孑民、吴稚晖、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较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九十六

人。"这一回忆是以日记为据写成，其日记称："是月爱国学社诸君因外界刺激，遂编成军国民教育会，入会者九十六人。"[30]应属可靠。《童子世界》第32期曾详载1903年5月调查的爱国学社132位学生的名单，惟缺乏资料，难以确认其中的入会者。

其次，组织概况。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设执法员3人，事务员10人，其中经理4人、会计员3人，书记员3人(后增补许寿裳为书记，共4人)，由会员公举产生，并由职员公推叶澜为职员长，负责召集职员处理日常事务。凡遇重大问题则须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决定，会前临时推举议长，"如议事时赞成、反对者其数适均，议长得决定之。又辩论时妄用意气、节外生枝者，议长得劝止之。"[31]职员任期半年，可连选连任。职员长和议长虽由声望较著者担任，但只是为会员办事的服务者而非领导者。类似这种模仿民主选举和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社团中十分流行，是他们反对专制，向往和追求民主制的思想倾向在组织上的体现。这与一些绅董名流控制下的地方自治团体或宪政团体对上要求分权，对下则集权垄断，彼此又争权夺利的情形适成鲜明对照。研究近代中国的社团政党史，对此应予充分注意。

军国民教育会还制订了颇为详尽的《公约》和《自治公约》，明确规定了宗旨、组织纪律以及会员的权力义务。这些规章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使其活动制度化、规范化了。当然，由于该会是以会员自发的爱国热情为基础建立起来，这种非契约关系的结合，加上学生们缺乏自律精神，当道义力量减退时，公约的约束力不足，实际运作起来不如纸面规定有效。在非法制条件下，如何在坚持民主制度的同时，确保社团的

有效运作，可以说是对民主的一大考验。

建立军国民教育会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军事，学生军时曾将全队编成3个区队，12个分队。改换名称后，因蓝天蔚等军事干部退出和新会员加入，同时为了避免日方再度干涉，遂将此编制取消，“惟教育的体操，此后仍时时讲习，不同军队形式。”[32]为此，把会员编成若干射击班，以便进行军事学习和训练。

与军国民教育会有关的一个组织，是留日女学生的共爱会。该会发起于1903年春，“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计划首先组织留日女生，然后“渐达其权力于祖国各行省。”[33]会中设事务长1人，书记1人，评议员2人。拒俄运动兴起时，共爱会集议协助，胡彬等12人报名参加义勇队、学生军，“逐日练习兵操”[34]，并有7人加入赤十字社笃志看护妇会学习救护，准备随军出征，担任救护。[35]后来全体会员均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同时仍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活动。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军国民教育会的附属。[36]

1903年后，留日学界各省同乡会纷纷成立，成为军国民教育会与全体留学生联系的纽带。先是，义勇队与各省同乡会之间存在一种前敌与后备的关系。“义勇队既成，福建、江苏、湖北、湖南、浙江、云南、贵州、广东各开同乡会，演说义勇队事，莫不呕心沥血，沉痛悲切。”[37]福建的方声煊和浙江的潘国寿两位少年在各自的同乡会大会上要求加入义勇队，年长学生加以劝阻，希望他们“留之以继其后。”[38]浙江温州籍18位学生中仅石铎一人入队，他们的敬告同乡书说：“岂我等之畏死遁死哉！我十七人公任其第二义务，俟开战期决，束装返里，誓与诸君出死力，鼓我瓯人尚武之精神，造就军国民之本领，组织一独立军，以

待死期之至。"[39]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军国民教育会时期。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初创时组织不够完善，为了巩固团体，决定"将采法诸大豪杰之手订章程，加以严重之自治法。"[40]5月23日，遂召开月会，改变原来较松散的组织形式，设议长、代议长、执法等职员。[41]为了便于操练，还按军事编制将会员编成8个小队。

最后，主要活动。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依据拒俄爱国宗旨，展开如下活动：第一，派遣特派员归国。此举早在学生军阶段即已议定，并推举钮永建、汤槱二人担任特派员，目的是争取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清政府允许学生军开赴前敌。5月13日，江浙两省同乡会和军国民教育会分别召开欢送会。次日，钮、汤从横滨乘"博爱丸"轮船出发，抵上海后与爱国学社取得联系，随即北上，到天津向袁世凯请愿，遭到拒绝。恰好此时《苏报》案风波骤起，驻日公使蔡钧又电告端方，指学生借拒俄行革命。端方通电沿海各省督抚，下令戒严，并电达北洋。袁世凯乃令叶祖圭率军舰巡洋。后因某明达之士劝说，才撤令解除。[42]而上海却风传汤、钮在天津被袁世凯杀害。鉴于形势突变，军国民教育会决定电召特派员东归。7月4日，汤、钮返抵东京，此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派遣运动员到国内外各地。义勇队成立时，即议决派人归国到各殷富地方以及南洋各埠和欧美一些国家进行活动。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当天，以推举、公认、自认等方式确定运动员12人，即程家柽、费善机、张嵩云、丁嘉墀、俞大纯、黄轸、杨毓麟、陈天华、黄铎、余德元、朱祖愉、黄润贵。但实际不止此数，如6月6日出发的廖世勷和负责湖南方面的许翔，均不在此列。运动员的主要任务是，散发《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募捐筹款；

联络各地爱国团体，扩大组织，并为此制定了《军国民教育会内地及外埠入会章程》。从5月21日到6月11日，杨毓麟等11人相继出发，朱祖愉、程家柽出发日期不详，陈天华则迟至1904年1月才归国，其任务改由许翔承担。运动员奔赴各自的活动区域后，依照公约规定，积极展开活动。开始，他们仍对清朝官吏寄予希望，走上层路线，如黄轸、杨毓麟等人曾与苏、湘等省督抚周旋。但是，《苏报》案后国内政局激变，完成原定任务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而这些运动员早已有革命思想，于是大都转向鼓动反清革命，密谋暗杀举义，如杨毓麟、黄轸、俞大纯、费善机、余德元等，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就原定任务而言，也成效甚微。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留日学生的捐款，各地响应义勇队之举，则大都是闻风而起的自发行动，而不是运动员活动的成果。

第三，进行军事训练。这是该会的基本活动。按《公约》规定，训练分为射击、体操、讲习三部。从5月18日起，各科训练陆续开始。射击在日本体育会里进行，每周打靶一次。讲习科由学生中的4位见习士官轮流讲演战术、军制、地形、筑城、兵器等课程。后因参加人数不多，拟改习普通科。体操则只限于所属学校不设体操课程的会员。女会员不参加军训，到赤十字社笃志看护妇会学习救护。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军事训练远不如上海方面，该会职员说："惟东京情形与沪上亦稍有不同，各人分居一也；学校功课不能荒弃二也；聚数百人排队操演，惊动日人耳目三也。故欲如爱国学社之整齐，势必有所不能。"[43]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主要活动不超出爱国的范围，冯自由说该会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44]，显然是把个别会员后来从事的革命活动当成组织活动

的一部分，混淆了事实。正因为该会坚持拒俄爱国宗旨，在清政府的压制下，其活动很难展开，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继续前此已经开始的演说，“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45]二是军事训练。从5月中旬开始，“一律学习兵操，早晚两操。又于学社之西偏租有广大体操场。”[46]留日学生潘旋华归国途经上海，在爱国学社亲眼目睹“蔡鹤廎（元培）老先生近亦去辫，与学生早晚同习兵操，实令人可歌可泣。”[47]章太炎甚至主张“全学社中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48]武装抗俄的情绪十分高昂。

三 政治属性

几乎所有的回忆录都说军国民教育会是一个排满革命组织，而撰写者又大都是该会会员或当时的留日学生，如刘揆一的《黄兴传记》、陶成章的《浙案纪略》、秦毓鎏的《自书履历》、李树藩的《甲辰拒俄义勇队与长沙之革命运动》、苏鹏的《柳溪忆语》以及王辅宜的《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等，其中说得最明确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军国民教育会与义勇队性质不同之点，后者属于拒俄御侮，而前者则属于革命排满，此其宗旨悬殊者也。义勇队既解散，学生之卑怯者，以畏惧政府干涉，不敢再预闻政治运动。湖北学生王璟芳因举发义勇队志在革命有功，清廷嘉之，特旨赏给举人。叶澜、董鸿祎、秦毓鎏诸人不为少屈，乃于癸卯夏间发起军国民教育会，群推秦毓鎏起草立会意见书。”“军国民教育会成

立时，以本身性质属于秘密团体，须预防破坏，且须计之破坏后之安排，故定名颇费斟酌。而招收会员，概取严密，人数不多，咸能恪守规章，保存机要。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故自癸卯成立起至乙巳合并同盟会止，迄未破坏。""更推举同志返国分省运动起义，名曰运动员，黄轸、陈天华即被派回湘之运动员也。"[49]

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的性质，早在60年代，金冲及、胡绳武先生即作过考证，指出在秦毓鎏等人发表改变宗旨意见书之前，军国民教育会不是一个革命组织。[50]但该文似未引起充分注意。而且由于将因此引起的组织解体仅认作成员分化，以为团体依然存在，并朝着革命方向转化，此后海内外多数著述仍沿用旧说，张玉法便将该会列入《清季的革命团体》。直至近年，误说还被一再重复。因此，全面核实误点，深入揭示误因，就显得很有必要。

1903年5月11日，学生军正式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当日大会通过的《公约》明确宣布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临时公约》亦称："此公约之目的在拒俄。"[51]军国民教育会派遣运动员归国，并不是为了发动革命，而是募捐筹款，联络同人，两位特派员的使命更是向清政府及袁世凯请愿。这样一条上层路线，遭到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反对。"学生军之出现也，热心如沸，而种族之界辨未明，欲运动伪廷与之共事。故特派员至上海，述前途方针，演说于爱国学社。吴敬恒首反对之。军国民教育会之募捐启，亦为《苏报》所齿冷。"特派员北行失利，清政府诬指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苏报》案的严酷事实以及上海同志的尖锐批评，才使"会中方针渐变，受伪诏之激刺，电召特派员还东。"[52]像王璟芳那样甘愿做清朝顺民的人，似不会列名于一个革命团体。7月5日大会上，他公然声称："大清不

可背负，政府不应乱诋”，煽动退会。“演说者曰：‘何故除名？’王曰：‘不同宗旨故。’演说者曰：‘何以不同宗旨？’王曰：‘本是拒俄，变为排满，我所以除名。’”[53]并于会后将意见书送交总监督汪大燮。此外，曹汝霖等政府派学生也为该会捐了款。这些都说明，在此之前，军国民教育会不是一个反清革命组织。而秦毓鎏等人的意见书并未得到多数会员的赞同肯定，相反导致了组织的分裂以至于瓦解，因此不能作为判断组织属性的依据。该会由一份修改宗旨的意见书而解体的事实，恰好证明其性质不是革命。冯自由误判的关键，就在于将提出意见书的目的由修改宗旨当成发起立会。所以，整体而言，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始终没有从爱国团体转变成革命团体。

然而，问题并不仅此而已。在确定军国民教育会爱国的基本属性的同时，不能否认在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革命因素，因而又带有较强的革命色彩。

早在19世纪末，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中已经有一些人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在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刺激下，又有一批留日学生逐渐摆脱保皇派的影响束缚，走上革命道路。1901年，秦力山等人创办了《国民报》，还拟组织国民会，成为留日学界革命团体萌芽的先兆。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发起“亡国纪念会”，对留日学生有所触动。是年6月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使留日学生大受刺激，革命情绪逐渐蔓延。与此同时，国内学界风潮渐兴，许多怀抱民主思想反清意向的退学生东渡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宣称：“我辈到东，非为学而来，为我国民而来也。”因此“孜孜焉求其革命之起点，维新之初步”[55]，“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庶几将来可以独立于竞争最烈之大舞台也。”[56]他们与原有的激进分子相结合，于是年冬成立了革命团体青年

会，推动留日学界的革命化。1903年旧历新正初二的排满演说，反映了留日学界革命情绪高涨的情形。

青年会成员在军国民教育会中起了重要作用。拒俄义勇队成立前，叶澜与秦毓鎏商议准备“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57]。青年会员多以为然，后来有11位会员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58]其中叶澜任职员长兼书记，张肇桐任会计，周宏业、王嘉榘、谢晓石任经理，秦毓鎏、蒯寿枢、董鸿祎任执法，占13位职员的三分之二。几次大会的临时议长亦由青年会员担任。以后发起改变宗旨意见书的15人中，有9人是青年会员。此外，黄轸、陈天华、刘成禺、李书城、杨毓麟、龚宝铨、林獬、陈去病、黎勇锡、伍嘉杰、李锡青、桂廷栾、区金均、卢牟泰、朱少穆、许寿裳、周维桢、尹援一、俞大纯、胡浚济、萨君陆、贝镛礼、贝均、陈定保、王孝缜、余德元、张崧云、费善机、赵世瑄、刘钟和、屈德泽、陈芙昌、施传盛、钮永建、翁浩、郑宪成等36人具有比较明确的革命倾向。由于这些占会员总数近四分之一的革命分子的存在，使教育会的活动不时闪现出革命的光芒。

还在商议组织学生军的大会上，叶澜就高声发问：“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永建应道：“为国民！”[59]全体与会者鼓掌赞同。军国民教育会的徽章，正面镌黄帝像，背面由秦毓鎏手书“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60]反清倾向相当明显。对于会中的革命分子来说，向清政府请愿只是一种手段，“特派员一事原出于万不得已，而非好为运动政府也。”当听说上海方面对特派员演说表示不满时，他们还特意去信解释，声明：“宗旨本同，所异在手段方法耳。”“本会以吴(稚晖)、蔡(元培)两公既为政府所深忌，则本会诸人亦同一辙。若与彼昏辩论，不但无益，而反触其忌。惟有坚韧不挠，始终与彼相持

耳。"[61]并指示运动员向各地同志解释清楚。所以，秦毓鎏等人在改变宗旨意见书中说："特欲达目的，不可不用手段，故先时章程中措词含浑，未将民族二字大书特书以揭明宗旨。"[62]

对于这种手段与宗旨间的微妙关系，会员中特别是职员中的革命分子心里"固已昭然"[63]，但不等于说军国民教育会是以爱国为名的秘密革命组织。革命分子在会内的活动是有限度的，即无论公开还是秘密，都不能把排满革命作为全会的宗旨和口号，也不能以组织名义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这是与中国教育会的重要异点。留日学生虽然大都是热血青年，富于民主意识，能够拥护或赞成排满革命，但要他们把革命的思想情绪变成实际的反清活动，甚至公开加入一个革命团体，就决非易事。他们绝大多数生长于官绅家庭，"湖北如饶应祺中丞之子，湖南如魏光焘制军之子若婿，安徽如马玉昆军门之子，广东如许应骙制军之孙，此其尤著者也。此外如二三品大员子弟甚多，不胜枚举。"[64]思想上受正统观念影响，精神上受宗法礼教束缚，政治上受专制制度桎梏，经济上则须仰仗于官府家庭，要他们义无反顾地举旗造反，需要一个痛苦的磨练过程。青年会成立时，就因为"揭橥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65]拒俄运动兴起，不仅清政府惊恐万状，迫不及待地进行压制，留学生家庭也唯恐其子弟沾染革命风气，"湖北派往日本游学各大员子弟现均急召回国。"[66]两江总督魏光焘则派道台陶森甲赴东，强迫江苏官僚子弟归国。有一位义勇队员签名入队后，"其家得悉，益复惊惶，因飞书促归。"一到家"即经其妻挟往母家，禁锢一室，不令出门一步。"[67]为此，会中的革命分子坚持合法斗争，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在合法途径尽被塞绝时，他们才能打出革命旗号，以免作茧自缚，削弱自身力量。

反帝救亡的拒俄运动吸引了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救亡的旗帜下暂时联合起来。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彼此的分歧与矛盾，联合体内部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磨擦斗争。军国民教育会主要由三股力量组成，一是以青年会员为代表的革命分子，约占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不仅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担任职员、运动员之责，在会中起主导作用，而且许多人还负责编辑各省同乡会所办刊物或担任同乡会职员，在留日学界的社会活动中影响很大。二是充满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他们人数众多，是军国民教育会的基础。义勇队成立时，“迫于俄警，以故有志者热力百倍，一时成军，而欲入而不敢入者尚多。其后章程既出，有‘服从政府之下’一条，而愿意签名者遂以百数计。”[68]其中一部分人随着形势的发展走上了革命道路，而相当多的人则不敢或不愿表态反清革命。三是以王璟芳为代表的拥清保皇派，他们为数不多，政见明确，社会活动频繁，在留学界具有一定能量，在职员中占有几个席位，如王璟芳任经理，林长民任书记，蹇念益任会计。[69]拒俄运动高涨之际，他们积极参与，但政治上坚决反对革命，挟清廷专制余威，不惜分裂组织，以见好于官府朝廷。三股力量联合中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斗争，中间派的倾向随着左右两派势力的消长及形势的变化而摆动。相对而言，第一、三派对社会政治活动较为热衷，中间派则比较情绪化，起伏波动。由于革命分子集中精力扩展拒俄运动的声势，忽视了组织内部的影响争取工作，结果，随着激进派陆续归国，对中间派的控制力大为削弱，而拥清分子的影响相应增长。7月5日大会上，对王璟芳反对改变宗旨的意见“鼓掌赞成者不知其数”[70]，引起退会潮。不过，中间派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附和拥清派，主要是畏祸，而不赞成其投靠清廷的变节行为。王后来

由端方举荐，被清廷赏赐举人，留日学生对他鸣鼓而攻，《国民日日报》“所收骂王小宋（璟芳）之杂文小诗，几乎日日有之。”[71]“学生谓其献媚官场，为学生羞，有欲得而甘心之意。”[72]由此可见，革命分子的失误，对军国民教育会的解体负有一定责任。如果处理得当，凭革命派的实力影响，应当能够控制局面，避免瓦解的厄运。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暗杀团的问题。该组织是在军国民教育会解散后，由一部分决心从事反清革命的会员建立的秘密团体。前此，军国民教育会并未实行暗杀。如果会内密设暗杀团，担任职员的拥清分子不会毫不知情。而且，据称是暗杀团骨干的杨毓麟、黄轸等人离日归国时，军国民教育会尚未提出改变宗旨，他们返国之初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公开活动。《苏报》案后，杨毓麟等人回到东京，这时军国民教育会却已经瓦解了。所以，暗杀团不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附属组织，它与后者有渊源而非从属关系。

由于军国民教育会本身的革命色彩和后来暗杀团的活动，加上清政府指其“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当时海内外纷纷传闻该会主张革命排满；而且许多会员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他们在建立革命团体时，往往把军国民教育会视为前驱。正是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许多记载甚至会员自己的回忆也称之为革命团体。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情况有所不同，其主要成员是中国教育会的激烈派和爱国学社学生，一般都具有民主革命思想。与东京明显有别的是，上海各派爱国力量联合的组织形式是国民公会，因而军国民教育会中不存在政派之争，只有革命派内部的分歧矛盾。早在立会之初，上海方面就主张“发起由拒俄，结局

直与普世界外族异种战死而止。"[73]隐约表达了排满革命观念。对于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上层运动路线，则明确提出批评，反对向清廷请愿。对于袁世凯之类的汉族官僚，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由爱国学社学生负责的《苏报》，从6月1日起在新任主笔章士钊的主持下大加改良，鼓吹排满革命，笔调十分激烈。爱国学社脱离教育会后，《苏报》完全归其编辑，更是"日日倡言革命"[74]，号召国民"乘是而流一点万世不磨之鲜血，造一个完全美备之政体，荡清胡氛，强我种类。"[75]可见，上海军国民教育会实际上是一个以爱国名义出现的革命团体。当然，它与直接从事武力反清的组织又有所不同，其主要活动是鼓吹宣传排满革命思想。

四　影响与分化

军国民教育会虽然不是革命组织，但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促进了国内各地拒俄运动的兴起发展，使这场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掀起高潮；它推动了近代知识分子的革命化，促成一批革命小团体的建立，为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骨干；它把革命火种撒向内地，使反清革命之火迅速蔓延燃烧。不少会员成为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宣传家，在辛亥革命乃至此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些会员归国后，虽然没有直接从事武力反清，但在兴学、办报、结会、演讲等方面各尽其能，启迪民智，开通风气，以思想启蒙为革命开辟通道。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留学界和国内各进步报刊争相报导，各地学生和进步人士闻风响应，除上海外，福建、湖南、浙

江、江西、安徽等地均有议编义勇队之举。军国民教育会不仅派遣运动员归国联络各地学堂热心志士，不少会员还公开致书本省父老同胞，鼓动他们支持和参加运动。尽管该会不久就解散了，但影响已经扩展开来，甚至浙江沿海一座小小的黄岩县城，爱国知识分子也"均有军国民之目的"，"齐用操衣，当大路而唱军歌，日日操于大校场。以文弱书生而当兵卒，乃黄岩自有生以来所未见者。"[76]军国民雄风吹过，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精神焕发，他们竞相表示："当此国家危急之秋，而仍不知有当兵之义者，直可谓无脑筋也。""不能为完全之军国民，亦当为普通之军国民。"[77]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军国民教育会解散后，革命分子转而从事反清活动。他们创办报刊，撰写宣传小册子，传播排满革命思想。其中突出的有章士钊、何梅士、陈去病、苏子谷、柳弃疾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不遗余力，时人有"《苏报》第二"之称，甚至认为"此报胜于《苏报》"[78]。林獬、林宗素等人主办的《中国白话报》，以通俗形式向下层群众宣传革命。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79]为宗旨。蔡元培、汪德渊、章士钊、林獬、贝寿同等人主办的《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更是风靡一时，隐执国内进步舆论的牛耳。此外，还有辛汉、严智崇等人在东京发刊《白话报》，刘成禺受孙中山之聘，任《大同日报》主笔。在其他宣传品方面，则有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士钊的《孙逸仙》、《沈荩》，黄兴等人的《血泪书》，敖嘉熊的《新山歌》，陈去病的《清秘史》、《陆沉丛书》，苏子谷译的《惨世界》等，影响颇大。还编辑出版了大量启蒙宣传书籍。上海出版革命书刊最多的东大陆图书局和国学社，其编辑中章士钊、陈去病、刘季平、柳弃疾、敖嘉熊等原来

都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

集会演说，是启蒙宣传的又一重要形式。不少会员奔走于各地，向青年学生和下层民众演说排满革命和民主平权。1903年12月，章士钊在南京北极阁向各学堂学生数百人发表革命演说。张崧云归国后，在广东南海、顺德一带乡里“排日演说，所到之处，乡民皆极欢迎。”“在沙头社学演说时，到听者几及千人，座中多有泣下者。翌日乡中农民复请演说，感泣如初。”[80]顾次英、穆湘瑶等在南汇举行演说，“由新场而周浦而大团而川沙，每会上下流社会环而听者辄数百人。炎风烈日中，流汗骇喘，无斁也。”[81]王隽基在浙江海盐所开演说会，“实为海盐第一次之演说也。”[82]敖嘉熊也在嘉兴举办演说会。上海爱国学社学生于假期返里时即到处集会演说，倡言革命，使地方官惊呼：“再不严行密拿，恐唐才常事将复见于今日矣！”[83]学社解散后，其成员分散到各地，四处鼓吹，使清政府防不胜防，长江中下游一带官吏惶惶不可终日，连远在西南的四川及其邻近各省也“于防范上海爱国会党持共和主义入川运动者，甚形骚扰。”[84]由于清政府和地方顽固势力的压制排挤，这些活动难以持久，但已将民主与专制的冲突由沿海都市引向内地中小城镇以至乡村，触动了基层宗法社会。

军国民教育会员在兴办学堂、普及教育方面的努力，既起到传播民主意识和科学新知的作用，也有助于聚集和培养革命人才。由黄兴、苏子谷、翁浩、陈介、秦毓鎏、谢晓石等人任教的长沙明德、经正、修业、实业等校，刘钟和、秦毓鎏、费善机等人创办的丽泽书院，林砺任教的同里自治学社，以及陈由己所在的安徽公学，都成为聚集革命力量的基地。先后任教于国内的会员还有卢牟泰、王嘉榘、董鸿祎、胡景伊、华鸿、钮永建、程家柽、周维

桢、顾次英、王隽基、蔡文森、顾树屏、方声洞、方声涛、周道刚、徐孝刚、王孝缜、陆规亮、刘景烈、刘景沂、屈德泽、李书城等，他们任教的学校有普通、高等、军事、农业、师范等门类，分布于广东、广西、四川、直隶、江苏、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云南、江西等十几个省份和北京。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青年学生接受革命思想，走上反清道路。

军国民教育会员还与各地革命分子或进步人士相结合，组织了一批爱国革命团体。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黄兴、杨毓麟、俞大纯、程家柽、余德元、陈天华等率先发动革命。军国民教育会解散后，具有革命思想的会员纷纷回国，“企图军事进行”[85]。上海会员也有一些潜返故里，从事反清革命。所以，当有人讥笑嘲讽该会虎头蛇尾之时，了解其中内幕的《江苏》、《俄事警闻》杂志不约而同地发表文章，指出：“夫革命而昌言于道，演说于市，报告于册，签名于籍，摄影于片，唯恐人之不速晓，乃国民未有经验，亦其中过渡之一阶级。至于实行之顷，有不得不用秘密之运动者矣。”[86]“凡势力固恒存者，或见焉，或潜焉，不得以皮相。不见水雷乎，炼钢注药，配机引线，非不铄然耀耳目也。及其安置妥贴，则索然无所睹。然而敌舰既触，轰然一击，则当者皆齑粉矣。”[87]他们建立或参与的革命小团体有黄兴、陈天华、秦毓鎏、叶澜、翁巩、章士钊、苏子谷的华兴会，龚宝铨、蔡元培、王嘉榘、董鸿祎、许寿裳、敖嘉熊的光复会，屈德泽、余德元、黄立猷、李书城、周维桢的武昌花园山机关，陈由己的岳王会，萨端、林獬、林宗素参加的福建学生会，杨毓麟、龚宝铨的暗杀团，敖嘉熊的温台处会馆，辛汉、严智崇等人的东京演说会。他们参加或创建的爱国进步团体则有叶澜的东亚谈话会，蔡元培、汪德渊、章士钊、林獬、贝寿同的对俄同志会(后改名争存

会)，蒯寿枢、诸翔、徐家瑞的中国工业研究会，蔡文森、华鸿、顾树屏的无锡理化学研究会，王隽基的海盐演说会，顾次英的南汇新场讲学会等。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原军国民教育会员入盟者有黄兴、陈天华、程家柽、黎勇锡、朱少穆、王孝缜、高兆奎等7人，此后陆续加入者有蒯寿枢、龚国元、蔡元培、杨毓麟、黄立猷、李书城、林宗素、区金均、苏子谷、钮永建、汤槱、陈去病。陈之骥、柳亚庐、刘成禺、董鸿祎、方声洞、方声涛、周维桢、章行严、章陶严等，加入欧洲同盟会的则有胡铮。因此有人说：军国民教育会"为同盟会之成立，奠定思想及组织上之牢固基础。"[88]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往往发生分化，有的消极沉沦，弃阵落伍，有的逆流而动，走向反面，有的则激流勇进，一往无前。军国民教育会员后来的走向，正是这种分化的典型表现。东京方面的208名会员中，走上革命道路有迹可寻者共59人，占28%[89]其中有的是著名的政治领袖，有的成为出色的宣传家，有的统兵作战，冲锋陷阵。武昌起义后，不少人在各地革命政权机构中任职，对建立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起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斗争中，陈天华、杨毓麟、方声洞、周维桢、程家柽、徐秀钧等英勇捐躯，为中国的共和革命事业献身。

也有一些人走上另外的道路，成为立宪派分子，比较著名的有贵州的蹇念益和福建的林长民。他们曾分别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会计、经理。武昌起义后，林长民作为福建代表赴宁参加各省代表会议，革命党人"以林素反对革命，今来投机，恐与吾党以不利，故欲除之。"[90]派人实行暗杀。还有个别人虽曾积极革命，却不能守恒，在名利权势的竞逐中倒退变节。如四川的胡景伊，原是青年会员，参与发起改变军国民教育会宗旨意见书，回国后相继在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新军及军事学堂中任要职，辛

亥后一度出任重庆镇抚府总长。作为民社四川支部负责人，他反对宋教仁的国民党。袁世凯篡权后，他又不惜卖身投靠，以换取四川督军的宝座。护国战争爆发，他更与讨袁军对抗，彻底背叛了革命初衷。更有甚者，有人后来成了汉奸国贼，由救亡志士沦落为民族罪人。

1903—1904 年间，国内以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的各类社团多达数百，不仅分布于各大都市，而且深入县城乡镇。其中除华兴会、光复会等少数几个主张并实行了武力革命外，多数以办报、演说、兴学为主要活动。有些团体带有革命色彩，甚至名称也给人以革命的印象，如江苏的民族自治会，而基本倾向并非革命；有的在宣传上种族革命气息极为浓烈，却没有从事武力反清，如埭溪蔡绿农等人组建的几个小团体；有的成员多为革命分子，但组织的中心活动还是爱国救亡，如对俄同志会和争存会；也有的表面看来不是革命，实际上暗中准备武装起义，如武昌的科学补习所。军国民教育会集中体现了这些团体的许多共同特征，突出地展示了最能反映 20 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变化的新知识界的政治动向。与革命派相比，他们行动上还有差距，但思想和发展趋势则同革命派的共鸣与日俱增。其追求民主，爱国救亡，革新变政的活动，是起义暗杀外冲击清朝专制统治的又一要素。清王朝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冲击下土崩瓦解的。存在于他们之中的政治倾向以及思想与行动差距的极端复杂性，使任何简单的两极派属判断难以得当合体。历史本身的丰富生动，远比一般概念更能显示过程与结局间既紊合又矛盾的魅力。

注 释

[1]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 276 页。

[2]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 1 卷,第 2 号,第 70 页。

[3]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 16 页。

[4] 据容应萸博士示教,明治时期日本只使用过"军国",而没有军国民的概念。

[5] 奋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 1 号,1902 年 2 月 8 日。

[6] 忆琴:《铸自由钟说》,《童子世界》,第 31 号,1903 年 5 月 27 日。

[7] 百里译:《军国民之教育》,《新民丛报》,第 22 号,1902 年 12 月 14 日。

[8] 《军国民思想普及论》,《湖北学生界》,第 3 期,1903 年 3 月 29 日。

[9] 奋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 1 号,1902 年 2 月 8 日。

[10] 脱羁:《军国民主义》,《萃新报》,第 6 期。

[11] 《无锡俟实学堂冲突之忠告》,《苏报》,1903 年 6 月 9 日。

[12] 脱羁:《军国民主义》,《萃新报》,第 6 期。

[13] 《军国民思想普及论》,《湖北学生界》,第 3 期,1903 年 3 月 29 日。

[14] 忆琴:《铸自由钟说》,《童子世界》,第 31 号,1903 年 5 月 27 日。

[15] 《军国民思想普及论》,《湖北学生界》,第 3 期,1903 年 3 月 29 日。

[16] 《译西报纪张园会议事》,《苏报》,1903 年 5 月 8 日。

[17]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军机处电》,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两江总督魏光焘电》,《辛亥革命》(一),第 443、444 页。

[18]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三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电》,《辛亥革命》(一),第 456 页。

[19] 关于爱国学社的解体,参见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

《东方杂志》,第14卷,第1号;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六月十八日;《革命逸史》,初集,第119页;1903年10月《致柳亚庐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49页。

[20]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21] 《革命逸史》,初集,第111页。

[22] 《中外日报》,1903年10月15日。

[23]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电》《辛亥革命》(一),第470页。

[24] 《中外日报》,1903年10月15日。

[25] 《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第47页。

[26] 参见《学生军名单》,《苏报》,1903年5月18日;《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革命逸史》,第5集;《记仇满生》,《浙江潮》,第6期,1903年7月12日。

[27] 参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名单》,《拒俄运动》,第127—128页;《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第二、四、五次。名字前标有*号者为学生军成员。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统计会员共190人,其中王侃、何澄、吴祐贞、李祖宏、汪荣宝、林志均、周来苏、施尔常、胡毅生、敖正邦、陈海鲲、陈荣恪、张世膺、汤标、汤祚贤、程树德、曾桢、邹容、董鸿祥、蔡懋鑫、樊锥、卢少歧、钟震川、蓝天蔚、魏兰、苏鹏、龚光明等27人,并非会员,他们有的参加过学生军,有的则只是捐款人。邹容早已离日居沪。陈海鲲即陈鲲,自号仇满生,1903年6月9日始赴东,行至马关即蹈海死。李寿康或即吴寿康。

[28] 《记改进学社向励志学社借款事》,《苏报》,1903年7月1日。

[29] 《军国民教育会捐款清单》,《拒俄运动》,第129—133页。名单共列488人,其中有些不是留学生,而有的会员则未捐款。

[30] 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四月三十日。

[31]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32] 《军国民教育会复神田警察署函》,《浙江潮》,第4期,1903年5

月16日。

[33] 《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章程》,《政艺通报》,癸卯第12号。

[34] 《女学生编成义勇队》,《苏报》,1903年5月9日。

[35] 《记留学女生拟创赤十字社之缘起》,《浙江潮》,第5期,1903年6月15日。

[36] 1904年秋瑾到东京后,与陈撷芬等人重建共爱会,不过与军国民教育会已无任何联系。有的回忆说秋瑾系发起而非重建,显非属实。

[37] 《学生军缘起》,《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38]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39] 《苏报》,1903年5月8日。

[40] 《留学纪录》,《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3年5月27日。

[41] 蒋慎吾:《兴中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第322页。

[42] 《几兴大狱》,《新民丛报》,第33号,1903年6月9日。

[43] 1903年6月6日《叶澜致费善机函》,《拒俄运动》,第115页。

[44] 《革命逸史》,初集,第112页。

[45] 《南洋公学的一九〇二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73页。

[46] 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四月三十日。

[47] 《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8日。

[48] 《与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25页。

[49] 《革命逸史》,初集,第109—112页。

[50] 《军国民教育会史实考辨》,《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1日。

[51] 《苏报》,1903年5月25日。

[52] 《中国灭亡小史》,《复报》,第10期,1907年7月。

[53] 《岭东日报》,1903年8月21日。

[54] 《刘云龙》,《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55] 陆规亮:《译〈日本维新之活历史〉序》,《政艺通报》,第20期。

[56] 《东京留学生赵君世瑄与曾君鹏云书》,《苏报》,1903年5月26日。

[57] 《革命逸史》,初集,第104页。叶澜,浙江钱塘人,叶瀚胞弟。

[58] 当时青年会一部分会员已先期回国或因故离日,如张继、潘赞化、陈由己、冯自由;有些虽在东京,但未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如汪荣宝、钮瑗、蒋方震;个别人则因害怕革命而脱会,如金邦平。这样青年会实际上已告解体。

[59] 《革命逸史》,初集,第110页。

[60] 《军国民教育会记事》,《拒俄运动》,第111页。

[61] 1903年6月6日《叶澜致费善机函》,《拒俄运动》,第114—115页。

[62] 《革命逸史》,初集,第110页。

[63] 1903年6月6日《叶澜致费善机函》,《拒俄运动》,第114页。

[64] 《浙江潮》,第7期。

[65] 《革命逸史》,初集,第104页。

[66] 《电告归期》,《苏报》,1903年7月7日。

[67] 《有妻室之游学生听者看者》,《国民日日报汇编》,第4集。

[68] 《时事要闻》,《岭东日报》,1903年8月21日。

[69] 会计一职原举黄轸,因黄自认运动员,遂举蹇念益代之。

[70] 《时事要闻》,《岭东日报》,1903年8月21日。

[71]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75页。

[72] 《纪留学生》,《中国日报》,转引自《岭东日报》,1903年9月22日。关于王璟芳赐举的原因,各报所记不一。1903年9月21日《政艺通报》第16号所录上谕称:由端方保奏,王"效忠守正,请破格奖励。"《大公报》称:"系因沈荩之死,南方人心浮动,故特请优赏一人,以安人心。"《中国日报》称:"中国留日学生因湖北学生王璟芳行事有污军国民教育会名誉,为众所逐。王被逐后大斥民族主义,屡与旧日同志反对,又巴结官场。湖广总督端方以其翻然改变面目,乃奏请给与举人,以示奖励。王得此

赏，遂以夸示同人，非常炫耀。”（转引自《岭东日报》，1903年9月22日）1903年9月21日《岭东日报》报导最详：“兹悉外务部某君接某君函云：因端午桥奉在京某大员之命，禁《湖北学生界》出版，特调该报馆主笔等四人回鄂，而四人中仅王一人舍身回里。初晤端时，尚严究报务之事。王详说并无非理不道之议论。端诺之，又问及在日本联队一事，答以原为拒俄起见，若身居文明之邦，尚无爱国思想，居内地者更不堪问矣。端当时送客无他。闻其于次日即往拜某领事，询留学东洋之学生其联队一事有无叛逆之举动。某领事笑谓：‘贵国之前途，其在留学生乎？如谓联队即是叛逆，是禁锢个人之爱国心也。我初闻贵国学生之举动，颇为贵国贺。今闻阁下之言，不禁为贵国前途悲。’端窘于词，遂归，反复思之，只有仍派王生赴东为是。次日又传见王，令其仍回东洋留学，勉以万不可行非理不道之事，及倡论平权自由之谬说。王唯唯而退。及至王赴东已久，端又忆及此事办理太潦草，不合官事，电商在京某大员如何办理。某员复电云：‘切实保举，以安其心’八字。此王得举人之历史也。”

[73] 《致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颂词》，《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5年3月27日。

[74] 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闰五月二十九日。

[75] 无名氏：《杂感》，《苏报》，1903年6月11日。

[76] 《黄岩学界》，《苏报》，1903年6月17日。

[77] 《无锡俟实学堂冲突之忠告》，《苏报》，1903年6月9日。

[78] 《新开〈国民日日报〉》，《岭东日报》，1903年8月20日。

[79] 《〈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二十世纪大舞台》，第2期。

[80] 《祝演说之前途》，《警钟日报》，1904年8月23日。

[81] 《南汇县党狱始末记》《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

[82] 《海盐演说会摄影》，《浙江潮》，第7期，1903年8月12日。

[83] 《密拿新党连志》，《苏报》，1903年7月4日。

[84] 《党狱事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

[85] 《革命逸史》,第5集,第61页。

[86] 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3期,1903年6月25日。

[87] 《告义勇队》,《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1日。

[88] 李自重:《从兴中会至辛亥革命的忆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209页。

[89] 即黎勇锡、伍嘉杰、李锡青、桂廷銮、区金钧、卢牟泰、翁浩、郑宪成、刘成禺、陈芙昌、王嘉榘、程家柽、董鸿祎、秦毓鎏、苏子谷、高兆奎、谢晓石、陈定保、萨端、贝镛礼、叶澜、陈秉忠、张肇桐、李书城、杨毓麟、钮永建、陈天华、朱少穆、黄轸、许寿裳、龚宝铨、周宏业、周维桢、林獬、林宗素、陈去病、俞大纯、顾次英、黄立猷、方声洞、方声涛、王隽基、汤槱、萨君陆、陈介、王孝缜、余德元、林肇民、夏斌、徐秀钧、张崧云、费善机、蒯寿枢、华鸿、刘景烈、刘钟和、胡铮、陈之骥、屈德泽。

[90] 居正:《代表赴宁·林长民遇刺》,《梅川日记》。

第 8 章

20 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概论

戊戌时期，在维新派的倡导下，中国出现了几十个学会组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政变发生后，这些学会大都陷于停顿。[1] 在清廷厉行党禁的高压之下，除秘密结社外，社团难以立足存身并展开活动。1901 年，清政府复行新政，对维新事业的各种禁令大都不宣而废。短短几年间，各地以新知识界进步人士为主体的社团纷纷建立，对于后来的立宪和地方自治团体以及各种绅商组织的涌现具有推动示范作用。不过，由于几个著名革命小团体的出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的立宪团体又声势显赫，20 世纪初叶，特别是 1901 至 1904 年组建的各种会社组织不易受到应有的重视。探讨这些社团承上启下的联系与影响，可以深入观测新知识阶层的地位动向与功能作用，以及这一势力的出现所引起的士绅官民关系调适重构的社会变动。此外，在陷入党争倾轧前，这些社团也更能体现近代中国知识人的性格风范，从而令后人在更加超越的位置上透视他们的身分与使命。

一 类型分布与社会探源

张玉法先生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对清末10年间的各种社团进行了统计并列表说明，共辑得国内各地及海外各埠的社团668个，其中1900—1904年间成立的仅37个（含日本、美国等地的华侨、留学生及流亡者的组织）。这与实际数字相差较大。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2]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而上一年仅为506个，发展很快，并且仍在加速。例如江苏1909年有教育会55个，3年后增加到115个，翻了一番。[3]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4]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大大超过张玉法先生的统计数。

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使前此已相继取得合法地位的各种社团得到根本大法的书面保障，这无疑刺激了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活动的兴盛，上述商会、教育会、农会等大都组建于此后。但是，戊戌维新派的宣传与组织活动，以及此后开明士绅的民间结党自救倾向，也是推动新式社团大量涌现的重要动因。变法失败后，外有保皇会对华侨的动员组织，内有正气会、中国议会对士绅的吸引聚合，戊戌学会的精神命脉得以维系。清廷恢复新政后，士绅的结社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类型也由单一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样化的功能团体。据《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中外日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申报》、《岭东日报》、《汇报》、以及《东方杂志》、《新世界学报》、《大陆报》、《选报》等几十种报刊杂志的报导，1901—1904年间，江苏

(含江宁)、浙江、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直隶、河南、奉天、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和上海,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 271 个(不含分会)。由于上述各报大都创办于上海,内地省份的信息不畅,因而这一统计远非完整,但大体可以反映当时国内各地新式社团蓬勃兴起的景象,并为具体分析提供必要的论据。

从不同视角观测,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社团组织的基本情况。首先是社团的区域分布,详如下表:

省份	江苏	浙江	上海	福建	广东	江西	湖北	湖南	安徽	直隶	四川	东三省	河南	山东	贵州	广西	云南	山西
数目	77	51	42	20	18	10	9	8	8	8	6	5	4	4	3	1	1	1

即使考虑到统计缺漏等因素,这一分布也与当时各地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趋新势力的活跃程度相吻合。江浙一带,不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外部联系紧密,而且戊戌以来各省不少开明趋新人士汇聚往来于上海,一直试图以各种形式建立和保持组织联系。从强学会、正气会、中国议会,到后来的中国教育会、国民总会、对俄同志会、争存会,宗旨方针因时而异,人员组成却有一脉相承的继替关系,一些骨干成员往往在前后相继的几个团体中扮演主要角色。如叶瀚先后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议会书记、中国教育会温和派领袖。

这些团体虽然多数集中在省会和其他大中城市,但在一些发达地区,也开始向府州县镇等基层社会延伸扩展。如早期民

办教育会系统，不仅在上海、杭州、苏州、南昌、福州、成都、济南、广州、保定等城市设立总会，在各府州县也设立了不少分会。湖北不缠足会成立后，很快发展出分会20余所。有些基层地方还独立组建了社团，如金华、绍兴、赣州、湖州、九江、常州等地的教育会，就是由当地人士发起，结合本籍旅外人士组成，开始与省垣的教育会没有统属关系。在一些开明进步人士聚集的乡镇，如江苏的同里、黎里、震泽、陈墓、浙江的埭溪、广东的西洋堡等地，均组建了若干不同类型的社团。上列271个社团中，127个设于各大都市，州县以下62个，其余则设在中小城市。

其次，从功能上区分，其中教育会21个，不缠足会34个，演说会25个，体育会17个，学生会26个，爱国团体17个，科学研究会18个，文学、戏曲、写真等艺术团体16个，妇女团体16个，实业团体17个，卫生及风俗改良组织8个，师范研究会5个，宗教性社会团体1个，其余为混合型，几乎涉及各个领域。

各种新式社团组织的大量涌现，显示出中国正在经历社会关系重新分化组合的大变动。这一过程包括两个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其一，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分化，各种社会群体的分界日益明显，小群体意识普遍增强。人们认识到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因而觉得有必要以团体形式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共同的利益意愿。在社会公众生活中，不仅让其他群体更充分地了解和考虑本群体的态度要求，而且使本群体在公众代表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杭州“各学堂学生以工商社会皆有会馆公所，以为集合团体之地，惟士社会散漫无纪”[5]，因而创设全浙学生会馆。其二，由不同群体分化出来的趋新分子希望按照新的组织形式相互联系聚合，以增强自身能量，提高社会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社团组织作为新的

社会联系纽带，逐渐取代已经部分断裂破碎的血缘、地缘等旧式纽带。

与此相应，新式社团的产生，直接受两种社会趋势的推动，一是开明士绅与青年学生的结合，二是都市与城镇趋新势力的凝聚。两种趋势往往交错互渗。

近代中国新知识群的形成，最初明显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与此关系最密切的，一是由士绅集团中分离出来从事文教新闻事业的开明人士，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包括国人自办与教会学堂）及留学运动培养的青年学生。中国的士林历来有所谓异端，只是在西学到来之前，他们的言行得不到映证与支撑，仅表现为个别现象，难以形成气候。随着西学的传播，这些对既有制度深怀不满的离异者开始探求新的路径，富强的西方成为他们学习仿效的楷模，以及映证自身行为合理合法化的依据，这一最抽象的共识构成其群体意识的基核。戊戌之际，先进人士利用传统绅权在皇权与民权间的协调制约关系，鼓动士绅起而要求变法。庚子以后，学生群体逐渐扩大，政治独立性日益增强，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既扩大了前者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也增强了后者的趋向性。由于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之间存在社会发展的梯次差距，在新学以及趋新事业的发展方面，形成以上海为轴心，以各大都市为枢纽的辐射网。这种格局对于社团组建具有明显的制约影响作用。

新式社团的成员主要是开明士绅和青年学生，除各自单独组成的团体，如学生会、教育会外，多数社团由双方联合共建。开明士绅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是精神领袖和财政支柱，而青年学生则是行动队。

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呈现三种形式，一是学生已形成主

体意识，甚至独立开展了社会活动，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然后与开明进步人士对等结合。拒俄运动中，福州东文学堂学生“得海外社会来函，愤激时事，相与设演说、体育等会，复集内地同志数十人”[6]，联合社会进步人士的几个小团体，共同组成海滨公会。[7]此后，福州学界与各界开明人士的团体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多次联合集会，建立协调机构，统一部署行动。[8]上海中国教育会与南洋公学退学生的结合更为典型，爱国学社社员大都加入了中国教育会。二是开明士绅以兴办教育来聚集和培养青年学生，并在其社团内附设学生组织，形成领导从属关系。如吴江同里教育研究支部附设青年会，专收10—16岁的学生，“以开发青年智识，养成独立之精神及发表其爱国心为主”，“敦群讲学，其庶几廓清学究之余毒，以为二十世纪之新人物”，借以改变乡村社会千百年来旧式教育下“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9]的恶性循环。三是学生以个人名义加入进步人士组织的各种新式社团，这也是最为普遍的形式。

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间新知识群的结合，具有双向互动作用。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性较大，士绅的相当部分来往于城乡社会，除致仕作官外，不少人兼营商业、办学教书或是入幕为吏。他们既是城市的要角，又是乡间的名流。20世纪初，由于基层社会开通之士较少，虽有除旧布新的愿望，而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与顽固势力抗衡对垒，不得不求助于聚居大都市的本籍人士。而后者有志于输入文明进化风气，也主动扶助家乡的革新事业。许多成立于上海及各省垣的团体，都有总部分会的计划，准备向内地府县乃至乡镇大幅度扩展。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城乡趋新势力的结合，使分散的社会力量逐渐凝聚为统一的整体。这一排列组合的变化，大大增强了趋新势力的能量。绍兴教育会的筹

建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结合。“初府中人士之有志者冀于府中建设公众学堂，以不集众力不足以成事，乃于府中组织一会，筹办其事。今春之交，议有端绪矣，然力之不厚，非所以终其事，且非所以振动全郡也。以沪上为人士荟萃之区，乃公举何君豫材至沪议此事，由蔡君鹤庼邀集同人设会于徐园。”“乃众议速设绍府教育会于沪上。”[10]绍籍旅沪人士经元善、杜亚泉等50余人参与其事。蔡元培在演说中表示：“吾辈责任，莫大于高绍兴人之人格而使无为世界上了无关系之人。”“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以媒介之尤不可。且上海者，欧化输入之第一步，无论士商□必多见闻，工比例，视内地各省为开通者也。”[11]

蒋维乔的经历则从个人角度反映了同一趋向。他在常州时，即联合同人，组织修学社，又开办体育传习所、藏书阁，大开演说会。加入中国教育会后，到上海爱国学社任教，并与严练如、谢仁冰等进入乐歌讲习会学习。暑假来临之际，“会中诸同志各抒其意见，谋所以不负此暑假者，有欲归而兴学堂，有欲归而兴演说。”蒋与严、谢等商议，回里开办音乐研究会、体育会、演说会。[12]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放假归来的学生志士也举办音乐会、体育会，高唱爱国歌曲，提倡尚武精神。[13]先此，屠敬山等人曾在常州举办过演说会，因善于演讲者少，未能打开局面。后经假期回乡诸志士的带领指导，有了很大起色。“诸志士各赴学堂后，其居留里中办教育者仍于每星期开会演说，照常体操。”[14]一些地方社团的组建，就是因为外出就学求知者增多。如南翔镇“夙称繁盛，比年学风大开，复笈四方者渐多”。据统计，“出外求学者不下三四十人，近乡一带，罕有伦比。”[15]新人多了，便产生结社需求，“同志因组织一会，借以养成公德，交换

新知，爰名之曰南翔学会。"[16]

在城乡趋新势力合流的推动下，不仅上海等大都市同时活跃着多种新式社团，一些中小城镇也出现若干团体并存的景象。常熟到1903年先后设立过开智会、教育会支部、明理会、体育会、通学会、师范讲习会，以及体操会、音乐会等。[17]松江有幼童会、书报会各二处，体操会三处，还有化学研究会、音乐讲习会、师范讲习会等。[18]温州瑞安有体育会六、七处，另有学生会、演说会。[19]广东西洋堡则有教育会、学会、演说会、阅报会、女学会。[20]这样，以组织形式为沟通渠道和依托，地方上分散的进步开明人士聚合起来，构成都市趋新势力延伸的支点，以及文明进化风气的收放枢纽，从而使新兴势力的能动力不仅作用于都市和上层社会，更对广大基层社会发生持续冲击和影响。由变化着的基层社会内部产生出自下而上的变革驱动，改变了革新事业自上而下单向运行的被动局面。

组织聚合所产生的能量扩增，对于那些趋新因素比较薄弱的社会群体效果更为明显。当时中国女界尚处于蒙昧状态之中，都市中具有新思想的人也为数不多，通过组织女学会，分布全城的女界新人得以聚集起来，开展活动，发表独立见解，引起社会对于女权初兴的关注。1902年福州女学会成立，到会女士10余人，听讲者60余人。[21]上海女学会首批会员20人，"多兼通中西文字，博学有志，欲振兴女学，为中国洗数千年女学暗黑之弊。"[22]两年后，张竹君在沪创设女子兴学保险会和卫生讲习会，即有会员60人。[23]广州女学会成立时，"五羊士女起而附和者数十人"[24]，不少男士也前来祝贺听讲。

在基层社会，有时一地开明人士力量不足，除求助于都市同仁外，还与邻近地方的同类社团进行联络，争取支持声援。同

时，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会员定期开会，举办各种活动，交换新知，相互砥砺，提高了思想与行动能力。在一些社团活动较发达的地方，还出现了团体联合的趋势。如福州的开智会、益闻社、崇实会共组海滨公会，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聚合了讲习会、调查会、学生会、自治会、文艺会、运动会等多个团体。[25]

二 宗旨与活动

20世纪初叶的新式社团虽然成员功能各异，活动重心不一，但却有着共同的动机意愿与总体目标，即以"开智"、"合群"[26]为两大主义，显示出社会变动已将趋新势力的利害一致性反映到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去并形成明确的宗旨。所谓开智，即传播新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1903年福州益闻社周年纪念庆典时，来宾的赠联表达了这一愿望："集全地球言论思想，益新学界智慧见闻。""中外采见闻辍读宁无经世志，宾朋罗杂沓纵谈同具感时心。""开震旦普通风气，鼓文明进化潮流。"[27]其中又各有侧重，有的主要以青少年学子为对象，积极培育新人；有的则"以灌输文明思想，开通下等社会为目的"[28]，面向广大民众；有的更进而要求全面改造国民性，认为中国"一则曰老成，再则曰持重，以酿成腐败之世界"，主张由朴实、劳动着手，养成尚武锐进精神，[29]努力破除缠足、吸毒、赌博、风水迷信、纳妾及不良生活习惯等恶习陋俗。

为实现开智宗旨，新式社团广泛展开如下活动：

1.兴学育才，发展新式教育。社团的组织者认为："世界当二十世纪之初，由兵战商战之时代，一变而为学战之时代。生于

此时，立于此国，入于此社会，人人为造就人才之人，即人人负造就人才之责。”[30]“彼学堂者，持教育之一部分而为全部发达之中心点，然则进化之理不明，合群之础不立，国家之观念不起，权利之思想不达，其影响至于民族萎缩，国势颓败，而教育实当其冲。”[31]不仅专门的教育会大力推进学堂教育，其他社团也往往以办学为要务。除发展国内新式学堂教育外，天津、上海、成都、扬州等地还成立了负责推动留学运动的游学会，依靠民间力量沟通海内外联系，为留学事业提供各种便利和帮助。

2.创办报刊出版业，组建各种形式的阅书报机构，传播文明信息。不少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社团附设出版部，编发日报杂志，开办图书局印书社，编辑出版各种西学新学著作。无力办报出书者则开设图书馆、阅书报社所，购置各种新书报，供人借阅。据不完全统计，1904 年以前，江苏、江西、广东、福建、四川、湖北、浙江、山东、湖南、安徽、北京、河南、贵州等地建有阅览书报机构 116 处。[32]其中有的已颇具规模，如浙江温州永邑书报公会，经过近两年的经营，“计新旧书籍二万余卷，寒士艰于购书，逐日来阅者络绎不绝，风气开通，出洋留学日见其盛，该书会之功诚不鲜也。”[33]

3.集会演说。由于清末以近代标准测定的识字率很低，加上经济条件所限，书报的直接影响面比较窄。为此，各团体都以演说作为重要补充手段，以“报章能激发识字之人，演说则能激发不识字之人，所以同志拟推广演说。”[34]除专设演说会外，不少团体还附设演说机构。形式上也呈多样化，有的固定场所时间，每次更换主题，或事先排定主讲人，或临时聘请过境名士，或由会员轮流演说，来宾及听众亦可即席登台，自由发挥。衢州江山宣讲会每月两期，“临会者颇不乏人。”[35]江西德育会“其演说

有七日演说（逢礼拜日演说）、义务演说（偶有心得事关国政民业风俗即约集同志一为演说，抒其一片热心血，逞其一刻好兴会，无一定时日）、特别演说（或国家与地方有大事关系极重者，临时开此会）之分别。”[36]有的则深入乡镇巡回演讲。浙江嵊县的练习演说会，除间日聚会演说外，还拟“扩张各地之演说，以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社会。”[37]济南教育研究公所每月在本所演说一次，又计划“多设演说场，以便广开民智。”[38]有的更因时因地，随处开讲。衢州不缠足会会员余天民乘举行订婚仪式亲友聚集之机，“极力演说不缠足之利。”[39]为了加强效果，组织者或事先散布传单，刊登演说要旨，以便于理解；或延请声望较著的新学名士及归国留学生作特别演说，以吸引听众。上海中国教育会会员不仅定期在张园举行演说会，而且经常应邀到各学堂演讲。由于主讲人能够抓住时政热点，传达最新信息，而且声情并茂，引人入胜，因而听众每每多达数百。

4. 开展体育和军事训练，强健体魄，洗刷文弱之风。中国重文轻武的风尚与近代国际社会斗狠争雄的氛围不相协调。在军国民主义的鼓荡下，士群吹起尚武好勇之风，教育宗旨相应提倡德智体并重。社团也注重体育，或附设体育部，或专立体育会，进行体操和军事训练。1903 年夏，休假回乡的武备陆师学生仅在温州瑞安城一地就开办了六、七处体育会，培训同乡青年。[40]

5. 借用戏剧、音乐、幻灯等形式传播近代意识，改良旧俗。上海、广州、绍兴等地的戏曲改良会，上海、常熟等地的乐歌讲习会、音乐研究会，湖北、镇江等地的活动写真社，都利用新形式或改造旧形式，向民众传播新气息，鼓动移风易俗。有人评价道：“种种科学发达之精神，尚武激昂之志气，将于唱歌一科中系之，唱歌诚吾国学业方针之指引哉。”[41]以音乐辅助演说，对下层民

众宣传时效果更佳，“且有下等社会及妇人孺子亦携手而来，其视演说，则以为说书也，其视风琴，则犹说书者之弦索也，故虽盛暑，皆眉开眼笑，闻声低徊勿去，盖声音之感人深矣。”[42]大大增强了启蒙宣传的影响。

6.开展调查，兴办实业。一些规模较大的团体下设调查、实业等部门，访查当地物产经济和社会人文状况，兴利除弊，发展实业。不过，由于缺少资金和人才，多数团体的实业计划只能限于出版业，很少举办工商业成功的例子。而且，一些组织虽然名义上将兴办实业作为长远目标，实际上只是为了开辟财源，解决经费困难，以支撑组织的活动，并未真正致力于实业开发。这种情况也反映出这些新式社团的成员主要是从事非实利性新事业，缺乏经营工商业的经验与意向。

7.开办综合科学馆或专门研究会，以引进和发展近代科学。福建、广东、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不仅出现综合普及型的科学研究会，还开办了地学、医学、农学、蚕学、理化、算学、化学等专门学会，其中不少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研究机构的开先河者，培养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

新知识界社团的第二大宗旨是提倡合群。近代中国积弱于民心离散，民力不坚，民权不振，欲救国难，必须从合群开始，这成为进步知识界的普遍共识。合群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一是利益群体自身的聚合，如学生、妇女、教员、报人等，共同的利害关系使他们意识到彼此为同类群体中的一分子。上海女子兴学保险会认为女子之险状，“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根源在于女子“不知学”、“不能群”，因而“以提倡女学，激发患难相救之情，合力实行为宗旨”，“痛洗从前腐败涣散之习。”[43]决心“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

而更张之。"[44]任教于湖南的外省籍教员组织旅湘俱乐部,"其宗旨专为联络情谊,交换智识。"[45]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更"以联络环球各处学生声气为目的。"[46]上海南市商学会的宗旨则为"合商群,讲商学,抵制外力,挽回利权。"[47]会员在演说中批评商界中人面对洋商竞争,"不晓得联合团体,共图抵制,只晓得各谋私利,因此行情不能划一,往往有互相倾轧的毛病。"[48]呼吁改变内耗局面,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地缘纽带的转型,是又一类型与层次的合群表现。具体有两种形式,1.客居异乡的同籍人士彼此加强联系,形成群体,结为组织,如各地的同乡会、上海的福建学生会、绍兴教育会等。有些非地缘性社团,由于受到同人的拥戴,也成为本籍人士聚会的核心。如上海的国民丛书社,不仅被旅沪鄂人公认为联络中枢,而且成为他们与原籍进步知识界及海外鄂人联系的中介。2.本地进步人士互相结合,以合群谋求地方自治。他们以"改良教育、发达人才为宗旨,提倡国民独立之精神,结集合群之诣力,推演进化高尚之思想","目的在文明普及,务使学界男女青年各具完全国民之资格,将来地方自治、国民同盟起点于是,亦无不可。"[49]这两类社团往往互为声援。一些旅外同乡社团,除加强维系当地同乡间的互助关系外,主要还是推动原籍的地方自治,以组织形式对原籍社会发展的重大事务施加影响。1903年5月无锡在沪同人组成新无锡会,就标明"以联络无锡人士,为新无锡之基础。"[50]该会发起人认为,欧美法制社会的中枢是宪法,"而宪法之成立,必以地方自治为起点。苟一国之人有一不知地方自治之义务,即不能享宪法之权利,且不足当立宪国民之资格。然则无论一国,即举一国分解之一地方,其民不知尽宪法上之义务与享宪法上之权利者,即不得谓之真自治。"[51]因而规

定："以改良学界，革新社会，造就国民之资格，组织地方自治之基础为宗旨。"[52]由此可见，这些新式社团的地缘性并非依附血缘纽带的家族宗族机制，而是共同社会政治追求的载体。所以有些区域性新式社团即在旧式组织如会馆公所之外成立，表明组织者已经认识到旧式组织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如设于上海的绍兴教育会，开例会的地点就在穿心街浙绍公所。[53]按照蔡元培的看法："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54]而立会的目的，就是要向绍兴输入文明进化，提高绍兴同胞的人格。会馆公所主要是依据地缘行业纽带维系与控制同籍同业人的利益，关注重心在当地。新式社团则更多地关注和推动原籍社会的变化发展。前者以社会关系的亲疏为尺度，后者则以思想倾向的离合为准绳。

国家民族观的升华，是合群的最高体现。小群体及地方性社团的建立，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多元状态，另一方面，群体意识又是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刺激下生长发育，"自小群以成大群"[55]，局部合群成为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阶段，在将国家主体由皇权转移到民权的同时，既打破了狭隘地方主义的局限，又解脱了传统社稷观的桎梏。1902 年蒋维乔在常州聚集同志，结合团体，便"以邑民同盟为国民同盟之基础。"[56]许多地域功能团体都将目标对准全国，如中国教育会、博爱馆等计划"置本部于上海，设支部于各区要之地。"[57]天津游学会准备"置本部于天津，拟逐渐推广，设支部于各省各埠。"[58]邹容倡议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更以海内外全体学生为对象，"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各设分部"，"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59]福建学生会的组建，一方

面凝聚本籍趋新人士,另一方面则希望对国家的革新事业发挥更大作用。其发起人认为:“年来福建人在上海的在汉口的在南京的很多,有的在学堂里读书,有的在各处铁道局办工程,有的在各处电报局管理电报,有的在南北洋海军操练驾驶,大家没有个总机关,很觉得十分不便。”因而聚议道:福建人在做文章、演说、以及开明人士数量方面都赛外省不过,“但是,我们这少数的明白国事诸君,若肯个个发愤,实力实心,办起事来,倒比他们力量大些。”只要发挥福建人在工程路矿、电报、海军等事业中的优势,“有了这几件权力,还怕不能制造出一个新中国么。”“倘使能够联合个大团体,慢慢的研究中国前途,把下手办事的方针拿得稳定”,加上闽人在美洲、南洋的商力,便可扬长避短,“将来随便筹一二千兆办事,也是易如反掌的。”[60]

如果说上述团体还是以某一特定群体成员为对象,那么还有一些组织则试图超越群体或阶层的范围。中国通学会确定宗旨为:“对内则开通学识,研究名理,对外则扩张运动,抵御外敌,组织一巩固秩序之社会,养成我高尚国民之资格。”[61]民族自治会“始焉以研究自治之法律为发源,中焉以牅成自治之基础为著手,终焉以实行此自治之宪法为结果,大抵以个人之自治积及而望成一国之自治。”计划“合同志四五十人先在沪渎设立首会,以后由会中诸人各在本乡设立分会,先尽其自治之职于乡里,而后施及他邦。”[62]1903年拒俄运动中成立于上海的四民总会,“欲合农工士商全国之民共为一大团体也。”[63]随即又改名为国民总会,从近代民主意识中找到了共同的徽号,使长期分离隔绝的四民首次聚集在国民的统一旗帜下。

受近代国家民族观的浸染和大都市社团全国性意向的影响,许多地方小团体虽然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其成员却不以畛

域自囿。拒俄抗法运动中，常熟教学同盟会与开智会联合召开会议，举行演说，准备订立共和宪章，集体加入上海国民总会，并声明："若会员有不愿入四民会者，即请出会，勿污染吾同盟之洁玉。"[64]当有人别有用心地说：法兵在广西不在常熟，即使在常熟，凭诸君之力亦不能抵抗时，立即被斥为同胞之公敌，而反驳者的发言博得满堂掌声。

三 两大特征

与戊戌学会及预备立宪以后的社团相比，这一时期的社团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民间性质，很少官方色彩；二是其成员以新知识界为主体，士多绅少，而且绅也主要是与文教新闻事业有关之人，商或与商、官关系密切的绅较少介入。

清代鉴于明末士林结社干预朝政，造成政局动荡，党争激烈，因而严禁集会结社。顺治九年、十七年，曾两度下令，规定："诸生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并制定出严惩重罚律例，"以后再有这等的事，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65]此后士林中只有以文会友聚合，远离时政。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冲破禁令，在各地举办了几十个学会，但他们提出兴绅权以伸民权的口号，依靠官绅的政治影响，与清中叶后地方士绅势力抬头的趋势相吻合。不久，政变发生，清廷再度明令严禁党会，大兴党狱。庚子勤王失败，党狱再起。辛丑以后，清廷虽然恢复新政，却未开放党禁。1904年，商会获得合法地位。此后，绅商的立宪及地方自治团体大量组建，迫使清廷于1909年制定结社集会律，承认其合法性，但对

学界结会仍予禁止。绅或绅商大量介入社团组织活动，既反映了自身实力的增长，又与当朝执政态度政策的张弛密切相关。而1901—1904年间出现的新式社团，并未得到官方许可，而是趁清政府的社会控制相对松动之机，顽强地自我生长，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

由以士为主的开明士绅和学生组成的社团，与得到官方承认或鼓励，以绅商或绅为主体的社团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首先，前者侧重于自由平等的理想追求，而后者侧重于实际利益与权力的争夺控制。因此前者以输入文明、培育国民为主要目标，大都从事教育宣传活动，很少介入权力竞争。后者则试图通过结社达到分享权力的目的，不仅继续保持对基层社会权力的垄断，而且借兴民权之名扩张绅权，参与地方乃至中央政权。其次，前者努力成为全体国民的代表，较少群体私见，后者则首先表达和维护本群体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其目标。前者反对皇权官权，争取民权，对上要求民主，对下代表民意，社团内部也实行民主制。后者则对上分权，对下集权，担心实行普遍民权反而会威胁其既得利益。内部组织受派系个人力量均势的制约，但权力来源更多地决定于地位、声望、财富及社交等因素，并非组织成员意见的向背，因而权力分配只是派别与个人权力资源强弱多少的反映。再次，前者明显具有对抗官府离异朝廷的意向，后者则与官府朝廷保持既相互依存又明争暗斗的关系。前一类团体声称："中国之不振，由于民族之不能自治，民族之不能自治，由于历代伯天下者之阴谋涣此自治体质于无形，夫善后可以操纵自如，逞其私欲，所谓莫余毒也。已降至今，吾民人几不识自治。"[66]矛头直指官府朝廷。即使商学会，也敢于冒犯时忌。有人在演讲中指出："外国商人是能够

独力不受政府的管束，政府要办事筹款，都要柔声下气的共商家商量，平时没事时候，还要尽力保护。"而中国则战败赔款向商人搜刮，"委员私肥是一份，差役勒索又是一份，稍稍不如意，就说我们抗捐，小则缚赴公庭，大则拨兵剿洗，哈哈！这也算是大清皇帝陛下的深仁厚泽了。我们商人试扪扪心头，这种世界，你还不想合群独力，脱去许多专制，跳出十八重地狱。"[67]不合法状态使这些小团体随时可能遭到破坏取缔，而冲突又进一步刺激了其成员与官府的对抗情绪。使之在反对顽固官绅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对待朝廷官府的态度立场。两类社团的差异，表明近代中国的士与绅，或投身文教事业的士绅与从事其他利权事业的士绅（或绅商）在发展趋向上有所不同。

以新知识界为主的社团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内部普遍实行民主原则与程序，具体表现为：1.明确规定会员地位一律平等，享有承担同样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会员皆可干涉会内事务"，"会长会员均平等相待"[68]，"无厚薄高下之别。"[69]有的社团公开标明章程为"共和"，"内界则期交换智识，发明新理，养成独立不羁之人格，外界则期互相联络，扩张群势，组织运动自由之团体。"[70]2.职员由会员以无记名、记名和举手等方式选举产生，多数取决，任期较短，一般为半年至一年，有的还规定连任次数。规模较小的组织多为直接选举，成员较多者，则实行间接选举，即由会员选举职员，由职员推举职员长以及决定内部分工。3.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组织机构，设有评议、干事、纠仪（监察）各部，相互监督制衡。4.一般会务由评议会公决，重大问题则须经全体会员大会讨论表决，职员负责执行贯彻决议，职员长的责任主要是协调而非领导。5.入会须由会员1—2人介绍，履行一定的手续，并制定了严格的自治规则，规定会员必须按照议会决

议进行活动，“会员有个人之意见，只可提出于开会时会议，不得于未经议决之事有单独之动作。”还要缴纳会费，遵守规章，“如有不守会章或放弃责任或毁损全会名誉之事，曾经监察员规劝而不从者，即于评议会提出决议除名。”[71]一些社团根据具体情况附有特殊规定，如女学会要求会员入学读书，不准缠足，婚嫁自主等。[72]

尽管这一时期的新式社团存在结构松散，维持周期短等缺陷，但与戊戌学会相比，则显得成熟定型。通观戊戌各种学会章程，可见确属新式社团的雏形。多数学会仅规定宗旨、应办事业及若干特殊规则，如戒鸦片烟会禁食烟，不缠足会禁娶缠足女子等，而未提及组织原则、形式与机构设置、一般性纪律等，近乎志同道合者自愿组合的联谊会。有的明文规定：“本会尚平等之义，不立会长”，只是公举1人管理“人物谱，功课册。”[73]有的则为以文会友的翻版，如京师西学会每星期聚会一次，交流读书心得，以“四小时为率，菜无过四簋，酒无过三行。”[74]未能体现组织纽带的功能作用。部分学会虽对组织形式有所规定，但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或仿效西方社团而不得要领，如有的以泰西教会、红十字会为楷模，[75]不了解宗教慈善组织与社会政治结社的区别，或继承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名称，办事处取名公所厅，职员定名为总理、协理、分理、董事、司事、提调、坐办、会办等。除个别团体外，戊戌学会均未贯彻分权制衡的民主制组织原则，多数是由会员公举一二人负责日常事务，而没有常设机构。只有保国会组织比较完善，设有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董事等，由常议员公议决策，总理负责实行，董事办理日常会务。[76]至于1905年以后的绅商社团，虽然表面规定符合近代结社原则，实际运作仍是个人实力取决，而且官府干预力较大。各种政

派团体也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偏向。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新式社团比较直接地体现了新知识界的民主追求在组织尝试方面的成败得失。

四 社会影响

新式社团促使城乡趋新势力结合，使基层社会的趋新势力有了核心旗帜，打破了官绅民的恒定关系，在将近代文明气息传向基层社会的同时，迫使当地各界人士对新事物表明态度，从而推动社会分化组合加速进行。温州瑞安演说会到1903年9月已开常会15次，特别会2次，议事会3次，研究会8次，"于社会颇有影响，然反对者亦颇多，约略分之，共有四派，一曰伪文明派，颇知演说会之有益，而因其非已所办，极力□□□。二曰顽固派，诋演说会为离经叛道，八股时代无之也。三曰浑沌派，谓演说会为耶稣教。四曰无理论派，不知事实与言论之界限，视演说会为行政厅，地方兴一事件，必作揭帖嘲弄演说会。"[77]这样，基层社会成员之间的旧界标开始动摇，依据对新社团及其所办各种事业的不同态度和反映，重新归类分界。新式社团的组建及其兴利除弊活动，尤其对把持地方权力的绅董的地位以及顽固势力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引发了进步与保守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冲突。浙江衢州江山宣讲会演说时，提出："惟有广设学堂，购阅各报"，才能自救，免遭东三省之惨祸，鼓动人们"向县官争回现有之学堂公款，毋任某某盘踞。"[78]黎里镇演说会也因指责中国学堂腐败而触犯原书院董事山长。[79]新旧双方为此展开激烈较量。当时"虽变法诏下，然村学究、乡老儒犹不知何谓时事，

何谓新政，遇办学堂开报会事，群出阻力，动多掣肘。”[80]地方绅董控制着财政大权，“非茸阘无能为，即鱼肉乡里肥己，儒者惜名，富者惜财，语以赛会演剧，则慨解悭囊，语以兴立学校，则去之若将浼焉。”“而无知之徒，或诋笑而排挤之。”[81]他们或者倚仗权势，或者煽动愚民，以各种手段干扰破坏革新事业。鄞城教育会、同里演说会、常州演说会、新会外海阅报会、常州体育会、福州海滨公会、苏州陈墓镇体育会、黎里演说会等，均遭顽固势力的反对。有的散布谣言，诬指演说会为“骂人会”[82]，“甚有谓其下药于茶，令人食之即迷信其宗教云。”[83]有的将“干涉主义告知各会员父兄，使其钤制以施其压力。”[84]有的干脆利用权力，强行封闭会场，禁止借书院庙宇进行演说，并扬言：“书院是我所管辖，岂容他人来演说。”[85]地方官吏一则担心权威动摇，二则害怕聚众滋事，也不断施加压力。嘉兴演说会、长沙旅湘俱乐部、赣学会、荆州图书仪器馆、无锡体育会、以及许多学生自治团体，均为官府以会党谋叛、不符章程等罪名封禁破坏，不仅掠夺财物，而且名捕人员。无锡体育会成立时，当局竟指称：“佯言卫生，实则操练兵法，以为将来革命之先声。若不严行正法，恐将来为患匪浅”[86]，下令密拿。

面对趋新势力的结合呼应，同受冲击的官绅也加紧勾结串通，共谋破坏。常州演说会大受社会欢迎，“而某绅者，素以顽固名识，演说会其必欲破坏之而后快，寓书于公学董事某，极力阻扰。公学总教华君若溪持某绅书示演说会会员，会员草一书复华君，痛驳某绅之说。绅计不售，乃腾播谰言，谓演说会会员皆系悖逆之士，且怂恿武阳两县照会公学董事严禁。”[87]马幼鱼等在鄞郡办教育会，当地新中举人历适豫、高振孝等威胁道：“开会演说，有干例禁，若不速行解散，我辈必将禀请当道如法拿

究。”[88]河南巩县演说会“颇有风动一时之概”，县令“遽以谗惑人心为词，极力干涉。诸顽旧复相和，反对王、张。诸志士寡众不敌，遂不得不渐行停止。”[89]

总的说来，由新式社团引入的革新事业在民众一方的反应平和甚至积极，公开持反对立场的主要是地方恶势力以及顽固官绅。而一般地方官吏和绅董，出于担心权力旁落的忧虑，则予以纵容庇护。这与清政府通过地方绅权推行新政在基层社会引起的反响明显有别。清政府实行新政，作为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一环，带有强制性和掠夺性，掌握地方权力的官绅将由此增加的财政负担转嫁到民众身上，使其已经苦不堪言的生活更加艰难，因而激起普遍反抗，毁学、抗税、抵制户籍调查的风潮层出不穷。而前此新式社团兴办的各项革新事业，内容相似，却受到乡村青年乃至一般民众的欢迎。常州演说会假地武阳公学，“自正月初七日起至十三日止，每日来宾之就旁听席者，动辄逾五百人以上。演说至慷慨悲愤之处，四座拍掌之声如雷，方谓风气渐开矣。”[90]这些“入席听讲者，上自士林，下至贩夫走卒，每日有五六七百人，座为之不容。”[91]河南巩县演说会“一时旁听二百余人，闻瓜分灭种惨祸，有泪下者，于是宋寺湾、黄冶等村相继演说。”[92]因而有人评价道：“演说者老朽顽固之仇敌，而青年学生之好友也。”[93]不仅启蒙宣传如此，在改良风俗及举办各种兴利事业时，以劝说示范为先导，以自愿原则募捐筹款，民众易于接受。以后清廷赋予地方绅董办学、调查等特权，虽然减少了后者对新政的阻力，但绅董趁机掌握更多的地方权力，鱼肉乡里，加剧了官绅与民众的矛盾。诚然，新式社团的革新活动侧重于精神教育方面，所引起的实际利益的重新分配幅度较小，仅仅触动了绅董权力资源的一部分，但这也表明民众并非本能地抵

制革新，反对新政不等于守旧，迫使他们起而反抗的主要原因，不是除旧布新的性质方向，而是由此造成对起码的生存条件的侵害与威胁。同样，地方绅董对新政接纳与否，也以利害关系为前提。由排斥反对进步人士的革新活动，到转而积极参与朝廷主持的新政，均取决于自身利益的得失。他们担心自下而上的革新引起既得利益的流失，却试图凭借自上而下的变革侵蚀分享国家权力。清政府通过士绅推行新政，不能有效地起到近代化所必需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作用，反而因后者滥用权力而普遍激化了社会矛盾，权力延伸的企图蜕变为权力瓦解的契机。单纯用新旧标准，很难测定各个社会群体在近代变革中的态度、位置与作用。辛亥革命之际，新知识界与旧士绅的分离对立倾向被反满革命所掩盖，双方暂时成为同路人。民国以后，潜在的矛盾迅速上升激化，由开明人士转型而来的自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由士绅支撑的正统秩序始终无法谐和，只好再度竞逐较量，以求实现民权。

上述分析，可以从浙江黄岩、江苏南汇两个典型个案中进一步得到映证。

黄岩位于浙江沿海的台州湾，地处丘陵，交通不便。1903年1月，爱国学社一位邱姓同学由上海抵达黄岩，与当地诸同志“舆论天下大势及在内地办事方法，养精蓄锐。”先此，黄岩设有阅书报所，因经费不足，各同志遂“轮往各缙绅家劝捐。”“所捐不过百余元，已极艰难，而蜚语中伤，在在不少。”至此，同志集议，在城西锦江桥文昌祠设立教育社为总会，“此为黄岩办事之起点”，并草拟黄岩自治表，分教育、实业、军事、交通、宪法、裁判、美术7部，设蒙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阅书报所、演说会、议事会、不缠足会、翻译社等。“部署未定，阻力遽起。”文昌祠原为

王、林、管、陈等姓出资修建，林某以该祠为其先祖所倡，出面刁难，诉请知县即行封禁教育社。1月14日，演说会首次开会，到听者达300人。讲演者称："演说为求真理，真理之极，即孔子亦可背焉。而闻之者大哗。"2月13日第二次演说，听讲者百余人，林某固请知县治以妖言惑众之罪。但教育社事先将蒙学堂开办始末及章程禀呈。知县沈锜"因上宪之敦促开学堂也，志在上详以讨好，又觇及教育社人众而势大，稍颔之，而劝同志勿演说焉。"蒙学堂开办后，"闻风者陆续来学"，学生很快达到70人。3月13日，第三次演说会开会，林某四出散布谣言，"三塾师随其后，一时众口烁金，不堪入耳。""首演邱吼神即至决裂，人或欲饱以老拳，因解散。"4月演说会被迫暂停。

4月下旬，学政案临台州，当地士人群集。"同志知其可以开大舞台也，乃办台学社焉。"5月4日、7日、12日，在台州玉皇庙连续举行演说会，由当地志士和归国留学生演讲"西人虐待之惨及瓜分之预备，瓜分后之情形"，"比较日本中国之长短及维新之宗旨"，"说明台学社之关系于台州及世界上，且表外界风潮之盛，台州将无立足地焉。"然后宣读台学社章程，正式立会。到会听讲的生童达七八百人，签名入会者约200余，"大半为黄岩人"。此后，黄岩教育社捣毁了文昌像，蒙学生在杭州大学堂退学生的鼓动下，不顾家庭反对，"削发归宗"，"割辫革命"。拒俄抗法运动兴起，教育社认为："均为中国前途一大影响，同志既有国民分子之责任，焉能无所补救？"于是开演说特别会于城隍庙。此庙"为顽固老大之巢窟，一时单刀匹马直入挑战，真出人意料之外。浑沌派遂大书一揭帖曰：'广西与台属相去数千里，即借法兵，与尔等有何关系。若有法兵入台属，试问尔等蝼蚁何御之？'"教育社同人不畏攻诋，坚持演说，"皆谓事关大局，愿告诉

于我国民，请我国民输财以争之。一时诺诺，连声赞助，声闻数里。立输电费者约墨银三十余元，即电告政府力争权利云。虽然以石投大海，毫无影响已耳，而黄岩之风潮，遂如达于一百二十度之高潮，沸跃异常。外人见教育社员者，咸欲得而甘心，而前日之同列社员者，均有朝为朋友暮则雠仇之意。"于是同志"思欲以武装为平和，乃倡为体育，齐用操衣，当大路而唱军歌，日日操于大校场。以文弱书生而当兵卒，乃黄岩自有生以来所未见者，人皆以颠汉目而避之。"[94]知县沈锜听说该社在城隍庙开会，"欲拘禁诸生，几开党祸"，后以演说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之弟，"乃止不问。"[95]

黄岩风潮革新保守双方还算势均力敌，江苏南汇则由劣绅与官府勾结，大兴党狱。南汇位于上海近郊，该县新场镇设有讲学会，逢星期日举行演讲。"开会之日，有素恃蒙馆以为生者，有素称八股名手者数辈，见会中人之举动，莫不惊心眩目。"在其阻挠破坏下，演说、体操两部被迫暂停。不久，任南汇学堂教习的留日归国学生顾次英在当地巡回演讲，"由新场而周浦而大团而川沙，每会上下流社会环而听者辄数百人，炎风烈日中，流汗骇喘无斁也。"新场讲学会员聆听之后，邀请顾氏和川沙学堂总理黄炎培、龙门书院肄业生朱祥绂再来演讲，并先期广布传单，"略谓今日中国危迫已极，瓜分之说，将见实行。我辈既同为中国人，自当共洒热血，以救此最可爱之中国。"演说前一日，讲学会员与黄炎培等前往永宁寺，揭露以左道惑人的西天门教师，与土棍黄德渊发生冲突。次日在城隍庙演说时，顾次英提议联名公请除去邪教，学生遂将庙中所藏鬼瓮打碎。黄德渊扬言："汝曹曾见此等学生乎？从来无好事若此者。彼等今日干涉，明日干涉，将来不知闹至如何地步，吾新场人衣食从此绝矣。且吾闻官

场亦不喜此等学生，其为不安本分无疑也。”当晚，黄以触犯神怒为词，鸣锣聚众，纠合邑中无赖三百余人捣毁讲学会，伤人掠物。“绅董自叶君外均佯为不知。盖绅董本与会友不合，以既开学堂，必筹公费，而各项公款，均若辈所窟宅，身家妻子衣食关系之处，不得不拼命力争。故自学会设后，啧有烦言。德渊廉知实情，有恃无恐。绅董实阴借其力，藉此阻挠学会也。”黄炎培等联名控告，南汇县令戴运寅将黄德渊等拘捕。公堂之上，黄德渊指称：“此辈聚众演说，上不忠于君，下不敬乎长，又复亵渎神明，惊动菩萨，打毁寺庙，创异说惑人，设甘辞诱人，以致上干天谴，下动众怒，故小人不敢不鸣鼓以攻。”戴即表示：“吾已洞知此辈之情矣。此辈皆革命党，若详奏上司，待有回文，彼为首者之头即可断矣。”[96]于是当堂释放黄德渊，而命人将黄炎培、顾次英等4人逮捕。审讯之时，戴高声咆哮：“你们讲什么学，你们谤毁皇上，谤毁皇太后，你们是革命党，你们想造反。”并拿出南洋及水师营务处查拿留日学生和上海爱国学社革命党的札饬，威逼恫吓。在教会人士的干预下，黄炎培等侥幸脱身。而戴与黄德渊等捏造凭据，罗织罪名，“合邑风声鹤唳，谣传四起。学界诸君惧祸及，大半渡浦寓沪上，士类一空。”[97]革新势力遭受重创。

上述典型事例表明：1.文明变革先锋主要是开明士人与青年学生，他们奉行西方近代思想家们倡导的理想社会原则，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均衡，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但他们的追求过于理想化，虽然博得民众的普遍拥护，却只能起到社会启蒙作用。按照理想化模式建立起来的社团，代表了民主化的追求与趋向，引发了矛盾冲突，但很难承受激烈对抗所产生的政治及心理重压。2.地方绅董对革新变政的态度，随他们在其中所处地位及所扮演角色的变化而改变。他们不愿意新知识界的发展对自身

利益构成冲击挑战，而企图借新政来巩固提高权力地位。3.清王朝不乏变革图存的动机，并为此作过努力，各级地方官也想借机表现或敷衍交差，却害怕由此产生的各种必然后果，特别是民间进步势力的兴起导致其权威动摇，社会失控。顽固官绅趁机破坏干扰，令民间革新受阻，新政变质。4.民众较易接受由新知识界发动的理想化变革，而对朝廷官府相同趋向的变政，由于切身利益受到强行侵害，抵拒心理强烈。由此可见，清末士绅商合流与分化的趋势相互交错，新知识群的社团反映了民权兴起的趋势，而地方绅董则更多地代表着清中叶以来绅权扩张的延续。真正能够转变到近代契约关系者为数不多。绅权扩张虽有削弱皇权、辅助民权的作用，但也存在与民权对立的一面。其对上分权对下专制的机制，是造成割据的重要社会条件。在中国，社会组织在向民主转型时，人们很难把握外来模式在权力来源与权力运作上民意与集中的关系，或保持民主方向而涣散无力，或有效运用权力而偏离民主轨道。新知识群与士绅矛盾的激化，成为民国以后社会冲突的焦点，最终导致一部分人与民众结合，掀起自下而上，以摧毁绅权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另一些人则坚持由民意和信念相支撑的社会良心，与权力主宰的现实始终格格不入。

注 释

[1] 李文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戊戌维新运动史论文集》。

[2] 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王笛:《关于清末商会统计的商榷》,《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7辑。

[3]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p.63.

[4]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第253页。

[5] 《警钟日报》,1904年6月12日。

[6] 《福州东文学堂学生退校及入校事件》,《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8日。

[7] 福州一学生:《福州学界之蠹》,《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4日。

[8] 《福建挽回路权要闻》,《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5日。

[9] 《吴江县同里镇教育研究支部附设之青年会叙》,《苏报》,1903年3月21日。

[10] 杜士珍:《论沪上建设绍兴教育会事》,《新世界学报》,第11期,1903年2月27日。

[11] 《蔡君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苏报》,1903年3月12日。

[12] 《论音乐之关系》,《女子世界》,第8期,1904年8月11日。

[13] 《警钟日报》,1905年1月16日。

[14] 《论常州武阳两县令之荒谬》,《苏报》,1903年5月20日。

[15] 《南翔学生来函》,《警钟日报》,1904年7月14日。

[16] 《南翔学会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7月16日。

[17] 《常昭调查一斑》,《江苏》,第11、12期合刊,1904年5月15日。

[18] 《学界汇闻》,《警钟日报》,1904年8月14日。

[19] 《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24、27日。

[20] 《记女学会》,《女子世界》,第8期,1904年8月11日。

[21] 《记女学会》,《中外日报》,1902年3月7日。

[22] 《选报》,第20期,1902年6月26日。

[23] 《记卫生讲习会》,《警钟日报》,1904年5月23日。

[24] 《女学立会》,《汇报》,第416号。

[25] 《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8月6日。

[26] 《镇江讲学社缘起》,《汇报》,第426号。

[27] 《福州益闻社祝典》,《苏报》,1903年5月4日。

[28] 《戏剧改良会开办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8月7日。

[29] 金松岑:《同里教育支部体育会演说》,《苏报》,1903年3月17日。

[30] 《扬州师范学会启》,《苏报》,1903年3月18日。

[31] 《教育会支部研究会序》,《苏报》,1903年3月2日。

[32] 此数字系笔者据当时数十种报刊的零星报导统计。本章其他统计数凡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33] 《温州之教育界》,《警钟日报》,1904年8月17日。

[34] 《鷗居日记》,壬寅八月初九日。

[35] 《详志江山演说会》,《东浙杂志》,第4期,甲辰十二月。

[36] 《记德育会》,《警钟日报》,1904年9月20日。

[37] 《练习演说会之发达》,《警钟日报》,1904年11月9日。

[38] 《教育研究所之月会》,《警钟日报》,1904年6月28日。

[39] 《志士新婚之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1日。

[40] 《记体育会》,《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4日。

[41] 初我:《记常熟公立校发起音乐科事》,《女子世界》,第8期。

[42] 《论音乐之关系》,《女子世界》,第8期。

[43] 《女子兴学保险会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

[44] 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警钟日报》,1904年4月24日。

[45] 《阻止俱乐部集会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6日。

[46] 《沪江烟景》,《汇报》,第8年第48号,1905年7月26日。

[47] 《白话道人附记》,《中国白话报》,第9期,1904年4月16日。

[48] 沪南商学会会员演述:《经商要言》,《中国白话报》,第9期。

[49] 《教育会支部研究会序》,《苏报》,1903年5月20日。

[50] 《童子世界》,第 31 号,1903 年 5 月 27 日。

[51] 《新无锡会之缘起》,《苏报》,1903 年 7 月 2 日。

[52] 《新无锡会章程》,《苏报》,1903 年 5 月 28 日。

[53] 《绍兴教育会》,《苏报》,1903 年 5 月 20 日。

[54] 《蔡君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苏报》,1903 年 3 月 12 日。

[55] 《天津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2 年 7 月 5 日。

[56] 《鷓居日记》,壬寅十二月除夕。

[57] 《中国教育会章程》,《选报》,第 21 期,1902 年 7 月 5 日。

[58] 《游学会章程拟稿》,《苏报》,1903 年 3 月 19 日。

[59]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 年 5 月 31 日。

[60] 《文明介绍》,《中国白话报》,第 8 期,1904 年 3 月 31 日。

[61] 《中国通学会章程》,《政艺通报》,癸卯第 13 号,1903 年 8 月 7 日。

[62] 《孙君子殖来函》,《苏报》,1903 年 7 月 7 日。

[63] 《海上热力史》,《苏报》,1903 年 5 月 6 日。

[64] 《常熟教学同盟会与开智会共和特别演说》,《苏报》,1903 年 6 月8 日。

[65] 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 149—150 页。另外参见萧公权: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42. Edward J. M. R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p. 24.

[66] 《孙君子殖来函》,《苏报》,1903 年 7 月 7 日。

[67] 沪南商学会会员演述:《经商要言》,《中国白话报》,第 9 期。

[68] 《两浙女学会简章》,《警钟日报》,1904 年 8 月 25 日。

[69] 《中国教育会章程》,《选报》,第 21 期,1902 年 7 月 5 日。

[70] 《常州开智会共和宪章》,《苏报》,1903 年 4 月 15 日。

[71] 《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改章程草稿》,《苏报》,1903 年 5 月 15 日。

[72] 《两浙女学会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8月25日。

[73] 《法律学会章程》,《湘学报》,第38册,1898年5月30日。

[74] 《京师开西学会缘起》,《知新报》,第45册,1898年3月3日。

[75] 《衡州任学会章程》,《知新报》,第56册,1898年6月19日。

[76]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国闻报》,1898年5月7日。

[77] 《记演说会》,《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27日。

[78] 《详志江山演说会》,《东浙杂志》,第4期,甲辰十二月。另据1904年12月11日《警钟日报》报导,某某者为郭景翘。

[79] 《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苏报》,1903年4月19日。

[80] 《镇江讲学社缘起》,《汇报》,第426号。

[81] 《海盐演说会撮影》,《浙江潮》,第7期。

[82] 《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苏报》,1903年4月19日。

[83] 《外海兴学》,《汇报》,第417号。

[84] 《陈墓墟演说会发达》,《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日。

[85] 《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苏报》,1903年4月19日。

[86] 《密拿新党连志》,《苏报》,1903年7月4日。

[87] 《纪常州演说会事》,《苏报》,1903年3月23日。

[88] 《苏报》,1903年5月20日。

[89] 《满人干涉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5日。

[90] 《纪常州演说会事》,《苏报》,1903年3月23日。

[91] 《论常州武阳两县令之荒谬》,《苏报》,1903年5月20日。

[92] 《满人干涉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5日。

[93] 《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苏报》,1903年4月19日。

[94] 《黄岩学界》,《苏报》,1903年6月17日。该报导据邱君日记写成。

[95] 《呜呼黄岩学界公敌之县令沈锜》,《苏报》,1903年6月22日。

[96] 《新场讲学会之历史》,《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25—29日。

[97] 《南汇县党狱始末记》,《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

第 9 章

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与国内知识分子的关系究竟如何，仍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国内外一些文章著作认为这一时期孙中山对知识分子不予重视，而国内知识界则对孙缺乏了解，双方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孙中山只能算是广东或珠江流域革命派的代表。有的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同盟会前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是一些孙派人物出于辛亥后政局变化以及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有意抬高所造成，并非历史真实。依据当时的资料，重新考察从戊戌到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与国内知识分子的关系，有助于认识其历史上的真实形象和把握国内知识界的动向。从中可见，笼罩于历史之上的后人主观因素重迭交错，能够具了解之同情者实非易事。

一 倚重态度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怎样看待知识分子，是判断他与国内知识界的关系首先应当澄清的问题。不少人根据朱和中的《欧

洲同盟会纪实》，认为直到1904年底，孙中山仍对知识分子抱着轻视的态度。朱的回忆说："总理问我辈主张革命，其进行方法如何。我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为言。总理不以为然，谓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双方反复争论三日夜，最后朱和中表示："革命党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必大多数知识分子均能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终于使孙中山改变了态度。但事隔不久，孙中山因盟书被窃，又迁怒于全体留欧学生，说："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1]照此看来，孙中山对于知识分子是疑忌重重，不予重视。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孙中山在此之前当然不可能主动争取知识界，也就不可能从积极意义上谈双方的关系了。

但是，参照其他资料，朱和中的回忆似不足以全面反映孙中山对知识界的态度。首先，孙自己就是一位读书人，在檀香山、香港等地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又努力学习中国文史，一生酷爱书籍。在他早期的几篇著述中，已经把教育和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兴衰存亡直接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中国"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因而"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主张广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2]他批评时人徒羡欧美诸国多善政，强调泰西国强民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多士人。"[3]这种认识后来体现到兴中会的组织原则中去。该会章程规定：本会干部必须是"品学兼优，才能通达者。"[4]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主要是知识人。像杨衢云等人的辅仁文社，本来就是一个新学人士的组织。特别是史坚如这样出身正途的少年英俊投身革命，令日本人士群相推重，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他与朱和中等人争论时，即"列述史坚如、陆皓东

诸人之学问以证之。”

其次，孙中山很早就把联络知识界作为兴中会的组织方针。该会成立之初，便主张“联络四方贤才志士”[5]，并主动提出与维新派合作，共谋大业。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从1898年起，与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建立联系，促使其中不少人走上革命道路。他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认为：“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6]1900年尤列到日本，和孙中山“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7]。此后孙中山努力贯彻这一方针。1902年，他以“中国士大夫尚无组织”，邀集李书城、程家柽、冯自由等人开会于东京竹枝园饭店，要求他们分别对本省学生进行发动联络，并称这次聚会为“中国开天大会”[8]。这说明孙中山不但不轻视知识分子，相反清醒地认识到新知识群体在近代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而重视新知识分子，又表明其致力的事业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当然，孙中山争取知识人的努力，也存在缺陷。1899年以前，他主要致力于武力反清，对宣传和组织工作重视不够，因而活动重心偏向会党。但是，就早期新学界的政治小团体而言，与会党结合才能更快地进入武力反清轨道，华兴会、光复会同样如此。华兴会入会者虽达500人，因为多数是知识人士和青年学生，还是要依靠会党发动起义。光复会初期，会员“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顾虑动摇，行动不坚决”，也将“注意力集中到运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会党方面，动员参加，以达到武装革命的目的。”[9]而另一些革命小团体，因未与会党联合，活动就只能停留在宣传方面。革命党人对此深有感触，他们

说:“会党党羽众多,又能脱离政府,超然自有所建树,隐然为一国之潜势力不可诬也。数年以来,爱国志士倡仆满独立之议,而赤手空拳,无所凭借,不足当伪政府剑头之一吷,则折而属意于会党,思有以运动而联络之。”[10]同时,也要考虑知识界本身的状况以及孙中山所受的限制。庚子以前,国内知识界接受排满革命主张者的确不多。章炳麟说:“方今支那人士日益阘茸,背弃同族,愿为奴隶,言保皇者十得八九,言复汉者十无二三”[11]。而孙中山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就成为清廷缉捕的“钦犯”,与国内联系十分困难,更无法踏足国土。1903年后,随着新知识群的革命化,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大大加强,但后者的活动和作用仍集中于宣传方面。孙中山认为知识分子不宜作为武装起义的主力去冲锋陷阵,也反映了知识界的实际情况。他与朱和中等人争论的问题之一,正是知识分子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即使在这方面,孙也没有轻视知识分子的作为。他认为会党固然重要,但“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12]主张用知识分子统率指挥会党。

从1898年起,孙中山鉴于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地方官防范严密,以广东作为起义的发难之地,“今日非善矣”,考虑把战略重点转向长江。但又感到“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13],这方面对长江流域没有把握。因此,他一面立足广东,一面努力扩展活动范围,为此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第一,指示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报》,加强宣传,发动国内知识界。第二,派人联络湘鄂闽粤会党,组织兴汉会,又与梁启超商议联合组党,一致反清。不料后一方面努力的结果多半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从此直到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没有再度大规模联络国内会党,而把主要精力

放到与保皇会争夺华侨和知识界之上。他对于宣传组织工作较前重视，并得到在士林中颇负时名的章炳麟等人的支持声援。1900年章氏因主张严拒满蒙人入国会，不为同人见纳，愤然断发出会，以示与保皇派决绝，随即将所撰《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解发辫说》投寄《中国报》，引兴中会为同志。以后又在《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公开与保皇派论战。同盟会成立前，章炳麟等人的革命宣传对孙中山的活动很有帮助，“影响所及，就地域言，由上海扩及长江流域；以对象言，由下层阶级，普遍到知识阶级，这于后来革命成功关系是很大的”[14]。与知识界的革命化相适应，孙中山不仅思想上而且行动上越来越重视联络知识分子，并逐渐形成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革命大团体的计划。

二　交往联系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争取知识分子的重点是留学生，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留日归国学生和一些往返于国内外的革命人士，与国内一些重要省区的知识界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他与国内的进步知识界或学生领袖没有多少接触。诚然，由于孙不能归国，难以同国内知识界广泛交往，但二者的联系毕竟存在，而且不断发展，并对双方的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集中在江浙、湖北、广东三个重要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挟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

发达的优势，成为进步知识人士的汇萃之所和国内学界风潮的发源繁盛之地；湖北省垣武汉号称“东方芝加哥”，洋务新政力开风气之先，兴学留学均跻于全国前列，进步知识界的组织与活动持续活跃；广东则为近代维新与革命运动的发源地，开放既久，人心思变。由于上述三地新知识界的实力较强，与之联系，既可以反映国内知识界的基本动向，又足以影响全国局势。

孙中山与江浙知识界的联系发端甚早。1898 年初，赴日考察报务的汪康年等人就和他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孙中山结识了不少留学生中的英俊之士以及章炳麟等著名士绅，许多人归国后就在上海开展活动，如章炳麟、张继、马君武等人参加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为《苏报》撰述；秦力山、戢元丞等开办《大陆》杂志、《少年中国报》、作新译社；叶澜等组织东亚谈话会等。这使双方的联系日见紧密。尤其是孙中山与中国教育会的关系，引人注目。《苏报》案后，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亡走日本，孙中山特邀其同居一楼，两人情谊甚笃。黄宗仰以诗记之曰：“仰瞻星斗十年久，蓟汉声闻三度雷”[15]，表达对孙的久慕之情。此后，孙中山与其保持通信往来，并通过黄与上海革命党人联系。邹容的《革命军》刊行于沪，“是时禁网方密，除镜今书局外，无人敢为出售，乃由黄宗仰寄千册予先生(即孙中山)。嗣先生来函，称《革命军》为南洋所崇拜”[16]。这对宣传人才不敌保皇派的兴中会帮助极大。孙遂复函吁请继续予以臂助，“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17]鼓动国内知识界加入反对保皇派的斗争。据张继回忆：“《苏报》案未决之先，余时至巡捕房探问，太炎致书总理，称‘总统钧鉴’，交余设法转递”[18]。1903 年秋，中国教育会内部发生

纠纷，大起争执，多方调解无效，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报》社社长陈少白闻讯，“以同党内哄，有碍大局，特亲至上海设法和解，并设宴邀集沪上诸同志联络感情”[19]，终于平息了风波。是年底，孙中山又致函上海同志，讲述平均地权思想及其与保皇派斗争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所定的新誓词和宣誓方法详告上海方面，说：“公等既为同志，自可不拘形式，但其余有志者，愿协力相助，即请以此形式收为吾党。”可见这已不是组织外部的一般关系了。1904 年 4 月 26 日，《警钟日报》将此函全文刊登，以为号召。6 月 10 日，孙中山在另一致黄宗仰函中询问：“上海同志近来境况、志气如何？”[20]除黄宗仰、章炳麟外，教育会中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或通信联系的还有干事王慕陶、戢元丞、会员张继、马君武等。双方在扫荡保皇派方面的配合协作，近似于统一组织的共同行动，所以孙中山、陈少白称上海方面为“同党”或“同志”。

湖北方面，庚子自立军起义时，孙中山与湖北知识界的关系一度密切，以后双方的联系通过两条渠道保持和扩展，一是湖北留日学生，如吴禄贞、刘成禺、李书城、戢元丞等。另外，程家柽、沈翔云等祖籍虽不是湖北，但与湖北学界关系密切。吴禄贞等人回国后，与武昌新学界中的激进分子共组花园山机关，俨然成为进步知识界的领袖。结会者筹议运动方法，其中一条是“寻孙逸仙，期与一致”。1903 年底，清朝地方官吏因武汉三镇革命风潮日见高涨，决定将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送往欧洲留学，以除隐患，其中多为花园山机关成员。他们在上海与刘成禺相遇，托其联系与孙中山见面，以后又访《中国报》主笔冯自由、《图南日报》主笔黄伯耀，希望通过他们与孙取得联系。次年，孙中山推荐刘成禺为旧金山《大同日报》编辑，“刘固两湖书院之学生，而与花

园山同志通声气者也。自此花园山同志始得间接以达于孙逸仙。”[21]从而奠定了欧洲同盟会的基础。

孙中山与湖北知识界联系的另一渠道，是旅居上海的鄂籍人士。花园山机关成立后，“公开招待各处来访之志士。于是远自东京，近至上海，莫不互通声气。”[22]还派人到上海设立联络处。当时活动于上海的各省进步人士很多，为了便于联系，增强影响，建立了一些地缘性小团体，如福建学生会，参加者不限于学生，还包括教员、编辑、记者和邮政、路矿、船政等部门的职员。湖北在沪同人也有类似机构，即国民丛书社。该社“为王君（慕陶）所创立，为吾湖北学生公益起见，递书售报，招待出洋，同乡公举以为上海机关，于吾湖北关系甚大。”[23]武昌花园山机关派赴上海创办联络处昌明公司的万声扬，就与国民丛书社有直接关系。该社实际上成为湖北知识界与国内外志士沟通的联络机关，不仅刘成禺、戢元丞与之关系密切，孙中山本人还与该社负责人王慕陶有通信往来。章士钊自述他译著《孙逸仙》一书的缘起时说：“一日，吾在湖北王侃叔（慕陶）许，见先生（即孙中山）所作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捲纸写，字迹雄伟，吾甚骇异。由此不敢仅以草泽英雄视先生，而起心悦诚服之意。”[24]后来章士钊在言谈撰述中，贸然将“孙”与“中山”二姓连用为姓名，王慕陶见状，当面指陈错误。章还从王处了解到孙中山的“抱负与方略”，因此决心翻译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向国人宣传介绍，并添加了不少标榜推崇之语。可见王不仅熟悉孙中山的生平思想，而且相当尊重。

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也是他最早进行政治活动并长期重视之地，他与广东进步知识界的关系之紧密，不言而喻，兴中会里就吸收了一批优秀的广东新学之士。孙中山在日期间，积极

赞助留日粤生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创办《开智录》。兴中会还在香港开办了两家报纸，直接对广东新学界进行宣传，一是陈少白主持的《中国报》，一是郑贯一主持的《广东日报》。他们十分关注广东学界动向，特别是对1903年兴起的学堂风潮，大加报导评论，推动运动在粤省的发展。因此不少学生以二报为自己的舆论喉舌，寄文投稿，向社会吐露心声。不过，由于革命派和保皇派都以广东知识界为力争对象，清政府特别注意这一地区知识分子的动向，甚至有因为害怕孙中山的影响蔓延而主张废弃新学及学堂教育者。[25]对于兴中会的活动，更是严加防范。加上广东知识界缺乏组织，保皇会的影响又多所掣肘，因而孙中山与之联系难以进一步发展。

除上述三地外，湖南、福建两省知识分子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值得注意。众所周知，两湖社会联系密切，孙中山与湖北知识界的交往，势必辐射到湖南。同时，上海的湘籍进步人士秦力山、章士钊等与孙中山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秦力山还被认为是“宗旨惟在革命”的“孙党”[26]。他们在向国内知识界宣传孙中山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又与原籍进步人士保持紧密联系。1903年底从东京归国到长沙任教、并加入华兴会的翁浩、郑宪成，是孙中山所创东京青山军校成员，曾由孙亲自主持宣誓，对其革命主张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此外，华兴会员中，张继、叶澜等见过孙中山，苏子谷则到过《中国报》社。他们均对湖南知识界有所影响。赵声在《保国歌》中唱道：“新湖南与新广东，社会秘密通消息。”[27]虽然受欧榘甲、杨毓麟鼓吹湘、粤独立的同名作品的影响，但所指并非保皇勤王的康梁，而是兴中会、华兴会这类反清团体。两湖和江宁学生将这份传单在长江流域广为散发，华兴会也以此为重要宣传品。当然，这些联系带有某种间接性，但毕竟不像有

的学者所说，自从毕永年隐迹后，孙中山失去了他和湖南、湖北两省的唯一联系；直到5年后结识黄兴，与两湖的联系才得以恢复。[28]

1903年，福建进步人士"闻国父倡义岭南，豪俊风从，遂在沪组织福建学生会。"[29]该会与中国教育会关系很深，不少会员同时加入两个组织，如林獬、林宗素兄妹，既是中国教育会会员，参加编辑《中国白话报》、《警钟日报》，又是福建学生会的骨干。青山军校的翁浩、郑宪成(均为闽籍)归国途经上海时，也参与该会活动。当时湘闽两省的新学界、尤其是青年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孙中山与之接触联系，很有积极意义。以后湖南进步知识界中不少人成为同盟会的骨干，福建学生会也加入了同盟会。

综上所述，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与国内几个主要地区的进步知识界有着不同程度的直接间接联系。这表明孙并未将其活动局限于广东和海外，从兴中会成立之始，就决心"联络四方贤才志士"，把支会扩向全国。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终于和长江流域的进步知识界建立起广泛联系，为组建全国性革命大团体创造了有利条件。同盟会成立后，这些省份也正是革命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三　群相推崇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在国内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相歧相悖的看法。一些学者根据朱和中、章炳麟、吴稚晖等人的某些回忆，认为在当时中国知识人的眼中，孙中山是连字也不识几个的江洋大盗，因而否认其在进步

知识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此，须依据史实加以澄清。

孙中山在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确有一个变化过程。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1900年惠州起义，一般说来，包括开通人士在内的士林视之为绿林豪杰式的草莽英雄或反满复汉的义士。当时在武昌上学的刘成禺听钮永建介绍孙中山的活动后说："此张煌言、朱舜水一流人也。"[30]就连和他当面交谈过的章炳麟也是有褒有贬，认为："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31]当然，对孙中山的态度，因人而异，既取决于对孙接触了解的程度，也受制于各自的社会背景与关系。如汪康年早在1895年就从梁启超处得知："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32]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他借赴日考察报务之机，暗中联络中日民间人士同盟救亡，并与孙中山有所接触。以后周善培、文廷式等人相继暗访孙中山，表明维新志士已将其视为同道盟友。戊戌政变、庚子国乱接踵而至，中国迭遭重创，激进者更对其排满革命宗旨产生共鸣。章炳麟断发退出国会，即对孙中山大加赞誉，称："廓清华夏，非斯莫属。"[33]不过，汪康年等人与孙中山宗旨有异，并不认为孙是拯救中国的适当领袖和革新变政的理想代表。对国内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子而言，梁启超仍是首屈一指的精神导师。甚至章炳麟也相信他确有排满革命真心，以孙梁并重，认为中国"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34]而后来奉孙中山为旗帜领袖的激进青年，这时对他还缺乏了解。1901年吴稚晖到日本时，友人约他往见孙中山，他以为是绿林豪杰，不愿前往。章士钊说："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系于孙先生。吾之所知于先生，较之秦力山所谓海贼孙汶，不多几许。"[35]

然而,1903年拒俄运动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的反清情绪公开化为排满鼓动。与此相应,国内进步人士,尤其是与孙中山有过交往者,纷纷发表拥孙的文字言论,掀起一阵宣传热潮。以下数例,可见一斑:

曾在海外结识孙中山的人中,章炳麟、秦力山分别为《孙逸仙》一书作序,推崇孙"揜迹郑洪为民辟","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其勇乎?"[36]

戢元丞认为,当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画者,舍孙文以外,殆不多见也。"[37]

黄宗仰在表达了对孙中山"仰瞻星斗十年久"的钦慕之心后,又赋诗为之饯行道:"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拿华剑气凌江汉,姬姒河山复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邦水奠新都。伫看叱诧风云起,不逐虏胡非丈夫。"[38]将孙比作拿破仑、华盛顿。

中国教育会会员、留日归国学生陈去病撰文盛赞日本友人援助中国革命,称孙中山为"汉族所倚仗奇人",认为孙当时远赴美洲,以至无人领导革命运动,使广西会党起义终归失败,是"吾黄帝子孙之不幸。"[39]

与孙中山素未谋面者,也高度赞颂其人格行为。章士钊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人物,吾其悬孙以为之招。"[40]柳亚庐推许其"十年磨剑,树独立之旌旗,九世复仇,理不平于种族,他日驱除异类,光复旧疆,扬自由革命之潮流,为东大陆之华拿,其在斯人欤。"[41]也誉为东亚大陆的华盛顿、拿破仑。高旭则将孙与历代汉族先贤相并列:"我拜岳武穆,我拜洪秀全,我拜文文山,我拜

孙逸仙，我拜郑成功，谓此皆汉贤。”[42]刘师培称之为“革命大家孙逸仙”[43]。华进表示：“孙逸仙为吾国革命巨子。”[44]《黄帝魂》的编者黄藻，在《书周云详事》一文中，借周云详之口批评康梁，认为：“当今之世，可与云祥共事者，惟中山其人。”[45]《警钟日报》署名“共和”的文章《〈孙逸仙〉书后》称：“夫逸仙粤党之魁杰，西学之巨擘，固夙倡导民权自由之说，而最富民族思想者也。”[46]上海国学社告白以“支那革命大豪杰孙逸仙”[47]的字样介绍金松岑翻译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国白话报》则称：“孙逸仙为二十世纪中国特色之人物，此人所同认。”[48]这些言论并无事后因素的干扰，可谓历史的真实再现。正如湖北进步知识分子所忆，当时“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49]

章炳麟、章士钊、秦力山、戢元丞、黄宗仰、刘师培、高旭、柳亚庐、黄藻、陈去病等人，是当时国内知识界革命营垒中的风云人物，他们相继不约而同地公开发表赞扬孙中山的言论，而且《大陆》、《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国民日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江苏》等报刊杂志和《孙逸仙》、《黄帝魂》等书籍，在国内知识界流传甚广，其影响不可低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03年以后，孙中山已经逐渐为国内进步知识界所了解认识，并被看成是整个中国反清革命的旗帜，而非区域性代表。1905年孙中山到东京组建同盟会时，陈天华称之为“四万万人之代表”，“中国英雄中之英雄”[50]，正是表达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国内知识界对孙中山认识的普遍扭转，由多方面原因促成。首先，1903年是进步知识界由爱国走向革命的重要转折，完成或处于转变中的激进分子需要一个榜样和领袖来代表引导革命

运动，也需要一个偶像和一面旗帜来号召民众。[51]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家，孙中山长期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反清革命，为争取民主共和努力奋斗，并得到海外舆论的承认，理所当然地为他们所尊崇仿效。但凡转向革命者，几乎都把自己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相联系。随着政治立场的转变，他们对孙的反清密谋有了与前此不同的观念，草莽英雄成了革命巨子，情感上容易沟通。

其次，1903 年后，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加强，对其革命活动与思想的宣传大幅度增加，使得进步知识界对孙中山的认识普遍加深，不仅可以排除清政府的诬蔑歪曲，而且能够与一般会党相区别。1900 年以前，国内很少见到正面介绍孙中山的文字，比较集中的一次是《时务报》在伦敦蒙难事件后，译载了一些外国报刊的报导评述，其中对孙的生平活动有所介绍。[52] 1897 年《伦敦被难记》出版，沿海一些口岸城市皆有寄售，但是英文版，流传不广。戊戌政变后数日，天津《国闻报》刊登了一篇《中山樵传》，这是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中文孙中山传记。然而作者对孙抱有敌意，不仅内容与事实出入较大，而且有意丑化。[53]1903 年后对孙中山的宣传由两方面组成，一是与孙中山有关系的日本人士和一些日本报纸的介绍。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全面模仿日本，民间志士则对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大为叹服，两国交往日益频繁，社会风气倍受影响，日本舆论成为关注热点。1902 年，宫崎寅藏作《三十三年之梦》，其中详尽记述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迹，与中国革命分子急欲塑造先驱领袖形象的需求相适应，为后者提供了重要蓝本。此外，一些创办发行于中国的日本报刊，也刊登过有关孙中山活动的报导。这些报刊虽然倾向不一，客观上却起到向中国知识界介绍孙中山

的作用。二是中国知识界的革命分子欲通过加强宣传这位革命先行者来促使更多的人起而革命。1903年,章士钊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译著参半,写成《孙逸仙》一书,"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54]有人读后表示:"哀哉吾黄胤,宛转奴圈里。自为亡国民,悠悠二百祀。欲雪此奇辱,革命岂容已。堪笑蚩蚩者,醉生复梦死。中山殆可儿,伫看鼐云起。"[55]黄兴就是读此书而得知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奠下日后与之合作共图大业的心理基础。不久,中国教育会会员金松岑又将《三十三年之梦》全书翻译出版。同会的蒋维乔看了该译本后,赞扬宫崎寅藏帮助孙中山,是"东方之大侠"[56]。以这些书为蓝本,柳亚庐作《中国灭亡小史》,用一个专节叙述孙的生平事迹;陈去病作《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的早期活动和宗旨主张。秦力山也曾有意著书宣传孙中山,"而以三年来与孙君有识,人将以我为标榜也,复罢之。"[57]与此同时,深受国内进步人士欢迎的《江苏》、《警钟日报》等刊物还刊载了孙中山的文章通信,并报导其活动行踪,使之成为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

再次,1901年后,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初步论战,到1903年,论战渐趋激烈,在国内知识界引起反响。同盟会成立前,论战虽未决出胜负,但影响巨大。在此之前,国内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梁启超的影响占了主导地位,人们开口则称引"梁任公"、"新民子"、"饮冰室主人"。南洋公学学生演讲时,几乎无人不从梁启超那里寻求理论依据。[58]论战展开后,这种主导地位无可挽回地动摇了。《苏报》、《国民日日报》、《大陆》、《广东日报》、《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一批在进步知识界广为流传的报章杂志,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和揭露康梁,报导孙中山在美洲扫荡保皇派的战况。正在香港与保皇派所办《商报》激战的《中

国报》，就不断转载《大陆》和《警钟日报》的批评康梁的文章，以加强攻势。海外华侨的民族情绪高涨和保皇派内部的动摇分化，对国内知识界犹如一针清醒剂，使之认识到："康梁，朝廷之忠臣也；孙文，则其仇敌也。"[59]此外，随着大批社会人文著作的翻译出版，国内青年学子不必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中曲折地汲取革命的养料，对比之下，他们益发不满于梁的浅薄。各种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更加有力地抵消了梁启超的影响。与此相应，孙中山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没有受过正统儒学的良好教育，因而在士林中声望不高。这固然指出了问题的一面，但显然对庚子后新旧消长的形势估计不足。由于守旧势力遭受重创，清政府力行新政，求新成为大势所趋，社会群体的分化组合加速进行，旧士群逐渐为新知识界所取代。对于守旧士人，孙中山当然不足挂齿，甚至罪大恶极；而对于进步知识分子，则所推崇的早已不是旧学名宿，而是新学大师。1902 年以后，随着国内新式学堂和大众传媒的增多，新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扩散，学习西学成为时尚，浪潮涌来，大有席卷旧学之势。远离学堂和传媒的旧学者由正统支柱变成时代弃儿，惊呼："经也，史也，词章也，中国数千年学界之精华，毕萃于此，学者一旦顾轻蔑乃尔。"[60]诚然，进步人士中也有持国粹主义者，但不无利用之意，而且章炳麟等人所以领一代风骚，不仅因其国学造诣深厚，更主要是敢骂皇帝，赞颂《革命军》。就连梁启超在知识界中的巨大影响，也由其以新民体传播新观念，提倡自由民权而来。国内学生慨叹当时中国"谈西学者，皮傅称数，腹诽学说，比比皆是，求一二人为严复、冯自由者，戛乎其难。"[61]孙中山受过系统的西式科学教育，对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学说又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被

誉为“西学之巨擘”。同时通过自学等方式,对传统国学也有所把握,具备与正途士绅交往的能力。以孙中山未受过儒学教育来否认他在中国进步知识界中的声望地位,既不符合知识界的心理趋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国学修养在戊戌时期还是开明士绅选择精神领袖的关键因素,那么庚子以后反而容易成为学堂师生沟通的障碍,梁鼎芬、劳乃宣、沈曾植、俞明震等一批学术名流,都成为学潮冲击的对象。

至于章炳麟等人的回忆,章氏所说为1901年以前的情况;朱和中等在武昌与吴禄贞同属一个革命机关,后又结识刘成禺、冯自由、黄伯耀,与程家柽等也有通信联系,并且千方百计要“寻得孙逸仙而戴之为首领”[62],不应对孙毫无所知。而吴稚晖的同事中不少人与孙中山有过交往或通信联系,对其早应耳熟能详,自称到1905年还不清楚孙是否识字,情理难通。他在另一回忆中就说,和孙中山会面于英国时,对其“温和端正,我是不吃惊的了。我早由我的朋友钮惕生在三年前告我。”[63]从吴的留英日记中,也看不出他对孙有任何误解轻视之意。[64]

四　思想对流

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双方在思想上的沟通呼应。1895年后,孙中山虽然一直置身海外,但对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和思想潮流的起伏消长十分关注,特别是对国内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尤为关心,从中汲取有益成分,调整充实和丰富完善其理论,以强化政治纲领的影响号召力。关于双方这方面的交往联系,限于资料,难以全面详尽地再现,但从种

种迹象中，可以找出有关的线索。

从1894年创建兴中会起，孙中山就明确宣布，要“创立合众政府”，提出了共和国方案。1897年与宫崎寅藏笔谈时，更断定：“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并驳斥一些人所谓“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观点，认为共和制不但适合中国国情，而且有“革命上之便利”[65]。但在很长时期内，其汉语词汇中并无“共和国”这一特定名词。1900年以前，国内知识界对于民主共和思想一般还不能接受，甚至所用名词的概念含义也与后来不尽相同。维新派把“共和”解释为君民共主，上下共和，而以“民权”与“民主(民之主)”相对应。随着新知识群的扩大和民主思想的传播，有关术语概念不断变换，在国民主体观与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的融合下，“共和”一词中的皇权因素被彻底剔除，成为表达近代中国民主政制的特定符号，并为进步知识界普遍接受。1902年11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中，学生们大声疾呼：“二十世纪举世皆共和，不共和则为鄙夫”[66]，“惟共和能久存于世界，惟共和能深得夫人心”[67]，还将自办的学校称为“共和学校”。中国教育会也自称为“共和的教育会”，决心以共和教育培养共和国民。[68]稍后，邹容在《革命军》中又进而提出“中华共和国”的概念。正是在民主共和思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孙中山将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国民”与“共和国”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提出“创立民国”的口号。这不仅使革命纲领更为明确完善，而且使之具有鲜明的民族与时代特征，在宣传上适应了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对民主共和观念的理解与表述，从而对国内知识界更具号召力。

1903年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概括了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但直到1905

年《民报》发刊词中，才正式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国内知识界则从1904年底起已开始对民族、民权主义进行公开宣传。1904年12月20日《警钟日报》刊登《〈孙逸仙〉书后》一文，开篇就说："今天下救时之彦，爱国之儒，万喙一辞，众声同应，莫不曰民族主义哉！民权主义哉！"该报1904年12月8日至10日连载"共和复汉生"所撰长篇论说《论中国民族主义》，从反满和反帝两方面详尽阐述民族主义。这有别于当时知识界以民族主义对抗欧美列强的一般观念，比较接近孙中山的思想。是月24日，该报又刊登署名"新中国主人"的《论共和政体》，对民权主义详加论述。两篇文章批判了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指出："今日而欲救中国，舍扩张吾民族主义，其道未由"，强调以革命方式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中国"不可无共和政体"。这与孙中山的思想虽不完全等同，但毕竟已标明概念，并包括主要内容。关于民生主义，1903年上海革命党人提出：反清革命"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69]章炳麟、秦力山在日本时曾与孙中山一起讨论过土地问题。1902年，章炳麟修订《訄书》，增加《定版籍》一篇，记载了讨论的有关内容。秦力山则于1903年8月在《国民日日报》上披露了部分《与孙逸仙讨论公地策记》的内容，称其主旨在于解决"贫富何以能平等"[70]。蔡元培、刘师培等人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探讨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愿望，还有人致函孙中山询问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1904年4月，《警钟日报》以刊登孙中山来信的方式，向国内知识界介绍其平均地权主张，顺应了探索者的需求。

另外如革命程序论和地方自治思想的提出，国内进步知识分子认为："专制政体推行之久暂，皆悬于臣下之举动，臣下而好

共和，君主即酷好专制而终则共和；臣下而喜专制，君主即意欲共和亦必流于专制，势为之也。”[71]这与孙中山的观点颇为接近。孙曾说：“夫拿破仑非不欲为民主也，其势不能不为皇帝，使华盛顿处之亦皇帝矣。华盛顿非必欲为民主也，其势不能不为民主，使拿破仑当之亦民主矣。”“即使诸统帅慕共和之治，让权于民，为其旧部者，人人推戴新皇，各建伟业，咸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陈桥之变所由来也。”[72]因而提出建政三阶段的构想，以保证在破除专制后，向共和政治平稳过渡。1901 年后，国内地方自治思潮渐兴，运动亦随之而起。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把地方自治纳入其思想体系。当然，二者差别很大，国内的地方自治，是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展开，流派甚多，宗旨不一，主流是借地方自治来摆脱集权的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而孙中山则主张首先推翻清朝统治，在建政初期以地方自治防止割据专权，培养国民主体意识，最终过渡到完全的共和民主政治。这与国内激进分子的追求相通。赵声在《保国歌》中，就主张首先推倒满清，建立共和政府，然后实行地方自治，以保障治安，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由于条件所限，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思想交流不一定直接进行，而 1904—1905 年之交《警钟日报》的宣传是否与孙本人有关，也难以证实。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孙中山虽然长期活动于海外，其思想主张却始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依据国势的变化而变化，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的观念制度，或闭门造车的产物。国内知识界的思想状况与动向，是其取舍修改的主要依据。第二，孙中山与国内革命知识分子在认识上心心相通，双方思考的均为重大时代课题，而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成为后来组织结合的思想基础。第三，正是由于孙中山

通过各种渠道与国内进步知识界建立了联系，使他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与后者在思想上同频共震。三民主义可以说是国内外进步知识界思想的共同结晶。第四，孙中山又有他作为革命先行者与政治领袖的特长，其理论的系统性和适用性要超过国内知识界的一般水准。当然，以实践为目的的革命理论，追求有效实用远过于学理的完美与逻辑的严密。如果说国内知识界对孙中山的推崇还带有偶像化色彩，那么宣传孙中山的思想或与之共鸣者就必须深思熟虑，比较鉴别，决非情绪冲动的表现。

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交流，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大团体的建立。

1903 年，是中国知识界分化改组的重要一年，清廷压制拒俄及《苏报》案的刺激，使反清情绪普遍高涨，“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73]在此形势下，孙中山着手实施组建革命大团体的计划。为使这一行动有所依托，他首先到美洲扫荡保皇派，恢复和巩固兴中会的海外阵地，以为建立大团体做一铺垫。其决策与国内知识界的风气转移有一定的关系。知识界革命倾向的增强，滋生了组织联合与统一领导的强烈愿望。早在 1903 年 5 月，邹容鉴于国内学生运动此伏彼起，而不能持久，“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计划各省设总部，各府县设分部，“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74]限于条件，未能实现。孙中山既看到知识分子的觉醒给革命事业带来力量和希望，也察觉到力量分散，缺乏组织造成的不利影响。他到旧金山时，当地致公堂所发布的一份公启，反映了这一认识：“近者各省读书士子游学生徒，目击满清政府之腐败，心伤

中华种族之沦亡，莫不大声疾呼，以排满革命为救汉种独一无二之大法门。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实事尚未能举而措之施行也。”[75]与《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开头那段文字相比较，这份公启很可能出自孙中山本人的手笔。审时度势，他决定先从已有旧式结社的海外华侨入手，目的则在吸引国内知识界和留学界。因此，在与保皇派紧张斗争的同时，他对国内知识界十分关注，通信中多次询问上海同人的情况。听说陈范在横滨设馆联络各处志士，即表赞成，还要求国内同志以新誓词发展党员。1904年日本《朝日新闻》报导说："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前在布哇密待时机，近往美洲大陆。现时东洋时局，其心所期许者，以俟便归国，改革中国为共和政体。""一旦得机，当有风行雷厉之举动也。"[76]刘成禺回忆道："甲辰（1904年）先生由日来美，谋开党之大团结，先生曰：'自《苏报》邹容《革命军》发生后，中国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气象，但无纲领组织，徒籍筹款，附党于三合会，不足成中国大事也。'乃谋设同盟会，指挥事业。"[77]这清楚地表明孙中山意识到要成就大业，必须团聚各省革命知识分子，统一行动，而不能单靠华侨和会党。1904年底，正当孙中山赴欧洲组建革命团体之际，国内知识界再度发出呼吁："欲共和政体之成立，必先增进国民之程度，鼓舞其民气，统一其主义，同心合一，团结一大团体，以养成我国国民共和政体之资格。"[78]这又与次年孙中山在东京对黄兴等人所谈意见的精神一脉相通。

综上所述，孙中山从其开始革命活动之日起，就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随着知识界革命倾向的增强以及联合会党、联合维新派尝试的屡次受挫，其倚重态度日益明显，行动上也日趋积

极。1903年以后，通过各种渠道媒介，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建立起直接间接关系，国内知识分子则普遍加深了对孙的认识。结果，孙中山在国内知识界的声望影响不断增长，成为革命分子的公认代表。双方共识增多，互信接纳程度加强，为同盟会的成立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此，"秀才造反"在中国有了崭新的含义，一个由知识分子扮演主角的新纪元拉开序幕。

注释

[1]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5－12页。

[2]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页。

[3]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页。

[4] 《辛亥革命》(一)，第88页。

[5] 《辛亥革命》(一)，第87页。

[6]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7] 《革命逸史》，初集，第31页。

[8]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9] 沈飏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34页。

[10] 《会党之进步》，《复报》，第6期。

[11]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12]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

[13]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3－184页。

[14] 张继：《五十年历史之研究与回顾》，第1讲，《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五，第7－8页。

[15] 中央：《与中山夜登冠岳峰》，《江苏》，第9、10期合刊。

[16] 《汪德渊致孙中山函》，转引自杜呈祥：《邹容的思想演变及其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之地位》，《开国文献》，第1编，第10册，第585页。汪德渊为中国教育会会员。

[17]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30 页。

[18] 张继:《回忆录》,《国史馆馆刊》,第 1 卷,第 2 号。

[19] 《革命逸史》,初集,第 136 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41 页。

[21] 朱和中:《辛亥革命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 2 卷,第 4 期。

[22]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6 集,第 3 页。

[23] 《湖北在沪学生代王刘二君公告》,《大陆》,第 12 号,1903 年 11 月。另据《湖北学生界》第 3 期《湖北同乡会敬告》:"宜昌王君慕陶寓居上海新闸新马路余庆里十九号国民丛书社,愿以所寓作湖北同乡招待处。"

[24]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集,第 243 页。

[25] 《两广总督陶制军批斥洪牧嘉与札稿》,《选报》,第 9 期。

[26] 1902 年 3 月 18 日《致吴君遂等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163页。

[27] 《在湖南革命之气运》,《中国日报》,1904 年 4 月 11 日。

[28]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 41 页。该书注明此意出自《革命逸史》初集的《毕永年削发记》,但冯著原文为:"自庚子至乙巳同盟会成立,长江流域各省之运动一时为之停顿云。"

[29] 《林森事略》,《革命先烈先进传》,第 813 页。

[30]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31] 1899 年 7 月 17 日《致汪康年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92 页。

[32] 1895 年 3 月 14 日《梁启超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831页。

[33] 《中国旬报》,第 19 期,1900 年 8 月 9 日。

[34] 1902 年 3 月 18 日《致吴君遂等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163页。

[35]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集,第 243 页。

[36] 《辛亥革命》(一),第 90－91 页。

[37] 《孙文之言》,《大陆》,第2年,第9号。

[38] 《饯中山》,《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文苑。该报署名"中根",《江苏》杂志亦载,署名"中央"。

[39] 佩忍:《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传》,《二十世纪大舞台》,第2期。

[40] 《辛亥革命》(一),第90、100页。

[41] 中国少年之少年:《中国灭亡小史》,第4章,丁,《孙逸仙》,《复报》,第8号。是文写于1903年,因故未刊。

[42] 剑公:《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警钟日报》,1904年8月10日。

[43] 光汉:《西江游》,《中国白话报》,第8期,1904年3月31日。

[44] 《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45] 《黄帝魂》,第285页。此文原载《中国日报》,其中并无赞扬孙中山语,所以有关言论应是黄藻本人的认识。

[46] 《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0日。作者疑为何海樵。

[47] 《〈三十三年落花梦〉告白》,《江苏》,第7期,1903年10月20日。

[48] 《中国白话报》,第2期,1904年1月2日。

[49]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3页。

[50] 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

[51] 章士钊在《孙逸仙》一书中,将此意表达得十分明确,他说:"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孙逸仙之原质"与"以孙逸仙之原质而制造之"物不同,"此二物者,非孙逸仙之所独有,不过吾取孙逸仙而名吾物,则适成孙逸仙而已。"因此,"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所以为孙逸仙者而能兴中国也。"(《辛亥革命》(一),第90页)

[52] 参见《时务报》第14、15、17、19、21、27、28册的有关报导。

[53] 《国闻报》,1898年9月25日。原文称此传系"从东友处辗转传抄",但日本人士怀疑出自徐勤之手。为此徐勤曾致函宫崎寅藏,力辩与此事无关(《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42-43页)。

[54]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43页。

[55]　黄天:《题〈孙逸仙〉用前韵》,《江苏》,第11、12期合刊。

[56]　瘦山道人:《鷦居日记》,甲辰正月廿二日。

[57]　《辛亥革命》(一),第91页。

[58]　参见《教育界之风潮》所汇录的1902年南洋公学风潮期间学生演讲记录。

[59]　《康梁失望》,《警钟日报》,1904年6月23日。

[60]　《读南皮尚书建置存古学堂札文》,《江西官报》,乙巳第1期。

[61]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2章,第26页。

[62]　朱和中:《辛亥革命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2卷,第4期。

[63]　《我亦一讲中山先生》,《吴稚晖先生全集》,第7卷,第303页。

[64]　蒋永敬:《从吴稚晖的〈留英日记〉来补正国父几次旅英日程的缺误》,《传记文学》,第26卷,第63页。

[6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173页。

[66]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2章,第33页。

[67]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3章,第12页。

[68]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

[69]　《驳〈革命驳议〉》,《苏报》,1903年6月13日。

[70]　《〈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9日。

[71]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3章,第1页。

[72]　《孙文之言》,《大陆》,第2年,第9号。

[73]　《辛亥革命》(一),第10页。

[74]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

[75]　《警钟日报》,1904年7月2日。

[76]　转引自《警钟日报》,1904年4月1日。

[77]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78]　新中国主人:《论共和政体》,《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4日。

第 10 章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与留日学界

同盟会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以孙中山为领袖建立起来的革命团体，它成立于清末留学运动的高峰期和留日学生汇萃的东京，其骨干大都为学界精英。从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可以探测近代中国新知识界这一重要成份的政治动向与组织追求。

一　初期关系

1898 年，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孙中山与留日学界的接触，开始于是年底或次年初。冯自由记："时孙总理、陈少白、梁启超先后亡命日本，彼此往还，相与研究革命方略，至为透辟。云翔偕同学戢翼翚(元丞)、吴禄贞(绶卿)访之，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备至。"[1]但这时留日学界人数少，思想程度低。据秦力山回忆："是时留学界尚不过百十人"，分成南洋官费、两湖陆军、湘粤自费、公使官费四部分，分别住在日华学堂、成城学校、大同高等学校、同文书院，"绝无政治上之运动也。"[2]虽然通

过彼此交往，特别是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以及孙中山、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的接触，其政治热情有所增长，一些人参加了自立军起义。但汉口失败使之遭受重创。孙中山与留日学界的关系，主要展开于20世纪以后。

政治方面，1902年4月，章太炎等人发起亡国纪念会于东京，孙中山署名为赞成人，并亲率华侨十余人自横滨赶赴东京莅会。后因日本警方阻止，乃与章太炎等在横滨补行纪念式。此会发起人多为留学生，在留日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宣传方面，1900年，郑贯一等在横滨创办《开智录》，反对保皇，因是油印，规模稍狭。是年12月，得到孙中山和横滨华侨的捐款资助，改用铅印，影响骤增。[3]1901年5月，东京留学生创刊《国民报》，得到孙中山的经费支持。“留学界倡导民族主义之杂志，以是为嚆矢。”[4]1903年，东京留学界各省同乡会创办的杂志相继问世，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种族意识，其发端则由《湖北学生界》。[5]先是，刘成禺“函约总理会谈于东京竹枝园，并邀程家柽、李书城、时功玖、程明超、吴炳枞等相叙，未几遂有《湖北学生界》之出版。”[6]

组织方面，1901年春，留日粤籍学生郑贯一、冯自由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政府宣告独立，孙中山予以支持。次年，孙鉴于“中和兴中，皆为海隅下层之雄，中国士大夫，尚无组织”，遂与刘成禺、冯自由、程家柽等“开秘会于东京竹枝园饭店，分途游说各省学生，及游历有志人员。”[7]

思想方面，拒俄运动前，孙中山已结识了不少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如戢元丞、秦力山、沈翔云、张继、程家柽、程明超、刘成禺、冯自由、李书城等，经常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言民族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8]这些学生又辗转传

布于同学中,如黄兴、刘揆一等人的反清革命意识,程家柽与李书城“实开其牖,遂深中于其心。”[9]程明超在湖北恳亲会中,曾“聆戢(元丞)君之演说,颇心志之。”[10]孙中山关于革命程序论的最早构思,也为留学生口耳相传。[11]

在孙中山的主导下,兴中会与留日学界建立起初步联系。惠州起义失败后,尤列亡走日本,与孙中山“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12]次年春节,留学生团体励志会开新年庆祝会于上野精养轩,尤列、翟美徒前往参加。兴中会在横滨组织的中和堂,时请革命党名士演讲国政,因而常有“留学生足迹”[13]。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报》,还特聘冯自由为驻东通信员,以加强对留日学界的宣传报导。亡国纪念会时,《中国日报》代为刊载宣言书,并举行纪念式于报馆,扩大影响。以后不少留学生归国途经香港,均在该社寄宿。

孙中山重视留学生,原因之一是他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比较深刻。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14]孙中山早期专注于发动起义,对会党有所偏重,但也懂得不能一味利用,应当因势利导,主张“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15]视知识分子为革命的领导。所以,他不但一开始就积极争取留学生,而且长期把建立革命大团体的希望寄托于此。

孙中山对留学生的态度,也与兴中会本身的状况有关。当时保皇派在海外办有多种报刊,占据了舆论阵地,“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为此,1899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去香港创办《中国报》。“然因操笔政者,短于欧美新思想,颇不为学者所重

视。"[16]迫切需要宣传鼓动人才，当是孙中山积极争取留学生的一个直接原因，以后冯自由、刘成禺、郑贯一等均被推荐为革命报刊的编辑。

与此相对照，同样流亡海外的保皇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对留日学生的态度有所不同。康有为专注于向华侨筹款，无论在财政还是宣传上，留学生都似乎无足轻重。梁启超则变化不定。他少年成名，不免自傲，对后生学子心怀轻视。杨衢云和梁启超会谈后函告谢缵泰："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17]胡汉民也说："梁启超初以能为时文，轻视学界"，"留学界间有发表反对保皇之言论，如《浙江潮》、《江苏》者，梁亦不以为意。"[18]1901、1903 年，梁启超两度对留日学界所办刊物发表评论，并与《清议报》、《新民丛报》相比照，俨然以言论领袖自居，俾倪之意，溢于笔端。[19]加上他政治上受制于康有为，对激进学生的言行相对消极，如对待亡国纪念会，前后反复，首鼠两端。但是，梁有感于变法勤王的惨败和革命风潮的激荡，又受孙中山等人的影响，思想一度激进，依违于排满保皇之间，对待留学生的态度随之摇摆不定。《新民丛报》发刊后，报导东京留学生的活动较详，特别是对 1902 年成城学校入学事件，详载经过及各方反应，予以声援。梁启超还亲自撰写了《敬告留学生诸君》一文，称留学生为"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指出：在专制政体和外族操纵下，留学生所学政治、法律、经济、武备等知识技能，没有用武之地，"某以为诸君之在他日，非有学校外之学问，不足以为用于中国。"希望他们"于求学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学之舞台。旧舞台而可用也，则请诸君思所以利用其旧者，旧舞台而不可用也，则请诸君思所以筑造其新者。"[20]鼓动留学生关心时政，参与变革社会的政治活动。

关于梁启超倾向激进的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则为公论，即其宣传起到启迪民智，传播民主思想，激发国民主体意识和反清情绪的巨大作用。国内许多青年更新观念，进而转向革命，都是从读《新民丛报》开始。由于清政府对革命革政一律镇压，使得发蒙未久的青年无法区分，纷纷接受梁启超的新民说，甚至不断因此演出激烈举动。许多学界风潮的潜因导索，就因校方“禁学生阅一切新书及《新民丛报》等。”[21]在留日学界，梁启超也有一定影响。李书城回忆道：“那时梁启超正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留学生中附和者不少，弘文学院学生亦多对梁启超表示崇敬。”[22]清驻日公使报告说：“溯自康梁毒焰销息以来，其捕逃潜匿日本，为所包庇者，指不胜屈，类皆窃其余唾，巧肆簧鼓，借合群之义，而自由之说日横，醉民主之风，而革命之议愈肆。各省聪俊子弟，来兹肄业，熟闻邪说，沾染日邦恶习，遂入歧邪，竟有流荡忘返之势。”[23]但留日学生不像内地青年那样对梁启超盲目崇拜，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接触各种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对照比较之下，发觉梁启超文笔虽引人入胜，学理却不免浅薄。在国内许多地方，新民说几乎是唯一的新型政治观，而在日本，它只是一般公理或一种学说的翻版。早在1900年，沈翔云等就著文批驳张之洞将“人人有自主之权”，“流血以成大事”，“不受朝廷压力”等“世界公理新学，一切臆断，疑为康梁之说”，明确指出：“公理之于地球，犹衣食之于身，不可一日无者。乃欧西诸名士，竭毕生之力以发明之。公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唾余，毋亦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24]外部世界的崭新社会规范为留学生提供了变革的有力依据。当清廷密探指留学生的言行“不外《新民》、《清议》二逆报之宗旨”时，留学生即批道：“推崇二报毋乃太过。”[25]有

人还公开发表评论说："吾闻今吏之杀人者矣，满口极骂，不以为大逆，即以为惑众，又不问其人之何宗旨，何来历，何所事，何所言，辄曰：'此康党！此康党！'康党二字，竟若为今日新党之代名词，受之者抑何冤。"[26]因此，他们比较容易摆脱康梁的精神影响，超越保皇派的政治主张。

保皇派内部的分化解体，加快了留日学界的转化。自立军失败后，保皇派原来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分裂，表现之一，是脱险归来的留学生纷纷转向革命，靠拢孙中山。除秦力山外，原为梁启超学生而加入革命党的，有冯自由、冯斯栾、郑贯一、苏子谷、李自重、马君武等人。支那亡国纪念会的10位发起人中，陈犹龙、朱菱溪、周宏业、李群、秦力山、马君武原属康梁派，其余4人也与康梁关系密切。唐才常的兄弟唐才质、儿子唐蟒均公开脱离保皇派，加入反清革命行列。后来孙中山即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27]为证，揭穿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表现之二，是康梁之间的分歧。梁启超所办《新民丛报》，"隐然附和《国民报》之宗旨，亦颇言民族主义。"[28]康门弟子韩文举、欧榘甲等同声附和，致使康有为如"大病危在旦夕"[29]。保皇派的组织分化，是其政治主张动摇的表现。梁启超明确宣称："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30]所以胡汉民后来说："平心论之，梁氏壬寅岁首之《新民丛报》，其学术各门，虽不免于剿袭，而鲜出心裁，然其所持主义，则固由黑暗而进于光明。"[31]当然，梁启超顺应庚子后海内外反清情绪高涨的潮流，以鼓吹民主、反对专制而张大声势，一旦退却，影响势必衰落。

1902年以前，留日学界虽然出现过主张排满的《国民报》，但普遍倾向还不是革命。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著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32]《大陆》杂志曾将1905年以前的留学生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1902年以前）"或唱革命，或唱宪政，或隐伏不出，或运动官场，大约以后者为最多。"[33]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留学生一度情绪激愤，决心继承死难者的遗志，组织励志会，"间有狂暴放恣，毫无检束，且皆心醉民权之说者"。驻日公使李盛铎归国觐见时奏称："若不加以辖制，日后必至不可收拾。"[34]但不久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一些地方督抚也罗致留日学生举办各项事业，励志会员为之所动，留学生对清廷产生幻想或为利禄所诱，政治上转趋消沉。秦力山等发刊《国民报》，鼓吹民族主义，拟"开一国民会以救其腐败，卒至不能成立而罢。"[35]次年初，留学生为挽回政府感情，运动新任公使蔡钧，成立清国留学生会馆于东京九段坂偕行社，并公举蔡为会长。[36]同年4月的亡国纪念会，在处于政治低谷的留日学界未能激起普遍反响。后来《大陆》杂志评论道："吾尝亲历留学生间，观其行事，按其言论，要犹是中国人之恒性已耳。"卒业后，"或窃附科阶，为宗族交游光宠之计者有之，或曲阿权要，为肥其一身一家之计者有之"，"其能于里党之间，稍集同志，开演说会，设蒙学堂，译小篇数种流传近邑者，已为豪杰之士。"[37]

留日学界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涨，开始于1902年6月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当时兼任上海出洋游学生招待会留东经理的留日学生吴稚晖（敬恒），因保送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与清

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蔡招日本警察拘捕吴并将其遣返回国。押解途中，吴"欲以一死唤醒群梦，起国民权利思想"[38]，遂自沉于河，幸而获救。"自吴、孙两君之见放，国耻观念益涌起于学生人人之胸中。吴君出行之日，侵晨六点钟，学生群集新桥驿（东京之火车站）相送者数百人。"此后，东京留学生会馆"日日集议"[39]，电请清廷撤换蔡钧，并有百余人弃学归国，以示抗议。这是留日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行动，留学生普遍参加到斗争行列中来。秦毓鎏等人"以此事大辱国体，大失国权"[40]，复入公使馆恳请蔡钧出面力争，亦为其招日警拘捕。目睹政府代表的丧权辱国，留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同时，"是岁国内风气大开，学生之新至者数百；又加之以上海南洋公学之风潮，其中退学以自费来者，尤为铮铮铁铁。"[41]一批思想激进，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在留日学界聚合起来，他们关注时政，对各种社会事务积极表明态度，发挥影响，使留日学界的政治激情不断强化。东京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遂应运而生。

然而，这时留日学界并无明确的宗旨主张，"思想无统系，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亦参杂于其间。"[42]一些人虽接受赞同排满革命观念，却不敢付诸行动。青年会因"揭橥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43]而清政府为推行新政，积极笼络留学生，对留学界政治热情不断增长的趋势未予足够重视，因而处理亡国纪念会和成城入学事件时，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癸卯新正初二团拜大会的排满演说，激成风潮，满族学生聚议激烈、和平、长治久安三策，请杀汉人并禁汉人学习陆军警察，"作书三百余通，告各省满洲大员之自爱其种"[44]，清政府亦未采纳，以免进一步激化矛

盾。因此，留学生参加附和突发事件者虽然踊跃，具备坚持日常革命活动的决心毅力者却为数不多，政治情绪起伏很大。

这个阶段孙中山争取留日学生的目的有三，一宣传，二领导会党，三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在留学生人数尚少，政治倾向复杂而不稳定的情况下，还不可能以此为建立革命大团体的基础。1902 年孙中山离日赴河内，直到次年 7 月才返回，刚好错过留日学界风云变幻的争取良机。所以他在 1905 年留学生欢迎大会上，面对人群攒动的热烈场面，抚今忆昔，感慨地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45]由于对 1902 年以前留日学界的政治状况估价过高，相形之下，孙中山反而显得消极被动，因此一些论者指责孙对留学生重视不够，没有在留学界积极发展组织。其实更多的倒是留学界的消沉限制了孙中山努力的效果。而留日学界最终皈依革命党而非倒向保皇派，除大势所趋的客观因素外，孙与康梁主观态度的不同也是重要原因。

二　失之交臂

1903 年的拒俄运动，以《苏报》高揭排满大旗为契机，从爱国发展为革命，成为留日学界转向革命派及接近孙中山的新起点。新年伊始，留日学生的政治热情就持续高涨。一批激进分子利用各种机会，鼓动带领同学参加爱国反清活动。旧历元旦团拜大会拉开斗争序幕，马君武"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在座五六百名留学生鼓掌支持。继而保皇党人樊锥鼓吹"满汉同种"，"满堂寂然无和之者。"[46]这是

留日学界革命倾向明显增强的突出表现。3月，秦毓鎏等人赴大阪参观博览会，见日本主办者将中国福建省物品置于台湾馆内，认为“即以福建比台湾也，国耻之大，孰有甚于此者！”[47]呼吁清政府驻日本的各级外交代表出面交涉。清朝官吏一味敷衍，与充满近代国家民族和国民主体意识的留学生形成尖锐对立。秦毓鎏等人大失所望，致电东京同学推举代表前来力争。日本当局慑于学生群起反对，乃将物品移放四川陈列所。4月，成城学校召开运动会，留学生以会场上“高悬各国国旗，独中国龙旗无之”[48]，日方且称“中国已降为各国保护国”[49]，不能与独立国平等升旗，集合校内外中国学生300人演讲国耻，相率抵制。在此之前，留学生还曾联络大阪、神户侨商抵制博览会所设人类馆丑化中国风俗，侮辱中国人格；弘文学院中国留学生则发动退学风潮，反对校方新订规则意在敛钱。4月底，日本报载桂抚王之春拟借法兵镇压广西会党起义，留学生闻之大震，500余人聚会于锦辉馆，通电反对。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在吸引同学参加社会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激进分子利用这一纽带，动员组织，能量倍增。有充当清廷耳目的学生密报说：“自入学院后，见同学诸友皆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慨，……时而倡革命之说，时而慕流血之举，时而赞自由平等之如何文明，时而议团体接派之如何组织，痛骂我国之政府，妄诋当路之公卿。或五日一会议，或三日一会议，或充总会头，或充乡会首，设职员，举干事。聚会之时，并未参互学业之得失，竞持笑骂之空谈。有稍持纯正之说者，则群起厉辩，抑制不准启齿。”[50]各省同乡会机关刊物也不断发表激烈言论。受其影响，留学生“皆不以课业为亟务，且云我辈到东，非为学而来，为我国民而来也。若第拘之于学业，则令学成归国，不过养成奴隶性质，以备受人驱使而

已。"[51]拒俄运动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政治热情驱使下高潮迭起。

癸卯新正初二的排满演说，虽然反映出留日学生对清王朝的普遍不满与仇恨，但还不能立即公开与之决裂。所以，拒俄运动初起，留学生编组义勇队、学生军，成立军国民教育会，派遣代表向清政府请愿，目的在于拒俄，性质纯属爱国。然而，清廷诬指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予以严厉镇压。当运动濒于绝境时，章士钊、章太炎等人发表革命排满檄文于《苏报》，将运动引向反清。东京留学生刊物对《苏报》的呼吁反应极为强烈，认为是"最富于种族思想之报纸。而《革命军》一书，则唤醒民族主义之钟声也。"[52]大声疾呼："满珠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53]《苏报》案发生及特派员请愿失败后，激进分子对清政府的最后寄望终告破灭，7 月 5 日，秦毓鎏等 15 人发起要求改军国民教育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54]。至此，留日学界的反清意向公开转化为结社行动。

孙中山是 20 世纪初中国革命党的代表形象，留日学生由爱国转向革命，必然以孙为皈依。正如章士钊所说："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人物，吾其悬孙以为之招，诚以其倡革命于举世不言之中，争此不绝如发之真气，深足为吾国民之先导。"坚信"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55]前此，由于兴中会宣传不力，知晓孙中山生平思想者为数不多。拒俄运动后，出现了一批宣传孙中山的报刊书籍，如章士钊译《孙逸仙》，金一译《三十三年落花梦》，田野桔次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等，《江苏》、《大陆》、《警钟日报》、《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广东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或以传记形式介绍其宗旨活动，或不时登载其文章、通信，报导有关言行。如留学生的《江苏》杂志刊登国学社《三十三年落花梦》告白，称孙中山为"支那革命大豪杰"[56]。秦

力山为《孙逸仙》作序，对孙推崇备至。这使孙中山在知识界的知名度大为提高。“于是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57]黄兴1904年重返日本后寻求宫崎寅藏帮助，就是因为读了《三十三年落花梦》。[58]

与此相反，梁启超政治上急剧倒退，使其在与时俱进的爱国青年中的影响骤然衰落。拒俄运动由爱国激变为革命，为梁启超始料不及，于是一变从前的鼓励支持为大加责难。他抱怨道：“自东京学生运动之义倡，不能损满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搁自己功课。或鼓其高志，弃学而归，归而运动，运动而无效，无效而惧丧，惧丧而堕落，问所赢者几何，曰废学而已。”认为民气太盛，要“敛之使静”，并批评留学界报刊竞相鼓吹种族革命：“一年以来，东京学界之杂志，彬彬辈起，突飞进步。然迹其趣旨，似专以鼓气为唯一法门。此倾向日甚一日，其发论之大轶于常轨者，往往有焉矣。”[59]留学生撰文批驳道：“且梁子生平为文，亦岂有他长哉，不过在他人一言可了者，彼则剌剌不休，重复杂沓，以盈其篇幅耳。”“若《新民丛报》、广智书局等，固诩诩以葛苏士辈大豪杰之事业自比，而天下亦谬认之者也。今若此，其欺骗之工，贼害之甚，吾虽欲为当事者讳，吾安得不为天下正告之乎？”[60]1903年底，梁启超从美洲返回日本，看到“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认为“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因而“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61]，公开反对共和革命。其逆流而动之举，为留学生所不齿。陈天华驳斥将留学生的激进言行归之于“康梁之党”的陈词滥调说：“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62]《江苏》杂志更公开鼓吹：“宁为革命鬼，毋为立宪狐。”[63]留学生对梁启超的指名批判，是前所

未有的新气象，既有助于清除其在留学界的影响，也配合了孙中山对保皇派的反攻。

留学界的革命分子与孙中山由思想共鸣到组织结合之间，还有过独立组建团体的尝试。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不久，派遣黄兴等运动员归国，原计划是筹集经费，联络团体。由于清政府镇压爱国运动，合法活动的条件不复存在，黄兴、杨毓麟等人遂转而筹划起义暗杀。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64]他们与国内激进人士相结合，一面办报印书，鼓吹排满革命，一面建立组织，实行武力反清，产生了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岳王会等小团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华兴会。

华兴会成立于湖南长沙，成员多隶湘籍，但入会的留日学生却不限于湖南一省，如秦毓鎏（江苏）、叶澜（浙江）、张继（直隶）、翁浩、郑宪成、林獬（以上福建）、金华祝、周维桢、张荣楣、万声扬（以上湖北）、苏子谷（广东）等。他们在会中起到骨干作用。华兴会会员多达500人，其中不少是省垣明德、经正、实业等学堂学生，而归国留学生则担任各校教职。华兴会所设总机关东文讲习所及联络机关作民译社，主持人亦为留日学生。

在留日学生的主导下，华兴会能够破除畛域之见，力争发动全国大起义。立会之初，黄兴即要求会员“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65]以后，华兴会在沪设立联络机关，并派人前往鄂、皖、浙、赣、川、桂等省联络同志，期于一省发难数省响应。黄兴等人具有如此见识抱负，既得益于传统士人天下观和大文化意识的熏陶影响，又是留学生国民国家观念日臻完善的表现。1902年后，留学生认识到，“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存竞争之恶风

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66]，相继发起建立各省同乡会，并声明："非敢自相畛域也，实智力之小，尚未足以谋远大也。"[67]尽管如此，不久也弊端丛生，"神田之留学生会馆，不和之气，扑人眉宇，同乡桑梓之称谓，塞于耳鼓"[68]，于是很快有人出来呼吁："拔省会之精华而建为统一会"，消除省界，注重国界，共组"各省协会"[69]。拒俄运动兴起后，邹容"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计划各省设总部，各府县设分部，"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70]表现了以拯救全中华为已任的胸襟气度。正如《苏报》所说：留学生"以留居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71]他们组织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不仅不受省界限制，而且突破民族隔阂，以全体国民代表自认，甚至满族学生亦可报名入会。

拒俄运动转向革命后，留日学生进一步分化，对于为数有限的革命分子而言，使之联系聚合的不是地缘乡谊，而是反对清朝统治的共同志向。发起改变军国民教育会宗旨的15人分属江苏、福建、浙江、四川、湖南、安徽、江西等7省（陈定保原属《新民丛报》社，省籍不明，其兄陈定友与陈去病交善），参加华兴会的留日学生也来自多个省份。当然，不排除华兴会中某些人（如刘揆一）地域观念较浓厚，但该会成员湘籍居多，因而带有地域色彩，则不是主观上的畛域之见造成，而是客观环境的局限使然。

华兴会的致命弱点在于没有系统纲领和严密组织，除仿照日本军制设立指挥机关外，本身几乎无组织机构可言。与该会关系密切的武昌科学补习所，更是公开设立的业余学校。它们或是起义的临时编制，或是同志聚会的外在掩护，而非恒定的近

代结社形式，不能满足知识界的组织需求。这就为留学生与孙中山结合，建立全国大团体产生了驱动力。

1903年风云变幻的大好时机，因孙中山远赴安南而错失。7月下旬，孙中山返抵横滨，到9月26日离日赴檀香山，前后滞留日本二月余。在此期间，他与留学生频繁接触，据冯自由记："各省留学志士先后访谒总理者，有程家柽、刘成禺、叶澜、董鸿祎、翁浩、郑宪成、杨度、时功玖、李书城、程明超、吴炳枞、马君武、杨守仁、姚芳荣、李自重、胡毅生、桂少伟、伍嘉杰、黎勇锡、区金钧、卢牟泰、郭健霄、刘维焘、饶景华、李锡青、卢少歧、朱少穆、廖仲恺、张崧云等数十人。""一时京滨道上往还频繁，总理所居，座客常不空也。"[72] 孙还嘱托他们"物色东京同学之有志者，参加结社，以待时机"[73]，并设立军校，组织自费生有志于军事者入校学习。这时留日学界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为革命风潮最盛时代，主革命论者大占多数，非革命论者几不齿于同类。其人愈后至者愈激烈，专以运动秘密为职志，不喜入校。"[74]而且经过军国民教育会倡改宗旨的风波，反清革命已呈公开化，孙中山又久怀"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75]的计划，却没有与留日学生共组团体，原因如下：

1."鉴于己亥秋与梁启超联合组党计划之功败垂成，迟迟未敢著手。"[76]加上兴中会的海外阵地多为保皇会夺占，以致孙中山抵檀时大有今非昔比之慨。其当务之急，乃是反击保皇党，恢复巩固在华侨中的声望影响，为建立革命大团体创造条件。没有兴中会对保皇派的胜利，留学生难以看到革命党的力量。

2.当时留日学生统共不过千人，以省计，陕西、山西各1人，广西2人，贵州7人，河南8人，山东10人，云南11人，川、赣、皖等省不过二三十人[77]，而且政治倾向不一，即使组党，也难以

达到预期目的。

3. 留日学生参加军国民教育会以及捐款者虽达 500 人，但该会性质为爱国，方针为运动政府。7 月 5 日大会上，秦毓鎏等发起改变宗旨，保守怕事者当即退会，引起大分裂，导致组织解散。对此孙中山不能不有所顾忌。

4. 孙中山抵日时，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已相继归国，留在日本者则因活动屡被清廷密探告发而转入秘密。《江苏》第 5 期载文总结道："夫革命而昌言于道，演说于市，报告于册，签名于籍，摄影于片，惟恐人之不速晓，乃国民未有经验，亦其中过渡之一阶级。至于实行之顷，有不得不用秘密之运动者矣。"[78] 所以，军国民教育会解散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不再见诸报端。而"新组织之暗杀党"，亦"尚无成绩"[79]。

5. 是时孙中山及兴中会财政上再陷窘境。本来孙此行准备前往布哇省亲，原计划 8 月 8 日离日，因旅费不足，迁延两个月之久。最后还是向黄宗仰挪借 200 元，方能成行。在东京时，孙"遍觅旧同志，无一见者，心殊怅怅，故有一走九州之意，又以资不足，不果"，令其"大有今昔之感也。"[80] 所以后来他从布哇函告平山周："以经济困难，退守此以待时机耳。"[81] 一贯困扰兴中会的财政难题，再度使孙中山情绪低落。

6. 留学生从转向革命到心悦诚服孙中山，需要一个过程。作为先觉者，他们普遍对地位使命自视甚高，认为对于腐朽的上层社会是"革新之健将"，而对蒙昧的下层社会则为"指向针"[82]。"是留学界者，对乎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无有过于是者。"[83] 舆论的推崇赞誉，也加重了他们的自负心理。直到 1905 年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时，仍有人表示："人不可失自尊心也，孙君英雄，吾独非英雄乎？

若之,何其崇拜之也?"[84]加上这时留学生尚未认识到革命纲领理论的重要性,青山军校成员没有切实宣传孙中山的新订纲领,参加其他团体时,也未加以传授。因而还不能视孙中山为理想的领袖。

就主客观两方面而论,1903 年成立革命大团体的条件都不够成熟。留学生对革命宗旨的认同要发展为和孙中山组织结合,还须假以时日和机会。

三 翘首以待

1902—1904 年,国内学界反抗专制的风潮此起彼伏,接踵不断,波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的各级各类学堂。清政府对此极为不安。张之洞视察京师大学堂时,"在座中所论,深以学界风潮为忧,谓庚子时此风尚不过汉沪一隅,乃不过三年,已遍大陆,可畏实甚。"[85]到 1904 年底华兴会起义失败及万福华事件后,国内政治风潮渐趋平静。《大陆》杂志载文《革命狱与谋刺案之影响》说:"湖南革命狱始兴,学界骤为之暗,上海谋刺案继起,政界大为之惊,……连日枢府与管学大臣互谒密商,颇耸观听。各学堂学生骄态锐减,有失其常度者。"[86]在高压与腐败下,1904 年底至 1905 年再次出现国内激进学生东渡热潮。许多拒俄运动中归国的留日学生在国内无法立足,也纷纷重返日本。两年内留日学生总数从 1300 人激增至 8600 人,除甘肃外,各省均有大批学生留日。清政府派遣留学生,意在巩固和改善统治基础。然而,数千中国学生聚集日本,在东京形成一个政治活动中心,为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

1903至1904年初,留日学生的革命倾向一度有所削弱,原因之一,激进分子大都归国运动革命,各省同乡会所办刊物又相继停刊,因而影响了对留学界本身的宣传。原因之二,大批新到学生良莠不齐,特别是清政府所派学习政治、警务者,多为保举的官绅,使留学生的成分发生较大改变。1904年,仅在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就读的官绅即达300人,占留日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87]"其游学也,多含有保举之目的,故人类不齐,棍骗及宿娼之事,所在多有。"[88]《大陆》杂志说:"三期为官费生最多时代,如山东,如两湖,如四川,动派数百人,其人非纨绔即腐儒,大都舍图功名富贵以外无他志。"[89]1903年底俄事风云再起时,留日学生仍有200人集会,准备重编义勇队。而日俄开战后,"东京留学生之归国者接踵于途,其在留者则足不敢出户,迥异曩昔者慷慨激昂奔走号召之态矣。"[90]连清驻日公使也说:"近年此间留学生多知向学,较前安静。"[91]这种情形曾引起国内一些报刊的尖锐批评。

然而,留学生身处海外,耳濡目染近代社会风尚和自由民权思想,有感于时事的刺激,国家民族意识迅速增强。1904年,国内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留日学生遥为响应,如反对湘绅张祖同私售开济轮船公司与日人事,皖抚聂缉规出卖皖省15州县矿产事,粤汉铁路废约事,严拒德国要求江苏狮子山作练兵场事,潮汕铁路案,川汉铁路自办事,峻拒法人要求在蒙自等地设立民政厅事,俄兵在沪杀害周生有案等,或通电抗议,或募捐筹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编有《东京留学》歌唱道:"留学生留学生,光辉灿烂留学生,少年人少年人,文明古国少年人。祖国有我生颜色,为国为民是天职。我为祖国增光荣,敬业乐群进无穷。"[92]不过,由于学生成分改变,保皇势力重新抬头。胡汉民曾对这个

时期留日学界的状况做过一番概括描述:"其时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杂糅以上种种分子,而其政治思想则可大别之为'革命'与'保皇立宪'两派,而其时犹以倾向'保皇立宪'者为多。"[93]

对于留学生的爱国行动,清政府故技重施,驻日公使指留学生为"好事之徒","不过借公愤以博名誉",虽然碍于"此间无治外权,不能查究",仍"设法劝阻"[94]。留日川生为争取川汉铁路自办,集议三日,筹款三十万金,作书呼吁全蜀父老同胞起而争路权,以免"全蜀将为东三省之绪。"[95]但川督锡良信任私人,委派贪官承办铁路事宜。留学生大失所望,著文痛斥道:"呜呼!今之官场狼心狗肺如是,稍有人心者,宁不起破坏思想哉!"[96]在内地革命分子陆续东渡的推动下,留日学生的政治态度渐趋激烈。1905年初议请归政立宪之事,反映出这一变化。先是,梁启超指使同党邓孝可提出公议意见6条,要求清廷归政立宪。各省同乡会相继开会讨论,山西、江苏、浙江、湖北等省表示中立,湖南、两广、直隶、安徽、福建、云南、江西、山东、贵州等省则予以反对,广西同乡会还明确提出:"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97]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大会,反对者占十分之九。与此同时,各省学生纷纷发表反对川策议论于会馆参议簿,"即四川学生,亦不尽赞同。"[98]保皇派的预谋遂告失败。事后,留学生会馆干事"以祖国艰危,拟将会馆章程大行整顿,一经公决,则此后联络全体,振起精神,正为他日之预备。"[99]连官绅出身者也有不少转向革命。同盟会初期成员,即以这两年东渡者居多。

随着留学生政治倾向日趋激进，一些以反清革命为职志者感到，须将个人的分散行动变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以增大能量，相继发起建立一些秘密小团体，如秋瑾、刘道一等人的十人会，仇鳌、余焕东等人的新华会，梁耀汉等人的义勇铁血团，邓家彦、康宝忠等人的“革命团体”等。冯自由、梁慕光等在横滨发起洪门三合会，两次加盟的留学生达数十人之多。这些小团体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和系统组织，有的甚至“没有甚么名称，只叫革命团体，也没有首领”[100]，而且规模小，没有统一行动计划和纪律，约束力不足，聚则为团体，散则无组织。如义勇铁血团成员归国后，“皆因各谋私事，不能履行原订计划。二三有志者又苦于孤掌难鸣。”[101]这种未脱雏形的团体甚至旧式结社也能吸引留学生，可见他们组织追求的迫切。

1904年万福华事件后，清政府加紧搜捕反清志士，东京一时间成为革命分子的渊薮。此后半年间，留日学生至少有过三次联合组党的尝试。先是程家柽、潘赞华等因各省革命分子渐次东渡，“力为联合革命之说，日以益振”[102]；继而光复会成立不久，陶成章约魏兰赴东，“乙巳正月，与魏等晤于东京；并与黄兴、蒋智由、陈威、陈毅、秋瑾、彭金门各志士，共磋商”[103]；再者黄兴、宋教仁等到东京后，“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104]但均未成功。原因之一，如冯自由解释：“顾以各派势均力敌，未能集中力量，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政府抗衡。”[105]秦力山剖析当时进步知识界的状况道：“今日风气固已大开，其稍动爱国之感情者，较之三年前已不啻千倍，则决计牺牲一身以报国家者，亦不啻什百。是则昔有所谓党而惜其无人，今有所谓人而忧其不党。”尤其是学生社会中，“一则以小团体中志节之腐败，遂刺激而离其群，不得已而欲以独力一泄其孤愤；

一则多由外界对于本团体感情之恶，不欲以众浊而混其一清”，因而“志士皆以结党为畏途，反趋于单独主义”，“以立大党为志者，殆绝无也。”[106]

原因之二，建立革命大团体，需要有理论为引导和凝聚，特别是其主体为新式知识分子时，更要求理论的相对完整与系统。胡汉民二次到东时，在留学界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著作，“惟邹、章只言破坏，不言建设，只为单纯的排满主张，而政治思想殊形薄弱，犹未能征服留学界‘半知识阶级’之思想也。”他因而与朱执信等人努力钻研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犹未得革命实行之要领。”[107]可见留学生已认识到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却无人能够承担总结提倡的重任。

原因之三，从留日学界的实际状况看，既有各团体均不足以成为中枢核心。光复会虽与留日学生关系密切，但主要力量在国内；湖北科学补习所成员星散，留在武汉者另组日知会；留学界中只有华兴会影响较大。而华兴会并非定型的团体，长沙起义不果，组织运作即近停顿。黄兴等人逃亡到沪，很快“又相共立一团体在上海新马路余庆里，颜面曰‘启华译书局’”[108]，推杨毓麟为会长。不久，因万福华事件牵连，组织复遭破坏。东渡日本后，原华兴会会员过从甚密，但多为个人交往，而非团体聚会。宋教仁发起《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曾邀黄兴参加，而黄不表赞同。陈天华主持东新译社，虽一度担任《二十世纪之支那》总编辑，但尚未发刊即因故辞职，并引起社内冲突，一部分人随之退出，几乎导致杂志社坍台。该社成员主要是宋教仁在湖北读书时的同学，陈天华辞职后，由程家柽接任总编辑，黄瀛元充当总庶务，除宋教仁外，在东京的华兴会员很少与《二十世纪之支那》发生联系。所以，该社与华兴会并无任何组织关系，既非后

者主办，也不是外围机构。另据程潜回忆，1904 年底黄兴等联合滇、苏、豫、直等省学生组织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109]，一说 1905 年湘鄂学生还组织过大湖南北同盟会。[110]但宋教仁日记中毫无反映，至少可以证明他本人及《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未与其事。[111]据查，1903 年 5 月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 5 期已刊登“大湖南北同盟会”的广告，该会是为打破同乡会界限而成立的跨省联合机构，并非秘密团体。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询问陈天华等人：“此间同志多少如何?”陈只是“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112]。至于黄兴等人讨论是否加入“孙逸仙会”，是因为孙提出要“联络湖南团体中人”，而华兴会尚未宣告解散，才有此不了了之的善后会议。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光复会仍有组织脉络可寻，只有华兴会完全消失，也表明其早已名存实亡。

华兴会务不振，原因在于内部。长沙起义失败后，除张继外，会员中的它省留学生多未重返日本，而抵日的会员又发生分裂，徐佛苏、罗杰、薛大可、杨德邻、陈其殷等人为梁启超所诱，纷纷倒戈，甚至陈天华亦为之所动，“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留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113]宋教仁等人也和立宪派较多接触，不仅《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中有倾向立宪者，宋还一再拉立宪派的雷道亨和《新民丛报》社的蒋智由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撰写发刊辞，并屡次向王璟芳约稿。[114]这些异动引起留学生的不满和批评。《警钟日报》刊登署名“青桐”的来稿《呜呼保皇党之傀儡》，揭示其原因道：“其或有新渡之士，于世界大势民族之谈，见之未真，而梁氏乃鼓其簧舌，俾以先入之言为主；又或实行之徒，累逞不得志，而梁氏乘其颓丧之顷，阴说以渐进之利。凡此种种，谅亦有之。”要求“亟

当严整自治之法团，歼其对待不肖之种子”[115]，从留学界清除梁启超的傀儡。缺乏完整纲领、系统理论和严密组织的华兴会，不能为革命活动提供方向指导，在思想和组织上抵拒保皇派的侵袭，团聚广大学生。所以，尽管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是精明强干的活动家宣传家，但华兴会却不能成为留日学生的革命中坚。[116]黄兴等人对此或许早有认识，因而每每准备另树旗帜，而不再使用华兴会的名义。

原因之四，孙中山在布鲁塞尔建立革命团体后，即由留欧学生作函介绍于东京的但焘、时功玖、耿觐文等人，程家柽、邓家彦等亦间接获悉。这时通过书刊宣传和宫崎寅藏等的介绍，留日学生对孙中山已有较多认识，均翘首望其东来。黄兴等欲组建团体时，程家柽力阻之，说：“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117]另据曹亚伯记：“黄兴来后，欲结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而戊戌政变后长沙时务学堂逃去之一班学生，如杨度、范源廉等，俱不愿戴黄兴为首领”[118]，于是黄兴也期待孙中山的帮助。

1905 年的留学界，革命风气蒸蒸日上，建立一个革命大团体成为迫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但群龙无首，漫无组织，最后的促成有待于孙中山的扬帆东航。

四　百川归海

拒俄运动后，孙中山趁革命风潮鼓荡之机，从思想上组织上

对保皇派发动反击，成效显著，其影响不仅限于美洲，上海的《大陆》、《警钟日报》、香港的《广东日报》，都报导过有关情况。同时，孙中山基本完成其革命理论的创建，将除旧与布新融汇贯通，可以满足知识界的精神需求，这就为吸引留学生，建立革命大团体提供了思想基础。

1904年底，孙中山自美洲抵欧，在布鲁塞尔首创革命团体。据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孙中山曾与之就以会党还是以新军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问题，辩论三日夜，最后孙接受其意见，才决定“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119]一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孙中山至此仍对知识分子采取轻视态度。[120]这样一来，1905年同盟会成立于留日学界似乎纯属偶然。但从各方面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武装起义依靠新军还是会党，并不涉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整体地位与作用，更无轻视之意。理由如下：

1.刘成禺说：“甲辰先生由日来美，谋开党之大团结。先生曰：‘自《苏报》邹容《革命军》发生后，中国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气象，但无纲领组织，徒籍筹款，附党于三合会，不足成中国大事也。’乃谋设同盟会，指挥事业。”[121]则孙中山聚集知识分子组建革命团体的计划不自比京始。此回忆可以从孙中山在美洲所写致公堂公启得到映证：“近者各省读书士子游学生徒，目击满清政府之腐败，心伤中华种族之沦亡，莫不大声疾呼，以排满革命为救汉种独一无二之大法门。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实事尚未能举而措之施行也。”[122]这与其他革命党人的看法不谋而合。被视为孙党的秦力山鉴于留日学生皆具爱国心，“以学生之力量，则虽有千百满政府，已不足以当之”，因而主张立党联络，协调指挥，以制造“畅

行其志"[123]的时机。

2. 与孙中山历来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相吻合。如前所述，他很早就从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极端重要，并制定了相应的争取联络计划。1901 年春，在与美国《展望》杂志记者谈话时，还特别表示了对留学生的器重："他拥有一批优秀的、被他称为现代中国青年的追随者，他们曾在英国、火奴鲁鲁和日本等地受教育，其中一些人家道殷实，必要时能为革命提供需要的资金，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拯救祖国的唯一方法。"[124]这表明他对留学生早予信任。即使在美洲与保皇派奋战之际，仍关注留日学界，嘱咐"在东国同志，暂为坚守，以待好机之来。"[125]

3. 其他当事者如贺之才等人的回忆，仅涉及如何使用新军与会党的分歧。

4. 朱和中本人在《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一文中，对同一事情的记载大不相同：孙中山"问予等将来成事之方略，予答以改换新军之头脑，由营中起义。先生不肯信，谓兵士以服从为主，不能首义，首义之事，仍须同志自为之。"并要求改革会党条规，"使学生得以加入，领袖若辈，始得有济。"[126]非但没有轻视知识分子之意，反而主动提出以其为主导。当时革命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华侨、会党和知识界，孙中山既然打算组建新型革命团体，实行民主革命，知识分子便是他唯一的选择。

1905 年 7 月，孙中山抵日，在留学生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下，积极联络，组党活动进展顺利，甫一月而同盟会宣告成立，除甘肃无留学生外，各省均有人加盟。孙 7 月 19 日方到日本，在横滨逗留数日后转到东京，7 月 30 日就召开筹备会议。短短 10

天内取得硕果，除留学生的拥戴外，还有具体原因。首先，孙中山组建大团体的主张，与知识界激进分子的愿望契合。1904 年底，上海《警钟日报》即呼吁"增进国民之程度，鼓舞其民气，统一其主义，同心合一，团结一大团体，以养成我国国民共和政体之资格。"[127]1905 年 6 月，秦力山撰写《说革命》长文，探讨革命的宗旨方法，特别强调立党设总机关的重要。他说："吾国二十世纪劈头一大杀风景事"，便是"昔有党而无人，今有人而无党"。如果"革新之运动，不能一致而群策群力，则效力恐终难望也。"在列举无大团的种种流弊后，他进而指出："故支那人不欲新其国则已，若欲新其国，则决非联为一致不可。若欲联为一致，其非有一国民总机关不可。"呼吁抓住"千载一时之机会"[128]，立党救国。

其次，孙中山对于争取留学生已有所部署，而且身体力行。1903 年他即嘱托马君武、胡毅生等"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129]。到日本后，又在京滨两地连续会见留学界各方代表，发动争取，使组党工作加速进行。

再次，程家柽等人的大力协助。两年前他们接受孙中山的委托后，即开始联络发动。胡毅生在广东学生中将孙的"言行介绍于众，众皆兴奋，渴欲一见。"[130]马君武对广西学生，程家柽对两湖学生及《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也做了大量工作。孙中山抵日前，他们将消息广为传布，"同人欢动"。孙抵横滨，"复由程家柽传告，东京学生往来京滨之间者甚伙。"[131]此后，他们一面加紧联络，一面为孙中山引荐。出席筹备会议人员亦由他们通知到会。所以，孙中山后来说，同盟会的成立，马、胡等"多有力焉。"[132]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是兴中、华兴、光

复三会的组织联合。但出席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0余人中，属华兴会的为黄兴、宋教仁、张继、陈天华、刘道一、柳扬谷等6人，属兴中会的为孙中山、冯自由、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等5人。光复会仅蒋尊簋1人，总共不过12人。加上属科学补习所的曹亚伯、余诚，属革命团体的邓家彦、康宝忠，原来有组织系统者仅16人。而且光复会本部未与其事，该会的秋瑾虽在东京，到8月27日才加盟。邓家彦称其团体成员“一起都加盟”[133]，实为后来陆续加入。《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成员也不是集体转入。华兴会员讨论的结果，决定听凭“个人自由”[134]，不加组织约束。这时华兴会已经分裂，一部分倒向保皇派，有的虽倾向革命，但不愿加盟，如章士钊、刘揆一。这次会议等于宣布解散。尽管同盟会初期两湖留学生举足轻重，出席筹备会的70余人中，湖南20人，湖北19人，占54%强。但华兴会不能代表两湖学生。孙中山争取华兴会，只是整个联络活动的一部分，认为同盟会顺利建成是因为得到华兴会支持的看法，不免以偏概全。孙中山曾设想过团体联合，却未能实现。集体转入同盟会的，只有兴中会一家。显然，同盟会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团体联合的观点，抹杀了多数会员的作用，还影响对后来同盟会内部分歧的认识，似乎会中仍有几个潜在的组织系统，夸大地缘派系的矛盾，实际上贬低了同盟会的地位和意义。

同盟会的成立加速了留日学界的革命化。到9月，入会者已有三、四百人[135]，一年后，更达万余留学生之过半数。[136]在同盟会的旗帜下聚集着各地革命知识精英，使中国革命有了领导中枢，能量大增。“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目睹众多“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文武才

技俱有之"的"饱学之才"投身革命，孙中山不禁欣喜"中国前途诚为有望"[137]，"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138]

知识分子是全社会首先觉悟的部分，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更是新知识群的先锋。一个全国性革命大团体的组建，有赖于他们的数量增长和质量变化。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国内的学界风潮，是20世纪初中国学生革命化的两条主线。留学生多从反对民族歧视，维护争取民族权利起步，由爱国走向革命，国内学生则首先破除学堂内部的专制腐败，逐渐上升到反对皇权专制统治。两条主线相互激荡，东京革命中心终告形成。同盟会的成立，正是孙中山长期努力和新知识界革命化的必然结果。

注 释

[1] 《革命逸史》，初集，第81页。吴禄贞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到日本，沈翔云于1899年赴日(《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

[2] 《秦力山集》，第158页。

[3] 据《开智录》改良第1、2、3期，该刊得到43人及励志会捐款共199元。捐款者多为与孙中山、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横滨侨商，所捐多则15元，少则1元。其中无名氏3人，隐名氏1人。

[4] 《革命逸史》，初集，第82页。

[5] 湖南同乡会的《游学译编》创刊虽早两个月，但最初纯为译文。以后受其他杂志影响，才增加论著。

[6]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49—50页。

[7]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8]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

[9]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

[10] 《湖北官费学生程明超捕房纪事》，《大陆》，第1年第3号，1903

年2月。

[11] 《孙文之言》,《大陆》,第2年第9号,1904年11月。

[12] 《革命逸史》,初集,第31页。

[13] 《革命逸史》,第3集,第131页。

[14]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15]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

[16] 《革命逸史》,初集,第10—11页。

[17]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38页。

[18]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6—17页。

[19]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丛报之进步》,《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3月26日。

[20]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22页。

[21] 《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记》,《政艺通报》,壬寅第20期。

[22]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80页。

[23] 《蔡星使钧致外务部书》,《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8日。

[24] 《中国旬报》,第35期,1901年1月15日。

[25] 《刘云龙》,《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26] 《嘉兴演说会解散事》,《浙江潮》,第6期,1903年8月12日。

[27]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1页。

[28] 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中兴日报》,1909年1月19日。

[29] 1903年4月15日《与勉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30]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页。

[31] 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中兴日报》,1909年1月19

日。

[32]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69—270页。

[33] 《日本留学界之片影》,《大陆》,第2年第6号,1904年8月。

[34] 《诋诽游学》,《新民丛报》,第10号,1902年6月20日。

[35] 《秦力山集》,第159页。

[36] 《中国留学生新年会纪事》,《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8日。

[37] 《离合篇》。《大陆》,第1年第8号,1903年7月。

[38] 《附记一则》,《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4日。

[39] 《国闻短评》,《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18日。

[40] 《蔡使第二次要求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18日。

[41] 《秦力山集》,第159页。

[42]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8页。

[43] 《革命逸史》,初集,第104页。

[44] 《满洲留学生风潮》,《选报》,第51期。

[4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2页。

[46] 《满洲留学生风潮》,《选报》,第51期。

[47] 《江苏》,第1期,1903年4月。

[48] 《成城学校运动会补悬龙旗事件》,《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6日。

[49] 《成城学校留学生罢运动会》,《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50] 《刘云龙》,《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51] 《刘云龙》,《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52] 《逮捕政策之里面》,《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

[53]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4期。

[54] 《革命逸史》,初集,第111页;《特派员之还东》,《浙江潮》,第6

期,1903年8月12日。

[55] 黄中黄:《孙逸仙》,《辛亥革命》(一),第100页。

[56] 《江苏》,第7期,1903年10月20日。

[57]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3页。

[58] 陈鹏仁译著:《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第194页。

[59] 《答飞生》,《新民丛报》,第40、41号合刊,1903年11月2日。

[60] 今世楚狂:《论广东举人梁启超书报之价值》,《大陆》,第7号,1903年6月。

[61] 《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3页。

[62] 陈天华:《复湖南同学诸君书》,《苏报》,1903年6月14日。

[63] 《江苏》,第6期,1903年9月21日。

[64] 《革命逸史》,第5集,第61页。

[65]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277页。

[66] 《湖北同乡会成立缘起》,《湖北学生界》,第1期。

[67] 《湖北调查部记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1期。

[68] 《离合篇》。《大陆》,第1年第8号,1903年7月。

[69] 《非省界》,《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东京来函续录》,《苏报》,1903年4月17日。

[70]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

[71]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

[72] 《革命逸史》,初集,第133页。

[73] 胡毅生:《同盟会成立前二三事之回忆》,《革命逸史》,第5集,第36页。

[74] 《日本留学界之片影》,《大陆》,第2年第6号,1904年8月。

[75] 《革命逸史》,第4集,第18页。

[76] 《革命逸史》,第4集,第18页。

[77] 《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公款派遣学生书》,《浙江

潮》,第7期。

[78] 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5期。

[79] 《秦力山集》,第159页。

[80]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8页。

[81]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8页。

[82]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

[83] 《教育通论》,《江苏》,第4期。

[84] 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期。

[85] 《筹论停科》,《新民丛报》,第34号。

[86] 《大陆》,第2年第12号。

[87]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学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八,第34页。

[88] 《秦力山集》,第159页。

[89] 《日本留学界之片影》,《大陆》,第2年第6号,1904年8月。

[90] 《留学生之狼狈》,《大陆》,第2年第2号。

[91] 《驻日钦使电告日本留学生情形》,《大陆》,第3年第3号。

[92] 《新民丛报》,第3年第3号。

[93]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2—13页。

[94] 《驻日钦使电告日本留学生情形》,《大陆》,第3年第3号。

[95] 《东京留学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新民丛报》,第3年第10号。

[96] 《东京留学界天君蜕与本馆记者书》,《大陆》,第2年第12号。

[97] 《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大陆》,第3年第2号。

[98] 《告读者》,《大陆》,第3年第3号。

[99] 《东京留学生会馆整顿章程》,《大陆》,第3年第3号。

[100] 居正修记录:《访问邓家彦先生第一讲》,《开国文献》,第1编第11册,第343页。

[101] 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

第5页。

[102]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

[103] 张篁溪:《光复会首领陶成章革命史》,《辛亥革命》(一),第523页。

[104]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

[105] 《革命逸史》,第2集,第136页。

[106] 《秦力山集》,第163—164页。

[107]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6—17页。

[108] 《宋教仁日记》,第11页。应为启明译书局。

[109]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70页。

[110]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382页。

[111] 日本菊池贵晴所著《现代中国革命の起源》称大湖南北同盟会由宋教仁发起,不知所据。

[112] 《宋教仁日记》,第90页。

[113] 《宋教仁日记》,第31页。

[114] 王璟芳原为《湖北学生界》编辑,有资料说他参加过社内秘密排满同盟,待查证。

[115] 转引自《广东日报》,1895年3月15日。作者疑为章士钊。

[116] 辛亥以后,一些华兴会员或与之有关的人,对该会的作用有所拔高,表现为:一,提早黄兴等人实行革命和华兴会正式成立的时间;二,夸大万福华事件后华兴会的组织活动及其在同盟会组建中的作用。前者如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归国不是发动革命,至少在抵武汉前,他没有实行武力反清。1903年11月4日,陈天华、章士钊、张继、秦毓鎏、苏玄英、翁浩、杨毓麟、吴禄贞、谭人凤、刘揆一、柳大任、龙璋等人不在长沙,华兴会只是着手筹备。后者如乙巳黄兴回湘起义之说,已被订正(毛注青:《黄兴乙巳回湘历险订谬》,《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

[117]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

[118]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 15 页。

[119]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6 集,第 6 页。

[120] 王德昭:《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开国文献》,第 1 编第 11 册; Jeffrey G. Barlow: Sun Yat - sen and the French, 1900—1908;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

[121]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122] 《警钟日报》,1904 年 7 月 2 日。

[123] 《秦力山集》,第 160—163 页。

[124]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10 页。

[125]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41 页。

[126] 《建国月刊》,第 2 卷第 5 期。

[127] 新中国主人:《论共和政体》,《警钟日报》,1904 年 12 月 24 日。

[128] 《秦力山集》,第 163—164 页。

[129] 《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 10 页。

[130] 胡毅生:《同盟会成立前二三事之回忆》,《革命逸史》,第 5 集,第36 页。

[131] 田桐:《同盟会成立记》,《开国文献》,第 1 编第 11 册,第 157—158 页。

[132] 《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 10 页。

[133] 《访问邓家彦先生第一讲》,《开国文献》,第 1 编第 11 册,第 344 页。

[134] 《宋教仁日记》,第 91 页。

[135]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86 页。

[136]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3 页。

[137]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86—287 页。

[138] 《辛亥革命》(一),第 11 页。

附录：

征引书目举要

一、书籍文献

中文：

1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北京，1987年影印本。

2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北京，1958年12月。

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4 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长沙，1983年1月。

5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洲国光社，上海，1953年。

6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6年。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5年2月。

8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2月。

9 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83年6月。

10 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

11 《饮冰室文集》，乙巳本。

12 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北

京，1982 年 9 月。
13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 年 6 月。
14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中华书局，1987 年 1 月。
15 章炳麟:《太炎文录》，上海古书流通处印，1924 年。
16 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太炎文录续编》，武汉印书馆。
17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 年 11 月。
18 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9 月。
19 汪诒年编纂:《汪康年遗著》，1920 年铅印本。
2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2 月—1989 年 12 月。
21 《张文襄公全集》，文海出版社影印，台北，1963 年。
22 《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 年。
23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4 月。
2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 年 8 月—1986 年 7 月。
25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7 月。
26 金天翮:《天放楼文言遗集》，1917 年排印本。
27 蒋维乔:《鷦居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28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台北，1969 年。
29 胡珠生:《〈宋恕日记〉摘要笺证》，《中国哲学》编辑部编:《中

国哲学》，第 11 辑，三联书店，1983 年。
30 蒋永敬：《从吴稚晖的留英日记来补正国父几次旅英日程的缺误》，《传记文学》，第 26 卷。
3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4 月。
32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0 年 9 月。
33 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长沙，1985 年 3 月。
34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台北，1965 年 11 月。
35 《中外大事汇记》，广智书局，1898 年。
36 居正著：《梅川日记》，大东书局，上海，1933 年。
37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1933 年。
38 故宫博物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 年。
39 清国留学生会馆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自壬寅九月起癸卯二月止。
40 清国留学生会馆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自癸卯九月起甲辰三月止。
41 清国留学生会馆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自甲辰四月起十月止。
42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上海，1903 年。
43 《陈天华集》，中国文化服务社，上海，1946 年 1 月。
44 黄藻编：《黄帝魂》，台北，1968 年影印本。
45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 年 8 月。
46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北京，1979 年 6 月。

47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北，1962—1963 年。

48 中国人民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新华书店，1962 年 2 月。

49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新智社，上海，1903 年。

5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华文化服务社，上海，1946 年。

51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 年 6 月—7 月。

5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30 年。

53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上海，1946 年。

5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61—1981 年。

55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59 年。

56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61 年。

5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8 月。

58 《容星桥讣告》，容氏后人家藏。

59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 5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年 6 月。

60 汤志钧编著：《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年 10 月。

61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台北，1969 年。

62 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1988 年 7 月。

63 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8 月。
64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1965 年。
65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年。
66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远东图书公司,台北,1982 年。
67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75 年。
68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71 年。
69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1 年 6 月。
70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 年。
71 黄福庆:《清末的留日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71 年。
72 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8 月。
73 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 80 号,1992 年 1 月。
74 徐蔚南编:《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中华书局,上海,1936 年 9 月。
75 蒋絅裳编:《浙江高等学堂年谱》,油印本,1957 年。

外文已译:

76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上海,1959 年。
77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

梦》,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1年8月。

78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

79 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

80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北京,1983年8月。

81 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辛亥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

未译:

82 日本外务省档案。

83 上村希美雄赠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东京对阳馆所藏兴汉会史料照片。

84 《南方熊楠全集》,平凡社,东京,1971年。

85 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平凡社,1971年。

86 宫崎寅藏:《支那革命军谈》,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7年。

87 菊池贵晴:《现代中国革命の起源—辛亥革命の史的意义》,严南堂书店,1970年4月。

88 上村希美雄:《宫崎兄弟传》,苇书房有限会社,1984年。

89 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98—1、2合刊,1985年。

90 J. Y. Wong: The Origin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 – 1897. 1986.

91 K.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 in Chin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92 Don. C. Price: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96 – 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93 By Marianne Bastid, Translated by Paul J. Bailey: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Michigan University, 1988.

94 萧公权: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1960.

95 Edward. J. M. Rhoo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uangtung, 1895 – 191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96 Jeffrey G. Barlow: 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 1900—1908.《中国研究论丛》,第 14 号, 1979 年。

二 报刊

1 《时务报》

2 《湘学报》

3 《知新报》

4 《国闻报》

5 《清议报》

6 《中国旬报》

7 《开智录》

8 《北京群报》

9 《国民报》

10 《中国日报》

11 《中外日报》

12 《大公报》

13 《译书汇编》

14 《外交报》

15 《苏报》

16 《新民丛报》

17 《文言报》
18 《新世界学报》
19 《游学译编》
20 《译林》
21 《选报》
22 《大陆》
23 《浙江潮》
24 《江苏》
25 《湖北学生界》
26 《汇报》
27 《政艺通报》
28 《湖南演说通俗报》
29 《萃新报》
30 《东浙杂志》
31 《科学世界》
32 《国民日日报》
33 《童子世界》
34 《岭东日报》
35 《广东日报》
36 《江西官报》
37 《湖南官报》
38 《俄事警闻》
39 《中国白话报》
40 《警钟日报》
41 《二十世纪大舞台》
42 《东方杂志》
43 《女子世界》
44 《商务官报》
45 《复报》
46 《中兴日报》
47 《民立报》
48 《民权报》
49 《国民日日报汇编》
50 《国史馆馆刊》
51 《建国月刊》
52 《近代史资料》
53 《光明日报》
54 《珠海文史》
55 《文史资料选集》
56 《岭南文史》
57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58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59 《历史研究》
60 《近代史研究》
61 《辛亥革命史丛刊》
62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63 《孙中山研究论丛》
64 《大阪每日新闻》
65 《东亚同文会报告》
66 《思与言》

出版后记

当前，在海内外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呼声正在兴起——它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它在争辩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它在呼喊中国优秀知识传统的复兴与鼎盛，它在日益清晰而明确地向人类表明：我们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我们还要群策群力，力争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变成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中，三联书店荣幸地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学术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编辑出版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以为华人学者们上述强劲呼求的一种纪录，一个回应。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应本店之邀，组成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完全独立地运作，负责审定书稿，并指导本店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工作。每一本专著书尾，均刊印学术委员会推荐此书的专家评语。此种学术质量责任制度，将尽可能保证本丛书的学术品格。对于以季羡林教授为首的本丛书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工作和高度责任心，我们深为钦佩并表谢意。

推动中国学术进步，促进国内学术自由，鼓励学界进取探索，是为三联书店之一贯宗旨。希望在中国日益开放、进步、繁盛

的氛围中，在海内外学术机构、热心人士、学界先进的支持帮助下，更多地出版学术和文化精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三年十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清末新知识界
作者＝
页数＝３７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